

《阳谋》

作者：丁抒

序言：刘宾雁

贱民岁月廿二年

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统治者把一部历史变为谜语，来训练子民们的智力。在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中，也很难找到一个时期，统治者如此成功地把许多史实隐蔽起来，或肆意颠倒，使国人久久地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

常有国人自责我们这个民族健忘。的确，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不知魏京生为何许人，而西单民主墙之被扼杀，魏京生等杰出的民主运动先驱被投入监狱达十余年之久，才不过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不过，既然中共统治集团严禁中国人和一切新闻媒体提及其事实真相，使魏京生只能作为因“向外国人出卖国家机密”而被判刑的“刑事犯罪份子”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又怎能责怪中国人健忘呢？

假如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出现的不计其数的谎言中，择其要者为十大谎言、五大谎言或三大谎言的话，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必居其中。丁抒先生为中国和为世界写出部取材相当详尽的第一部书，来揭示这场中国史上罕见的民族悲剧的真相，无疑是一个重要贡献。

在事情已然过去三十余年之后，这部书竟然还只能在中国境外出版，并且必然属于中国政府不准入境的禁书，这个事实本身，已足可证明今日中国的当权者既无放弃毛泽东衣钵之意，对于自己曾是这场阴谋的同谋和帮凶也绝无忏悔之心。正由于此，有关反右派运动的许多重要史料仍作为党和国家的“机密”被严加控制。因而，丁抒君尽管做了极大的努力，在此书首版于香港发行后又做了大幅度的补充，但在取材上仍然受到许多限制。一如中国的任何当代史书，这本书的作者也必将在今后的研究中有更多新的发现。

一九五六年，是中国两种发展可能交错并存的一年。苏共对斯大林罪行的揭发和自由化浪潮的兴起，以及中国国内因毛泽东对政治、文化的高压和急速推行经济国有化、农业集体化造成的弊端之暴露，促使中共始修正其一系列政策。

尽管中共中央严密封锁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只准高级干部阅读），先后两次发布《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件，为斯大林进行辩护，反映了以毛泽东为首，中共内部有一种力量不想放弃斯大林道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对“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推行，对知识份子政策的改正，新闻自由的少许放宽，社会学、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之被允许讨论，法制建设的开始和律师制度的恢复等等，使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生机。那年夏季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未公开发表），表明他有意放弃斯大林的经济模式，为中国探寻一条自己独有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又欲通过中国人以有限的自由来克服官僚主义，使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超过苏联，从而表明他比斯大林更高明。

但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证明这个设想是失败了，反右派运动葬送了中国一度出现的走向民主化道路的机会。这并不偶然。正如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所说，党内“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反对”他关于开放言路、鼓励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批评中共的主张。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与个人威望无非是加重了这种倾向而已。

毛泽东有比斯大林高明之处。他对自己的政敌一个不杀，也很少逮捕，甚至还要把属于敌我矛盾”的右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实，毛泽东及其同伙刻意营造的那种特殊环境里长年的贱民地位与非人的生活条件，是对“右派”的慢性枪决。事实证明，这种“慢性枪决”并不比斯大林处置政敌的手段更人道；对于最终仍然死于非命的许多右派份子来说反而要痛得多，对于统治者却更为有利。一百余万名“反面教员”（毛泽东语）散布在全

国各地，朝夕出没于数以亿计的人们面前，无疑是对于所有中国人的无言的警告：哪一个胆敢对中共稍发异议，便必定会得到同样的下场！而那个下场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被剥夺一切而又身败名裂却苟且生存下来的那些右派份子，时时刻刻起着反面教员的作用，向人们昭示着：在中国做人，切不可诚实坦率，切不可过问政治，切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恶感，切不可违抗当权者的意旨，切不可对任何人寄予同情与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将把这些戒条牢记心间，并传给自己的子女。

然而毛泽东没有料到他的打击会是双向的。他在清除异己时，也就清除了党内真正有良心、有智慧、忠于革命理想的党员。中共党内早已存在的左倾势力，以及中共执政后为追逐个人利而拥入党内的新党员则纠集在一起。这些人政治投机，唯命是从，不问是非，打击异己时不择手段，对人民疾苦无动于衷。反右派运动使这些人如鱼得水，逐渐在中共内取得主导地位，使这个党的法西斯成份大大加强。

中国的年轻人或外国人恐怕很难理解，被为右派份子的人当年所揭示、所抨击的种种现象都是事实，所提出的主张也能证明是远见卓识。那么，为什么除极少数人外，所有右派份子都认了罪，顺从地接受了长达二十余年悲苦的贱民命运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九五七年那场为时虽然很短的“鸣放”浪潮（不到一个月），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见到的言论自由。那些对中共的批评和这种难得的自由气氛，曾在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心中唤起一种希望，广大工人和学生甚至以行动——罢工、罢课和请愿示威等来呼应知识份子对中共的批评。一九五七年五月下旬我在上海，那一个城市便有三十余家工厂的工人到中共市委请愿。然而毛泽东一旦发动反击，全国宣传机器一旦以一个调子鼓噪起来，特别是全国各地工人群众在党委和官办工会操纵下纷纷举行大规模集会“声讨”右派份子，一时间便形成铺天盖地的浪潮，似乎全国人民都和中共站到了一起，而昨天还被视为真理而受到热烈欢迎的种种勇敢的良知灼见，立刻成为“射向党和社会主义的毒箭”；因大胆为民代言而被视作英雄的人物，顷刻间便成了“一小撮敌人”和“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宣传机器的鼓噪和周围的人（包括昨日的知己甚至今日的亲人）的敌意，造成一种难以忍受的孤立感，使右派们知道，党既看中了你，一个不可更改的结论便已在那裏等着你；况且“态度”非常重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只能招来更坏的厄运。假使你已成家，就还要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妻子儿女少受一点牵累的问题。这样，你便不能不逐渐软下来，直至在一份结论上签字，接受一个政治死刑的判决，从此便开始你漫长的暗无天日的贱民岁月。

究竟一九五七年至五八年中有多少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现在就有两个数字：官方宣称为五十五人，而我从一位掌握当年内部机密文件的人士处获悉的数字则是一百零二万。此外还有很多实际上被作为右派处理的人，并未经过必要程序，即他们本来并不是右派份子，因而那些人很可能还不在这百零二万的数字之。

在中国城市裏，几乎没有哪个家庭其亲属与友人中没有什么人是右派的。我和我的朋友们常常惊异地发现，一个小小的聚会中往往就有几个人是一九五七年的“难友”。一个家庭中夫妇同是右派，或兄弟姐妹中有二、三人都被定为右派者，也屡见不鲜。我在香港和美国每作一次演讲，听众中自动上来向我自报身世的右派，总不下数人。而这种演讲，我三年多来在美国三十几个州已做了不下二百余场。况且，有许许多多当年属于依政策不得打成右派的社会集团，如中学生、工人或农民，因而不戴右派帽子，只戴“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的帽子，但后来二十余年的境遇却无异于右派份子。

没有哪个右派份子当时会料到厄运会延续那么久。所有被他打倒的敌人中，毛泽东似乎特别钟情于右派。一九六二年，当毛泽东因他发动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导致三千余万人饿死，以致不得不同意对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人平反时，党内出现了也应为右派平反的呼声。安徽省作为试点，甚至已经给不少人平了反；北京各机关也开始进行。毛泽东赶忙出来制止，说：“对于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不存在甄别平反的问题。”于是全国立即刹车。一些已被本单位领导列入平反议程，遵命写了要求平反的材料的右派份子，则一概被视作“妄图为自己翻案”的死不改悔的右派，处境更加恶化。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许许多多右派份子，包括早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又一次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但是，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下，一些人忽然发现，原来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份子当年便是今日造反派的先驱；而十年前主持反右派运动、把这些人打成右派的人，正是今日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对象——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这就越发证明了右派是冤狂的。而中共党组织这时又已停止活动，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一度出现了为一些右派平反的机会。不过，这种苗头很快就被压了下去。

到七十年代末期，侥幸没有在劳动中冻饿而死，未在屈辱与绝望中含恨自尽的右派份子，大约没有一个对于自己的右派问题有一天会翻案再抱什么希望了。因而，当一九七八年底风传中共中央准备给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平反时，很多人不肯信以为真，按照中共中央五十五号文件，不过是给一九五七年右派中“结论做错的”少数人“改正”结论而已，并不含有任何大规模平反的意图。显然是经过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的极大努力，并经过邓小平的默许，这个文件在实行中才一变而为给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以上的右派全部平反——承认划错，恢复当年的级别、薪金，共产党员则恢复党籍。

二十二年间，从基层到中央，很多当权者是靠一九五七年后卖力推行左倾路线爬上去的。因而，给右派平反遇到极大阻力就不足奇了。毛泽东的“宦官”汪东兴首先反对，拿出毛泽东一九六二年的讲话——“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不存在甄别平反问题”。邓小平随即回答：“不是给右派平反，不过是给结论做错了的人改正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平反，却称做“改正”的来由。大势所趋，即使那些当年在反右运动中中大显身手的人，最终也不得不同意给这些人平反。不过，他们仍然竭力阻止给平反了的右派在政治上和生活上恢复其原有地位。五十五号文件本来规定平反后右派应回到原先的单位中工作的，但由于遭到党内强力反对，不出两个月，这一条就被改为“就地安置”了。所谓牢期满后就业的劳改工厂或农场，可能会给给一份领干部工资的差事，也就是到所在县的县城文化馆当一个干事或中、小学做一名教员。江苏省的新华日报社和黑龙江省的哈尔滨日报社竟不许一个右派编辑、记者回归本单位。原因很简单，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的打手们已飞黄腾达，占据要津，允许右派回到本处工作，则等于使自己的活动的罪证每天展示在所有人面前。况且那些右派在能力和品德上一般都比打手们高出一筹，甚至当年就是后者的领导人，一旦归来，怎么安排他们的地位呢？

且说那些右派，除极少数人外，二十二年来不是被剥夺了全部工资，也是降了几级，绝大多数人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胡耀邦曾提出要给他们补发工资，主管财政的李先念一口回绝：“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由于许多右派与海外华侨有亲属关系，大约在一九八二年，宋庆龄（孙中山夫人）¹代表海外华侨向中共领导人提出：“你们若真的没有钱，我可以建议华侨在海外募捐，用以补发右派的工资如何？我本人也可从我的财产中拿出钱来，如何？”这时，中共中央才不得不再次考虑这个问题，连续提出过几个方案，结果都因遭到抵制而搁置。

这不仅仅是一个对政治受害者给不给予经济补偿的问题，它反映了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中许多人对反右派运动负有罪责而无忏悔之心。邓小平本人的态度就是一种代表。尽管他同意给绝大多数右派“改正”，但仍顽固地认定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是“必要的”，因为确有“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进攻”，那场运动的问题无非是“扩大化”，即打击人过多而已。为了给这种论点提供依据，甚至不得不留下几个当年的重要人物（民主党派的首脑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不予“改正”。又明知理亏，不得不派人去安抚那些人（都已故去）的家属，私下承认这些人也属无辜，但请他们“顾全大局”，即为了党的政治需要而任死者继续将右派帽子戴下去。

邓小平是反右派运动期间党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比毛泽东本人还积极地主张扩大打击面，因而自知罪责重大。从中央到基层，这种“用右派份子的鲜血染红自己顶子”的大有人在。那些一贯左倾的老党员和一九五七年后靠整人起家的干部，自然也是以左倾路线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右派在他们眼中便给终是异类。

一九八一年党和军方保守派发动的第一次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过去的“右派”作家白桦为首要打击对象。一九八七年的第三次“反自由化”运动，最先开除的三名知识份子就有两名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王若望、刘宾雁），一位是反右派运动中被开除党籍的人（方励之）。这绝不是偶然的。中共中央领导集团甚至一度决定把一九八一年那场“反自由化”运动发展为第二次反对资产阶级右派份子运动，只因阻力太大、后果不堪设

想才作罢。

反右派运动给中国造成的伤痛与灾难是至深至巨的。它使中国丧失了一九五六年埋葬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而另辟蹊径的历史良机，走上一条邪路，不仅失去了二十年宝贵时间，并且为以后的中国留下了永远无法治愈或很难愈合的创伤；大好河山面目全非，自然生态和人的生存条件的破坏无以复加；人口恶性膨胀，伴随着人的生理与精神素质严重下降；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庞大、贪婪的官僚集团章鱼般附着在中国的肌体之上吮吸着人民的鲜血；一九四九年以前曾长期为害中国的官僚腐败、盗匪横行、贩卖人口、吸毒、赌博、卖淫等现象现在又在中国重现；又因权力之集中而无能，法纪之阙如和传统道德之败坏，而使社会失去了对于邪恶的任何有效的制约机制。遂使种种罪恶现象洪水般在中国大地上泛滥开来，其势头之大甚于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旧中国。

这四十年来中国历史的唯一尚可称道之处，便是中国人作为人的觉醒。他们再不是那么愚昧可欺了。然而中共当权者如今却正在以加倍努力来阻止人民在政治上的觉醒，其手段之一便是使人们遗忘历史。一九八六年，一批中国知识份子（为首者俱是前右派份子）曾不谋而合地着手编写三本主题相似的书，都是关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真相的纪实文集，为的是纪念反右派运动三十周年，计划于一九八七年出版。不幸由于一九八七年初中共发动了第三次“反自由化”运动，新闻出版自由进一步缩小，编者中又有两位第二次被开除党籍，几本书无一得以面世。在这种情况下，丁抒先生这本著作就尤其可贵。

丁抒君属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起来的一代。这一代人，在现时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四代人中属于第三代，特别值得重视，因为只有他们这一代，在文革期间从头到尾的实践中，从热烈投入转而怀疑，又通过痛苦的幻灭与反思而达到觉醒。因而，他们是最富于独立思考能力与叛逆精神，也是最了解中国人民苦难的一代。这是由毛泽东造就而又最先和最彻底地背弃了毛泽东的一代人。年在三十几岁至四十几岁的这一代人，现在已成为中国社会（包括党、政、军）的中坚，他们终将是毛泽东所缔造的那个制度的掘墓人。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于普林斯顿

1 海生注：此处有误，宋庆龄逝于一九八一年

作者自序

关于在毛泽东时代（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年）中国大陆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人告诉我们：

“让这些没有必要留给我们子孙知道的事，在历史的尘灰埋没了吧！”¹

但又有人这样说：

“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回忆聚在一起，将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

说这话的人便是曾呼吁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的老作家巴金。²

在那陈列我们民族灾难的博物馆建立起来之前，我们应当先将沉积在那些往事上的历史尘灰掸去，将这些事情聚拢来，铸成一百口铜钟、一千口铜钟。我们没有权利决定哪些是有必要留给子孙知道的，哪些是不必要的。我们要做的只是把那一桩桩历史事件刻在一口口警钟上。

我这本书《阳谋》，只是一口小小的铜钟。上面记载着毛泽东执政的前半期发生的一个主要事件——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在那场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更为酷烈的运动中，约一百五十万人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份

子”、“极右份子”、“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的“帽子”，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识份子。从反右开始，毛泽东政权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暴虐、衰败之路。本书即为此一事件发生前后中国社会的真实记录。

承蒙香港《九十年代》月刊每月拨出不少篇幅刊载这些陆续写成的文字，前后达一年，之后又出版成书。去年，此书修订，多处作重要补充，俾使更多史实能留存于世，不致被时光的尘灰掩埋。尤其是关于右派人数，世人及本书首版均引用中共官方数字“五十五万多”，但本书作者近从中国大陆各县、市的出版物中收集的数字推算，不算“中右”，仅“右派”、数字便在八十万以上，很可能接近百万。一百万比“五十五万多”更接近于真实数字（参见本书第十三章）。本书再版，亦为纠正那个以讹传讹的“五十五万”的说法。

《九十年代》出版社为此书出力甚钜，今在此表达作者的谢意。

丁抒 一九九三年一月，美国

注释：

- 1 费孝通，见《人物》一九八七年六月号第四十页。
- 2 巴金《怀念胡风》，见《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十月号。

引言

一九五七年夏初，中国大陆曾出现一场短暂的“大鸣大放”运动，在人民与执政的共产党之间，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空前规模的大辩论。在和平的环境中，没有刀光剑影，没有胁迫和利诱，人民就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是非广泛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大鸣大放”，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于中国人民及其统治者毛泽东而言，这却是决定命运的一战。

这次较量，以百万中华民族的精英份子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而告终。他们成了“新社会”中的贱民阶层，有的家破，有的人亡。未料到鸣放运动会如此结束的人们认为，执政者搞了一个阴谋。但毛泽东却声明那是一个“阳谋”，因为制裁“反党反社会主义”者是他早已公开宣布过的方针。右派们被“处理”一送入监狱、押送劳改营或就地监督劳动。从此，所有可能对共产党的施政偏差施以制衡或可能对毛泽东的行为加以约束的政治力量，都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毛泽东走上了大规模迫害人民、长时期祸害经济的道路，被他控制的党和政府则未荣先衰，由此败象丛生，渐失民心，直向下坡走去了。

不过，毛泽东到死也没有意识到，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功，为他日后的失败埋下了种子。他认为他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所以当年十一月他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苏学生时志满意得地说：“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实际上是在一九五七年。”由于这场胜利，获得历代中国的统治者从未得到过的自由，得以放手按照他的意志去改造中国：用他的话说，可以在中国这“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了。“反右”之后，他送给中国人民的第一件作品，便是于今已臭名远扬的“大跃进运动”，其直接后果是两千多万人死于饥饿，（海生按：根据上海某学术机构最新估计，约四千多万人死于那场饥荒。）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他的第二件作品，号称“文化革命”的人类浩劫，究竟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尚待确定。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文化革命”这三大灾难严重地阻滞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既然“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第一个灾难，本书的记述也就从这开始，看看百万知识份子是怎样成为“新中国”的贱民的。

第一章：甫执政强制改造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是毛泽东临死前不久，以一个八十二岁老人的衰病之躯，向全国发布的一条“最高指示”。在他统治国家的二十七年里，他抓住一个又一个靶子，掀一场又一场批判运动，使整个社会处于永无休止的斗争回圈之中。接连不断的斗争运动，将中国人民拖入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之中。而首当其冲被当作斗争物件的，几乎总是中国的知识份子。

一九四九年中共的队伍打进城市执政时，大多数知识份子没有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台湾。他们选择留在大陆，并非因为服膺马克思主义，而是由于对新政府抱有希望，愿意为国家效力、为社会服务。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一旦执政，一般意义的国家、社会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专家、学者、教授、工程师、医生则几乎全部有了新的身份——“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所以，他们的厄运几乎就在那时开始了。尽管那时就受到迫害的知识份子的人数与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人数相比微不足道，但却是那场历史上空前的大迫害的前奏。要弄明白百万知识份子怎么会在一九五七年成为毛泽东的阶下囚，不能不看在那之前毛泽东和中共做了些什么。

让我们从五十年代初谈起吧。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共产党宣布“解放”了全中国。在这之前，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将未摄制完成的电影《武训传》的底片藏起，未让厂方带到台湾。他们将这部未完成的片子献给新政府，并在新政府的支持下于一九五〇年完成了摄制。

一九五一年二月，该片导演孙瑜给政府总理周恩来去信，表示已遵周的指示将电影修改完毕，希望周“于日理万机的余暇，赐以三小时的审映”。孙瑜当日即接政务院通知，将影片带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去放映。一百多位中共中央的首长看了这部片子，给予不少掌声，总司令朱德还特地与导演握手道：“很有教育意义。”（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见《中国电影时报》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及十二月六日、十三日。）

但几天后毛泽东将片子调去看过，情势就突然变了。他指责该片宣传“投降主义”，并通过《人民日报》下令：“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出严肃的公开自我批评。”由此把这部电影纳入了政治斗争的轨道。

本来，武训这个历史人物并非全体中国人的楷模，他的身上不过比常人更集中了教育救国的精神罢了。作为失学的贫家子弟，他以兴办义学、教育乡民为己任，这是无可非议的。至于他为募集捐款，为博取有钱人的施舍，不惜侮辱自己，甚至伏地学狗叫，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亦无可厚非，说这种行为不足为训、不值得提倡，也还是公允。武训本不是个革命家，他不过以为读书识字的人多些，世道就会变好罢了。对于作为历史人物的武训，毛泽东当然可以有他的看法。他不喜欢电影《武训传》也不是错，这本是个文艺与学术的问题。但是毛泽东偏从政治、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批判武训“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把武训扫进了反动派的队伍。在毛眼裏，从来就没有纯学术问题。所以他一声号令，就把批判武训和《武训传》变成一场政治运动，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

查禁电影《武训传》只不过是事情的开头。毛泽东将因身份欠佳而不能明媒正娶、党中央政治局明令不得插手政治的江青解放出来，兴师动众地去山东实地调查武训的历史，弄出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记》。

江青与毛结婚十多年，一直被冷落，这回得到了露一手的机会。她率队到达武训的故乡山东省堂邑县。当地人本把武训视作骄傲，他的事迹妇孺皆知，有口皆碑。但当地县长一知道人“李进”的那个人就是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就不敢再对武训说好话了。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武训，在当地人民的心目中从未干过恶事。他一生要饭办义学，没给自己盖过房子，舍不得在自己身上多化一文钱，最后因病中吃了别人抛弃的霉烂药丸子而死去。但江青却在调查报告中将武训描绘成“残酷剥削农民，甘作封建统治阶级孝子贤孙的大地主和大流氓”。一时间，全国上下雨骤风狂，电影局长被撤职，凡夸奖过此影片的头面人物，包括周恩来在内，都被迫作检讨，著名学者郭沫若也在报上公开发表检讨文章。与此同时，数万文艺工作者被迫进行自我批判。由此开始，文艺界进入了遵命时代。

由于全国的新闻宣传机器一起开动，大小报刊同时咒骂武训，以至有人以为哪里又抓出了一个名字“武训”的反革命份子。为了为武训的反动，江青的《调查记》又将上个世纪造反不久便被朝廷招安、反过来帮当局镇压农民起对、只因靠山在朝廷失势才又重归山寨、最后遭官兵捕救的宋景诗的历史加以涂改，抹去他为清廷当犬马的经历，将他改塑成一个农民英雄。随后，剧作家陈白尘“奉命创作”（陈的自述）电影剧本《宋景诗》也就成为《武训传》的对立面而当作革命的样板，占领了全国的电影院。

十几年后，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江青派人将《宋景诗》的导演郑君里抓去整死，武训的尸骨被掘出，游街示众。中国的文化人在文革十之八九被斗得死去活来，溯源而上，一直可以寻到当年这场批判武训的全国性运动。

事情还不止于此。由于武训成了反动派，中国着教育家陶行知（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安徽歙县人）竟也隔代连坐，被全盘否定了。

陶行知推崇，武训在农村兴办义学的精神，于一九二六年辞去东南大学教务长职务，邀集一批志士仁人，在南京郊外的晓庄建立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实验其“教、学、做合一”的主张。“亲民亲物亲赤子，问古问今问未来。”他脱下长袍马褂，穿上布面草鞋，成了一名“挑粪校长”。

由于学校师生倾向进步，国民党当局称该校为“造反学校”。一九三〇年十月，蒋介石要陶行知开除“赤化”学生。陶拒绝后，当局封闭该校，并逮捕、枪杀了十几名该校学生（共产党员），陶也不得不一度流亡日本，只因杜威、爱因斯坦等世界知名学者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请蒋取消对陶的通缉令，陶方得以回国。

陶行知十分赞赏武训以乞丐之身开办十几所义学的事迹。他提倡“新武训精神”，并亲身实践了二十多年。

综观陶氏一生，即使不是共产党的战友，也可称个同路人。一九四六年，著名学者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陶对友人说：“我等着第三枪。”不久，他因脑溢血去世。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他“一个无保留地跟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和朱德发出唁电，称他“为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另一位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甚至题了“当今圣人”四个字贴在陶的棺材上。（《人物》一九八〇年第四期第十九页）。

现在，由于批判武训，推崇武训的陶氏也就遭了殃。因为他主张“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所以也就成了猛烈批判的对象，罪名同武训是类似的：“改良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救国”、“世界观的改造没有完成”等等。他甚至被说成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敌人”，好像当初毛泽东和共产党从来没有将他看成好人。陶氏本人早已入土，不会因此而受罪，但他所培养的子弟却遭了殃，三十年不得翻身。

另一个具有与武训类似经历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及其子弟的遭遇就更惨了。晏氏一九一八年自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旋赴法国为欧战华工创办识字班。一九二〇年归国后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并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率领有理想的人士深入农村，本着“与平民打成一片”的精神，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劳苦大众服务。一九二八年他赴母校耶鲁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在美奔走呼号十个月，募得五十万美元（一说十五万美元），全部用于中国的乡村教育和建设事业。一九四〇年，在抗战大后方，他又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无比艰苦的条件下，他仿效武训，沿门托钵，募集办学经费。他以办学的实绩赢得人们的关注、解囊，不必像武训那样以作贱自己来换取人们的施舍，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但教育救国的精神却是与武训相通的。晏氏也不想触动国民党政权的“一根毫毛”，他毕竟不想做革命家。但这决不等于他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在一九四三年纽约纪念哥白尼地动说四百周年的大会上，晏氏与爱因斯坦等人并列，被国际学术界评为“世界上为社会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之一。

一九五〇年，晏氏在美国受聘为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但他留在国内的事业却被当成了异端：他手创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被宣布为“反动组织”；他在抗战期间历尽千辛万苦支撑下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被定

为“反动学校”，学院的院长魏永清则被定为“反革命份子”（三十年后方被“宣告无罪”），学校师生受到株连，成了批判对象。

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在眼看着自己在祖国的事业被摧毁、有家归不得的百般无奈之下，于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大革文化命”的时候，到菲律宾创办了国际乡村建设学院，为亚、非、拉几十个国家培训了大批乡村建设人才。

毛泽东死后，当年主持批判《武训传》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乔木在“陶行知研讨会”成立大会上否定了这场批判。他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引自香港明报月刊一九八五年第十期第九页。）但他对于毛开创的把对一部文艺作品的争论演化成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的做法却讳莫如深，似乎那只是孤立的个别现象，只是一场可悲的误会罢了。

其实，从共产党的原则来看，那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陶、晏都不是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信徒，他们是在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百年积弱的历史进程中选择了教育救国这一药方的理想主义者。共产党执政后如果对异己的思想加以容忍，任他们及其弟子继续其平民教育事业，则他们向几亿农民灌轮的，必然只是文化知识而不是阶级仇恨，而且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宗旨与中共斗地主的政策亦格格不入，无法协调。“平教会”要借助中国农村唯一有文化的地主、富农的知识和财力，共产党则需借助无文化的农民将地主、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而彻底消灭。如果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和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学院的毕业生散布到全国农村，无疑会妨碍中共农村基层组织执行其阶级斗争政策，所以中共不能容忍那两支队伍存在的理由也就不解自明了。

在新中国的词典里，没有什么是同政治挂不上号、贴不上“阶级”、“主义”的标签的。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的那一天起，没有一个知识份子可以置身于政治之外，也没有一天可以置身于政治之外。

中共建国的几个月后，其教育部便提出了在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采用苏式教育度的计划。由于大多数教授受过欧美教育，他们的抵制使计划未能实行。中共看到“高等学校教师中还浓厚地保存着欧美反动资产阶级的思想……对于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则投以不值一顾的轻视的眼光”，认为这是“危险到极点的思想敌人”，（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是党外学者，故该部由副部长兼党的负责人钱俊瑞主持。此段钱氏言论见灵子着《中共思想改造的面貌》第四十二至四十三页。）遂于一九五一年底发动了一场以全国知识份子为物件的“思想改造运动”。

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沈从文，以刻划美丽的湘西风土人情的小说而闻名于世。国民党撤离北京的前夕，当局曾将飞机票送到沈家，沈断然拒绝，等着共产党进了城。

开始，沈从文的处境还不错。一九五二年，毛泽东与夫人江青请他到家中吃过一顿饭，毛还说过“沈先生还可以做小说嘛”。接着，刘少奇、周恩来也相断请沈去吃饭，都说他应当继续写小说。（见香港《争鸣》月刊一九八八年七月号，古华的文章）。但奇怪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时却下令各地的公安部门将沈的著作全部收缴烧毁。所以，当北京大学同各处一样搞起政治运动时，沈就成为靶子。在大字报的围剿下，连他的妻子也怀疑他是不是犯了反革命罪。一九五三年某日，在绝望之中，他割喉、切腕企图自杀，获救后辞去北大教授的职务，离开了这块是非之地。他的作品在台湾被禁，因为他留在大陆“匪区”；他的书从大陆所有图书馆中消失，则是因为他“反动”。他的作品纸型都被出版社销毁了，存书全化成了纸浆，谈论现代中国文学的书籍、论文全都如避瘟疫似地躲开这个名字。他的名字消失了，消失得如此彻底，连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都不知中国曾有一位叫做沈从文的作家，有过一本叫《边城》的小说。

沈氏受难只是当时中国知识份子厄运的一个写照，中国为数不多的宝贵的知识份子队伍中受到摧残的远不止他一个。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派飞机来接高级知识份子，将他们送往台湾。外文专家英千里等走了；北大名教授、美学权威朱光潜像沈从文一样，拒绝接受机票，毅然留下，静静地等待北平的解放。他后来兴奋地对人讲，北京解放使他“恢复了青春”。但好日子没有几天，在改造运动中他成了反面教材。北大专门

搞了一个展览会对他进行批判，甚至画了漫画来丑化他。为了过关，他不得不搜罗自己的各种“反动观点”，给自己戴帽子，丑化自己。后来他还在一九五六年上交了一份《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的文章，骂自己“站在反动文学方面”，“作为没落剥削阶级的一个代表”，“为着要保卫我多年积蓄的那一套腐朽家当”，“以螳臂挡车的气概，去抵抗革命文学的气概，去抵抗革命文学的潮流”。（引自一九八六年六月六日美洲《中报》。）

依靠“积极份子”大会批判小会“帮助”，逼迫斗争对象自己认罪，是中共搞运动的惯用手法。在这场运动中，各大学的党委发动学生、职工为基本群众，利用他们对须交待“过关”的教授们一一围攻，追查历史。由于批电影《武训传》的火药味还弥漫在知识界、文化界，毛泽东又在一九五二年元旦号召全国“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俗称“三反”运动）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七日《光明日报》。）知识界人士虽无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之嫌，可是人人身上都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谁也不能说自己是干净的。为免与那个咄咄逼人的新政权对抗，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采取了低头认罪、向共产党表示竭诚效忠的态度。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是语言学大师。他在共产党接管北京大学时表示：“我过去是专门研究学问的，现在和将来还希望如此。过去我不愿意受国民党的训，现在我希望共产党也不要强迫我学习。”他的希望落了空，共产党就是要改造他。他终于被迫在报上发表自己的检讨，题为《认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他承认自己抗战时在西南联大办文史讲演会是“直接给国民党帮凶”，承认他的“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言论是“反动透顶”。（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三日《光明日报》）

民国初年赴美留学归国的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金岳霖是个唯物主义者，应当算是信奉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的同志。他归国三十多年，同唯心斗争了三十年，到此时仍不免要检讨过关。因为他的学生殷福生去了台湾，他便检讨自己培养了“一个反动份子”。由于清华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经费，同美国文化界联系较多，他便在政治上检讨自己“成为美国文化侵略的工具”，“丧失民族立场”；在学术上则检讨自己搞的哲学“根本是反科学的”，并说“我认识到哲学系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训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员”，此外他还表示要肃清自己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七日《光明日报》）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钱端升除了检讨自己过去“客观上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外，还得批判北大前校长、中国现代教育界先驱蔡元培先生的“所谓‘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表示“我们除了宣布胡适（亦为北大前校长）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应该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光明日报》）当年蔡元培去世时，周恩来曾送挽联“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可见当时中共是不反对蔡氏的“自由”的。一九一九年前后，名不见经传的湖南学生萧瑜、蔡和森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信，请他雇用他们的朋友毛泽东为学校清洁工人，以解决毛的生活，蔡却认为在图书馆工作对青年人更有益处，便立即写信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请李在图书馆为毛安排一个职位。毛自然不忘此事，给蔡的挽联写的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没有了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这些学者们就只剩下了糟蹋自己的“自由”。

著名的土木工程专家茅以升，三十年代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后为阻遏日本军队而炸毁，某事迹在中国桥梁史上可占一章。他被“改造”后，这样在《光明日报》上掴自己的耳光：“我于一九二〇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趋炎附势，惟恐不及。今日想来，实不可恕。”“在那三十年中，除去参加修建一座桥梁外，其余几乎什么好事都没做，只是大量地耗费了人民的血汗而已。”

为了迎合共产党的“剥削”理论，茅又不惜给自己栽赃，说自己也是个剥削者：“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三日《光明日报》）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因为曾在国民党时代的中央研究院工作了十五年，在《人民日报》上着

文骂自己“整整有十五个年头，做了反动政府当点缀用的一只花瓶”，说“我也曾做过中国科学的小买办”。（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清华大学教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除了也说自己是“反动政府的点缀品”外，更因为二次大战期间在美国学者、以测量电子电荷而闻名于世的密立根（Robert A. Milikan），一八六八—一九五三，一九二三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的帮助之下，曾经赴美搞过一个时期的军事科学的研究（从飞机上掷鱼雷入水的问题），被迫在《光明日报》上历数自己的“罪恶”，说自己“无耻地向美国物理界的学阀密立根请求工作机会”，并说他这个研究“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因为那是“美帝国主义所主持的企图屠杀全世界和平人民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这还不够，还要加上一段这样的文字才能过关：“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我愿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给我的余毒，下了决心重新做人。”（一九五二年四月八日《光明日报》。）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明明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周教授的军事科学研究自然属于人类进步活动。这是信奉历史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理应赞同的立场。然而，毛泽东等人只是阶级斗争论者、实用主义者，既然中共“志愿军”与以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军正在朝鲜拼命，他们就不要那个“历史唯物主义”了。一个科学家，当祖国遭受日本法西斯铁蹄蹂躏之时，远渡重洋，为寻找更有效的打击法西斯的武器而奋斗，回到祖国却不得不为此而在报上公开往自己身上泼污水，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

在这场改运动中，人人都是资产阶级教育出来的，无一例外。他们唯一可做的只是往自己脸上泼墨，痛斥自己的过去，洗刷被洋面包、洋墨水薰臭了的灵魂。

自美国归来后在东北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的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这样评价他评价他将西方各种建筑流派的理论传授给学生的教学工作：“把敌人的糟粕——同鸦片烟一样的麻醉剂——运回来毒害我们下一代的建筑师。”（引自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大陆学人浩劫》，第八十页）

由于梁思成是清末维新派人物梁启超的儿子，所以他在检讨中还要另加一章将其父痛斥一通。

在二次大战末期美军轰炸日本本土之前，梁思成曾在日本地图上奈良和京都这两处古都作了记号，让绘图员画出保护圈，转交给驻重庆的美军指挥部。奈良、京都从未受到空袭，应有梁思成一功。

一九四八年底，清华园解放，北京城仍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下时，共产党的军代表访问过这位著名学者，请他在地图上标出一旦打起来应予特别保护的区域。共产党和平进城后，为了保存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不被现代建筑吞噬，以梁思成为首的知识界人士主张将中央政府机构设在郊外，并拿出了个方案，清理护城河，将顶部宽阔的城墙开辟成空中花园，如一条绣带环绕京城。然而到了这时候，专家学者的话不管用了，毛泽东执意要住在昔日皇帝的花园里，执意要将政府设在皇城内以示正统一一正如民国初年大总统世住中南海一样。毛搬进中南海，政府便非设在城内不可，城区也非膨胀不可。这样城墙就成了累赘束缚，也就非拆不可了。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也是一位建筑学教授，她闯进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力诉城墙不该拆之理。彭说不过她，只得拿出毛的批示来：“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见美洲《世界日报》（世界周刊）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五日，曹长青的文章。）

此时，新中国的统治者已经江山稳固，学者们正在报刊上一个接一个地打自己的耳光，没有人敢以毛住的“中南海也是封建皇朝的象征”来反衬拆城墙之荒谬，除了梁先生公然大哭一场之外，拆城一事便顺顺当当地做下去了。外城内城一起拆，陆陆续续拆了十几年。当年明朝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微服冶游，对人说，他住的那个地方外面是个大圈圈，里面是个小圈圈，小圈圈里面还有个圈圈，他就住在那个黄圈圈里。如今，大小圈圈都被革了命，“北京城”也就成了历史名词。不过现在早已不是正德皇那大刀长矛的时，只要有地下通道通往“城外”（这是习实称呼）的西山，安全就有了保障，有没有那两道城墙做屏障，对于住在黄圈圈里的毛泽东也就无所谓了。

在我们的城墙拆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美国有人动议在科罗拉多河的大峡谷建坝发电。反对者谓此峡谷世界唯一，一经破坏，从此消失，要发电何必非动此处脑筋？抵制居然成功。反观中国，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北京城不是出自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出自我们祖先中的能工巧匠之手。这才真正是“世界唯一”的瑰宝。若京城犹在，无论从德胜门坐汽车还是从西直门坐火车，前往八达岭长城，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内我们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的子子孙孙？然而，这一代中国人“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周恩来对于一九四九年以来滥伐兴安岭森林所作的痛心评语），终于毁了它！

学者们自掴耳光并不等于就可以免受批判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便是一例。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占领了北平的日军将坦克开进燕京校园，封闭了这所美国教会出资办的著名学府。陆校长率领教授、学生，化装逃到西安集中，历经千辛万苦在成都复校，直到抗战胜利才迁回北平。中共执政后，他努力紧跟，“反对美帝侵略”的大会、游行，他都积极带头，痛斥自己“亲美反共反人民”的检讨更是做了好几次。可是他躲不过大会批判，当他的女儿（本校研究生）奉命登台“控诉我的父亲陆志韦”，指着他的脑袋训斥时，他只能默默恭听，没有张口的份儿。

共产党刚进城时所带来的新气象，曾经使老百姓真的认为“天亮了”，黑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成千的知识份子犹如百鸟朝凤从海外归来，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傅鹰就是其中一个。一九五七年反右前的“鸣放”期间，他曾告诉上海《文汇报》记者：一九四九年，他是在美国读到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炮轰英舰“紫石英号”的新闻的。“解放军的大炮使我相信了新的政府是勇敢的、革命的。于是我这个受过辱的中国人就回来了。”（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上海《文汇报》。）然而，归国学人却并没有被执政者视为“自己人”。他们是“资产阶级学者”，按照“亲不亲，阶级分”的逻辑，在他们被彻底改造、脱胎换骨之前，都不是可以依靠的对象。于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将自己从海外带来的先进科学知识献出，为国效劳，而是洗刷自己的脑子。傅鹰教授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大学里箕研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还是令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地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地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

受不了这一套，便只有选择死。原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著名的无机化学家高崇熙便受不了折磨服毒自杀死了。他逐渐被人遗忘，只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周恩来负责领导制订全国科学发展规划时发现无机化学界缺了个带路人，这才想起他来。

数学家华罗庚，当年以一青年店员之身被清华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慧眼相中，破格选入清华任教，旋送美国深造。新中国成立时，他已得到美国伊利诺大学的终身教授聘约。在新政府的感召下，他走上了归途。归国后，只因保存了当年国民政府发的护照，他被攻击为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差点自寻短见死去。

总之，随着这场规模浩大的运动的开展，中国整个教育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国各大学的社会学系都被取消了，因为社会学不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在共产党进城执政前，像大多数学者一样留在大陆，未去台湾、海外。他那时已经有点担心，曾对朋友说：“我希望（共产党来了以后——引者按）我不会失去研究社会学的机会。”如今共产党执政才两三年，社会学就被宣判死刑、彻底清除了。所有的社会学教授都改了行，新一代的大学生再也没有听说过“社会学”这几个字。

与此同时，各大学里西方学的“政治经济学”课程纷纷停开，被称为“反动的”、“唯心主义的”的生物遗传学课程全部停止。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谈家桢被剥夺了授课的权利。东北师范大学的英文系主任失了业，只能到图书馆去做一名普通馆员。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潘光旦思想上“有暗流”，检查了十二次，还通不过。

连遗传学都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分，搞艺术的就更难置身于“改造”之外了。中共执政后第二年自巴黎归来的画家吴冠中后来对他当时的处境作了一番回顾。当时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他写道：“在那些‘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的眼里，我这个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满身是毒素，他们警惕地劝告同学们别中我的毒。”“我努力想在油画中表现自己的想法，实现归国途中的憧憬，但有一个紧箍咒永远勒着我的脑依——丑化工农兵。”“我终于被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教水彩之类偏于‘纯技法’的绘画课程……”（《人民文学》一九八二年十月号，吴冠中《望尽天涯路》。）

满心想为“新中国”服务的知识份子发现，在新的执政者眼里，他们不过是一批“满身毒素”的异己份子。这样，由于新政权的建立而一度沉浸在欢欣鼓舞气氛中的知识界逐渐沉默了，“解放”二字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的局面逐渐罩上了一层阴影。然而毛泽东所关心的不过是打掉知识份子的威风，确保他们没有二心；待他们一一表示同旧政府、旧时代划清界线，“坚决向党靠拢”之后，也就放他们过了关。教授还可以当，洋房还可以住，更没有下乡一说。好像雨过天晴，“党的阳光”又从云后钻了出来一样。

但是，不愿紧跟，不肯辱骂自己以换取过关的人，下场就悲惨了。

云南大学的教授刘文典就是拒不检讨的一个。当初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教授们纷纷北上，刘因眷恋昆明的气候，谢绝了北大校长胡适的邀请留在云南。他是一个狂放不羁的学者。二十年代末，他在安徽大学校长任内，曾同蒋介石当面顶撞，说：“我和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听说过你的名字。我根本没有听过蒋介石三个字。”以至一度被蒋拘留软禁，在蔡元培等人的呼吁下方获释放。他一贯目中无人，自称是三千年以来唯一真正懂得庄子的人，自然不会因为来了共产党就肯“改造”自己。若共产党能相容并蓄，容忍学术自由，大可任其教他的书，写他的文章。但这有违阶级斗争的哲学，而且听任反动派“放毒”，危害、腐蚀青年学生，是“丧失阶级立场”的原则问题，党的干部自然不肯放过这样的人。

但是刘氏放浪惯了，对于学校当局将他当作批判靶子毫不在乎。批判他的大会上，他公然宣布：“我是一个国民党同盟会的会员，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如果说的政治思想错误，那就是孙中山的错误。至于我的学术思想方面，正如你们所熟知的，完全渊源于庄子。倘若你们觉得庄子的思想有问题，你们可以不选读或是取消这一门功课。你们要清算我的思想，不如请你们先去清算孙中山和庄子。这才是正本清源。如果孙中山和庄子都是反动和应该被打倒的，则我的存在与否，也不值一谈了！”（引自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大陆学人浩劫》第二十页。）

这个年愈花甲的学者，软硬不吃，拒绝接受改造，终于落得个无课可教的下场。

追根究底，这一切都在中共中央少数几个人的操纵之下。最明显的证据便是一九五五年北京大学校庆的那一天，毛泽东的亲信陈伯达和北京市长彭真代表党中央出席庆祝会，陈竟然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这样声色俱厉地训斥名学者冯友兰：“冯友兰！你过去放毒，近来写文章消毒，这远远不够，远远不够！”

可怜这位老教授，当初国民党请他搭机南下赴台湾，他曾以极大的勇气拒绝，并以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身份临时担任清华校务会议主席，迎接了共产党。现在受到如此侮辱，只因对方是中共中央的代表，他竟忍气吞声，不敢辩一个字。经过那场“改造运动”，中国的知识份子处于何种地位不是清楚得很吗？

就统治者一方来说，把全国的专家、学者管束到了这种程度，当然是一大成功。毛泽东发动这场“改造”运动，本意也即在此。他是一个读史书的人，想必读过明太祖朱元璋的“语录”：“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他自然明白治理国家不可不用知识份子，但是他太相信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学说，不明白爱国主义可以使那些不信奉马列的学者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所以明知那些学者可以去台湾享受优厚的待遇而没有去，明知他们从海外回归的是大陆而不是台湾，仍然对他们放心不下，唯恐他们“出则巷议，入则心非”，同新政权捣乱，非要将他们的脑子清洗干净不可。这就是为什么按照周培源给自己定的罪，他完全该进监狱，可是他反而因此而得到重用的原因。

仅在思想上“改造”知识份子当然不够，组织上的控制更为重要。譬如东北工学院便利用这场运动将全校所有的系主任（均为老教授）撤掉，换上了清一色的共产党员。（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是否就此认为江山稳固，可以放心了呢？没有。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运动，等到反右派运动”在神州大地登台时，人们才看到，一九五二年的“改造运动”只是小菜一碟，微不足道。

第二章：施暴虐镇反肃反

六十年代有一阵，毛泽东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修正主义者，全世界只剩下他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领袖霍查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连霍查也不算数了。于是他成了天下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指责别人是“修正主义者”，主要是别人或多或少放弃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立场，而他沉缅其中，以斗争为乐，以革命为荣，至死也不改变。“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毛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归纳，也是他那本“小红书”里为中共理论家引用得最多的语录之一。

秦末无产者陈胜、吴广，汉末贫农子弟白莲、黄巾，都是为前朝官吏作嫁衣裳。五胡乱华，同劳动人民更不相干。唐末黄巢有《咏菊诗》一首传世，应是读书人，但也还算是农民领袖；可惜血流三千里，最终白干一场。宋亡于蒙古，汉人沦为三等公民，但地主和农民、百姓同父母官的关系并没有颠倒过来。元末朱元璋，标准无产者一个，可他当了皇帝，连他家乡的穷人也没有沾上光。“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这两句花鼓就是明证。他的无产阶级战友们几乎个个满门抄斩，连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也一并拿去砍头。堂堂中国几千万无产者，除朱氏一人，谁也没有获得胜利。

明末李自成，才过了几天皇帝瘾，江山就丢了，全体无产者空欢喜一场。清末洪秀全定都南京，号称太平天国，但天下尚未太平，内部就开了锅，成千上万地杀人，杀的全是阶级兄弟，他造反倘若成功，也不过是另一个朱元璋，除了将孔子牌位砸掉换上耶稣基督之外，他与大清皇上并无区别。洪氏弄了一百零八个妃嫔，算是他个人的“战利品”，而他给老百姓下的圣旨是“照旧缴粮纳税”，所以“胜利”与百姓们是无缘的。

农民造反，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催生婆。而新朝代的当权派每每重奏前朝曲，对旧官员多采用安抚政策。新旧官员似乎天然就是一家。北周“总司令”赵匡胤陈桥兵变，成为大宋朝太祖皇帝，可是三位旧朝正副宰相照旧高踞庙堂便一例。受剥削阶级的成员欲获得个人胜利，或者上京赶考，“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或者上山落草，然后让朝廷招安，混个一官半职。至于说两千年来究竟哪个阶级胜利了，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谁在乎朱元璋的阶级身份呢？

但这都是西风东渐、马克思的学说传到中国之前的老皇历。一经阶级斗争新学说的解释，新旧政权的更替，就有了全新的意义。“一些阶级消灭了……”毛泽东开创新朝，执掌政权二十七年，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一条。

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曾就农民起义被镇压后再图巩固政权的旧朝，或者借助农民起义成立的新朝，是否对农民实行了让步政策，展开过一场辩论。此一难以说清的问题，被毛泽东一语了断：“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注1：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对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的讲话。）

历史上新皇朝甫建立，新政权的统治者需要收买人心为本，以怀柔政策为首务。为使人民休养生息、增丁添口，也必得薄徭役、减税赋。譬如唐朝初年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与中共的土地改革相去不远。又如清朝初年，湖广填四川，并招抚流民，安置士兵，一律给田耕种，新垦土地一概免赋。又废除明代一切苛捐，滋生人口永不加赋。（注2：四川《井研县志》一九九〇年版第二页。）这就是所谓“让步政策”。

可是毛泽东从史书中看不到这些。他只看见“阶级斗争”。他一味迷信“反攻倒算”和镇压，不承认世界上就是有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有利的“让步政策”。具有如是的历史观，他上台执政之后，便把镇压“阶级敌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由于胜利来之不易，他那“镇压”的心态也就份外强烈。一直到二十年后，他在文化革命中将国家主席、他的湖南同乡刘少奇残酷地整死时，所持的理由还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其实，为中国旧政权服务的人员是十分庞杂的。国民党政权早期是一支有理想、有献身精神的优秀青年组成的队

伍，后来腐化堕落了一大批，但在抗战中又吸收了大量民族精华，尤其是在共产党势力薄弱的南方诸省。譬如四川省井研县，全县人口仅十余万，成年男子中差不多每三个人便有一个参加国军抗日，一万一千多名将士大多数为国捐躯，战后仅五十人退伍返乡。（注3：四川《井研县志》一九九〇年版第三页）

那些为国民党政府服务过的人，在抗战胜利后随即开始的三年内战中，许多人或对共产党不了解，或者尚来不及思考国共双方的是非，便成了战场上的俘虏，或者被逃往台湾的政府抛弃，束手就缚。为振兴中华计，优秀人才参加建设，一定得益匪浅。然而，毛只信“一些阶级消灭了”那一套，只信“反攻倒算”，于是玉俱焚，使中国这个遍地文盲的国家不知损失了多少人才。

譬如南方诸省，由于“过多杀人和乱杀人”，叶剑英主持的中共华南分局不得不下文件制止“乱捕乱斗乱杀的错误”。（注4：一九五〇年出版的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编《干部学习资料》第二辑，转引自丁望着《华国锋纪登章和新起的一代》。）但杀了的却再也不能复生了。例子俯拾皆是，这里不妨列举几个。

广东台山县一位老教育家陈觉生，虽曾任旧政府参议会参议长，在共产党的队伍进城前，恶霸劣绅们纷纷避往香港时，他自持平素并无劣行，便留下协助解放军。他一度被誉为“民主人士”，可是共产党要“镇压反革命”了，他就成了反革命，被乱棍活活打死。

河北人冯谦光，早年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一九三五年任山东临淄县长后，查烟，禁赌，肃匪，在全县兴办小学，普及国民教育，又自任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很做了一些好事。他在一九四一年被日军俘虏，关押在济南狱中，直到日本投降才获自由。一九四九年中共接收傅作义控制的北京城，傅的人马均作为收编对象，其中包括冯谦光。可是冯却于一九五一年以“反革命杀人罪”被捕，一直关了二十多年，直到他快死了才宽释。

东北伪满东安省军医院一位主任军医回健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听到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消息，即集合队伍宣布起义，击毙日本人院长，率队奔向苏联。东北光复后，他回到祖国。当时中国由国民党执政，这个爱国者便当然地认为加入国民党才能更好地为国效劳。他组织了国民党东安支部，自任书记长。但随后国民当接收大员的劣迹使他对那个政权彻底失望。经与中共地下党联络，他于一九四八年穿越对阵的国共两军的防线到了共产党的那一边。但是解放后，他却因抗战后那段历史而被定为阶级敌人，名列待消灭的一批人之中。只是在死刑宣布执行之，他出主意帮监狱改善了卫生情况，监狱当局为使用这个人才，将死刑改为二十年徒刑，他才逃过了这一劫。（注5：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一《人民日报》海外版。）

第一个将咖啡引进中国并种植成功的一位印尼华侨，平生致力于创办咖啡农场，只因在旧政府任过官职，便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直到二十年后瘐死狱中。

中国以农业立国，两千年间虽然战乱频仍，但诗书香火绵延不绝，因为大多数读书人都在乡村。他们要研究诗书，就不可能自己去种田，多少要出租一些土地。所谓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其实也是雇人去耕的。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农村的知识份子几乎都与地主、富农沾一点边。过去的改朝换代不干他们的事，中国的文化得以保存。这次“新中国”的执政者却以阶级斗争为己任，读书人也就难逃被“坑”的命运了。

江苏南汇县年近七十的读书人苏局仙是一九〇七年清廷废科举之前考取的最后一批秀才之一。他除了日军占领时期回乡念佛之外，终身未离教鞭。可是因为家里有几亩地，也被定为“地主份子”，家业被分。幸而他被“宽大”，只是被管制监督劳动，未被镇压，活了一百一十一岁。

诸葛亮茅庐所在河南省南阳县，一九五〇年便枪决了一千一百多个“反革命”。（注6：《南阳县志》一九九〇年版第一〇五页。）由于中共至今仍说它是“依法”杀的人，我们无从估算其中有多少是被坑的“儒”。但从别处的例子，我们可推度八九。

四川省夹江县，总共不到十七万人，可是逮捕“反革命”的案件竟有九百五十四件，而且其中又只有五分之一是

上级批准逮捕的，百分之八十共七百六十七件逮捕案件未经任何部门批准。（注7：《夹江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四五七页。）要是再考虑到那上级批捕的也多属冤案，人们就明白那“乱捕乱打乱杀”是如何恐怖了。当时夹江县的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三千分之一。即使夹江一个案件只逮捕一人，那全县便逮捕了九百五十四人。按此推算，全国仅在一九五〇年的“镇反”中便逮捕了近三百万“反革命份子”。由于一九八〇年代中共出版的各县县志披露各县在当时逮捕的案件均在数百件上下，因此即使夹江县的数位超出全国平均数的一倍，全国总数也应在一百五十万上下，这还不包括四九年中共的军队打到各处时当即就捕杀了的大批“反革命”。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曾得意地声称，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注8：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指的就是这场镇压。现今无法核实那时被杀的知识份子的准确数字，但是由于国民党的政府人员和注定要被消灭的地主很多是知识份子（以当时中国的标准而言），所以实际被杀的“儒”必定远远超出此数，很可能接近被杀人数的三分之一，即五十万左右，超过秦始皇不是一百倍，而是一千倍。

一九四九年后陈毅主政上海，十分稳重。上海历来是藏污纳垢之所，曾有人主张大开杀戒，列了数万该杀者的名单，陈毅看了说太多，减到数千，他仍说太多。最后只杀了确实罪大恶极的数百人。上海解放前夕上任的国民党代理市长赵祖康是个老工程师，他就任后主动妥善配合中共的队伍接收上海，使上海基本未受战争破坏。陈毅任命他做了新政府的副市长。

如果全国都照陈毅那么办，必可为本已缺乏读书人的中国保存更多的文化力量，国家必定可以更快地从动乱中恢复过来。然而，在全国范围内，一无“招安”，二无“怀柔”，三无“让步政策”，有的只是“镇压”和“反攻倒算”，使中国损失了无数宝贵的知识份子。

另一批注定要被新政权镇压的是所谓“封建地主”。本来，乡村中有一部份地主又是当地的恶霸，鱼肉百姓，俨如小国之君，对这类人予以镇压是必要的。但是，为中国贫穷经济的出路计，对那些只坐收地租，并不残害百姓的地主，尤其是只不过有那么十来亩薄田的小地主，家产比旁人多得有限，新政权没有理由将他们列为斗争对象。要说“剥削”，他们比不上城里的工商资本家；要说“反动”，他们同旧政权官府也没有多少瓜葛。但是，除了少数因子女参加共产党，进城当了大官而受到保护之外，统统被划归为“阶级敌人”，被扫地出门或者肉体消灭，即使不置之于死地，也被斗得呜呼哀哉。

由于毛泽东认为光把土地从地主、富农那里拿来分给农民还不够，必须发动农民斗争地主，提高“革命觉悟”，否则便是“和平土改”，是右倾，是对敌斗争不坚决。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及主持工作的方方是主张行温和土改的，他们只搞分田，分浮财（衣物之类），但不挖底财（埋在地下的金银等物）。鉴于大量地主是华侨或侨眷或兼营工商业，他们不主张没收其财产，结果被批判为搞“和平土改”，另由在广西杀了大批地主的陶铸去重搞一套，使千万户在叶、方主政时并未遭劫的“地主”家破人亡，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领袖反对“和平土改”，下面各级干部便唯恐不够革命，纷纷以对地主的残忍表明自己对党的忠诚，结果冤杀了许多无辜。

以周恩来胞弟的岳父为例，他在民国初年做过江苏省运河水利工程局局长，但之后从未在国民党政府中做过事。加上周恩来兄弟外出参加革命，他将周母接到自己家中供养了十多年。共产党南下时，他不认为自己会成为镇压物件，便静静地留在家中。不料甫一解放，他便因为“地主”身份成了第一批清算斗争的物件，很快就送了老命。周恩来的亲戚尚且如此，别人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九〇年，有人如实地披露了一九四七年中共在冀东平原搞“土地改革”，处决地主时的惨烈景观：农民们被组织起来，“依照古老家族的遗风，将黄豆粒仍进土台上的大瓷碗。当唱票人用异样的嗓音宣布‘票’数超过一半时，行刑手举起装满火药的统枪……”有条壮汉没有立即死去，小学生们被动员来，“用锥子、剪子、小刀、铁钉，一下下的壮汉身上戳眼、掏洞、割肉，再往伤口上糊泥巴。一个男孩子手舞足蹈，像剪树叶一样剪掉了罪

犯的两朵耳廓。据说，那个壮汉的全部罪恶是查出了祖父那辈曾经雇过一个长工，依照政策精神，这位片瓦皆无贫农改划为地主，一夜之间变成敌人。”（注9：《新华文摘》一九九〇年第一期第八十二页。）

中共这么做，并不是头一次。早在二十年代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毛泽东在家乡湖南发动他称为“好得很”的农民运动，农民突然从社会最底层翻到无人管束的境地，无法无天，滥用私刑，死人无数。中共高层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醴陵乡间的一个规矩的读书人，就是死者之一。

到了一九三三年，周恩来在江西“苏区”（苏维埃地区）执行莫斯科来的指示“消灭地主”，有田四十亩甚至不满十亩者便在被消灭之列。据因反对此一政策而被周宣布“开除党籍一年”的粤赣军区司令龚楚回忆：

“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

“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注10：《龚楚将军回忆录》第五六五至五六六页。）

地主杀了，读书人也跑不掉。“苏区”贫瘠，养不起大批红军。地主榨完、杀光后，给养仍有问题，于是稍有点家业者便成了剥夺对象。如瑞金县有户读书人家，家中只有十多亩田，由两个也读过书的儿子耕种，是为自耕农，算不得地主。可是三人都被苏维埃政府捕去吊打，迫交二百五十元大洋。婆婆与两个媳妇凑了一百二十元，加上自己的全部首饰，缴去赎人，但因不足数，老人被吊死，两个儿子也杀掉。杀了男的，仍然逼妇女交钱，否则大人小孩一起抓。这一家老小向龚楚磕头求救，龚却无能为力。在此之前，长汀县一位替龚楚治过病的老中医曾因为交不出一大笔“捐款”给红军而向他求救，他说了情之后那医生仍然被杀掉了。

了解了中共三十年代在江西的“红色政权”杀地主、富农、读书人的历史，对一九五〇年全国都成为“苏区”之后中共的作为就不难理解了。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京郊大兴县发生了党支部书记召集贫下中农、民兵，将十几个村的地主、富农悉数满门刀劈斧砍，连吃奶婴儿也不放过，先后打杀三百二十五人的惨剧。（注11：《当代中国的北京》第一卷第一六八页。）与此同时，毛的湖南老乡（在某些地区）也在一家一家、一乡一乡地杀已经当了十几年贫民的地、富。就全国范围而言，这股杀人风只是个别现象（广西等地也杀了地主、富农及其家属，但总的说来，仍不能算作全国范围的屠杀），为时亦极短，而且连死前一直替毛泽东掌管北京和公安部的谢富治也不赞成那种野蛮屠杀，但这种事件能在毛泽东眼皮底下发生，这一点已可以说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被歪曲到了什么程度。

毛泽东执政后期出现的事，包括文革中那些惨无人道的行为，在他执政初期已露端倪，决不是偶然的。中共在土改时告诉农民，只要把地主阶级斗倒、斗垮、消灭掉，农民就翻身成了主人，就可以享受社会主义幸福生活了，可是实际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毛泽东夫人江青一九五一年在湖北农村某地搞土地改革，她的生活比当地被斗争的志主阔气一百倍。她进茅房，门外有三个警卫站着；每隔几天便有医生给她检查身体。乡里贫农团团赴武汉追拿逃跑了的地主时外感风寒，发高烧，无钱交医。可是江青竟不让自己的医生给他看病，任那位“翻身农民”连烧了十几天，悲惨地死去。可见就在中共着手消灭地主阶级时，新的“地主”就已经出现了。当然，江青只有一个，而大量的则是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干部。一九六二年，邓小平说过：“有的农民讲：过去我们养一个保长，现在是好多保长。……这部份人是大量的，据说是一千几百万，一个数字是一千六百万，有的估计是二千五百万。”（注12：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时的讲话。）按这个数字计算，平均二十至三十个人养一个“保长”或“地主”。有些“保长”比过去的更坏。一九六〇年，被毛打倒的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蜗居京郊，一位

警卫战士的家属前去探亲，曾这样对彭诉苦：“下边的干部比过去的地主、保长还凶，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这日子怎么过啊！”（注13：马骥等《国防部长浮沉记》第一六二页。）

所以，中共执了政，地主阶级是消灭了，可农民阶级却并没有胜利，毛泽东阶级斗争只是杀了一大批保长，并且将“一个保长”换成了“好多保长”而已。

因为将阶级斗争看得太严重，在肃清了敌人营垒的人以及为敌人帮过忙、帮过闲的各种流派之后，便要自己的内部里抓臭虫、掐虱子了。这就是“肃反”，即“肃清反革命份子”。

只有熟知五十年代中国历史的人才知道，“镇反”即“镇压反革命份子”，杀的是敌人营垒的人；而“肃反”则专搞自己人。待肃的“阶级敌人”身上没有标签，都是“暗藏的”，加以如辩方不能证明自己没有杀人可能就会被判杀了人，这就非造成恐怖不可。连一九二五年入党、红军一九三四年长征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都成了“内奸”、“反革命份子”（潘、杨在毛泽东死后均获平反，参见张重天《共和国第一冤案》），还有什么人能担保自己永远平安无事呢？

一九五五年初，潘、杨被捕。尽管这两人经过了长达八至十年的“预审”囚禁之后才被判以长期徒刑，但他们，特别是长期负责统战工作的潘汉年曾经领导过的文化界人士却立刻就遭了殃。

抗战胜利后任上海敌产处理局逆产组长的邓葆光，负责接收了日本人及汉奸的数十万册书籍和档案资料。他让共产党员将其中日本人搜集的中共情报整理、珍藏起来，又从几十万册书中挑出七万册善本书，佯称运去台湾，实际上运到香港隐蔽，上司让他运往台湾的金银珠宝也被他用拖的办法保了下来。遵照潘汉年的指示，他本人留在香港保护那批书籍。国民党退至台湾后，夺书未成，于一九五〇年九月派人去香港，在大街上对他白日行凶，用菜刀在他头上砍了九处。在美国妻子的悉心照顾下，邓幸从死神手中逃脱，派人将书单送到上海交给了潘汉年。中共将那批书取回之后，邓也回到了大陆。然而，潘一下狱，邓葆光立即被打成同党，也成了共产党的囚徒。他的妻子也被关押了一年多，出狱后就成为没有户口的“外国人”，只得只身回了美国。他的儿子则被送去劳改，长达二十三年。

从二十年代起即开设电机公司，为中共制造收发报机，并在随后的二十年间发展成一个拥有钱庄、煤矿、钢铁厂、纺织厂、影片公司等企业的大资本家蔡叔厚，实为中共秘密党员，为中共做了无数他人无法替代的工作。他接待过参加一九二七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潜逃至上海的中共要员叶剑英、廖承志等数十人，将其公司营业收入用来安置同志，又在国民党军政部兵工署秘密发展了十几名共产党员，为中共获取过大量情报。解放后，他将全部企业青理交公，自己则只领取一份电机工程师的工资。潘汉年和杨帆的事作一出，蔡便上了被逮捕的名单。只是因为化是“高级统战对象”，名单报到周恩来处时：他与潘、杨虽有私交，但不是一伙，不能捕，他才得以免祸，但与他几十年共事的副手陆久之却逃不过牢狱之灾，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陆久之在一九四六年与蒋介石前妻陈洁如收养的女儿结婚，但从二十年代起就秘密为中共工作了。他不是中共党员，那是因为周恩来说“陆久之在党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九二八年，当国民党出动人马围捕中共领导人项英、向忠发时，每次都是他暗中传信，使国民党特务扑了空。一九二九年，日共总书记矢野学自苏联归日途中，曾在他家中藏了一个多月。一九二九年冬，中共在上海开代表大会，会址是他租赁、布置的一个“医院”。一九五〇年初，中共还曾派他到日本去策动原国民党政府使馆人员起义。（海生按：据“传记文学”报导，陆久之那次成功说动了一批国民党使馆人员“光荣起义”，但他自己在归途中因海上风浪太大而碰伤了头，成为终生不愈之固疾）如今中共险一翻，他就进了牢房。只是在牢里蹲了七年之后，陈洁如向周恩来求情，周恩来过问他的案子，他才出了狱，但蔡叔厚却在不久后的文革中被投入监狱，成为无人审问的“寄押犯”。在那座当年他的公司建筑的监狱里，他不断地喊着“冤枉”，离开了人间。

年轻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以后长期从事对日情报工作的顾高地，身为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京沪区少将主任，却与中共的地下组织保持秘密联络，为中共效劳。解放后的几年，他的待遇是不错的。但当初与他秘密接

头的中共组织是潘汉年领导的，他也入狱判刑十四年，被押送到青海去了。“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但顾先生终于活了下来。当他二十多年后修书给家报讯之后，收到的却是他弟弟的回信。原来早在九年前，他的妻子、儿子、女儿就在一起自杀了。他那女儿顾圣婴是在世界钢琴比赛中夺得第一枚金质奖章（一九五六年柏林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中国人。他的妻子、女儿、儿子在开启煤气灶自杀前，仅给他留下了一张简短的纸条：“我们等不及你，先走了。你刑满释放以后，希望你也自杀，我们一起在天堂相会。”（注14：引文为纸条的大意，源于看过纸条的一位上海《文汇报》记者的回忆。由于当局怕顾高地真的自杀，直到他死也没让他知道此纸条的存在。）顾高地老先生在二十多年的劫难之后回到上海，已经没有了家，永远听不到女儿那美妙的琴声了。

三十年代电影《十字街头》中有首家喻户晓的歌曲，“春天里来百花香……和暖的太阳在空中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其歌词作者关露女士有诗集和小说问世，本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人，只因为共产党做秘密工作而暂时放下了笔。抗战后，周恩来怕国民当加害于她，要上海的党组织把她送到新四军中去。到了新四军解放区，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对她说：“任然做一个左翼文人吧，你看党多么需要你！”谁知到了一九五五年，她竟成了囚犯，因为抗战时她曾被潘汉年派遣，打入日本驻华使馆办的杂志社收集情报。

一九二六年就入了共产党的恽逸群，中共夺取上海后任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一九五一年他因报纸漏登了一则史达林致毛泽东的贺电而被撤职，让张春桥捞个便宜，接替了他的位子。当时中共还没把他当做敌人，可是由于他在抗战期间曾按照中共的指示去香港工作，受潘汉年领导过一阵，一九五五年潘被捕后，他也被指为“特务”进了牢房。因为没有证据，干脆不审不判，押了十年之后，才突然宣布判处十一年徒刑结案。

参与创建中共的周佛海在日本占领华东时，与日本人合作，成为日伪政权的头面人物。他在日出生、在日读过大学的儿子周幼海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一九四六年成为中共党员，专事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由于杨帆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杨被捕后他也入了狱，关了十年后方以“反革命”罪被判以“管制三年”。

搞起运动就没章程，乱抓乱捕，这几乎成了规律。一九四九年中共军队横渡长江后的桥头堡之一，安徽安庆市，有个曾是国民党人员的刘某。此人一九四八年加入民盟后，便成了共产党的命作者。他发动安庆的地方武装起义成功，使解放军和平进了安庆。之后他又为大军渡江做了不少工作。几年来他都被认为是功臣。但肃反了，他突然成了“历史反革命”，进了监狱。他的妻子走投无路，终于自缢身亡。

因为抓虱子多多益善，以前中共不想抓的人这时也抓了进去。原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一名专员杨云飞，建国初求才甚殷的共产党当局曾邀请他为新政府工作，并表示可以“原职原薪”。但扬打算观望一阵，未予接受，就此赋闲在家。谁知到了一九五五年，肃反肃到他家里，把他抓走了。说是只判处十年徒刑，可是一关就是二十年，直到一九七五年中共特赦国民党战犯，才让他出狱。当局将他那早已因他入狱而与离婚的妻子找来，说：“当初逮捕老杨是党的政策，现在释放老杨也是党的政策。……你把老杨接回家吧。”（注15：上海《文汇》月刊一九九〇年第三期。）

邮电一个职工在肃反中被揪出来斗争，原因是平日爱说怪话：“话怪话就是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站在反革命方面；站在反革命方面，就是希望蒋介石回来，就是反革命。”（注16：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仅东北师范大学一所学校里就将师生抓起一百多人，作为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加以审查。连同被勒令停职交待问题的，共二百多人成为肃反对象。由于实在榨不出油水，不久便全都放了。但这二百人躲过了初一没能躲过十五，在一九五七年抓右派时全都落了网。

当时武汉大学的一位学生对该校的肃反曾作了如下的回忆：“运动深入时（武汉）市委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在大会上对着我们声色俱厉地吼叫：“我们已充份掌握了你们的材料证据，在你们面前只有一条出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者受奖。”……运动进入检举阶段，人人都要写检举交待材料……那阵子，天天有人被批斗，天天有学生跳楼自杀……”（注17：香港《争鸣》月刊一九八七年六月号第三十九页。引者认为，

由于事隔三十二年，“每天有人跳楼”可能有误，也可能只是短短的几天每日有人自杀。）

作家黄秋耘到八十年代写出了肃反中他亲身经历的事。由于他有多年革命历史，在单位里属于受党信赖的可靠份子，于是他奉命率人去逮捕一名共产党员、《文艺学习》杂志的编辑冯大海，并由他负责审查冯的案子。经他调查，逮捕冯所依据的“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罪名完全不能成立。他如实报告上级，幸获上级同意，对冯“宽大处理”，不予判刑，但仍然开除了党籍。当时黄所在的单位一下子抓了十个反革命，其余那九个黄表示他未经手，无法判断其真伪，但他们无一例外地被戴上了“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受到从开除公职到十年徒刑不等的惩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其余那九个只是不幸没有能遇上黄秋耘那样敢讲真话的人，以至冤沉大海，成了肃反的牺牲品。不过冯大海虽逃过了肃反，却没有能捱过文革。因为黄被说成是“漏网右派”，冯算是被他包庇下来的，这样冯就难逃文革这一劫了。受够了折磨之后，他用上吊的法子结束了痛苦。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副书记曾镜冰，一九四七年主持地下的中共福建省委时，曾经错将手下一大批干部当作“内奸”杀掉，如今自己反倒成了“大内奸”，被撤去全部职务，直到文革中被整死也未能翻身见青天。

这场肃反，全国究竟整了多少人？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是这样说的：“审查了四百多万人，搞出了十六万嫌疑份子，查出了确实隐藏的只有三万八千人是反革命份子……那三万多人，一个不杀，大约百分之一劳改，其余的人都在原单位工作。”（注18：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在全国工商联二届一次代表大会部份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按毛的说法，全国仅几百人被送去劳改，其余则平安无事，只是虚惊一场，至少保了饭碗。这显然不是事实，连黄秋耘所在的那个小小的杂志社都有好几个人在肃反中判刑，全国如何会只有区区数百？

如广西上林县，抓出一百五十名“反革命份子和坏份子”，其中中小学教师占了六十名。一百五十人中，不是毛所说的“大约百分之一劳改”，而是三分之一被逮捕判刑，三分之一送劳动教养，三分之一被开除公职或管制劳动，仅四人未予处分。（注19：《上林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三八〇页。）

又如辽宁省长海县，是个海岛，人口仅五万一千。肃反中“有三十三人被定为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坏份子。其中：判刑十四人，依法管制五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九人，监督劳动改造五人。”（注20：《长海县志》一九八四年版第五二五页。）

毛泽东必定知道全国将数十万新抓出来的反革命送去坐牢、劳改的真实情形。他为何说只有几百？因为听他讲话的是刚刚将全部资产交给中共的各地资本家的代表，他需要安抚这些刚刚“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资本家，给他们一颗定心丸，除了信口胡诌，实在也没有别的好法子。

毛泽东说“审查”了四百多万人，这大致还是事实。但是这“审查”完全是以践踏人权的方式进行的。运动一来，党号召大家“揭发”反革命份子，只要有人“揭发”，就可以先把人抓起来或扣起来，一个大学一关就是上百人。这种先抓人后审的法子，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逼得多少人走上死路。

为什么会一下子“揪出”那么多“反革命份子”？因为有“指标”（配额）在。譬如中共财政部党委在肃反开始时先定了个“百分之五”的指标，（注21：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即将部内百分之五的作为反革命抓起来“审查”。所以披关押、斗争的那些人不是有罪而是倒楣罢了。

因为揪出的每一个“反革命份子”都是肃反的成绩，各单位自然以多为荣，多多益善。如东北财经学院，近三千三百人，其中教师总数为四百二十五名，肃反中被斗的占一半。官方宣布：“清查出了披着人民教师外衣的反革命份子（现行的和历史的）与坏份子共六十一名”。此外，因“反革命嫌疑”而被斗争的还有一百四十五人；以前被定为反革命，但被宽大，“不以反革命份子论处”，但表现不好而在肃反中再次被斗争的为二十九人。当局认为，这些人都是该斗的。另有二十一人，“因检举材料失实或仅因思想落后而被斗争”，当局承认“这些人才是

真正斗错了的”。（注 2 2：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辽宁日报》。）

各机关、学校，情况都差不多。如东北工学院抓出“反革命份子、坏份子五十五名”，另加“不以反革命论处”的“历史反革命”八十八名。（注 2 3：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沈阳日报》。）

本来，运动只是“肃反”（肃清反革命），并没有“肃坏”，怎么忽然就把谁也不曾明确定义的“坏份子”掺和进去了呢？中共从来不予解释。但肃反的伟大成绩全是这样宣布的：河北省“清查反革命份子及坏份子共六千零六十一名”。（注 2 4：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四川省抓出“反革命份子和坏份子五千三百多名”，“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注 2 5：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不管那些“反革命”中有多少是冤曲了的，那些“坏份子”显然是为了凑数而陪绑的。

中共学习苏联老大哥，搞计划经济，经济建设有五年计划，抓反革命居然也有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十五省市书记会上就定了个指标：“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可以说，肃反中的无数冤案均源出于此。

其实这种运动总是搞得一片恐怖，这里仅举一个小例子。泌尿外科专家张华麟一九五〇年自美国归来，五一年被任命为解放军第一医院院长。不久遇上“三反”运动，其妻子因拿过公家一枝体温计，被打成“老虎”（贪污份子），随之而来的便是斗争批判，人格侮辱外加肉体摧残。年轻人受不了，用一条围巾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人死了还没完，张还被逼着为那一枝体温计在全院大会上替死去的妻子作检查。

《新观察》编辑黄沙鉴于无辜的人一个个死于运动，在一九五六年就提出了“人的价值”问题，他说：“在这个社会，人是不值钱的，今天还是好好的人，明天就可能无辜的被判为反革命。”“这不是某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必须从制度上根本解决。”（注 2 6：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当时，认识到这个根本问题的人已经不少，可是人微言轻，丝毫改变不了中共的所作所为。

毛泽东那样搞运动，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是他的一大帮手。刘少奇曾经这样说过：“土改、肃反、三反、五反、审干和合作化运动……是毛主席领导的，是成功的，必须的，必不可少的……缺点错误不过是一个指头。”譬如“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对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斗对了，成绩就是“九个指头”，就是“成功的，必须的，必不可少的。”

毛泽东统治中国二十七年，人命越整越不值钱。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坐牢和自杀的人比五五年的“肃反”多了许多。到了六六年的“文革”，打死的和自杀的数目更是远远超过了“反右”和“肃反”的总和。再以前述辽宁长海县为例：总共五万多人，仅在一九六八年那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便关起三百多人，活活打死五人，打成残废数十人，逼得一百零四人自杀身亡！（注 2 8：《长海县志》一九八四年版第五三九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时代死于冤狱的人数，多于历代冤狱致死者的总和。

在毛泽东的脑子里，阶级斗争本是个无孔不入的概念，但并不是说他搞的每一个运动都源于阶级斗争，有的是由于他个人品质、修养之久缺，自以为掌握了终极真理，容不得不同意见造成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便是一例。

文学评论家胡风的文艺思想与党内主流不合拍是由来已久的事。他不是中共党员，却始终是中共的战友。作为左翼作家，他早在三十年代就在日本加入日共。一九五三年林默涵、何其芳等党内文艺“理论权威”出面批判他时，仅仅是说他“反现实主义”，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而已，文章毕竟还是在文艺范围内做，并没有同政治搞到一起。

鲁迅早就说过“胡风鲠直，易于招怨”，这次他果然咽不下这口乌气，遂自书三十万言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

将对他的批判一一反驳，上书中共中央，希望中央能主持公道，定夺此案。

但是胡风太天真了。在文艺方面，毛泽东认为他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期所作的“讲话”早已定了乾坤，文艺工作者只有照本宣科、按精神办事的份儿，岂能另起炉灶再搞一套。胡风那三十万言的意见，阐述的是他自己的文艺理论。因“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而坐了七年牢的诗人绿原将它概述为：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标准第一”；反对文艺脱离历史真实，不同意“以歌颂光明为主”；反对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宣传政策的工具、传声筒；主张以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审美标准。（注29：绿原《胡风与我》，刊《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这些见解与毛的《讲话》大相径庭，毛自然不容。何况当时尚无其他政治、思想领域的运动，毛正需要一个斗争的靶子。胡风不啻自己送上门来，于是毛立即就势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运动。

为了避免人们在文艺理论上争执不休，毛一开始就否定了《文艺报》编委为发表批判胡风材料而写的“按语”。康濯所起草的那个“按语”是根据周恩来的意思写的，主要批判胡风的“反动文艺观、世界观”。毛泽东一看便说：“要不得，不能用。胡风怎么只是个文艺观、世界观问题？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注30：康濯当时是作协书记处候补书记，《文艺报》执行编委，驻协会作家党支部书记。引文为康对作家古华的谈话，见古华《一代革命作家的悲剧》，载香港《争鸣》一九九一年五月号。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对此的回忆载于《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他自己熬了个通宵，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连同胡风的“罪行材料”交给《人民日报》发表。他无中生有地给胡风捏造了一大堆罪名：“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这样一来，胡风文艺观点的是非就无人再关心了，他那可能动摇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权威性的理论被封杀了，毛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的确，胡风是“延安讲话”发表以来唯一系统地向它挑战的人。胡风成了反革命份子，毛杀一儆百之计彻底成功，从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出笼了。

给人定罪要有材料，公安部采取全国统一行动，将凡与胡风有过同事、师生关系的人及有过书信来往的人，全都抄了家。从抄得的信件、日记里摘下片言只语，便足以给胡风定罪了。

为了搞臭胡风，中共当局曾不惜工本，将胡风的罪状编绘成连环画，以小人书的形式散发到千家万户（《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短短几个月发行了五百多万册）。

因为这是一场运动，人人都得表态。巴金回忆道：“人们劝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很不客气……”于是他也只好写几句，说鲁迅先生受了胡风的骗，说胡风“做贼心虚”云云。（注31：上海《文汇报》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怀念胡风》。）有人因为写揭发文章对胡风骂得不够狠，只好再度写文章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份子打掩护。”郭沫若在胡风等人被捕后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的会上则说：“以我个人来讲，认识胡风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有感觉到他是这样一种反革命的破坏份子。我们可以说，二十多年是和豺狼一道睡觉……鼻子不通，大中伤风。”（注32：《文艺报》一九五五年十一期第二十九页）

由于人们知道胡风与鲁迅有较深的友谊，而鲁迅又是被毛捧为圣人的人，为了剥掉胡风的老本，当局便将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弄出来，让她宣布：“鲁迅爱党爱人民，胡风反党反人民。划清界线，胡风绝无丝毫似鲁迅。胡风只不过是鲁迅的叛徒。”（注33：《文艺报》一九五五年二月号第三十五页）

毛称鲁迅“没有丝毫的媚骨”，当属客观，但这不等于鲁迅的妻子也如此。“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钟”。许广平不敢为其亡夫的故友胡风鸣冤叫屈，已够悲哀，还被逼着拿起小钟去敲那面破鼓，该是何等凄惨！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作协）按照党的指示，公布了一个《决议》，除了开除胡风的会籍外，还“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作必要的处理”。（注34：同32：）

“处理”是逮捕的代名词。由党的官员把持的作协出面向党“建议”逮捕其成员，虽有些不伦不类，但确实可以镇服所有的作家。批判胡风的高潮的一天夜里，胡风被黑布蒙上眼睛，被麻绳捆上双手，进了一所监狱。

胡风进了监狱，毛泽东钦定他有“可杀之罪”，但又认为“杀了不利”，饶了他一命。至于那该杀之罪究竟是什么，当局从来也没有向人民大众公布过。

其实，具体办案的政法人员早已明白胡风的冤枉，只是由于毛先将胡定了罪，他们便无法循法办事了。直到一九五七年四月，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到中国人民大学作报告，有人向他问到胡风时，他还这样回答：“现在侦查工作已经结束，但胡风很不虚心，不接受意见。”仅仅是因为“不虚心”，胡就得在监狱中（而且是在最易使人精神崩溃的单人牢房里）蹲下去。到了一九六五年，胡风已经蹲了十年冤狱，毛的“可杀之罪”已经明白成了笑料时，当局还为了毛的脸面而坚持要胡认罪。可是胡偏偏就是那么“鲠直”，就是不肯用认罪去换取宽大。他对被关押数年后获释前去探监的妻子说：“我何尝不知道大帽子底下过关的诀窍，但那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对自己不负责！”僵持了一阵之后，胡风终于未被宽大，此案以“十四年有期徒刑”告一段落。但判刑之后就将他释放回家（“监外执行”），了结此一公案。至于文革后他又重被收监，又关了十几年，那是另一段故事了。

为了证明胡风罪大恶极，便要炮制出一个“反革命集团”来，于是一大批党内外外的干部和文艺界人士便遭了殃。一九八〇年，中共给胡风平反的档说：此案“触及”了二千一百多人，逮捕九十人，其中七十八人定为“胡风份子”。

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彭柏山，早年在胡风鼓励下从事文学创作。一九三四年他被捕后曾在狱中化名给鲁迅写了封信，经胡风认出笔迹，鲁迅嘱胡风按月寄钱、物到狱中给彭，直到三七年抗战彭获释为止。彭能文能武，身经百战，一九五二年自解放军第二十四军副政委任上转业到上海。因为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中称赞了他，毛泽东亲自点名：“上海为什么不出彭柏山？”“胡风反革命集团份子彭柏山”便被搞出来了。他原先所在的第二十四军也大搞了一阵肃反。他在湖南茶陵县老家的大哥受累被定为“坏份子”，于一九六〇饿死；担任乡长的二哥则被开除了党籍。

关押了一年半后，实在找不出罪证，当局只得给彭安上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一般份子’”的帽子，开除党籍，释放回家。一九六五年彭到了河南农学院，在图书馆中当资料员。文革中这种“份子”是跳不脱的，他在被打得体无完肤、头发被揪得剩不了几根之后，终于自杀。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思，一九四六年曾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发表过一首诗，以后又去看望过胡一次。这时他也被抓起来“受审查”。他不像彭柏山拖到文化革命才自杀，他当时就服安眠药解脱了痛苦。

彭柏山、郑思与胡风相识，说他们是“反革命”，是“胡风份子”，多少总还有风影可捕可捉。可是，当年延安青年鲁黎同胡风从未谋面，只是他在延安写的一首名为《延安赞》的诗，经人推荐给胡风主编的杂志发表，他也就成了“胡风份子”。

胡风的妻子参与了三十万言书的抄写工作，当然地成了“胡风集团骨干份子”，也坐了牢。

上海的名杂志编辑尚丁，作为上海市人民代表，白天还去视察了监狱，当夜却莫名其妙地被捕进了监狱，原因是他有几个过去的同事成了“胡风集团骨干份子”，他也就被划进了“胡风集团”的圈套。

三十年代起将小说投寄胡风主编的杂志而进入文坛的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在一九五五年春节胡风已处于被批判状态时，他与朋友饮酒，还“祝胡风身体健康”。作为“胡风集团骨干份子”，他也进了监狱。在此之前，他先后蹲过几次监狱：一九三五年在北京读书时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由家人花钱保释；抗战末期被日本人捕去，直至日本投降才获释。但唯有这中共的监狱蹲得特别长，而且押了十年之后才判刑。

九一八事变后投笔从戎的抗州诗人阿珑，在一九三七年的淞沪抗战中受过伤，后由其为周恩来秘书的朋友安排到延安。以后他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多次将军事情报托胡风转故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女带到延安，直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发通缉令要逮捕他才逃走。现在他成了“反动军官”兼“胡风份子”，判刑十二年，死于狱中。

胡风曾因不满足于看马列著作的译文，请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谢韬帮助查找原著，谢因而成为“胡风反革命份子”，坐牢二十二年。

作家路翎，不到二十岁就完成了部长篇小说《财主的女儿们》，一九四八年一出版就销售一空。其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一九四六年已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中共执政前他总共出版了计二百万字的小说集。由于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份子”，他在狱中生活了二十年。二十年后，人们“在一条脏胡同里，在大扫把扬起灰尘和垃圾中间，发现一个蓬首垢面的老头低着头一面扫，一面喃喃自语……这就是当年名重一时的路翎。”“有人去探望他，把他过去写的书送给他看，他一面摩挲着陈旧发黄的封面，一面恍惚而淡漠地问道：这会是我写的么？”（注35：《新华文摘》一八五年第四期第一八五页。）

已有三十年中共党龄的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华岗，是学者型的革命党人。他着过好几本书，其中《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史》一书曾为毛泽东称道。他虽与胡风没有关系，却因批评过毛泽东，也被打成“胡风份子”，同胡一样，关了十年黑牢之后才被判刑。当局也要他服罪以换取“从轻处理”，但他坚持“无罪可服”，一直坐完了他那十三年刑期。一九六八年刑满之时正值文革，他被留在狱中，直到病重才送回家。但家数口仅一间房，他无处栖身，不得已又拖着病躯自愿返回监狱，并死在那里。

一九四九年离台湾经香港北上的美学家吕荧，作为一名学者，本来无事，但在胡风等被捕后召开的文联大会上，主席郭沫若要求将胡“作为反革命份子依法处理”，他上台坐到郭和主持斗争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中间，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不能说他是反革命”。这样，他也被扣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份子”的罪名。文革期间，他在劳改农场被宣布为“疯子”，从队长到歹徒都折磨他，凌辱、漫骂甚至殴打，几乎天天发生。他曾鼓励难友“要坚持信念”，人民是必胜的”，但自己却未能坚持下来，在病饿交迫下，他默默死于一九六九年春天之前。掩盖他的一堆土旁立着一小块红砖，上面用粉笔写上“吕荧”二字。这就是他留在人间的一点记号。一个美学家死了，正如另一个“胡风集团骨干份子”、被迫害死去的作家阿珑的诗里所说的：“我要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胡风案波及不大，不过“触及”了两千人而已，但这只是中共官方的说法。相比之下，当时作协的实际负责人之一康濯的数字可能更为可靠：“全国被清查、揪斗的达十余万人，被捕入狱的一万多人。有的人仅是读过胡风的一篇文章，听过胡风的某次报告。”（注36：康濯当时是作协书记处候补书记，《文艺报》执行编委，驻协会作家党支部书记。引文为康对作家古华的谈话，见古华《一代革命作家的悲剧》，载香港《争鸣》一九九一年五月号。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对此的回忆载于《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毛泽东对胡风的历史所栽的赃，纯属他个人的创造，他对胡的经历根本不了解。真正了解胡风的人是有的，这便是周恩来。

一九四一年新四军九千人被国民党人围剿、仅一千余人逃生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在重庆捕捉亲共人士，周恩来及时派人送去路费，让胡风与别人一起到香港隐蔽。这一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军不敌日寇，香港沦陷，周又指示将他们无一遗漏地营救出来。当时国内气氛有所缓和，周指示胡风回到重庆，支持他向国民党登记出版杂志，以文艺为武器与国民党作合法斗争。现在共产党翻了身，胡风反倒被宣布为“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了。然而，周恩来不出来说话。他只做“中转站”，将毛的指示转给领导文艺界的周扬，自己不加工。不与毛正面冲突——这是周恩来在二十年前红军长征被期的遵义会议上被毛夺了军权，逐渐沦为毛的助手之后所采取的既定方针。这样就再也无人对胡风施以援手了。

周恩来对胡风也不是一点忙没帮。据康濯说，文革中胡风被重新判决，本拟判处死刑，“经过总理多方周旋，改判无期徒刑，终身监禁，留作反面教材。”（注37：同注36）

胡风等“份子”入狱后，作家巴金曾偶尔向熟人打听胡风的消息，可是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问了。”过了近三十年，他回忆当时的情景道：“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注38：上海《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怀念胡风》。）

巴金将“反胡风集团”的运动和“反右”、文革相提并论，说他一想起这“三大运动”，“便不由得浑身战栗”，正是肺腑之言。在毛泽东统治下，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整罢一批人整另一批人，这一次不过是“轮到胡风倒楣”罢了。

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说，一九五五年是毛泽东的一个大丰收年。“潘、杨集团”、“胡风集团”外加“肃反”，一大批各类“份子”被肃清，而且共产党似乎就要这样斗下去，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人们只是希望在下次的什么运动中，自己不会成为一名新的“份子”，哪里还敢对国是发表意见？巴金的“不敢做声”正是当时中国知识份子精神状态的写照。中国的知识界死气沉沉，似乎就要下去了。

第三章：换调子“双百”出笼

到了一九五六年，情形忽然大变。二月间，各国共产党的老大哥苏共展开了对斯大林的批判，“解冻”成为潮流。这对中共不能不发生影响。经过高层的磋商后，毛泽东宣布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采取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应作为我们的方针，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见。”（注1：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这个后来被毛的助手陈伯达浓缩为“双百方针”的提法实在是条含混不清的口号。正如后来一位教授所说：“在百家争鸣中是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则恐阻止他家的争鸣……”而处处事事以马列主义（六十年代后又加了个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是中共从未放松过的。尽管有这样明显的矛盾，这个“方针”仍然由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于五月间郑重其事地告示全国。

由于陆定一代表中共宣布每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注2：转引自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一书第一二六页。）不少人耳目之一新，十分兴奋，认为跨进了一个新时代。当然，也有人在推敲陆氏讲话的真髓：“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虽然同阶级斗争密切有关，可是它和政治终究不是完全相同的。”学术和政治当然不完全相同，可是只要“同阶级斗争密切有关”，而且政治问题仍然是个“不得入内”的禁区，那么陆氏所许诺的那么多自由就都只是雾中楼台中月，并无实际内容。

事实正是这样。毛泽东从执政到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七年中，发起过不少批判运动，如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梁漱溟的批判等等，无一不是将学术问题和政治搞在一锅里煮，结论则无一不用“阶级斗争”罩住了事。无论哪个问题，只要毛泽东发了言，其他人的不同观点就再无立锥之地，那个领域也就了无生气。学者们要么沉默，要么做释经家，当传声筒，决无自成一家之言的可能。譬如北京大学著名的美学教授朱光潜采取的是沉默办法。他自述道：“在‘百家争鸣’的号召出来之前，有五、六年的时间我没有写一篇学术性的文章，没有读一部像样的美学书籍，或是就美学里某个问题认真地作一番思考。其所以如此，并非由于我不愿，而是由于我不敢。”（注3：见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文泊的文章。）

教授可以在讲两门课之外保持沉默，作家除非改行，沈从文去搞文物，陈梦家去搞考古，沉默是不行的，结果只能当传声筒。作家李准一九七九年在《文艺研究》上着文说：“我们已经当了二十年传声筒，不能再当传声筒了。”这就是对那一状况的沉痛反省。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文学家就已经是传声筒了。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和“辩论的自由”，就不可能出现百家林立的局面。没有诸子百家，何来百家争鸣？然而，就在这种气氛下，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要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这真有点匪夷所思。所有的人都还记得在知识份子改造运动中怎样靠丑化自己过的关，所有“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都还弥漫着去年大规模肃反运动留下的杀气。创痛犹在，记忆犹新。对过去几年一个接一个全以知识份子为对象的运动不作一番清理，不给一个结论；对于无数被伤害的、被整死的无辜，没有一句反省，不显示一点歉意，知识份子们自然仍有余悸，不会因为党中央一个号召，宣传部长在大会上振臂一呼，专家教授就会立即行动起来，你争我鸣。牡丹芍药更不会自己从地底钻出来，争妍斗丽。

然而，这一次中共中央的态度又实在诚恳得很。中宣部长陆定一于七月二十日对出席会议的各省市管宣传、文化、教育的官员们大声呼吁，要他们让大家讲话：“人家不讲话，我们就耳不聪、目不明，再过几年就变成木乃伊了。”无论什么话，多重复几遍总有用处。过去几年累积起来的疑惧逐渐消退，气氛终于松动了。

虽然大多数人仍然保持沉默，但终于有人由于自身的善良，或是由于天生的健忘，或是由于练就的勇敢，或是架不住宣传机器的千呼万唤，或是抵不住“百花齐放”美丽的诱惑，跳出来喊叫了。

其实，记者刘宾雁早在中共鼓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前就已经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所驱使，以“干预生活”为己任，自行行动起来。一九五六年二月间，他就已完成了一部中篇特写《在桥梁工地上》。文章批评了一个党的干部，此人为官的哲学是“最重要的就是领会领导意图”，“不犯错误，就是胜利”。刊登这篇文章的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四月号），秦兆阳主持的编辑部在该文前面的“编者按”中说：“我们期待这种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希望……更多地出现这样的作品。”

编辑们没有失望，不久，这样的作品又出现了，只不过作者还是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及其它续篇相继在六月和十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着力描绘某省党报的一位女记者如何在弥漫着官僚主义气息的环境中追求真理、主持正义。一年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一位干事姚文元批判这篇文章时是这样概括的：“整个报社的气氛十分暗淡。官僚主义如同一块大石一样压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总编辑陈立东……是一个压制任何合理的政见的独断独行的专制主义者。”姚的结论是，“作者带着深刻的嘲讽描绘这一切”。（注4：《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第十一期）

就一点而言，姚文元说的倒不错。刘宾雁的文章一改风行全国的用华丽的词藻颂扬执政者，用空洞的议论掩饰矛盾和危机的文风，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比刘宾雁稍晚少许，王蒙将抨击北京一个中共区委机关的官僚主义现象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投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秦兆阳接到稿子后迅速行动，先嘱王蒙加以修改，而后自己又在王的二稿上作了改动，使批评官僚的意味更加强烈，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

这篇小说尽管暴露和鞭鞑的深刻不如一些文革后出世的作品，但当时却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数年后，一位西方人士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暴露文学”集成了一本名为《苦果——铁幕后知识份子的起义》的书，其中中国人的作品便是王蒙的这篇小说。其实，作者王蒙和编辑秦兆阳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不过是以知识份子的良知对党内的丑恶现象加以鞭鞑而已，同“起义”二字毫不相干。

小说发表后各报刊相断对此展开争论，连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都拨出了不少篇幅，刊登读者的评论。

前不久由于批判老学者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受到毛泽东夸奖、红透了半边天的青年学者李希凡，此时已从“小人物”（毛泽东语）升为中人物。他欲再立新功，便对王蒙这篇小说持批判态度，理由是“这种官僚主义满天飞的……党的区委会，在离开中央较远的地区……还有若干可能性，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这是不能相信的”。（注5：一九五七年二月九日上海《文汇报》）

谁知他这回摸错了行情。毛泽东正欲鼓励百家争鸣，对李希凡的观点大不高兴，说：“北京怎么就没有官僚主义？”

对王蒙这篇小说展开的讨论倒是在大致无政治压力的情形下进行的，颇有点自由争鸣的味道。王、秦二人被打成右派以至受罪二十余年，那还是九个月以后的事。在一九五六年的秋天，他们却是为推动“百家争鸣”的方针立了功的。

天津戏曲学校校长、相声作家何迟也用他的作品“鸣”了一下。他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发表了一个相声《开会迷》，着力讽刺了一个“不吃饭不睡觉过得了，不开会不作报告他过不了”的干部。譬如有一天他又召集会议，有人问：“讨论什么问题哪？”“讨论一百年后工人福利问题。”“一百年后的事，干嘛现在就讨论哪？”“要展望一下共产主义社会的美丽远景啊！”

这样的讽刺作品得以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足见作家和编辑颇有点勇气。

不过勇敢的人毕竟太少，虽然有些搁笔多年的作家重拿起了笔，一些几年来不准上演的老戏又上了台，也有人敢说“不要谈什么主义，只要读者、观众欢迎，就该肯定它是好作品”了，但是就全国来说，知识界对中央的号召反应并不热烈。所谓“百家争鸣”，仅仅处于聊胜于无的状态。

为了创造百家争鸣的气氛，中共于七月间通知两个多月前方被命令停刊的上海《文汇报》前社长徐铸成，要他带领原班人马复刊，办成一家以知识份子为对象的报纸。复刊后的《文汇报》虽不免仍要以贯彻中共的政策方针为办报主旨，但它毕竟与官气滞重的党报不同，受到知识份子的普遍欢迎，就制造宽松气氛而言，中共让它复刊的目的确实达到了。

对贯彻“双百方针”作了进一步推动的是九月间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苏共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错误作了严厉的批判，苏共又是各国共产党的当然带路人，于是反个人崇拜便成了中共八大上的主要议题。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修改党章，将中共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句话删去，在“党员义务”那一款中也删去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内容。

讲到这里，还得谈点历史。四十年代初，毛在党内的地位虽已高于周恩来及他人，但周的组织势力却大于他。毛欲成凌驾于众人的领袖，必得借助“思想”、“理论”，因为那正是周的短处。在刘少奇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之后，毛方从中共诸领袖中脱颖而出，所谓“朱、毛”、“毛、周”都不复存在，无人能与之比肩而立，他的领袖地位才最终奠定。从此中共就采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了。

那个“毛泽东思想”，显然就是毛泽东的思想，而不是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所解释的中共领导人大家（包括邓小平）的思想。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曾作过一个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注6：《中共党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六期，《八大党章未写“毛泽东思想”的原委》。）可见毛并不认为“毛泽东思想”有别人的份。邓在六十年代文革中所写的检查中说，“我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也可做个辅证。要是毛泽东思想连刘少奇、邓小平都有份，那“格格不入”又从何谈起？

可是，后来毛泽东觉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使人以为二者是不同的东西，于是在一九五四年批发文件通知全党：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注7：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五日中共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同注6。）所以要改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注8：同注7。）

所以，中共八大修改党章，删去“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党内高层无人提出异议，毛泽东本人也不好启齿反对。但这并不是因为毛要“把自己摆在马、恩、列、斯学生的地位，保持谦虚谨慎，力戒骄傲”，（注9：一九五六年九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而是出于其谋略，否则无以解释为何四十年代他把提出“以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林彪定为接班人，独独在五十年代初那几年内表现出伟大的谦虚。

至于中共其他领导人，服膺苏共的程度比毛深，紧跟苏联老大哥的心态也比毛强烈，对毛大哥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做法更加认同。对他们来说，删除“毛泽东思想”一词就不是因为与马列主义同一，而是要执行“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了。（注10：一九五六年九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当时党内反对个人崇拜的风气之盛，可以从一件小事看出：有一天举行文艺晚会，周恩来告诉到场的人：过一会毛主席来的时候不许鼓掌，谁鼓掌了下一次不发给晚会入场券。

在这种气候下，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基础动摇了。要巩固人人喊“毛主席万岁”的地位，必须抵抗对斯大林的批判浪潮。所以，他一九五六年四月间先后与苏共主席团成员米高扬、苏联驻华大使谈话时都说：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十月二十三日，他又接见苏联大使，明确表示对苏共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到了十一月三十日，他再次接见苏联驻华大使，说：“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指斯大林）。”（注11：一九六八年二月北京《史学革命》编辑部出版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九二一——一九六七）》第一四八及一五二页。）

毛这些话，与其说是讲给苏联大使听的，还不如说是讲给中共同事们听的。但刘少奇等人不愿为此与苏共闹翻，他们不觉得批判斯大林对他们有什么威胁，对于毛急于肯定斯大林的做法不予响应。这样，毛只得忍受，待日后再求翻身。

毛当时忍辱，日后处心积虑翻案，乃至发动文化革命，目的就是要重新恢复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方针，在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之后的一九六九年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他终于成功地推翻了八大的决议，将这一条重新写入了党章。

如果“毛泽东思想”果真如邓小平来解释的那样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邓与刘少奇合伙在一九五六年八大上将它从党章中删去，便不仅是一项严重的原则性错误，而且毛藉文革来“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无可厚非，刘、邓对这场浩劫之发生也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了。

由于“斯大林爷爷”被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特别是在三十年代苏共肃反期间滥杀无辜的罪恶被揭露，使得每一句话都被当作是金科玉律的毛泽东也不再是圣明，中共党员（当然更包括普通人）不再有义务学习他的思想，敏感的知识界自然感觉到了春意。至于中央所许诺的“自由”，那是他们一直向往的。但由于共产党所执政时知识份子已经失望过一次，所以一九五六年中共主动谈论“自由”时，大多数人心裏虽然痒痒的，但乃缺乏刘宾雁、王蒙、秦兆阳那份勇气，于是只是观望、等待着。

本来，毛泽东统治中国七年的历史已经告诉人们：只要他在位，中国决无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之可能。只是相当多的人头脑不清醒，没能看得分明而已。

这里有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中共当时的“双百方针”为何物。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上海文化界在报上讨论“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中央宣传部分管电影工作的钟惦非写了一篇题为《电影的锣鼓》的评论文章，披露四年来国产电影有百分之七十不受欢迎，收不回成本。他以为问题征结是把中共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变成了拍“工农兵电影”，领导电影业的中共官员作年度拍摄计划时，往往先“规定题材比例：工业，十个；工农十五个，以及如此等等”。此外，剧本的稿费，导演的酬金等，通通要呈请电影事业管理局批准，“管的人越多，对电影的成长阻碍也越大”。（注12：《文艺报》一九五六年第二十三期。）该文本意在探讨如何使电影事业繁荣，实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可是在毛泽东看来，这已经属于大逆不道了。钟被毛点名批判，以后成为右派大军中的一员，吃尽了人间之苦。他的妻子拖着一群未成年的子女，过了二十多年赤贫的生活。

四川的年青诗人流沙河写了一组托物咏怀的散文诗《草木篇》，刊登在《星星》诗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上，结果

很快就招来围攻。诗中写了“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的藤，本意是鄙视趋炎附势的小人，批判者却一口咬定他咒骂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说是“对人类历史上最民主最先进制度的诬蔑”。诗中说梅花“把自己许给了冬天的白雪”，结果被批为有“变天思想”，盼望国民党回来复辟。四川省文联的党委领导甚至说：“我一看见《草本篇》就想起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对这种反动腐朽的东西，一棍子打死也未尝不可！”（注13：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上海《文汇报》。）

在全国性的批判围剿之下，流沙河曾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他虽然挺了下来，但数月后中共“反右”，《星星》诗刊编辑部连他在内四个人，统统被扣上“右派”帽子，分头遣送农村劳动改造去了。

由此可知，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和那批以整人为能事的各级干部的控制下，百花是无法生存的，百家争鸣更是痴人说梦。

其实，即使对钟惦非、流沙河不进行围剿，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不会有积极的成就。这应是意料中的事。过去几年中，艺术家们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除了唱唱时代曲没有危险外，其余的创作动不动就犯忌，时间一长，肚子也就空了。正如名作家巴金所说：“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来。”（注14：上海《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怀念胡风》。）

科学家们绝大多数都与欧美有联系，将大量精力用于清理自己的“反动思想”，徒有著书立说之志，笔底流不出墨水。大家即使愿意争鸣也鸣不出声，热闹不起来。科学创新、文艺创作，不能一蹴而就；没有宽松、自由的气氛，没有活泼的思想交锋，一切都无从谈起。正如朱光潜教授，由于中共许诺诸多“自由”，允许“百家争鸣”，使他“松了一口气”，并且“喜形于色”，觉得“还可以趁有用的余年在学术上为大家一样心爱的祖国出一把力”，可实际上却会不出什么学术成果问世。这本是毛泽东执政七年中的一系列批判运动造成的直接后果。要是毛真有推行“双百方针”的愿望，那么持之以恒，假以时日，不断地改善政治空气，检讨过去的劣迹，使知识界生活在宽松的环境里，而不是生活在口号的世界中，三五年后情形可能会大变。那时中国各行各业都可能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国家也可能从此走向大治。

可是，毛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不习惯于过平静的生活。他既不愿意做周恩来那种婆婆妈妈的家务事，也对刘、邓那种具体的党务人事不感兴趣。他向来热衷于指挥大军叱咤风云，一年不搞运动便觉难耐，岂能坐等三五年！“桃三李四杏五年，枣子当年好卖钱。”他没有耐心栽苗浇水，种桃植杏，也明白诗歌小说、科学发明靠打板子打不出来，索性换个调子，另辟蹊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决定另搞一场政治性的运动，让全国人民帮共产党“整风”（整顿作风）。此时距陆定一向全国宣布实行“双百方针”刚半年。毛说：“我们要进行一次大的整风运动”，“主要是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贪污浪费以及下边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注15：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

从他宣布的内容来看，这运动是针对党的干部，旨在改进党的作风的，怎么会从一九五七年四月开始整风，到六月初就演变成一场酷烈的、导致百万知识份子家破人亡的“反右派斗争”了呢？

我们不妨对历史回顾一番。

毛泽东搞整风，这不是头一遭，历史上有案可查。整风即整人，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就可以用这几个字概括。那年三月，整风开始不久，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王实味就在壁报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鼓吹党内民主。党内同情其观点的人相当多，看壁报的人川流不息。有几期壁报上贴在布上挂到延安南门外，人们像赶庙会一样前去观看。但好景不常，一天晚上，毛泽东去看了壁报，回来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王实味的鸣放就此结束，以后便是拿他开刀。一开始还只说要纠正王实味带头刮起的小资产阶级歪风，要求他改

变立场。随后将他与有类似点的人区别开，以便孤立、打击他这个闹事的。

五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由毛和在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上反对毛上台、攻击毛“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不过懂点孙子兵法罢了”的凯丰（何克全，政治局候补委员）共同主持。会议期间毛作了那个成为日后文学艺术工作者金科玉律的“讲话”，对王实味的“资产阶级文艺观”作了批评。

领导延安整风的是一个“学习委员会”，毛泽东自任主任，控制特工系统的康生任副主任。这个委员会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拥有随意逮捕人的权力，可见“学习委员会”管的并不是学习。本来，王未被视作敌人，但康生插手此事后就不同了。六月，王被定为“托洛茨基份子”；十月被开除出党，批评改为批斗。其时，毛的助手陈伯达发明了一个新的斗争术——将王实味骂成“王尿味”。

一九四三年四月，康生下令一夜间抓了二百多名从全国各地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罪名是“特务”、“汉奸”、“叛徒”和“托派份子”，王实味亦在此列。以后越抓越多，到了七月，康生召开紧急大会，说已有四百五十名特务坦白交待，号召其他稳瞒了历史的“失足者”赶快坦白。

一九五七年也成为右派的女作家陈学昭后来这样回忆延安整风的情形：一天“突然气氛紧张起来了，叫我去参加（《解放日报》）报社和新华社一起召开的一次抢救大会，号召人们上台去坦白。有人上台去坦白自己是特务。上台坦白的人接连不断。”（注16：《江南》一九九〇年第五期。）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胡乱说自己是特务呢？因为共产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一套很厉害，要是你不“坦白”，当局说你是特务，你拒不承认，那便是“抗拒”，要从严处理，一旦“从严”，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还是先“坦白”，保住脑袋再说，以后慢慢再甄别平反也不迟。要说这是“活命哲学”也可以，反正是行之有效的好法子。譬如，要是邓小平抗拒文化革命，拒写“永不翻案”的检讨，他大概也就和刘少奇一样，在六十年代就结束生命历程，没机会搞后来的改革了。

总而言之，虱子抓得越多越高兴。一时间延安特务多如牛毛，造成了恐怖气氛。欲知如何恐怖，可见以下二例。

曾在北京的大学里教书的中共老党员齐燕铭带了三个女儿到延安，三个都被当作特务嫌犯扣住，逼令“交待”。主事者将其七岁女儿的头绑在窗台上说：“交待出来，我给你上伙房打碗羊肉吃。”

在这种气氛下，经不起冤屈、折磨的，只有另求解脱之道。仅延安一地，就有五六十人自杀身亡。（注17：文聿《中国左祸》第一三七页。）

本书作者一位朋友的父亲，当时还是“小鬼”。一天晚上，上级给他一把大刀，指着被关押的一大屋子各类嫌犯说：“要是谁敢逃，你就劈了他！”

到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打进延安前夕，王实味被押撤离，到达晋北根据地后不久被杀。同一批被处死的还有晋绥《抗战日报》发行部主任蔺克对等。

王实味及其妻子均是二十年代大革命浪潮中加入共产党的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王与胡风还是同班同学），不过在整风中鸣放了几句，他就被“自己人”处死了。

由于毛泽东指示过，对王“不要放也不要杀”，所以听说下面自作主张杀人后颇有点恼火。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认为王的鸣放越出了允许的界限，属于造反行为，必须严惩。至于罪名，在那个不讲法律的天地里是最好办的，随便按一顶帽子即妥。毛直到一九六二年还恨恨地提到王实味，说他“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来把他抓起来，杀掉了。”（注18：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不过，中共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倒没有给王实味栽上“国民党探子”的脏。他只说王“王写大字报反党、反中央、反革命”而已，（注19：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似乎不赞成把王往国民党那边扯。

毛泽东所提到的那篇“诬蔑共产党”的《野百合花》里，送了王实味的命其实只是几句抨击党内不平等的“牢骚”而已：“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得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至下对上感觉到他们是异类……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他还特地说明自己也是吃小灶的，“葡萄并不酸”。此外，又讲到“学生出身”的青年，“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

王实味对革命的“攻击”仅及于此，而且他也没有停留在“攻击”上。他指出：“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本质，合理地消除这些现象底根源。”

其实，对于打着“共产”旗帜的革命队伍内部的不平等，并不是王实味一人不满。女作家丁玲在她那篇也使他挨了整的短文《三八节有感》中，是这样提到妇女在延安这个“革命摇篮”里遭遇的不平等的：“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里，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

时至今日，人们对执政以后的共产党官员享受特权的情形已十分清楚，同花园洋房与三代合居的土屋之间的差异相比，花绒布与脏布片的不平等就根本不算一回事了。因此，人们或会认为王、丁二人是小题大做，而且的确有平均主义在作怪。保姆缺乏，不能将所有的革命后代都照顾周全，高级首长的孩子被优先看护，这是任何队伍都免不了的“不平等”现象。只是由于王、丁二人是怀着纯洁的共产主义理想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份子，他们以为到了延安就是到了一个大同世界，不明白他们所向往的不过是一个理想中的世界而已。如果他们有错，则只错在把共产党的革命想像得太美好太浪漫了而已。

但共产党又必须打“共产”、“平等”、“平均”旗帜，丢了这面旗，便会失去号召力。所以共产党最忌讳“不平等”三个字。只怪它的领袖们一方面有革命理想，另一方面也是活人，在物资匮乏、只充许少数人过像样的生活时，将物资首先分给他们自己也是自然的。文革中为了搞臭刘少奇，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将刘的“罪行材料”向全国散发，弄得全国上下都知道刘少奇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乃然吃鸡。作为倒刘的主谋，毛泽东看到那个材料应当不太愉快，因为他在延安也是吃鸡的人物。虽然陈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释过毛主席吃鸡是党中央的决定，并不是他个人要吃的（大意）。但“食分五等”总不能说是共产革命队伍的光荣。反观国民党，它本来就反对“共产”，所以就不用顾忌这一点，不必在“平等”二字上纠缠。

毛泽东心知光凭《野百合花》里那几句话就给王实味扣上“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的帽子难服人心，于是遂有“暗藏的国民党探子”一说。但他又表示不赞成杀王，王之被杀的确也与他无关。但他忘了，他宣布了王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而探子们都是该杀的。由此可见，对于王实味一案，他无法自圆其说。

延安整风、审干（审查干部），最初抓出来的“国民党特务”、“内奸”，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冤枉的。刘少奇五十年代为延安整风辩护时竟说那百分之九十五被整错了的人“多多少少是有错误的。那时那么多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资产阶级思想泛滥……老实说，有的人戴上个帽子不冤枉，你有那么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嘛！”（注20：同注19。）有“资产阶级思想”就可以关押起来，扣上一顶“特务”、“内奸”的帽子狠整一通，可见远在中共进城执政前，知识份子就已经是中共的运动靶子了。

其实，那么多人被关押审查，并非因为他们有“资产阶级思想”，而是因为各部门都要抓个“特务”出来报成绩。譬如舒群是当时延安的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第四版（文艺版）的编辑。他当时也是被“揪出来”的“特务”。四十年后，他这样回忆道：“……组织上决定我去主编第四版。在这期间，我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接触……”整风中，“起先，我以为我认识毛主席，也认识康生，他们都了解我，大概我本人不会有什么事。可是……我无故被

停了职……因为各部门都搞得热火朝天，只有副刊部还没有抓出一个‘特务’来。……随后，我被当作‘双料特（务）赚（疑犯）’打入水中。……明明要革命，却变成了‘特务’。我百思不得其解……被迫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注2 1：《人物》一九八四年第三期第九十至九十六页。）

像那百分之九十五中的其他人一样，舒群在一年后获得甄别平反。不过，到了一九五八年，他成了“反党份子”，这回是二十年大难不死获平反。

至于剩下那百分之五被认为没有整错的，被枪毙、砍头、活埋了的，也未必是“国民党特务”。他们在整风中消灭，只是因为他们是知识份子，首先成为怀疑对象罢了。例如北京大学女学生陶凯孙及其已入了中国籍的朝鲜人丈夫金文哲，他们全力为中共搞地下工作，儿子一出生便送给了人。抗战后不久，二人到达延安，一九三八年春一并失踪，随之被康生宣布为敌人，秘密处决，死时仅二十七、二十八岁。（注2 2：《人物》一九八七年第三期第三十四页。）他们中共处决的自己人中的典型。直到一九八二年公安部才接受其家属的申诉，复查后宣布“这是一起冤案”。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要是将延安整风时处决了的“特务”、“内奸”们一一复查，很可能大多是冤案。

不仅延安地区，中共在各根据地搞的整风都是这样胡抓乱杀。亲身参加了冀南区（河北南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女作家刘真这样回忆道：“在打骂、吼叫、种种花样的肉刑中，冀南整风大队三个小队几百名干部百分之八十都成了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有的是双料特务，还有‘灯下黑’即被怀疑成特务的人。不断的有人跳崖自杀，山上山下一片恐怖……冀南行署主任刘建章也被打成了特务。他死也不承认，被拉出去假枪毙……”（注2 3：刘真，《太行山的整风运动》，香港《开放》杂志一九九三年五月号第一〇一页。）

提到延安整风，不仅知识份子，连很多老干部也深恶痛绝。一九六七年二月，文化革命搞得热火朝天，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副总理陈毅针对许多人挨整的情形提到了延安整风：“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总理不是挨整的吗？”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走进毛的书房，向他汇报。当毛听到陈毅这段议论时，立即勃然大怒：“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注2 4：《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二卷第六十七至七十页。）（王明直到整风前还是唯一有力量和毛争首席的莫斯科派人物，他给党校学生讲联共（苏共）党史课时，掌声不绝。康生还带领学生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中，新四军负责人项英被打死后，王在军中失去了有力的支持者，在四二年整风后被毛变相软禁，脱离了党的核心。）由毛的激烈反应，也证实了延安整风的对像是王明及其支持者。所谓“王明路线”时期，王明只是在苏联遥控，真正干事的是博古和周恩来。博古在遵义会议中下台，周恩来则因及时转向、反戈而被“团结”、留任。既然王明路线周恩来有份，他就非检讨以求过关不可。这也就是陈毅说周在延安整风中“挨整”的缘故。延安整风连着毛的神经中枢，陈毅那一番话促使毛迅速反应，当即作出了反击“二月送流”的决定，将陈毅等副总理、元帅送上了斗争台。

知道了这段历史，再来看一九五七年的整风一鸣放一反右，事情就容易理解了。

第四章 诱鸣放“引蛇出洞”

“整风”是叫人民给共产党提意见，纯政治性的，而“双百”里的“鸣放”是学术、艺术性的，是谁把它们搅和到一起的呢？毛泽东在将百万知识份子打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之后说是右派们搞的：

“鸣放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去年在这里讲百花齐放……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是百家争鸣，就不涉及政治。后头右派他需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叫鸣放，叫做鸣放时期，而且要大鸣大放……”（注1：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这完全不是事实。事实是：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的“鸣”、“放”二字抽出，移植到政治上来，赋予全新

的意义，并将“鸣放”引向政治，以至形成一九五七年年四、五两个月全国范围的批评矛头对着共产党的“鸣放时期”的，正是毛泽东本人。

毛的意图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发动“鸣放”？

当然，他看到了共产党的官员脱离群众、官僚作风的一面，但这不是他最关心的事。一九五七年初，占据他头脑的主要是政权巩固与否的问题。这可由一月间召开的中共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他的讲话看得一清二楚。这个会议是“反右”之前中共中央召集的唯一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开始和结束时，毛都作了长篇讲话，“思想动向”是他讲话的主要议题。要了解为什么会出现“反右斗争”，不可不读此一讲话。（注2：引自本书作者保存的一九六七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的《学习资料》第二册（一九五七—一九六一）作者保存该资料共四册，此章接连数段引文均引自此一资料。）

他在会上说：“思想动向的问题：党内思想动向、社会思想动向应该抓住。”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了斯大林——引者）……中国也有少数蚂蚁想出洞活动。现在赫鲁晓夫改变了（指镇压一九五六年十月间的匈牙利事件，又回到马列主义），蚂蚁也缩回去了。”“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小资产阶级专政，把你搞下来他专政。想搞匈牙利的，要整一、二十年。各省要开群众大会、演讲会、辩论会，展开争论，看谁胜利。……有屁让它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让大家鉴别香臭。社会发生分化，我们争取大家，大家认为臭，他就被孤立了。”

这里毛所谓的“他”，正是五个月后被从六亿人中“孤立”出来的“右派”。多少人是右派？作为一个战略家，毛心里已经有谱了。他下面接着就讲：

“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长越好。……哪里有脓包，有细菌，总是要爆发的。大省五万，中省三万，小省一万。准备闹事，年终结账。”

全国二十六省，外加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大中小各三分之一，加起来大概就是九十万。后来果然抓了百万左右的右派，不过不是等到年终才“结账”，而是在年中六月份就结账了。

毛甚至在当时就连什么人谁是右派也已经有点谱了。在一月间的这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他在谈到“年终结账”之后还讲到了如何“处理”那一百万人，并举例道：“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后来丁玲成为全国著名的大右派，受到全国各大小报刊、杂志的批判，被弄得其臭无比，连不识的女人都骂她是“妇女中的败类”，原因就在于此。

由此可知，从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到五七年一月，占据毛的头脑、使他不安的就是中国“党内外”那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尽管事实上它并不存在。

对毛来说，那些“缩回去的蚂蚁”是潜在的威胁，不消除它们，他在紫禁城那个黄圈圈里就睡不安稳。波兰、匈牙利不久前的人民暴动告诉他，知识份子鼓动工农造反，推翻一个昨日还貌似强大的共产党政权不是不可能的。要不是中共施加压力，催迫犹豫不决的赫晓夫出兵镇压匈牙利人民，匈牙利共产党政权早就不存在了。

毛需要把那些“蚂蚁”们请出来，然后聚而歼之。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它们请出来。他决定利用“双百方针”。“百家争鸣有好处，让那些牛头蛇身鬼子王八都出来”，“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注3：此两句分别见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在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一九五七年四月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从一月到四月，他做的是将“双百”逐渐往政治方面引，将“百花齐放”的“放”演变成“大放厥词”的“放”，将“百家争鸣”

的“鸣”演变成“不平则鸣”的“鸣”。这一点，他的的确确做到了。

我们不妨看看他是怎么成功的。

一九五七年三月间，毛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说：“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注4：转引自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一书第一九四页。）他在这里说的“言论”自然是政治言论，而他鼓动“再放”的显然不是科学、艺术上的意见，而是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即政治上的“鸣放”。

如果说这话还不够明白，那么几天后他在天津对党员干部就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注5：同注4。）

此时，毛只要提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指的必定是政治，是邀请知识份子批评共产党，与文艺、学术已毫不相干了。

毛从天津南下，三月下旬到达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幸蒙召见，试探地问：“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说，是征求高价的批评，让人们畅所欲言……”毛答：“你的意见很对、很好”（注6：同注4，第一九七页。）

可见，毛半年后所说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涉及政治”、“右派他需要涉及政治”，与事实完全不符。

毛知道知识份子被“阶级斗争”斗怕了，便安抚人们道：“现在阶级斗争不斗了，阶级斗争停止了。现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注7：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山东济南的讲话，见《中共党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二期第六十二页。）四月十一日，他还将北京大学冯友兰、贺麟，上海复旦大学周谷城，中央民族学院费孝通等十来名教授请到中南海他的住处，说：“我感觉你们这些当教授的被搞苦了。……我们现在要整风。我们党对整教条主义是有经验的，你们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出来，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注8：《人物》一九八七年第五期第九十一页。）

毛的引导相当成功。这时，中国的知识界人士已忘了“百家争鸣”的“鸣”和“百花齐放”的“放”，应当是指在科学、文化、艺术领域立自成一家之言、竖标新立异之帜；大家一谈到“鸣放”，便不约而同地意指“不平则鸣”的“鸣”，“有气就放”的“放”，同他们的本行专业毫无关系了。

至于“双百方针”本身，中共倒未宣布收回，只是毛已不再理会它，任其冷冷清清地无疾而终，他自己则兴致勃勃地抓取得心应手的第二个“鸣放”——政治上的鸣放去了。

这个“鸣放”，开始时行情也不看好。凡是不太健忘的人都知道，毛在施政大事上是不容他人置喙的。一九五三年，与毛同龄，常被毛请去作客的名学者梁漱溟在一次会议上对共产党进城后用剥夺农民的办法积累资金搞工业的政策提出异议，毛当场翻脸，将梁臭骂一顿，其用词之恶劣，不堪入耳。随后，各重要报刊发动了“向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展开斗争”的批判运动。以后在文革中，那位七十多岁的老学者，更被耍猴子一样以绳子系颈，手持铜锣，敲锣游街示众，受尽了侮辱。

毛在批梁漱溟时，曾承认自己是个没“雅量”接纳意见的人。如今“鸣放”，他竟然将斥骂梁时的那副凶脸收起，换上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邀请人们提意见。对于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来说，这实在是个新鲜事。过去几年，他们只是改造对象，自我批判，互相揭发，台上斗争，台下检讨，写自传，写交待，早已不敢想像自己有资格批评共产党改过，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其中是不是有诈？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文章？

但是，毛泽东将全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一齐请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坚决宣布“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过去了”，这次整风“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毛毛雨”。（注9：，徐铸成《一九五七年“阳谋”亲历记》。）这个做法十分灵，赢得了不少早先被一次次整人运动搞得心灰意懒的高级知识份子的心。

当时政治气候确实暖和了一些，连在狱中的胡风份子、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也得到了一份周恩来的报告，里面讲到绝大多数知识份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监狱看守对他说：“你随时准备出去。像你们这样的人是国家的宝贝……”贾满怀希望，觉得就要走出铁窗了。

不过，相当多的人仍然怀有疑惧。在听完毛的讲话后的小组会上，仍有人不相信共产党是否会真正实行“言者无罪”。有的人甚至明说：“要我发言，先要给我一张铁券。”

铁券是过去皇上才给的东西，是保证不对臣子加罪的誓言。（注10：如明太祖朱元璋口赐俞通源铁券文：“今天下已定，论功行赏……兹与尔誓，若谋逆不宥；其余者若犯罪罪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尔功。……）所以，提出此一说话者只是表示自己怕被加罪而已，并不真的企求一张铁券。上海的文化界名人王造时教授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就比较实际：希望中共“发表一个比较具体的声明：保证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外，一切思想问题都不在追究之列”。（注11：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光明日报》。）

身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央常务委员的北京大学原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对于自己在“知识份子改造运动”中检讨十二次尚不得过关且淑缘拢?是面对帮共产党整风的“邀请”，坚决声明“不跳”。

重庆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教授，过去爱对不合理的现象发表议论，吃够苦头后，现在学乖了，私下对朋友说：“主人翁感万万感不得。天下无不是父母，只有听说听教罢了。”有的教授则悄悄劝人学圆滑些，不要直话直说，当炮筒子：“要多学薛宝钗，乃至王熙凤；那林妹妹的性格，千万不能学。”四川还有教授在家里贴了副对联：“守口如瓶，身心安宁”，表示对毛泽东那些“和风细雨”保持距离，决不响应。

河南省信阳地区计委干部刘铁华不相信共产党已经变了。他认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个幌子，实际上是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共产党是闻到批评，面红耳赤，居高临下，棍帽齐来，泰山压顶，借端报复。”“不如武则天，例像隋炀帝……以顺为贵，以直为仇。”（注12：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人民日报》，转引自陈权《鸣放选萃》第二册第二〇页。）

河北省一位党外人士则表示他有顾虑，怀疑共产党的“放”是“放长线，钓大鱼，发现目标”，以便整肃。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本为社会学教授，因各大学系均被撤消，他无书可教，去国务院专家局做了个副局长。这几年他心存不满，写了题为《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请朋友（如著名女作家谢冰心）看过，修改之后，发表于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报》。文中点明了大多数知识份子的心理状况：“心里热，嘴却还很紧……怕（百家争鸣）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

四月里，北京大学历史学家翦伯赞写了篇短文，谈到多数知识份子对中共号召“鸣放”的态度：“他们还在揣测，这是真放还是假放。如果是放，放多少，放了以后还收不收。放是手段还是目的，是为了繁荣文化学术还是挖思想、整人，以及哪些问题能争鸣，哪些问题不能争鸣等等。”（注13：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五月五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在上海召开座谈会，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潘世兹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今天我把什么话都讲出来，过一个时期，一年或许两年，我讲过的话是不是要算账？”“现在整风是整党内，过一个时期，是否要轮到我们？”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自己倒无顾虑，但他在五月九日中共统战部召集的会上说：“工商界有人……怀疑‘放’、‘鸣’与‘整’是三部曲，‘放’、‘鸣’以后有被整的危险。”

在中国人民银行非党干部座谈会上，朱绍文说：“这几年来知识份子受到了损伤和压抑，他们的心情深处已经像是一潭积水，欲鸣无力，欲放无胆了。”（注14：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转引自陈权《鸣放选萃》第二册第一九一页。）

辽宁省东北工学院教授许冶同在校党委邀请的座谈会上对人们为什么会欲放无胆作了一番解释：“过去向领导提出批评者就被认为对党不满和扣上‘反动份子’的帽子，平素交往较密者被认为‘反动小集团’，在肃反时都成为斗争的对象，肃反后都成了惊弓之鸟……所以在此次会上，不愿发言，恐自取其咎……”（注15：一九五七年七月六日《沈阳日报》）

被整怕了的知识份子不敢相信从此就没有“狂风大雨”，也没有“中雨”、“小雨”了。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穆木天所说：“尽管学校当局召开了几次教授座谈会，可是教师还是顾虑重重，不敢大胆提意见，怕再遭一次无妄之灾。因为在师大，教师被发配、降级等等之类的阴谋报复，是早有前例的。”“闻者不戒，言者有罪，‘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师大几年来一贯的传统。”（注16：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光明日报》。）

“含情欲说宫中事，鸩鸟前头不敢言。”广州《工商周刊》编辑樊建华在谈论人们为何不愿鸣放的文章中引了这两句唐诗，道出了多数知识份子的心声。

直到五月下旬，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鸣放座谈会”上，共产党会不会搞“秋后算账”还是被当作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提了出来。但是，一些民主党派的头目却已相信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求他们帮助中共改正缺点、作风的诚意。五月二十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副主席龙云在会上告诉大家：“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是不是共产党想测验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后整人？”“现在时机不同了，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会出尔反尔，开这样的大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以后再整？”（注17：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国务院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副主席罗隆基也不怀疑毛泽东有整人的意图。在同一天的会上，他表示不赞成某些人要共产党保证将来不搞打击报复的意见。他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也觉得缺乏保障，便提出了一个方案，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保证这一点，而且建议全国上下都设立这种委员会，形成一个系统，不但审查过去运动中的偏差，为过去受了委屈的人平反，而且可以制止以后可能发生的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的事件。“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注18：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这个方案若真能实行，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反右”这个名词了。只是罗隆基当了共产党二十年的政治伙伴，对什么是“整风”竟全然没有了解，提出这种共产党绝不可能接受的方案，这也就注定他日后会成为举国声讨的“大右派”。

知识界中了解中共在延安那段历史的人太少了，所有官方的出版物都掩盖了延安时期的真相。人民只知道歌里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从未听说共产党会把自己人抓去枪毙、砍头、活埋，会在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中成百成百地抓特务；更不知道毛泽东一九三〇年在江西清洗、屠杀红军内的异己份子，“杀了近万的干部和战士，当时江西省委级的同志，除曾山、陈正人外，其余的多被屠杀，红二十军全部消灭了。”（注19：《龚楚将军回忆录》第三五四页。）当然，也不会有人披露真相，说中共红军一九三四年从江西突围“长征”之前，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将几千名不可靠、“动摇”的干部、战士集中到十来个收容所，一刀刀砍、活埋，以致一九二八年一月与朱德、陈毅等共同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龚楚无法认同，终于在一九三五年脱了队。

人们从未闻说那些暴戾的事情，连龙云、罗隆基这样在政治沙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将都不了解自己与之打

交道的对手，普通读书人就更难猜毛泽东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

其实，就在龙云说共产党不会“开这样大的玩笑”前一个星期，毛泽东已经在调兵遣将，部署全国范围内的抓右派运动了。早在五月十五日，毛就已经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高干部。文中说之所以允许报纸发表鸣放言论，“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

毛将他的策略概括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其“诱”的对象则为占知识份子百分之十的“右派”——“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

百万知识份子的命运已经由毛一手决定了：“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过了二十多天，当毛下令“反右”时，他们夹紧尾巴也来不及了。

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是龙云、罗隆基们发言的座谈会的主持人，他说“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注2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八三五页。）这一点不差。可正是他在毛写了那篇文章之后拚命劝诱人们给共产党“提意见”。只要他将《事情正在起变化》文中的几句话告诉与会者，就不会有人再坐在那里发言，会也就无法一直开到六月三日了（每两天一次）。

问题就是人们全被蒙在了鼓里。人们只知道党诚心诚意欢迎人民帮它整风，要人民大胆鸣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却不知道毛另外有话：“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自己头上来的。”“共产党要让骂一下子，让他们骂几个月。”“有人说放长线钓大鱼，也有一些道理。”“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注21：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他们更不知道毛只是存心“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而百分之十的中国知识份子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他们鸣不鸣、放不放其实都一样了。

毛的“引蛇出洞”的谋略被党的高层接受，无人反对。各级组织将他二月底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层层传达，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信息送到全国去，让全国都知道：毛主席说了，“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宪法是应该实行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毛还亲自点名斥责写文章对“百家争鸣”表示不满的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等人：“不让人家讲话是专制主义嘛！”陈沂被迫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检讨。

毛不仅鼓励大家“鸣放”，而且提出要出版《蒋介石全集》，允许罢工、罢课，“第一条是反对官僚主义”等等。由于主要是请党外人士鸣放，毛特地于四月三十日约集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谈话，说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确是不好当，“党内外应改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又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等等。在这种循循善诱的气氛中，《人民日报》又于五月二日发表了根据毛的意见写成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表示中共决心“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份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常爱贴这样一副对联：“日暖风和民主气，莺歌燕语自由声”。那时人们真的以为共产党来了，民主自由也就跟着来了。不料安稳日子过了不到两年，一个个杀气腾腾的政治运动就荡尽了人们对自由、民主的期望。如今中共似乎彻底改弦更张了，真的爱上了鸟语花香、春风暖气，真的要倾听人民的声音了。

此时，各级党的干部也在自己掌管的部门动员人们向共产党提意见。譬如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就在社内号召：“有意见提完，有批评提完，有气出完，有冤伸完。”

辽宁省委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李荒亲自在《辽宁日报》上发表《有话放出来最好》、《要受得起批评》等文章，鼓励人们“要大胆放，大胆鸣”，并批评了不欢迎鸣放的干部。

江苏省政协委员会四月下旬讨论毛泽东的讲话时，有人认为“不平则鸣”的“鸣”是发牢骚，不好，不要这种“鸣”。省委书记许家屯却说：“不平就要鸣”，“鸣出来就能有利于矛盾的解决，就能得到平。”（注22：一九五七年四

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针对有人说中共是“先放后收再整”，保证“不会有收”：“今天放，明天放，后天还是放，永远是放。更不会被整。”（注 2 3：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人民日报》。)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四月间党员会议中甚至说：“我们不能只准放香花，不能放毒草。”“只准放香花，不准放毒草是教条主义。”

共产党的诚恳态度终于收效了，春风吹到玉门关，不久前被中共的整人运动弄得心惊胆战的人们，终于解除了戒心。

一位教授不知道毛泽东另外还有“让那些牛头蛇身鬼子王八都出来”的话，竟然对中共的诚意万分感动：“争鸣这个方针的提出，只有在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党和毛主席真是伟大！”

山西省和省会太原市的民主党派人士听了毛的讲话的传达，在讨论会中，“许多人怀着又兴奋、又感激的心情说：‘毛主席的这次讲话，真是说到我们心里去了！’……‘讲话的内容的深刻，态度的诚恳，给人以莫大鼓舞！’许多人说出了憋在心里多年不敢说的话。”（注 2 4：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作家应该是不轻信的，可是刘绍棠太年轻了，他被形势感染得热血沸腾，在给他的朋友从维熙的信中写道：“五十年代第七个春天将是文艺的璀璨季节。毛主席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的文学艺术，或许将进入一个繁荣鼎盛的时代。”

艺术家自然就更容易冲动了。上海著名的电影女演员吴茵到北京参加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聆听过“伟大领袖”讲话的报告。她对共产党的诚意深信不疑，对还打算看看风向的伙伴说：“怕什么？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写，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注 2 5：《戏剧报》一九五五年第十四期第十二页。）这个善良的、不谙政客手腕的女演员哪会知道，伟大的毛主席不过是在引他们这些牛头蛇身出洞以便聚而歼之！

不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似乎倒真心要造就批评共产党的气份，他在中宣部的大会上就带头鸣放起来：“党没群众路线，就像国民党。名为共产党，实际是国民党。以党治国，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那“一个党，一个领袖……”本是人们骂国民党专制用的，如今中央宣传部部长将它安到了共产党头上，人们还有什么可顾忌，还有什么根据说共产党会对批评者“秋后算账”呢？人们嘴上的闸门终于打开了。

《阳谋》第五章：评肃反上下呼冤

人命关天，一旦鸣放起来，“镇反”、“肃反”等死人的事就首先被提了出来。

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原国民党政府广西省主席黄绍口（音弘），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鸣放座谈会上发言：“我去各地视察时亲眼见到的事，镇反、肃反运动中，处决冤枉，惨不忍睹。但死者已矣，不能复生，该他命短，不去谈它。然未处决还在押者，尚有五百一十二件冤案。其中举出几件冤案的情况为代表，和党的方面谈一谈。”他举的例子有上海一个医学院的女学生批评苏联医学不及德国、日本，认为不应将苏联医学拿来误人子弟，于是被指为“反苏”、“反革命”，遭逮捕关押一案；有上海原沪江大学校长因早年代表国民党政府赴德与希特勒政府签订秘密贸易协定，被指为反革命，关押六年不审不判一案。举了几个例子后，黄氏又总结道：“我认为这样的肃反，尽是冤狱……文明国家，有冤狱的赔偿规定，社会主义国家冤狱就冤死了结。……要人民如何信仰？国家社会如何安定？”（注 1：当代出版社刊行《鸣放革命实录史》第八至九页。）

另一位国民党老党员、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罗艺群则如此鸣放：“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切，别的省份我不知道，

就广东省来说，肃反政策、农业政策，搞得太糟，七年以来的镇反、肃反冤杀了许多好人。”（注2：同注1，第九十九页。）

沈阳师范学院两位青年干部张百生、黄振旅联名在《沈阳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镇反和肃反都是企图用暴力维护革命果实。这同我国著名的‘爱民如子’、‘以德立国’、‘以法治国’的传统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民盟湖南省负责人杜迈之认为“肃反是全国性的错误”，是“专政专到人民头上来了”，主张成立“肃反善后委员会”。民盟湖北主任委员、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则斥责中共搞的肃反，“把发牢骚的，就认为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这是一种杀人逻辑。”

对外贸易部行情研究所欧美研究室主任严文杰则鸣道：“亲身经历过三反、五反、肃反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跳，毛骨悚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不管什么人，只要领导手指一下，就可以斗的。”“斗的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我觉得，反会把一些本不一定反革命的人逼着去反革命。”“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规定：除非检察院同意，并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机关、团体不得开斗争会。”（注3：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兆龙的口气比较和缓，但问题却提得十分尖锐：“希望检查一下历次运动的合法性，尤其是肃反运动。”对于中共将法律定义为“阶级镇压的工具”，他表示异议：“中国今天镇压对象只有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要不要法律？”（注4：《提高警惕，粉碎右派阴谋》第八十六至八十七页。）

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的“庶民社”，在其油印的《庶民》中鸣放道：“发动群众搞肃反是没人权，没宪法，没常伦。”提议对肃反中积极参与的人“追查责任，以法律制裁”。

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教授六月六日在民盟的学者会议上说：“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清斗，有人听了流泪……想不到在解放以后还有这种事，简直是太黑暗了。……我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注5：成文出版社《中国往何处去》第五十二页。）

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非常局长座谈会上，司法局副局长、原政法学院教授楼邦彦说：“肃反运动中被整的都是知识份子，而且都整错了。”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说：“肃反运动有什么成绩？”“文艺界又肃出了什么特务？”“许多人都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在群众运动中有偏差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理论非常可怕。”（注6：《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十七号第一九一页。）

剧作家吴祖光在文化界的一次整风座谈会上发言道：“肃反这种斗争形式，即使在专制时代，也是罪恶的。”“建议文联出一个小册子，把文艺界内受冤枉者的名单，通知大家。”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启贤说：“对肃反重新估价的问题，关系到将来的历史如何写法。应该说肃反错误所造成的罪恶是严重的。因为斗了多少人，多少人被当作反革命斗了，结果都不是反革命。拿人命做试验，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呢？造成的罪恶是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注7：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阿房宫赋》中有‘使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的话，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不敢言不敢怒’了。”（注8：见《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第三二八页。）

山东工学院的民盟、九三学社成员（均为教授）召集了六次“平反座谈会”、“肃反座谈会”，请肃反时被斗的人诉苦。他们抨击该学院的肃反运动是“乱点鸳鸯谱”，学院领导肃反的人“无理、无知、无情、无能，个别的无耻。”（注9：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河南农学院女学生姜卓廉是院学生会副主席，她认为“农学院的肃反是违法乱纪”，并主持学生会通过决议，成立独立的、不受党委管辖的“肃反调查小组”，还召开了“控诉大会”。

天津市天主教人士聂国屏说，过去的运动“伤害了许多虔诚教徒的感情和自尊心”。他主张“过去判十年、二十年徒刑的，今天都应该宣判无罪了。”

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德钧肃反时被逼自杀身亡。鸣放时，该校经济系教授、九三学社昆明分社负责人秦瓚对《云南日报》记者说：“拿肃反来说，最初，说云大一定有反革命：到系里，就成了系里一定有反革命：到小组，就成了一个小组里有反革命……但谁也不敢说‘不见得’……那怎么办呢？就只好捕风捉影了，本来是打‘老虎’，结果是把狼、狗、猫都打了。十分之三、四的人都背上了包袱。”

山东省文联艺术部部长、画家任迁乔说：“哪个单位打不出‘老虎’，（领导）就要摘乌纱帽。肃反都要凑百分之五的数字，这就得从瘸子里面选将军。这些都是与中央的政策有关系。”（注10：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又如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在中共山东省委召开会议上发言：“肃反时毛主席说了一句‘反革命份子可能只有百分之几’，一句估计猜度的话，但是后来竟成为肃反的指标。……我们看，靠‘人治’是多危险。”（注11：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青岛日报》。）

肃反时凑百分比、按预定的数字捉人，非仅山东省一处，全国都是这么干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执中在一个高等教育座谈会上将数字列了出来：“以第一次肃反为例，共产党不从细密调查工作出发，而是事先拟定必须打击的一张数字单，规定北京需要逮捕反革命份子五百名（似应为五千——引者），上海七千名，武汉五千名，广州六千名，其他省也相等如此上下数字。……结果就使无数的人民受了害。”由于对受不了折磨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冠以“畏罪自杀”的罪名，顾还指出：“对并非畏罪，而是畏斗、畏逼者，必须清查，予以名誉的恢复，并须照顾其家属。”（注12：同注1，第十七页。）

提到“畏罪自杀”，实在不能忘记一个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率领船队由香港开赴大陆的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曾被毛泽东称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不可忘记的四个人之一。（注13：见《现代作家》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期第十五页：“报载：五十年代中期，毛主席对黄炎培等人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国工业发展，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不能忘记卢作孚。）卢本人在新中国确也受过优待，在毛举行的招待会上，他曾两次得到坐在毛身旁的礼遇，周恩来也曾端着酒杯到他座前来敬酒。然而，仅仅一年以后就搞起了运动，他在四川成了“不法资本家”。在无情斗争之后，他自杀了（但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说他“一九五二年在重庆病逝”）。随后，四川当局在报纸上公布了他的“罪行”。

卢作孚本为中国一代爱国知识份子的楷模。一九二五年，这个出身贫苦的青年知识份子为了“实业救国”，集资合股，订造了一条名为“民生”的小船，利用四川合川县一所小庙的殿堂开始了他的事业。事业发展后，他当过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次长。一九四九年时，他的公司已拥有上百条船，航线远达东南亚，他本人却房无一间（他住在公司职工宿舍里），地无一垄，银行里甚至没有一文存款。他真是赤条条地离开了人间。

卢的遭遇实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写照。一九五二年初开始的以工商界人士为目标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用不受法律约束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清查资本家的违法行为，正是以“不法”攻“不法”。对于偷税漏税，不是坐下查账，以数字为依据，而是先把人扣起来，用饿饭、疲劳审讯的办法让人交待。那些被斗的，要是熬不住日夜追逼，便只好用死来解脱了。

卢氏是服毒死的，大多数死者却是采取更简单的法子——跳楼。当时主持全国“五反”运动的中央节约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一九八八年回忆此事道：“‘五反’开始后，在上海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不时传来了资本家跳楼自杀的消息。为此，毛泽东同志派我到上海去。我跟陈毅同志说，发生跳楼事件不好……”（注14：一九八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后来，上海市市长陈毅对人说，上海的“降落伞部队”有一千三百多个，他感到很不安，若早点作宣传，本来会缩小到一千名之内的。具体数字目前无法核实。）

资本家死了就死了，那是无人去为他们平反的，只是由于卢作孚当年太有名，对中国工商业的贡献太大，从重庆到上海长江一线，上了年纪的人几乎无一不知当年有过“民生公司”。当局在三十多年后还肯承认当时公布的卢的“罪行”不实，并费心为他平反，表示要纪念他对中国近代工业所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其他“畏罪自杀”者——包括千名以上在上海跳楼的所谓“不法资本家”——则永远在中国的历史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严格来说，卢氏之死可能是通讯不够发达，上下来不及通气，以至阴差阳错造成的。不管毛泽东如何想消灭资产阶级，他总该还感念卢率船队来归的功劳，卢氏本人不可能是他要直接打击的对象。只是运动一下子搞得太猛，卢氏生性太烈，行动太快，毛泽东、周恩来还没想到将他的个案另行处理，他已经以死抗争了。他的死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名作家老舍的死相类似，只要向毛、周求救，或者忍几天等毛、周伸来援手，都能免于灭顶。可是他们都撰择了死。不过，卢氏即使不死，日子也不会好过。譬如他的公司的经济研究室主任就被送到新疆去“劳动改造”，直到三十年之后才宣布平反，说是搞错了。

上述鸣放者，本人并不是肃反的受害者。他们只是替别人申诉，鸣不平，有的鸣放者甚至是肃反中的积极份子。譬如上海同济大学助教汪长风是该校青年团委组织部长、上海市人民代表，肃反时曾搜查过学生的日记信件，使部份被斗者精神失常，有的甚至自杀身死。现在他在全校近千人的教师大会上说：“如今我觉悟了，我愿意向被斗的人道歉，向死去的忏悔……”（注15：见香港自联出版社《鸣放回忆》一书中《我戴着帽子写回忆》。）他还说：“我认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肃反问题现在党委采取个别道歉，我是不同意的……肃反是方针政策的错误，不单是方式方法的错误。……”（注16：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民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也以肃反为主题：“党领导这一次的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人民赤诚拥护而胜利的。人民不拥护的话，大家不站共产党一边去合作，共产党得不到胜利。”“但是人民有个不解的问题，每次政协、人大开会时，司法、公安两部门的首长都要光荣地报告肃反成绩，宣布‘有反必肃’的长期政策……这个政策的需要，连我都有些不太明白。我们觉得已解放了八年……尚须长期地继续肃反，那就证明……至少这次革命过程中出了毛病，有了偏差。”

他的发言心平气和，毫不激烈，他主张成立一个委员会，为历次运动中受了冤屈的人平反。“同时，劳改中的大知识份子，应该释放；其他劳改的知识份子，从事体力劳动者，应该改为从事脑力劳动。”

罗并没将那委员会命名为“平反委员会”，倒是湖南省有人提议成立“肃反善后委员会”，专事平反工作。

民革中央委员周颖倒不将肃反的问题全算在中共身上。她说：“在肃反运动中，我们民主党派不闻不问，不提意见，民革的成员被斗争，自己的组织袖手旁观。”因此民革也有一份责任，也应该改变作风。（注17：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人民日报》。）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九三学社成员顾执中也有类似意见：“共产党把国家事情搞得这样糟糕，民主党派也要负责任，因为民主党派过去都是捧共产党。”

鸣放只是鸣放而已，那些肃反的受害者，死的不说，活着的也没有因此得益。出席鸣放会的共产党干部只是在听意见，而不是听指示，当然不会说了就去处理冤案，开狱门放人，向当事者赔礼道歉。在鸣放期间，立竿见影、

一鸣而收效的恐怕只有文学讲习所所长丁玲和《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的“反党集团”案。肃反时二人无端被肃，只因名气较大没有下狱。此刻鸣放，二人将两年来受的气大大地出了一通。主持全国文艺界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竟立即承认肃反有偏差，并向二人表示了歉意。就全国范围来说，这实在是个异数。二人尝到了鸣放的甜头，着实高兴了一阵。但个把月后，风向突转，他们也就首当其冲地成了文艺界的“大右派”。

关于肃反，人们的鸣放（譬如黄绍口的发言）与前述毛泽东的“一个不杀，大约百分之一劳改，其余的人都在原单位工作”的说法大相径庭。毛泽东和黄绍口，一为中央人民政府军委会主席，一为副主席。毛讲话在先，黄鸣放在后；毛说“一个不杀”，黄说“处决冤枉，惨不忍睹”，而且是“亲眼见到”，可谓存心要与主席捣乱。因此，一个多月后全国报刊一齐咒骂这位黄右派，使他成了妇孺皆知的大名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也是鸣放中的一大话题。罗隆基顾忌中共的面子，只在民盟内部说胡风肯定是搞错了，却没在会上将这问题挑出。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室副主任许君远却公开鸣道：“胡风有才华”，“为什么不把胡风放出来让他开开花？”河南省文联创作部负责人、共产党员栾星认为胡风集团案是“一个大的文字狱”。他说：“当今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统治，比清朝的‘文字狱’还要凶，还要厉害。”（注18：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对外贸易部法律室顾问董士廉亦为胡风辩护，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他指因揭发胡风被中共宽大、不予逮捕的舒芜是“卖友求荣”，并说因在批胡风的大会上为胡辩护而获罪的吕荧“显示了中国人的骨气”。他还指斥刊登胡风“罪行材料”的《人民日报》“犯了诽谤罪”。（注19：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刘奇弟本人在肃反中曾被关押，与胡风在同一所监狱呆过。他在校园里张贴了一副对联：“铁窗禁忠良，天昏地也暗”，横批是“为胡风伸冤”。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教师的说法则婉转得多：“如果胡风是反革命，为什么至今还不审判？还不敢见人？”

对胡风案讲得最宜截了当的恐怕要算人民大学的女学生林希翎，她的鸣放一语破的：“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两年还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很难，没法下台，知道错了又不肯认错……”

对于中共不依法行事，人们不满已久。鸣放期间以顾执中教授的意见最为尖锐：“宪法自一九五四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第八十九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全被破坏了。第八十七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集会结社的自由更少，许多人民团体几乎都是官方包办。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没说不行，但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的做。”“大家都把宪法当做一张纸，通过后也就算了……现在从刘委员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刘少奇——引者）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注20：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过去八年中，司法部门执行党的指示，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中捕人、杀人，冤枉了许多无辜。但司法人员并非都是铁石心肠、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们心里也有气。

最高人民法院顾问俞钟骆在中共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坦率地表明了他的不满。他认为“现在的政府不保护公民权利的状况，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他批评审判时“罪与非罪界线划不清”，并认为原因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和“审判人员判案可以随心所欲”。（注21：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北京是首都，可是北京的司法干部似乎意见最多。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斐然说：“市委不懂法律，还阻碍法制建设。”

北京中级法院院长贺战军则说：“案子送给他们（指市委书记）批，我看行市也不一样，犯人有走运的，也有倒霉的。”

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提出他的意见：“单凭市委的指示办案是违法的，破坏了法院进行审判的独立地位。”王斐然的意见同楼一样：“现在审判独立不起来，主要原因是党委干涉。”

这些干部所以主张按法制办事，反对党委干涉，可能与其经历有关。譬如楼邦彦早年自清华大毕业后即赴美国，一九三九年留学归，回母校任教。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掌权后，他欣然接受中共的委任，是因为以为中共会按法办事，会尊重法院的独立地位；但几年下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自然有话要“放”了。

由于这几位高级干部带头，北京司法界的鸣放十分尖锐：“党委过问具体案件就是违法。”司法部门党的干部“很多根本不懂法律，真是祸国殃民。”“当委审批案件是做成错案的原因。”

作为司法人员，他们的意见几乎都是围绕法制而发的：“主要法律没有公布，造成审判人员无法可依。”“所有刑事案件都没有法律。”“以政策代替法律。”“现在只有人治，没有法治。”

“在这个社会里，无法可依，有法也不依，谁有权，谁的决定算数。”“审判员凭空气办事，中央说宽就宽了，说严就严得要命，凭风办事。”“重判的时候有重判的理由，轻判的时候有轻判的理由……这‘辩证法’反正什么时候都对！”

“群众运动破坏法制。”“遇到运动就要找典型，就要判罪……”（注 2 2：此处数段引文均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北京市司法界右派份子是怎样进行反党活动的》）

中共本将司法部门视为“专政机关”，抓、杀反革命都要靠此机关，现在竟然连这些参与“镇反”、“肃反”的执法人员都“鸣放”起来，而且矛头指向党和党的干部，可见中国人已经到了非鸣不可的时候了。

可是，在不久即展开的反右运动中，上述对肃反表示了不同程度不满的人无一例外地成了“右派份子”，尽管他们只不过说了几句实话而已。

共产党里并非人人都是以说谎为生的。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一九五九年就在公安部的一次全体干部大会上说过这样的话：“在右派进攻的时候，肃反是他们攻击的主要方面……他们讲的一些事情，……有一些就是事实。”（注 2 3：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罗瑞卿在公安部全体干部大会上的发言。）

由于时值毛泽东发动的另一波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运动”的高潮，罗瑞卿的讲话不那么爽快，而在“反右斗争”之前，他讲的便直率得多：

“我们（肃反）的缺点错误是很多的，我们决不隐讳。”“斗了、捕了、搜了一些好人，有些好人自杀了。”“有说，‘镇反、肃反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这种说法……是有一些根据的……有冤枉，可以平反……”（注 2 4：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罗瑞卿“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x x x x 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我想黄绍口……等人所列举不人道的事例，事实上是远远不能代表我们现在真实存在着的严重事实的。”（注 2 5：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罗瑞卿“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我们有少数劳改队的一些干部对待犯人比奴隶主对奴隶还要残忍……不仅是违法，简直是惨无人道。”（注 2 6：同注 2 5）

“我们的劳改队、监狱，……有的不给水喝，不让睡觉，有的劳改队，使犯人每天劳动到二十小时，死后解剖，肠子和纸一样薄，这简直是惨无人道，而且是犯法的。”（注 2 7：一九五六年七月五日，罗瑞卿“在各省、市委

x x x x 负责人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一九五七年为受冤者鸣不平、抨击中共将宪法当手纸的人，无论如何没有料到他们自己也会成为冤狱的牺牲品，成为罗端卿所批评的那些劳改队、监狱的“奴隶”。当然，这是毛泽东发起“反右斗争”之后的事，我们还是继续述说五七年春中国人的“鸣放”吧。

第六章：“一边倒” 国人齿

鸣放中被提得最多的都是积怨已久的问题。除肃反之外，另一个便是对苏联的关系问题。前述黄绍弘列举的冤案中那个上海医学院女学生的“反苏”一案，便很有代表性。当时的情况是，凡是指出苏联的不是，甚至只是指出某一个苏联人，如在华的苏联专家、顾问的不是的人，轻则挨批判，重则入狱。苏联是个宗教殿堂里的圣物，碰一下也算亵渎。虽然几年之后中共把苏联骂成世界上最坏的恶魔，但当时的苏联的的确是人们搜肠刮肚用最漂亮的词句歌颂的对象。

要弄清这一点，还得谈点历史。

一九四九年，即中共刚刚进城，新中国尚未建立之际，毛泽东就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延安时代曾帮助过中共的英国人林迈可(Michael Lindsay)一看完报纸便提笔给毛写了一封长信，说这会把中国拖入泥坑，中国军民八年的抗战成果，都会断送在这个政策里。他以后和各省长谈话，或作公开演讲，都指出这个决定愚不可及，理由是苏联的政治体系和中国文化传统及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惯格格不入。每日替他安排活动日程的王炳南告诉他夫妇：“毛主席一有空就接见你们。”但毛显然故意避而不见，他始终没能向毛面陈见解。(注1：林迈可一九三七年与白求恩大夫同船从美洲赴中国。自一九三八年夏起秘密访问聂荣臻将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之后，即利用在燕京大学执教的条件为中共采购药物、电讯器材。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与夫人、燕京女学生李效黎赴中共根据地，帮助中共架设电台，培训通讯人员。先后在晋察冀、延安工作了四年。引文见香港《明报》月刊一九八一年二月号第三十七页李效黎的文章。)

这个“一边倒”得当与否，其实可归结为对当时的苏共首领史达林怎么看。要看清他的本相，得追溯至十九世纪。一八五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俄国人乘人之危，入侵黑龙江，扬言要与英法联合对华作战，逼迫当地清军签了《璦琿条约》。此一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了去，又将乌苏里江以东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定为两国“共管”。俄国人抢去一大块肥肉，举国欢庆，将与璦琿隔江相望的海兰泡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报喜城。

当时中国积弱贫穷，不堪一击，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咸丰皇帝出逃、圆明园被焚而告终。俄国人乘势逼迫清廷签署《北京条约》，不仅承认了《璦琿条约》的内容，而且变本加厉，又将条约中划定两国“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了去。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于一九二〇年九月发布第二次对华宣言，宣告“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和永久地归还中国”。

不幸列宁过早死去，未及实践此一宣言。史达林掌权后，先是否认那个“对华宣言”的存在，继而杀人灭口，将签署此宣言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列文·卡拉罕作为“叛国犯”枪决，从此不提这段公案。

史达林欺侮中国，无所不用其极。外蒙独立之经过，乃又一明证。辛亥革命之后，沙俄曾一度策动外蒙独立。到了一九二二年，苏共又支持外蒙共产党发动革命，夺取了政权，宣布独立。当时谓中国本土尚在反动政权统治下，待中共革命成功后自当回归云云（假设这是列宁的善良本意）。中共领导人表示相信这个说词。毛泽东三十年代在延安接见外国记者时还说：中国革命成功后，外蒙将自动成为中国的一部份。

但史达林继承沙皇的衣钵，处心积虑欲将蒙古变作其附庸。他在二次大战后又用计逼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承认了外蒙的独立。

一九四九年后中共执政，刚进驻紫禁城的那个“黄圈圈”的毛泽东发现，在史达林控制下，外蒙“自动”回归祖国的梦想已经破灭。“新中国”要多方依赖苏联，毛在蒙古事务上只得放弃原则，服从莫斯科的意志。他步国民党的后尘，亲自到苏联签订了又一个“中苏友好条约”，承认外蒙独立，并与外蒙建立“外交关系”。从此，外蒙正式脱离中国，成了苏联卵翼下的一个附庸。

中共执政前，史达林做过的对中国人可以称为好事的，是抗战中的军援以及在日本投降前夕出兵东北。但细细说来，出兵东北这件事也做得并不光彩。

一九四五年，日本在冲绳对美决战失败，海空军覆灭。七月间，美军大举轰炸东京，日本已毫无希望，只在苟延残喘。美国于八月六日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九日，第二颗原子弹投在长崎，苏联在该日出兵东北。十日，日本照会盟军表示投降意愿，十五日正式投降。

史达林在日本于冲绳对美决战失败、海空军覆灭，又在原子弹打击下举国斗志瓦解之后才出兵东北，实在是一本万利的事。他如不出兵，日本亦会投降，但原本被沙俄从中国夺去、日俄战争俄国失败后转割让给日本的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就该回归战胜国中国。史达林可不愿做这好事，他当初同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对日作战问题讨价还价，第一条就是要回库页岛、千岛群岛。他出兵的目的主要在于。而罗斯福也不觉得用那本属中国的土地换取史达林的出兵有何不妥。而中国又没有发言权，便宜便尽让苏联得去了。

史达林不费大力就取得了库页岛、千岛群岛，但他还不满足，又在东北大肆劫掠，拆工厂设备，甚至搬走商店的布疋、百货以及各地粮库的粮食，及至各类家俱，行径与强盗无异。苏军代表巴甫洛夫斯基中将对中方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公权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苏联红军来解放你们东北老百姓，流了不少血，要求这一点经济利益，难道你们都不肯吗？”（注2：香港《大成》杂志第十二期，赵世洵《东北见闻录》。）

当时负责与苏交涉苏军撤离事宜的国府官员蒋经国曾对驻苏使馆武官李修业说：“要是东北的房屋和土地能搬走的话，他们都会搬走！”（注3：《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一卷第一六五页。）

按李修业的估计，东北工业设备约被拆走了百分之六十五。

为了搬运那些物品，苏军违约拖延撤兵。国民党政府虽然发表声明，予以抗议，但未能有效阻止苏军的抢劫。

能搬的全搬走了，搬不了的工厂、矿山，苏军统帅马诺夫斯基元帅则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对赴苏军总司令部（设于长春）商谈的蒋经国、董彦平、张公权等人说：“我方认为，所有东北的重要工矿事业，均为苏联对日作战所获之战利品。现在，苏联决定以百分之五十之股权让予中国，作为中国与苏联合作经营之资本。”（注4：同注2。）并以拖延撤兵为要胁，企图逼迫国民政府接受其要求。所以，毛泽东攻击蒋介石，说他抗战胜利后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夺取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果实是诬词，跑来摘桃子的第一个应数史达林。

对这件事，中国人民深恶痛绝。所以在鸣放时，当年曾雄踞云南的龙云就把对苏联的问题作为他的第一条意见“放”了出来：“中国抗战胜利，日本投降，苏联出兵中国的东北，将东北价值二十亿美元的机器和物资，搬去到了苏联，至今未归还，怎么算是友好和兄弟国家？”

龙云是个军人，可是粗中有细。他说“日本投降，苏联出兵”，却不说“苏联出兵，日本投降”，大概是对毛泽东的“苏联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一说表示异议。龙云曾主滇十八年，抗战时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由于与蒋介石关系不佳，抗战胜利后被蒋的嫡系部队挟持到南京。名义上他是军参议院院长，实则没有行动自由。后来他化装逃出南京，到达香港，派人到昆明推动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使云南得以和平解放。一九五〇年初，他在香港接见记者，表示“阻碍中国建设繁荣的毛病扫除得干干净净，全中国人民都清楚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远景”，随即北上到了北京。

在人民政府里，他享受“副总理”的待遇，但此公不好好享清福，遇事总爱发言，意见又往往与中共主流不合。

一九五〇年中国出兵朝鲜，他当时就表反对。这件事在肚子里憋了几年，现在又放了出来，目标还是直指苏联：“朝鲜战争是苏联指使北朝鲜发动的，反要中国去抗美援朝，而所用的武器又是用中国的物资，尤其是粮食，向苏联换取的，一切战费皆由中国负担，这样是公平合理的吗？”（注5：当代出版社刊行《鸣放革命实录史》第六页。）

本来，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史达林和金日成想解放南韩，自有其说词。但这一对冒险家不审时度势，不计算成功的机率，以为划了三八线，美军撤退，南韩几成军事半真空，他们便可来个闪电战，突然袭击，一举击破，于是仓促行事，挑起了战事。他们虽然一度打到了汉城，但美军一个回马枪，杀得金日成老本丢光，南韩没有得到，北韩也差点输掉。此时本应由肇事者史达林自己出兵相救才是正道，可是史达林这个老狐狸却要他人收拾残局。中共不希望鸭绿江对岸出现一个敌对的政权，为安全计，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计，都可以成为出兵朝鲜的理由。但是，中国出了人不算，还要出武器。史达林一个子儿不出，却大做其军火生意。苏联提供的一枪一炮都要中国付钱，天下无赖，无出其右。韩战三年，中国伤亡三十三万，（注6：《党史研究》一九八〇年第五期第十一页：“志愿军在朝鲜打了三十三个月，战斗减员三十三万（不算北朝鲜）”。）国内百孔千疮，百废待举，但毛泽东却硬充好汉，让几亿百姓勒紧裤带向苏联还债。所得收益如何？毛泽东有如下说明：“一九四五年，史达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史达林相信我们从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〇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注7：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打了韩战，取得了史达林的信任；可是战争结束，斯某也死了。这么一打，中美关系扣上死结，台湾问题解决无日，中共实在是损失惨重。有些人认为中共敢于同世界头号强国交锋，而且打了个平手，甚至可以说打了胜仗。（如不出兵，北韩共产政权必定垮台。不过事后挑起战祸的金日成并无谢意。文化革命中双方交恶，朝鲜反说中共是拍打到自己国土上，才跑到朝鲜去打的，吃亏的反是他们。）殊不知与此同时，对苏联老大哥要忍气吞声，吃了哑吧亏反而不敢张扬，实在是办了一件大大的辱国外交。只是由于“家丑不可外扬”，中共默不作声，世人不予注意罢了。

中国人民吃了史达林如此大的亏，中共的宣传机构仍然天天在喊“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其么事都要挂上“中苏牢不可破的友谊”，广播里则反覆高唱“莫斯科——北京”，“史达林和毛泽东率领我们……”

批判知识界崇美思想时，官方最爱引用的一句是：“（他们）认为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现在崇苏，几乎是“苏联的烧饼比中国的月亮圆”。有例为证：一位干部去过苏联，回来说了一句“苏联的红场比我们天安门广场小”，结果被逼当众检讨，说自己错了。其实人人心里明白，莫斯科红场只顶天安门广场的一角。

一九五三年史达林死后，全国到处有人痛哭。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一九五七年鸣放，中共许诺“言者无罪”时，人们心中的不平就一股脑儿放了出来。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昆明航空工业学校的两名学生许其武、童幼卿写大字报：“今日新中国向苏联一面倒”，“飞机以及各种武器皆是自苏联买来的，专家顾问也是苏联人。……我们觉得一个国家的重要事件，操在外国人手里，总是不好的，迟早要出问题的。不问同主义不同主义，人种土地是不同的。不管苏联如何的好，他总是外国人，绝不是中国人……共产党昏迷沉醉，死投于苏联怀中，必有亡国灭种之一日。”（注8：同注5。第一〇四页。）

“亡国灭种”，似是危言耸听。但十多年后，毛泽东的确也有“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语录告示全国，差别只在于先知与后知而已。

早在一九五六年十月苏军用坦克镇压了匈牙利人民的起义之后，就已有有人站出来抗议了。如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马云风（时为学生党支部书记）就贴出过一张大字报《苏军滚出匈牙利》。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吴弘达则在会议上发言：“一个国家派兵到另一个国家，无论如何是违反国际法的。”尽管催逼赫鲁雪夫出兵匈牙利的中共领导人把反

苏视同为反中共，当时还是容忍了这些言论。（马、吴二人被抓去坐牢、劳改是几个月之后的事。）

到了一九五七年四、五月间，中共号召鸣放，人们也壮起胆子放了。

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呼声》的文章，文章说：“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国人民应该站起来了。应该由中国人来管理自己的国家！遗憾得很，现在哪一个地方没有苏联专家和顾问！那些所谓中国干部们……把苏联专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国专家看作饭桶！苏联专家什么都好，即使放一个屁都是香的。中国专家被排挤得透不过气来……发表与苏联专家相反的意见就要大祸临头，一连串‘反苏’、‘反共’、‘反动’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来……在中国境内，中国人没有说话余地，这是什么样的社会？”文章还喊出了“精简全国苏联专家”的口号，呼吁“需要者留下，整脚货叫他们回去！”（注9：《提高惊惕，粉碎右派阴谋》第一〇五至一〇六页。）

整脚货是有的。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马干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的设计者之一。在鸣放中，他写了这样一张大字报：

“苏联老大哥派来的所谓专家，在经常来我们院的十几位中，除三几人真正够得上条件外，其他充其量只不过工龄较长的熟练工人，或刚从大学毕业而全无实际经验的黄毛小子而已。例如……（略）……又如（略）……再如水工组的一位所谓专家，甚至连计算排水隧洞的系数也不懂。可是他们仍被奉为（权威）和每每以绝对权威自居，乱下指示，乱发批评。另方面生活特殊，如每个月都有一个星期假日去从化温泉休养……这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这便是‘一边倒’的代价？”（注10：小铤《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鸣放记》，引自香港自联出版社《鸣放回忆》一书。）

华中工学院副院长刘干才的批评则直指高等教育部：

“高等教育部……有一个时候，曾经这样强调：‘百分之百学习苏联’、‘不折不扣学习苏联’……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一概加以否定……闹了不少笑话。譬如有些有东西苏联没有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却有的，我们就闭着眼睛加以批判，结果现在苏联也有了，我们就只好自我解嘲一番。”（注11：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光明日报》。）

教授们也有类似的不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陈友松便在《人民日报》上批评了校方“只重视苏联专家，躺在苏联专家怀里，没有重视中国专家的潜力”。

关于中国专家受排挤的问题，可以下列事实为佐证。

一九二八年自日本归国后，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被选为执行委员的经济学家王学文，抗战前夕到达延安。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共成立“马列学院”，由党总书记张闻天亲任院长。王学文则任副院长兼教务处长，并亲自上课堂授课。一九四〇年，王担任过总政治部敌工部长。一九五〇年，他将受原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委托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的第一部份“绪论”写成，《人民日报》予以连载，并刊印发行。但不久后，一位苏联专家提出这本书有问题，与斯大林的某些观点不一致，于是原先称赞该书“别开生面”的陈伯达立即转舵，对王大加批判，而审阅书稿的陆定一、胡乔木也未坚持应有的原则。于是王被罗官撤职，从此赋闲在家。

地位、功劳高如王学文，尚且遭如此对待，一般与苏联专家意见不合的中国专家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譬如优秀的经济工作者顾准，入党已二十多年，担任过上海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可是在中苏开发黑龙江水利资源的谈判中，他作为中方代表，口制了苏方的无理要求，又说过些批评时弊的话，就被说是“反苏”，成了右派。（注12：《民主与法制》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第十五页。）

当然中苏专家合作无间的例子也有，在此不提。

中国专家不受重视，中国专家的书自然也不受重视。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曾彦修抱怨道：“解放后，大部份力量和纸张都用于翻译苏联的小册子，这简直没有用。”“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学术著作，而让苏联的小册子泛滥于市场。”（注 1 3：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高级知识份子如罗隆基，说话就比较委婉：“中国的宪法，是从苏联译过来的，行之于中国，不可能无问题。五年计划也是抄写苏联的，内中也有许多不妥。”“社会主义国家，由苏联领导。苏联一手拿着和平以及平等的旗帜向世界招手，一手指挥大军镇压匈牙利人民，干涉他们内政，这种和平阵营可能粉碎。……将来是不是有麻烦的问题出现，累及中国，也要作个远见的估计。”

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农工民主党中央秘书长、副主席黄琪翔则更加直接地抨击苏联的政治制度：“苏联制度，无论党内党外，皆无民主，绝对是党阶级和领袖独裁。我到苏联去考察，所得的事实是如此。它那种政治制度，完全是百分之百愚弄苏联人民的。……人民穷困，物质缺乏，物价高昂，生活不易。社会主义不过是宣传而已，其实行不通。……人民失了望而不信仰，故到处设了集中营的黑牢，凡一人反社会主义，全家以及亲友可以连罪。这种社会古今中外也没有听说过。中国共产党以苏联为领导，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也弄到党内外缺乏民主，缺乏自由，动辄镇压和肃反……这都是苏联式的政治制度，向苏联看齐学来的。实在太危险了。”（注 1 4：同注 5 第十一至十二页。）

过了大约一个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七月十一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对鸣放中的反苏语论作了总结：“我们同右派的另一个根本分歧，是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态度。”“中苏团结是世界和平主要支柱，是整个人类的最大利益所在。”“右派……的言论，……就是要把苏联说成是‘赤色帝国主义’……”他还引经据典说，“继续发展和巩固”中苏友谊是上了宪法的，所以“右派的反苏活动，在我国是违反宪法的。”（注 1 5：引自《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十六号第一〇四页。）

这一条，龙云等人在鸣放时多半没有想到。在这个没有人认真将宪法当回事的国度里，人们确实忘了宪法中的那一条文。

但也许鸣放者并没忘记宪法，只是认为自己说的事实，并非“反苏活动”。民盟女中央委员王立明抨击了抗日战争后苏联红军在东北到处奸淫妇女的行为。这种事，东北无人不知晓。本书作者在东北生活八年，苏军丑闻听过无数。一九七一年，本书作者到牡丹江市，当地人仍愤慨地谈及此事。一九四五年时尚是中学生的一位干部说：他当时的女教师全凭剃了光头，混在男学生堆中劳动（清理战争废墟等），才未被红军官兵认出，拉去奸污。此类事，中共官方并非不知，但为了拍苏联马屁，硬说王立明“造谣”，“破坏中苏友谊”，给了她一顶“右派”帽子。

二次大战后联合国成立时，王立明曾作为当时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出席。当上右派后，她在家中写了一份改造联合国这个组织的计划，打算日后有机会时呈交周恩来。不幸文革来临，她家被抄，这份计划成了她“里通外国”的证据。她被捕入狱，死在那里。

王立明之当右派，说冤也不冤。早在一九四九年，东北作家萧军就因为批评苏军军纪太差、到处强奸中国妇女而被一棍子打倒，在中国文坛上消失了。王立明对此应当有所闻知。苏共、苏军是碰不得的禁区，硬要去碰，焉能不遭劫？

党内也有人因为“反苏”成为右派。当时的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陈修良有段文字说明自己是怎样成为“极右派”的：“一九五六年，刘晓任驻苏大使，将赫鲁雪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寄给了中央，还附上了自己写的一份报告，认为史达林搞肃反扩大化，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搞个人迷信是完全错误的，赫鲁雪夫揭露这些问题是正确的。报告在省委高级干部中作了传达。……我同意刘晓的看法。在讨论苏联问题时，我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不料在‘反右’时这却成了‘反苏’言论，成了把我打成‘极右派’份子的罪名之一。”（注 1 6：

《新华文摘》一九八九年第八期第一三五页。)

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还宣称：“不要联合苏联，那就只能亡国。右派的主张，就是要我们亡国，就是要我们人头落地。”(注17：同注15。)违宪外加人头口地，有了这两条罪名，对右派们就是千刀万剐也不为过了。

“反苏”有罪，反俄也不行。

一八五八年，沙俄用武力强迫清廷官员签订“璦琿条约”，将中国的黑龙江北岸六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去时，在那片土地上有六十四个中国居民村屯，共约两千户、一万余人，散布在黑龙江以北、结雅河以南、南北七十公里、东西四十公里的土地上，史称“江东六十四屯”。条约规定，那些中国人“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由中国官员管理，俄人不得侵犯。可是到了一九〇〇年，沙俄决清除被其割去的土地上的中国人，在海兰泡一带“将华民之在俄界者十余万人”，“尽行屠戮”。(注18：清军将领增祺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八日致朝廷奏折，转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沙俄侵华史》第三五一页。)事后，六十四屯人民纷纷避往黑龙江以南。七月二十日，哥萨克骑兵闯进六十四屯，将未及渡江的七千多中国居民全数杀戮。俄军将财物抢劫一空之后，放火烧掉全部村屯，从此霸占了那片土地。(注19：清吏周树模致朝廷外部《俄人占璦琿六十四旗请据理力争函》，见《沙俄侵华史》第三五二页。)

当年十二月，列宁曾着文谴责沙俄侵略者“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注20：《中国的战争》，见《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五页。)可是，如今自称列宁信徒的中共领导人却为了向苏共示好，不准人民再议论此事。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雷光汉说了一句“苏俄霸占我国江东六十四屯”，便被定为“反苏”，扣上右派帽子发配到中国最西端的边境塔城劳动改造去了。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位中学历史教员，上课时曾画了一幅地图让学生认。学生看不明白，他便说：“这是我们的东北。”说着将十九世纪时两次被沙俄割去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的轮廓勾勒出来，问学生：“看剩下的，认出是我们东北了吧？”这样，他便被定成了“反苏”的右派。

南京工学院学生陈森辉看了苏联小说《库页岛的早晨》，对同学说库页岛原本是中国的，这也构成了定他为右派的罪名，他被“宽大”，被下放到苏北泗洪县一家工厂去劳动改造，但工资却只发给一半，以为惩处。

中央美术学院年仅十八岁的学生袁运生，鸣放期间正在外地写生、作画，在旅顺见到用俄国将军命名的街道时，对同伴表示过“真叫人扫兴”。回到学校，同伴告发了他的上述言行。领导将他叫去，说：“经过研究，你被划为右派了！”他就成了京郊双桥农场一群右派份子中的一个。

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大学教授陆钦墀在一个并非“鸣放”的科学报告会上发表了一篇《东北边界改变》的论文，论述帝俄如何在一百年前夺走中国的领土，并批评中共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及理论家胡绳(中宣部副部长)在他们的书中有意“刷去”这段历史。不久，中共反右，说他用“狭隘民族主义的反动观点，捏口了一些……史料，向社会主义、向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疯狂的攻击”。(注21：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人民日报》。)其实他只是指中共不该为讨好苏联而“刷去”这段历史而已。由中共给陆教授所安的罪名便可看出，中共一向标榜的“爱国主义”里，并不包括为中国人普遍接受的民族大义。当然，毛泽东不是石敬瑭。他只是史达林的小弟弟而不是儿皇帝，自不肯将国土拱手让人。只是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他不得不依靠苏联。既然苏共不肯将其沙俄老子抢去的中国领土还回来，毛泽东只好禁止人民发议论了。

早在中共夺权成功之前，天津市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就这样评论过中共：“共产党若是剥去外来的名词和口号，不过是一个半秘密半公开的，带有宗教性的，以饿民为基础的割据势力。它的唯一真正特点，就是依附外力与否认国家民族……”(注22：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这外力就是秉承了沙俄扩张、侵略本性的苏共。

到了一九五七年，雷教授当然就成了“右派份子”。

第七章：“党天下”识者诟病

鸣放所提出的问题中，真正触了毛的痛脚并最终引发空前规模镇压的，还是政权问题。

中共于一九五四年制定的宪法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既然中共说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当然就要它来领导。但它和中国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机械科学研究学副院长雷天觉用提问的方式放出了自己的意见：“党究竟应在国家之上，还是应在国家之中？”

山东青岛市民盟成员曲北韦也用提问的方式参加了鸣放。他在市政协会议上发问道：“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注1：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人民日报》。）

广西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说：“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是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在省里还好一点，愈到下面愈成问题，区委书记和乡支书就可命令一切。”注2：一九五七年六月六《人民日报》。）

湖北省中南财经学院院长、民盟湖北支部主任委员马哲民则批评道：“中共不少领导同志……认为日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们俨然为‘天生的圣人’。这就等于基督教徒说‘我代表上帝’了。”（注3：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北京大学有人署名“天水心”贴出一张大字报说：

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人民全体，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主”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换。

略举一二事例：

宪法规定人民有选举权，然人民代表已由党内定。人民不认识代表，代表不代表人民。

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然而报刊、广播、电台均为党所垄断，凡发表与党的调子不谐和的言论，概以反革命论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然而凡结社、集会不经党批准，并接受其指定领导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人身自由，然而“肃反”表明：各级党组织负责人都有权以党的名义，限制任何一个正直的公民的自由。

大字报还提出：“反对以‘党主’代‘民主’。把民主权给予人民，让人民享受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权利的充份保障。”（注4：成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中国往何处去》第三十七至三十八页。）

意见虽然尖锐，却只是泛泛而谈。相比之下，《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却将矛头直指中共主要首领毛、周二人，而且口气颇有些咄咄逼人。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于一九五六月一日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一次发言，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说“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

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坐此交椅？”（注5：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

储氏提出此问题，实在是因为他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毛只说过在“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并没说社会主义不搞一党专政，而且他的意思正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一九五三年，刘少奇企图“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推迟进入社会主义，被毛批了一通。到了一九五六年消灭了全部私营企业，农民也已将土地改革中分得的土地全部交出，变成了只凭“劳动工分”吃饭的合作社社员。中共正式宣布全国进入社会主义，将那些党外人士的椅子搬到“人民代表大会”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细察储氏的历史，他并不傻。他在此发问，也许只是明知故问，为了向毛、周二人挑战。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时期，他就曾在其主持的《观察》杂志上着文说：“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说，今日共产党大叫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中国的纷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他反对国民党政权，但也从来不欢迎共产党上台。他说：“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份子……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份子。”（注6：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观察》第二卷第二期，转引自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人民日报》。）

由于他的杂志一篇接一篇地刊登名为特约军事记者、实为周恩来手下秘密工作人员的撰稿人的文章，报道国共战事，气得蒋介石大骂：“报上都登了，还打什么仗？”（注7：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国民党封了他的《观察》杂志，将储氏逼上梁山，采取了与共产党合作的路线。

中共本来说执政后将成立“联合政府”，但当时并没有说明如何个“联合”法。现在给“民主党派”人士几个部长当，已经够客气了。中共并未食言，只是这些“民主党派”人士自己胃口太大，以为中共真的有心同他们平起平坐了。贼船是这班知识份子自己爬上去的，这就是为何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是上了贼船了”的时候，颇为蔑视这班人的缘故。

对储安平的说法表示赞同的人颇为不少，如《中国青年报》记者詹寰就说：“共产党就是党天下，没办法，这是根本制度问题，我完全同意储安平的意见！”“共产党不仅是以党代政，而且有党无政！”（注8：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是国务院交通部长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对“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状况也颇有不满：“国务院每次开会，总是拿出成品要大家提意见。生米煮成了熟饭，还有什么意见可提？”“譬如文字改革和如何改革，并未讨论过，就拿出已拟好的改革方案，向大会宣布，就算通过，强制执行。这算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没有说话的余地，只可说是党的专政吧？实际的情况就是共产党专政，并没有人民民主专政。”

章伯钧早年留学德国，返国后参加大革命，北伐期间曾具有国共双重党籍。他是一个社会主者，但不是马克思的信徒。他主张“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民主相结合”，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加上英美的议会政治是一件大大的憾事。（注9：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人民日报》。）几年来，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共产党专政的既成事实，现在似乎看到转机，便提出搞“政治设计院”的主张：“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

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注10：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有些人则不谈大事，只用具体事例表明其不满。如国家计量局副局长严希纯（致公党成员）这样批评中共：“不管党员称职不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一个图书馆内有一个图书馆专家，做了十几年工作，但领导上却派一个文化不高的党员作他的科长。这样作，是不能使非党人士心服的。”（注11：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民盟广州市主任委员梁若尘以广州市博物馆为例说，全馆仅一个人事干部是党员，他便成了整个博物馆的实际领导人，但他对文物史料一窍不通，因此大大妨碍了工作。

电力工业部工程师张金堂也用实例说明中共对非党人士之不信任：“云南烧坏了发电机，请了十个工程师去作决定，结论是技术操作上的错误，十个工程师都签了字。但十个人中没有一个是党员，因而领导上不相信这个决定，结果还是把运行人员逮捕了。”（注12：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更多的人不似储安平以“党天下”概括共产党控制整个社会的现状，但用词同样激烈，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老工程师戴占奎鸣道：“国民党党员犯法，加倍处罚，共产党党法不分，党员犯法，逍遥法外，姑息养奸”，把“中国旧有的优良传统给毁弃了。”（注13：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戴占奎所言，正是中央林业科学研究所鸣放期间的主题。该所办公室主任两年前强奸了其家中女佣，所的党支部不依法行事，却只召开党内会议，给了那人一个“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了事，办公室主任的官还可照当，而且替他保密，不让党外群众知道。鸣放中，群众得知此事，便贴出无数大字报，将批评矛头对准了包庇罪犯的党支部。（注14：香港自联出版社印行《鸣放回忆》第七十九页。）

福建师范大学学生贴出的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么？》由二十二人署名，内容也是说校人事科长利用职权，威胁利诱并施，奸污女助教、女学生，而校党委熟视无睹，千方百计包庇，任其“在我们新中国神圣的高等学府中为非作歹。”（注15：林学政《阳谋》，《从大陆看大陆》第一一二页。）

党外人士对中共不满，说：“只要是共产党员，不论工作、地位、待遇、生活都可以特殊照顾……旧的统治阶级是没有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注16：同注1。）

很多党员也一样不满。一九三六年参加共产党的山东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周次温就这样说：“我是战时入党的，假若是在解放后的现在，这样的共产党，我根本就不会参加。”（注17：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载引自陈权《鸣放选萃》第一八五页。）

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傅信也认为中共已经变了质。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利用特权剥削人民，是剥削集团。他说，这种剥削很巧妙，不必占用生产资料，“直接利用特权而无偿地占用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注18：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傅信没有举例，但国务院参事徐行之则讲得很具体：“北京医院专门给七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看病，这种照顾也是应当的。但是有些高级干部的家属也去享受公费医疗的优待，有的甚至一起把四、五个得了感冒病的孩子也送去住院。有的因为天刚冷就干脆把自己的父亲母亲送到医院住院了。”（注19：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转引自《鸣放选萃》第一八五页。）

外贸部民主建国会副主任毛宗尧也是就事论事：“生活上，干部的待遇也很不一样，经理的保姆一人一间房，而一般干部是三代同堂。我是十口之家，只住了三十三平方公尺的屋子，白天把衣服放在床上，晚上放在桌子上。……对面的空房空了几个月也不让我住进去。……党员干部坐转椅，非党干部坐硬板凳。一样的科员，但是屁股不一样。常言说：‘菩萨庙里的菩萨怎么坏的，就是被捧坏的。’”（注20：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转引自《鸣放选萃》第二〇六页。）

由于共产党声称与各党派“互相监督，长期共存”，实际上却将各党派视作可任意摆布的棋子，那些党派的人士长期敢怒而不敢言，现在得到机会，便把闷气大大地放了一通。们平素最深恶痛绝的是共产党派遣党员到各党派中去担任领导职务，把持各党派的活动。前国民党政府广东省主席、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便说：“共产党派党员参加民主党派，是封建王朝稍有头脑的政治家所不敢的。”当时各党派被控制到这地步，以至欲使用一名工作人员也须由中共统战部派遣或经其批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在鸣放座谈会上发言温和，但也提到九三学社内的职员问题困难重重：“社内所中意的人选，统战部不派，这样如何才能使本社社员安心工作？”

中共这样做，自有其理由。“新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人人都拿政府的工资，民主党派录用员工，薪水却要从政府支取，政府自然不能不闻不问就照单全收，一定要从中挑选可靠的。中共的统战部虽然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但中共本无党政分家的概念，为了管理方便，就让统战部审查、控制各党派人员录用，实在是自然得很。所以，民主党派不幸要从共产党管理的荷包里拿饭钱，想独立也无从谈起。

这些党派在国民党时代经济上是独立的，不需按月到政府那里去支取薪水。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它们也就独立于政府之外，而不是执政者的附庸。由于鼓吹实行民主政治，说它们是“民主党派”也还恰当。但如今共产党执政，号称实行社会主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么都是“国家”的。共产党控制了国家，当然也就控制了这些政党。说这些党派是“民主党派”，早已名不符实，共产党尊称其为“民主党派”，只是照顾历史，兼为自己增添些民主色彩而已。

毛泽东拜斯大林为师，建立了一个集全社会经济与政治权力于一身的政府，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统治者，然后将这种一切归政府所有，而政府的一切又由共产党安排的制度定义为“社会主义民主”，这与他执政前所主张的“人民民主”已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共产党不让其他小党派参政已有违其执政前建立“联合政府”的许诺，它在各党派中安插不暴露真实身份的“地下党员”，更是自打其“互相监督”的耳光。而各党派对其组织内何人系中共秘密党员只能臆测，平白生出许多矛盾，积怨已久。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罗隆基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共产党员退出民盟，当时未有结果。现在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张云川便把问题点明了：“请（中共中央）统战部将盟内还未公开的党员身份公开，看看他们的作法如何，以便互相监督。”

名作家肃干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短文，其中引用了一位民盟成员的牢骚：“从政治鉴定，评级评薪，到领结婚登记的证明书，孩子能不能进机关的托儿所，都掌握在人事科手里（各单位人事科均由党员把持一一引者），还谈什么互相监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景超认为，民主党派没有自己的通讯社，中共又实行保密制度，使各党派无消息来源，根本无法与共产党“互相监督”。他要求中共允许民主党派建立一个足以与共产党的新华通讯社竞争的通讯社，并解除实为“封建愚民政策”的保密制度。

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互相监督”之不实。一九五五年肃反时，“致公党有一成员在科学院工作，被捕了。”“但是不久他又出来，而且恢复了工作。至于到底为什么被捕？又为什么释放？致公党根本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不给民主党派知道呢？”（注2 1：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人民日报》。）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局委员严信民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意味着共产党与各党派平等相处，可是“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离事实上的平等还远远得很。……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注2 2：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对于这个“互相监督”，武汉华中师范学院的一位教授艾玮生（民盟成员）则真截了当地说：“当前共产党和民主

党派……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互相监督是解释不通的。”“民主党派只能在共产党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见，譬如共产党提出一个文件，民主党派便在文件上改几个字，像‘之’字改成‘的’字，‘我们’改成‘大家’等。民主党派只能施工，不能设计。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帽子是扣不上的。所以，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应该改变。”（注23：）

民主党派人士都是自视才高的知识份子，他们对于国家建设的确也有很多设想，对于“只能施工，不能设计”，充当政治花瓶，自然不满。如中国伊斯兰协会副主任、北京伊斯兰经学院副院长马松亭就发骚说，“政府把他和达浦生（中国伊斯兰友好协会副会长）当作两盆花，一盆摆在伊斯兰教协会，一盆摆在回民文化协进会”。（注24：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可是，不满归不满，“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他们每月要从共产党那里支取薪水，除了跟着指挥棒转外，实在也无他路可走。于是便出现章伯钧所说的现象：“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协、人代会上的发言异口同声，千篇一律，真正的意见得不到发表，不满意的意见不敢讲。”民盟女中央委员周颖则说得更坦率：“民主党派的工作只是歌功颂德，锦上添花，火上加油。”

章、周二人只觉得“异口同声，千篇一律”不正常，却不知道这正是毛泽东蓄意造成的。毛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露骨地说出了他对付民主党派人士的办法：“他们是知识比较高的阶级，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办法一是出钱赎买，二是出位子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份之一，三分之一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注25：引自作者保存的一九六七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的《学习资料》第二册（一九五七—一九六一）第五页。）他将那些人安置在政治协商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位子上，只是为了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只是叫他们举手。所谓“人民民主”、“互相监督”，不过是赶时髦，贴个现代标签罢了。

“民主人士”中有善于随遇而安、与世无争的人，但也有很多颇想干些事业的。这些人对于有职无权的处境便深为不满。

原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华中剿共副总司令张轸，思想一贯左倾，身在曹营心在汉，加上其年方十八岁的夫人与中共有秘密接触，在她说服、安排下，他暗中去上海与中共接上了头。一九四八年他率兵到湖北即宣布起义。随后湖南的程潜、陈明仁亦起义，国民党在华中遂崩溃瓦解。有此巨功，解放后张被任命为河南省副省长，并被授予国家一级解放勋章。然而在共产党领导下，他的日子过得却很不如意。党号召整风，他这样“鸣放”道：“我告诉朋友，‘我是个党外人，做挂名的副省长里面的一个，是个闲散的人，称不上官僚。’”“遇着党员要低头，开会来是凑数的木偶，所发表的讲话，是党拟好了的文章，照章一读，或不须经过照读的麻烦，党就在报上替代发表了……官都不成为官，僚是潦倒的潦……”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自己的处境：“有一次，由于初次不了解党的规矩，在会的讲台上，我以为我是副省长，自然站在前排的正中。哪知领导干部指责我：‘哪个排定你站在这里的？这里是省委书记、省长站的位置。你知道不知道，随便乱站，破坏会场秩序，是犯错误的。’我就知趣后退向台下走，那干部如巨雷一声喊道：‘张同志你走到哪里去？你发态吗？你真不进步，你的位置在前排右角。’”（注26：见当代出版社刊行《鸣放革命实录史》第六十四至六十五页。）

其实，有职无权的花瓶并不只是副省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过去多次拒绝国民党政府的邀请，不肯做官。中共执政后，他在周恩来的劝说下终于同意出任政务院（国务院前身）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他年过古稀而当官，连他的子女也不理解。他这样回答子女：“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注27：《新华文摘》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第一七三页。）他自以为做了“人民的官”，其实是一厢情愿。有一次他要求得到一张全国各省工业厅厅长的名单，遭到拒绝，理由是“保密”。贵为副总理、部长尚且有此遭遇，一般人的处境和所谓“联合政府”是怎么回事，就更可想而知了。

森林工业部林业经营司副司长张楚宝是九三学社成员，有一次司内开会，身为共产党员的司长声色俱厉地对他说：“公文你要先看，你是正司长？你是共产党员吗？”张不敢顶撞，只是在鸣放时诉了一下苦，说“这些都使我情绪消极”。（注28：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陕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史教授王尊一是位七十高龄的老学者，他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六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转载时反右已经开始，文章就成了罪证：

“元朝时候，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由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罢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以后，政治要职都设复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任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官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把它叫做‘民族压迫’。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是多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的形式……和元朝、清朝又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即使党外人士任了正职，也一样是有职无权。邮电部部长朱学范是长期“左倾”的原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为“统战”计，中共给了他一个部长的头衔，但往往部内的事下边的党员司、局长都已经知道了，他还不知道。他批准成立一个教育科，可是管事的党员副处长不同意，结果便无法成立。当他不同意开除一个人时，监察室一位党员副主任坚持要开除，结果便开除了。他在局长会议上作报告，只能照本宣科，念完才能谈点他自己的意见。部内有些事务干脆先由党员副部长签完字再交给他个押，自是履行了手续。（注 29：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又如上海一间大学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因公外出，事先贴出告示，说在他离职期间“校内一切事务均由校长代理”，等于公开声明校长是个傀儡。天津市有间医院，院长非共产党员，副院长却是党员。此副院长常未经讨论自己决定问题，院长批评他时他竟答道：“有什么事，我负责好了。”院长自知本人的地位，只好说：“这样，要我干什么？”

民主党派不满被排斥于权力中心之外，“轮流执政”的意见自然就提了出来。不过，各党派的领导人似乎都很有自知之明，并不认为那是现实可行的方案，因此他们并没有提出这个意见。章伯钧、罗隆基、龙云、黄绍弘、陈铭枢、章乃器等所有“国家级”的大右派份子无一主张“轮流执政”。倒是有位小人物，天津市一位中学教师黄心平这样说：“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样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不过，即使他希望这样做，也并不认为这是个现实的方案：“这是一个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弃政权。”（注 30：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提出类似意见还有一些，譬如中共天津市塘沽区委组织部干事韩克才就有“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共产党下台不等于蒋介石回来”的议论。四川重庆西南农学院教授李友霖在该校的座谈会上亦公开表示：“共产党中央不改变政策（的话），我就拥护第三党出来执政。”（注 31：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另一位明确主张“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的是河南省洛阳市九三学庄的梁中康。（注 32：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河南日报》。）

没有人公开主张让台湾的国民党上台，但太原铁路局技术员王少英却这样放出了他的主张：“中国应分成两半，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归蒋介石领导，以北归共产党领导。让任何一国援助共产党，让美国援助蒋介石，双方竞争。”（注 33：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转引自《鸣放选萃》第二九四页。）

江西省公路运输厅工程师黄振藩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观点。他写了一份《修改宪法要点》，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各级“先进人民代表大会”，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现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均自动宣布解散”，“此后全国任何人不得另组织政治党派”。（注 34：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这个意见太致命了，所以当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公开呼吁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提议成立劳动党，走印度尼赫鲁的中立路线后没多久，中共就将他抓了起来。这位老学者很快就死在劳改营里。

徐教授之死，原因恐怕不仅在于他建议成立劳动党，还在于他在清华大学党委邀请的座谈会上“不揣冒昧，建议（中共）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因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任何一个学说都不能包括全部的真理。”因此他主张“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注35：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徐教授不久前方自美国归来，他之所以敢如此“冒昧”要中共废止其指导思想，也许是因为他在国外呆得太久，以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享有言论自由，不会因言获罪；也许他以为他是做过毛泽东老师的徐特立的近亲，说话可以随便些。总之，他要是对中共多了解一些再鸣放，是不致惹上杀身之祸的。

一九八六年五月，当年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代表中央宣布“双百”方针整整三十年之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对这段历史作了这样的回顾：“一九五七年四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极少数右派份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以‘轮流坐庄’取代共党的领导。……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极少数右派份子失败了。”

党外人士并没有“妄图”取代共产党，即使有这么几个人“妄图”如此，也不过是读书人的臆想，中共本不必将其呓语当真。然而它不仅当真，而且草木皆兵，以为执政地位受到威胁，匆匆实行镇压，还抓了上百万从未对执政问题置一词的人陪绑，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

大多数人在鸣放中是就事论事，泛泛而谈的很少。直接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本人的虽然不多，但亦有人在。

前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对毛个人的修养、品质抨击了一番：“凡是旧创造者，执国政治者，是公平正直，绝无偏见，明察秋毫，谨慎将事，精诚坦白，亦不装假，豁达大度，为国家而不为名利。并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国华盛顿然。伟大的毛主席，不是如华盛顿然，而是与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政治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不宁，察而不周；自然为党见与感情所沸动，生出浪潮，喜功好大，难以制止。”“好好的一个优良的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弄到中国八年来混乱不清，天天忙于镇压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

陈铭枢还说：“光荣的、伟大的毛主席，还没有搞清楚历史文化和国本的地位、民性的风格，硬去尊夷，闹了一些什么总路线的新名词，无产阶级专政的什么经验……这些多余的新名词，在愚民的苏联用得着，在文化高度的中国不会有人重视。”（注36：同注26：第十至十一页。）

在毛泽东尚在世时便对毛作如是批评，尤其直指毛欠缺政治修养，可以说只有陈氏一人，陈因此而被一棍子打倒，实属必然。七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文：《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说他“狂妄无耻”、“是一个包藏祸心、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反动份子。”从此陈铭枢这个人就在政坛消失了。

第八章：数弊政举国放言

自从共产党执了政，所有的报纸都成了“党的喉舌”。如今党欢迎人们说真话，当然也包括那些充当喉舌的人们，于是新闻界也“‘鸣’起来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二百多名新闻工作者在北京开会，放出了不少言论。新华通讯社记者邹震说：“新闻自由被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剥夺了……中宣部应该开放绿灯。”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认为报纸成了“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新闻工作者没法独立思考。中国人民

大学新闻系教员莫如俭说：“党委认为报纸是代表党和政府的，所以讲党性，过份强调报纸是教科书，总是自上而下地传达命令。……压制了大家的积极性。”《文汇报》记者杨重野说：“解放后许多记者不写新闻，是因为新华社统一发稿。新华社这么一统，各报记者就没事做了，文风也变了，新闻的写法都是老一套。”杨还批评新闻记者协会是“新闻记者首长协会”，因为其负责人全是“首长”，没一个编辑、记者。

由于各省的报纸都是党报，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河北日报》编辑于山提出了在全省办两家报纸唱对台戏竞争的主张。

铁道部的《人民铁道报》副总编辑范四天认为共产党是“官方”，报纸不应代表“官方”，一代表官方就“不能成为群众舆论机关”了。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批评“有些党委把报纸看成下达自己的命令和意见的工具，忘记了报纸还是人民获得知识和消息的东西”；“有一个报纸要办个文艺副刊，党委不同意，说这没有思想性。”他不赞成中共把报纸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报纸是为了叫人看的，如果人家觉得没意思，没兴趣，看不进去，那还有什么阶级性呢？”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执中是这样批评中共的“宗派主义”的：过去“上海《申报》、《新闻报》许多老记者……在解放以后全被辞掉了。新设立了一个新闻图书馆，成为这些人的养老院”。他建议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资产阶级的报纸能够办得生动活泼，社会主义的报纸却做不到呢？（注1：此数段引文均见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自中共执政以来，文艺家们就不得不时时提防自己在阶级观点上栽筋斗。创作新作品要当地雷、陷阱，出版旧作则更成问题。作家于是只有删削自己的作品以免受批判。

“剜却心头肉，医得眼前疮。”叶圣陶将他的主要作品《倪焕之》删去好几章。曹禺则改动其剧作，将《雷雨》、《日出》中身为劳动人民的“好人”从阴曹地府拉回人间，使他们的结局由死变为生。老舍的《骆驼祥子》末尾描写无产阶级份子祥子堕落为行尸走肉的那近万字统统删去。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学会了如何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保护自己，免于灭顶。被删的内容，几乎全是有“丑化劳动人民”嫌疑的（现在又改回来了）。

作家们那样做，心里自然有气。剧作家吴祖光在整风座谈会上发言道：“不论党员非党员，领导非领导，都是怨气冲天。”“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一切都是领导决定的，甚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领导意图作出来的。”“做了工作的会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解放后我没有看到什么出色的作品。”（注2：《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十四期，吴祖光《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

吴祖光还激烈抨击八年来禁戏的恶果：“今天无数的艺术团体的领导，偏偏就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要，认为群众浑噩无知，对群众喜爱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许多应当属于国家宝贝的优秀前辈艺术家，在这样悠长的岁月里，就是因此被剥夺了在舞台上生存的权利，穷愁潦倒，老泪纵横。”“如果党一定要这样的领导，过去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的？又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莫里哀的？”（注3：《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十一期第五至七页。）

广西省文联副主席胡明树（民主促进会成员）的鸣放与吴祖光类似：“共产党领导文艺，就使文艺枯萎了，没有生气。”（注4：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人民日报》。）

按首长意图改戏，这里有个例子：传统京剧《三岔口》，剧中角色刘利华本是反面人物，可是“有个领导同志看了《三岔口》，说刘利华应该是好人，第二天的戏台上刘利华变成好汉了”。（注5：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写戏的不满，演戏的火更大。在不得不服从指挥棒转了数年之后，中国京剧一团团长李万春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中国戏剧本来就是人情法理、善恶因果的社会反映，是好的教育，是寓教育于社会人生的，也是促使改变不善的人心。凡一词一句，经过了许多文学家审慎鉴定，一排一演，经过了许多艺术家设计指导。如此而成为剧，流传数百年……这是它的价值，亦是中国戏剧的历史光荣。“中国戏剧的重点反映‘忠奸功罪’四字，当然离不开帝王将相、富贵贫贱。也有呼帝王万岁，那是表征实情实事，何谓封建以及资产阶级？要以这是‘封建余毒’，那么……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皆是封建余毒。”（注6：当代出版社刊行《鸣放革命实录史》第四十七页。）

针对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概说成“封建”的情形，北京一位教授忿忿不平地说：“好像马克思未出世以前，人类就没有文化似的。王羲之的字，李白的诗，赵子昂的画，等等一切，都是封建，只有马列主义是人类的文化，岂不太偏太过！”

吴祖光提到的那些被剥夺了演戏权的老演员中有一位在北京曾颇有名的筱翠花（本名于连泉），他把《人民日报》的记者请到家中说：“请你把我的心里话在报上也登一登吧：我要唱戏！我知道这几年观众很想念我，我更想念他们……一个演员，不让他演戏，比死还痛苦。从九岁登台起，在舞台上生活了四十多年；这五年闭门在家，心情实在是痛苦之至。”记者如实记下他的不满，冠以《筱翠花说：“我要唱戏！”北京市文化局竟置之不理》的标题，登上了《人民日报》。

吴祖光说共产党领导文艺的方法不对，李万春则认为党派去领导文艺的干部素质不够：“党领导戏剧，党干部根本中国文化不够，历史不明，偏要来领导、要改剧、要改演。”“党领导干部，根本不明艺术，一律以马列教条……吓唬他人，似乎拉屎撒尿都要结合社会主义，才拉撒得正确。”（注7：同注6，第四十八页。）

话剧作家曹禺说：“依照教条所写的戏剧，写出来叫不响，价值安在？所谓重在为党宣传的文化，令人不看已讨了厌，有何收效？‘三害’（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是文艺界的大敌，此敌不除，今后文艺界没有搞头，都要被迫‘入土’了。”（注8：同注6，第四十六页。）

外文出版社的编辑冯亦代则利用鸣放为胡风伸冤：“胡风主张文艺要有自发性，不要钦定式。钦定式的文艺，是对文艺界头上插上一刀子，文艺要丧命。这个主张是正确的。”

其实，如吴祖光、李万春所抨击的“禁戏”问题，有些共产党干部早已有所认识。譬如，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会议，对京剧《四郎探母》是否应当禁演发生争论后，中共副主席刘少奇表示：“《四郎探母》唱唱也不要紧么，唱了这么多年了，不是唱出一个新中国吗？”（注9：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红色宣传员报》。）北京市长彭真在一次招待民主人士晚餐后的闲谈中，还说过这样的话：“文化部的同志真是头脑狭窄。他们今天说这种题材不能用，明天说那种题材不能用，若是照这样挑眼下去，恐怕根本没有题材可用了。……其实，我们是听戏，其么题材不都是一样吗？”后来他还颇为得意地对人说：“进城以后有那么一股风，这戏不能演，那戏不能演。我就第一个在市委礼堂请人来演《贵妃醉酒》，打开了这个局面！”当时身为中共“第八号人物”的彭真相信是赞同吴祖光、李万春的观点的。叫人难以理解的是，他那么爱看京戏，竟然让吴、李，特别是李万春这个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在他的鼻子底下当了“右派”。

中共执政以来，共产党和毛泽东被尊奉为“红太阳”。每次集会时，人们必须起立恭唱“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文学家、诗人都围着这个太阳转。诗人李白凤对此深为痛恶，在鸣放期间写了一封《写给诗人们底公开信》。他在信中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文字：“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接着又写道：这“在我们今天，不是可以参考参考吗？”（注10：刊于《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七月号。）

大多数艺术家的鸣放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而发的。《北京日报》的漫画家李滨声说：“有些人轻视漫画、轻视作者”，“粗暴到野蛮的程度”。北京出版社出版他的画集时，不许在封面上印他的名字，说“印上作者的名字会培养个

人英雄主义”。

南京的戏剧教授朱彤说：“一九五一年我创作了《书香人家》，苏南文联却要我检讨。后来我又写了讽刺喜剧《贾医生的烦恼》，江苏文联连油印几份讨论一下都不肯……几年来，我的话剧创作生命几乎被窒息了。”

北京著名的女舞蹈家戴爱莲说：她创作的舞剧《和平鸽》“演出之后，就被教条主义者指责，扣上一顶‘崇拜西洋、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帽子”。她是中央实验歌剧团团长、北京舞蹈学校校长，可是团内、校内的事务均由党员把持，“我只能听他们的，我的意见不被重视。”（注11：李滨声、朱彤、戴爱莲三人的言论载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这种情况十分普遍。民间文学专家钟敬文是《民间文学》杂志的负责人，他在文化部邀请的一个座谈会上吐出了自己的怨气：“党员的文章不经我这负责人同意就可发出去，我自己的文章在《民间文学》上也登不出。”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苦禅是有名的国画家，他在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召开的会议上说了自己受排挤、被歧视的遭遇：院方不让他教授国画，竟然派他到工会去，专事给职工代买戏票。

漫画家们以往是不敢讽刺党的干部的，现在党本身鼓励批评，画家的胆子也就壮了一点。当时中央理论刊物派人用轿车将《北京日报》的李滨声接走，请他根据报资料作一幅漫画后，他画了一幅《没嘴的人——老实干部奖获得者》，用怪诞夸张的手法，画了一位干部，五官堂堂，独缺一张嘴，意指这种干部是中共的优秀干部。他还画了幅鹦鹉与一位干部对话。鹦鹉：“我专会学人讲话。”干部：“哼，我是有选择的：专学领导人说话。”

山东省的画家任选乔是省文联艺术部部长。他画了个褴褛模样的女人，抱着个模样像成人、太阳穴贴着膏药的娃娃，娃娃手中捧着一张“升官图”，下边的说明是：“乖乖，听我的话听，我将给你个副局长的官作作。”这样的“攻击”党的干部的漫画能够出笼，足见人们对于鸣放真的是百无禁忌了。

不过，百无禁忌的日子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到六月初中共“反击”时，李滨声的漫画被说成是“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他本人则成了《北京日报》社头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而共产党员任迁乔则成了“对党进行了露骨地恶毒地攻击”的“反党漫画家”。（注12：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和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知识份子几年来一直处于受教训、被改造的地位，他们的不满集中由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种孙教授的一篇短文表达了出来。该文题为《中共失策之一》，用词不可谓不尖刻：“对知识份子的失策，也许这是中共近几年最大的失策之一。”“在乡间，中共提倡斗争的目标是地主、富农。在城市中共提倡斗争，斗争的目标是买办、资本家。在高等学校，中共提倡斗争的目标是谁呢？自然不是工友，不是学生……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份子就会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份子的。”“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四海之内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份子不寒心？……自然中共会说，我现在是用了，没有一个知识份子失业呀！但打着用，骂着用，把这般知识份子打服了，骂服了，就容易驾驭了吗？……再这样打骂下去，仇恨就会结深，后果不堪设想……”（注13：《师大教学》第一五一期。）

这种不满是普遍性的。浙江大学教授董太（禽禾）就这样说：“共产党不仅把知识份子当门下食客，而且每次运动都把他们当作批判的‘罪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化学家傅鹰的不满则有所不同：“这些年来，中年以上的人差不多都消沉起来，处于无用的地位。”“六年来学校当局没有找过我们讨论学校的方针大计……”

其实，学校当局不找那些教授商量大事自有其理由。北京大学党委委员文重便公开这样说：“办社会主义大学是我们的事，不能放在你们（指非党教师——引者）手里，这样你们就会把我们的学校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了。”

（注14：见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北京大学教师黄继忠《大胆的向党和党员提意见》一文。）
尽管不愉快，傅鹰还是觉得北大比他曾执教过的北京石油学院还强些：“在北大，我只觉得党没有表示愿意和我

交朋友。在石油学院时，我可是觉得党踩在我头上。”（注15：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沈阳师范学院教授徐公振发表了类似的意见：“我国自古以来是尊重教师的，天地君亲师，教师在古代是有地位的。只有今天教师才没有地位，共产党不尊重教师。”（注16：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

北大的王铁崖教授批评的则是共产党带进学校的官气：“我们现在是学校机关化、衙门化……学术空气下降……人们不是以学术地位来衡量一个教授的学识才能，而是以什么主任什么长来表示一个人的学识才能；甚至在报上也出现了‘某某教授升为系主任的可笑提法……’”

上海的学者也表示了类似的不满：“在学术界，由于教条主义的长期以来的统治，使我们的学术思想，自由的思想，几乎遭到窒息而死的命运，因此解放八年来，我们学术界显得非常沉寂。没有任何的独立思考，听不见有什么自由辩论的空气，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术界是没有生命，没有生气的。”（注17：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批判右派份子沈志远吴承禧在经济科学方面的反动言行》第六页。）

“几年来高等学校里教师们变成了留声机，科学研究机构变成了死气沉沉的衙门，许多学者专家变成了鸚鵡。”（注18：同注17，第十三页。）

不仅大学，中国科学院也是这样。在五月十六日的一个高级研究人员的座谈会上，“不少发言者认为，科学院不像一个学术研究机关，而像一个衙门。”“行政人员超过研究人员一倍。”考古学家陈梦家说：“科学院实际上是一个衙门，层层的领导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官。”“科学院有一个党员副院长专管社会科学，原来是张稼夫，后来是张劲夫。但不论是张稼夫还是张劲夫，我们都只在台上见到他们，除此以外别无关系。”（注19：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的有机化学家黄鸣龙认为，“科学院中阶层森严，以‘长’为贵，不以研究人员才力为尊。”他建议：“最好恢复以前（指共产党执政前——引者）的条例，即以研究员为主体，研究员才可兼所长或院长。”（注20：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大学教授们在过去几年的不同遭遇，又使其鸣放有不同的内容。譬如南京大学，由于中共认为社会学、法律学、政治学的教授讲授的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要从根拔掉”，于一九五二年强令解散了其法学院。现在被遣散的教授们纷纷壮起胆子鸣放起来。

原国际法教授孙煦存说：“政治、社会、法律究竟是科学还是万金油？是否有了马列主义就可代表一切？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

原政治系教授王辉明说：“解放后，高等学校的变化很大，但没有学语文的去教化学，而我们社会学、法律学、政治学的人你却到图书馆，他到参事室；你在教美术，他在教俄文……已经五年了。”

原法律系教授祝修爵就就在教俄文。他忿忿地说：“这真是我一生以来精神上最大的打击，最痛苦最耻辱的事！我看共产党处理问题太主观、太武断，不讲理，前后反覆无常。”（注21：孙煦存、王辉明、祝修爵三人的言论见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其实祝教授的命运并不太差，至少要比前辅仁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李景汉好得多。李一九一七年赴美学习，一九二四年归国，先后在燕京、清华、辅仁等校教了二十多年书。一九五二年起，所有社会学教授都失业了。李教授便如一名小工般被驱使，这学期做机械学教员助手，下学期做纺织教员的助手，再下学期又换过学校做教劳动保险的教员的助手。到了学期末了，工作又没了。鸣放时，他说道：“于今党不仅要洗脸上的灰尘，需要洗脸，更应该把肥皂吞到肚子里去洗一洗。”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注22：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以前是有意见不敢提，如今有了机会，天津南开大学王赣愚教授便在《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他出席的座谈会上提出：“过去好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都取消了……取消后好多专业没有人管，如人口学、民族学、社会思想都没有人专门研究……我希望：重新考虑恢复某些被废除的学科。”（注23：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国际法便是被废除的学科之一。北京大学王铁崖教授说：“国际法科学在中国已经中断了七年，这是由于对法律科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的结果。”国际法的姐妹学科国际私法“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快到绝种的境地”。他呼吁赶快让国际法教授们恢复教职。（注24：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人民日报》。）

前天津南开大学史国纲教授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共产党用不着这样的资产阶级教授，便给了他一个江苏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的闲差。他认为，“在（江苏省会）南京的情况看，国际关系学这一门整个已经绝种了。”

民主党派和文艺界、学术界人士的鸣放即使言词激烈，也仍只限于在座谈会上发表看法，但青年学生一进入政治漩涡，就不再是“和风细雨”了。他们无官一身轻，没有“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头衔，又无家室之累，不必瞻前顾后。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有热情、有勇气。这样，大学生的鸣放就完全是另外一个局面了。

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学生林希翎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会上，站在几张课桌拼成的讲台上，面对几千听众陈述自己的观点，抨击八年来中共没有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们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大家要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注25：成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中国往何处去》第十二至十四页。）

四川大学女学生冯元春在事先贴出海报后，两次在成都对学生、市民及郊区农民演讲，听众达数万人。学生组织的《论坛社》向兄弟院校发出“呼吁书”：“要重新燃起五四以来的火焰，以冲击的号角声和剑戟声夺回民主自由。”

沈阳师范学院青年团委宣传部长张百生等在鸣放讲坛上发言说：中共执政这几年来，“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圣的。一手托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仗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出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带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人大只有手（指举手通过）：政协只有口（说说而已），……‘人大’与‘政协’，就像两朵纸花一样点缀着民主的门面。”“应该让人民自由组织新的党派、社、团和出版报刊，以便广开言路。”（注26：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沈阳日报》。）

在北京大学，有的学生持脸盆在路边敲几下，等人们聚拢来，便发表演说抨击时政。清华大学一位学生，在校园里摆上一张桌子，借了一个扩音器，命名为“自由论坛”，让同学自由鸣放。北大学生还组织了“百花学社”，不仅搞演讲，还创办了刊物《接力棒》，寄发全国各大专院校。他们主张“开展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据当时上海《文汇报》的报导《北京大学“民主墙”》介绍，北大学生辩论的问题有：要不要取消教条主义的政治课？要不要取消党委负责制？新生入学由校方硬性规定学习的专业是否应改？这些全都是敏感、尖锐的问题。山东曲阜师范学院一位学生将自己的鸣放文章油印散发，还给毛泽东、周恩来各寄了一份。

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雷戟张贴了一份《二十条大纲》，提出“反对特权”：“特权是官僚主义的特征。它产生奴颜媚骨，阿谀逢迎，趾高气扬，鱼肉民众。”（注27：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中国青年报》。）

湖北武汉大学的学生举办“民主论坛”，发起讨论“胡风集团是反革命吗？”“武大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吗？”要求建立教师民主管理学校的体制，取消党委负责制。中文系学生吴开斌还组织了一个演讲团，到处向成千上万的学生、工人、市民发表演说。

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组织起《X光社》、《苦药社》，自办油印小报《底层之声》，要求改组院刊《师大教学》。

湖南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的学生组织了《解冻社》，向党委宣传部要求接收校内广播台，参与院刊的编辑工作。

陕西师范学院的学生似乎行为最为激烈。他们拿木板、铁钉封了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占领了青年团委书记的办公室。化学系学生提出“学生会管理学校行政”，物理系学生接管了校广播室，生物系同学将系党总支部书记半夜从被窝里抓起来打了顿。由于该校回族学生曾上书学院党委，要求开设回民食堂，被党委书记拒绝，不吃猪肉的回族学生被迫与汉人同餐。现在，他们署名“小民”贴出了一首打油诗：“共产党，像太阳，民族政策太荒唐。和尚吃狗肉，尼姑喝狗汤。回民啃猪骨，藏胞嚼鱼肠。不吃你的事，饿死自己当……”（注28：香港自联出版社《鸣放回忆》第九十一至九十五页。）

有些学校鸣放最激烈的问题并不涉及政治，如兰州大学被教育部定为全国重点大学，可是师资、设备均差，学生不满，各系各班推举代表，组成了一个十二人的上京请愿团。五月下旬，代表团刚到西安车站便被北京赶来的教育部副部长刘皑风劝回，未进入北京。

又如北京俄语学院，听说在华苏联专家的人数将减少，需要的翻译相应也减少，学生毕业将面临没有工作的境地，三年级学生主办的大学报刊物《破冰船》组成代表团专访党委，获证实，于是全校轰动。高教部长杨秀峰亲去学校亦不能制止骚动。杨离去当夜，各班选代表，第二天赴国务院请愿。总理周恩来未出面，但其办公室主任齐燕铭与学生举行了座谈。

学生自身没有职业，天下大事他们都关心。只要不合理，即使与切身利益无关，也要议论、抨击一番，不像文艺界人士大抵是就事论事，不出文艺本行的圈子。譬如安庆师范学院的一个学生贴出一份《古今谈》的大字报，就陈独秀坟墓被掘一事对毛泽东作了猛烈的攻击：“鞭尸！中国古今历史有两个被鞭尸者，楚平王是一个，安徽的陈独秀是一个。伍子胥报父兄之仇，鞭楚平王之尸。按中国伦常道理，杀父系不共戴天之仇，尚有可说。陈独秀并未杀毛泽东一群的父兄，又有什么戴天之仇要鞭尸呢？因为陈独秀是列宁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开创的领袖，……演变为今日的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陈独秀已长眠于客地的四川江津。但是中国人有一种特性，不以成败论英雄。陈独秀是中国有数的文学家、政治家，他是温和中国型的共产主义者。中国人民仍然崇敬他。他长眠于江津，也时有文人学士，以及革命家常去墓前献花致敬，景仰其学术与其为人，凭吊一代的政治人物——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乃其共产党一群，得了中国统一政权后，尚不容陈独秀这堆死骨头存在，挖坟鞭尸，平毁无迹，使百年之后中国政治历史只有毛泽东而无陈独秀其人……”“斯大林已遭受后辈共产党的鞭尸，我相信中国鞭尸的历史要重演……”（注29：同注6，第八十二至八十三页。）（陈独秀之子松年于一九四七年托人将陈的灵柩迁回安徽安庆老家，不知这位安徽师范学院学生所言究系何处之墓。——作者注）

六月二日，北京清华大学一个共产党员，并且是“解放区土生土养”、为中共打过仗的，署名“一个清华人”，张贴了一份题为《我控诉、我抗议》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毛泽东。这份大字报行文不甚通顺，不像从容写来再加润饰的文章。作者显然是在感情冲动的情况下草草挥成，所以顾不上遣词造句：

“我抗议毛主席最近在团中央所说的……。皇上哟！秦始皇与你相比，也只能是个无名小卒了，无怪乎你说：‘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你在镇压人民的这方面，是胜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这样，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杀了七十多万人民！（还不算一些自杀的呢）杀吧！把中国人杀绝吧！”

“胡风那一条子构成了反革命份子的罪状呢？还不是由你将‘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善良人们的身上！……他要杀你时，还不用自己动手，还可以动员你的妻子、你的骨肉孩子翻脸不认你，亲手杀死你！这是理性的社会乎？这就是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啊，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面貌啊！”

“独裁者，你们已经是残暴成性了。在延安十二点钟一声炮响，你杀了多少所谓可疑份子呢？这就是你们的所谓‘纯洁内部’、‘三查’和‘整风’啊！所谓什么圣地延安，王实味不过在《野百合花》中说了一声大灶、中灶、

小灶而挨整了。下落呢？不知道。抗大（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学生他们在前线拚命，而你们在延安呢，花天酒地。什么口洞生活，什么枣园清苦（当时毛住在枣园——引者），抗大学生在看到这些令人不能容忍的事实后，在一个晚上打死了二十多条猪吃掉了。而你们利用了‘纯洁内部’，活埋了多少人，这不是事实吗？你们自己这样做会有根本的动荡时，你们的没有人性的理论出来了：委屈是应该的，为了党的利益受委屈以至牺牲是光荣的。……有多少人死在自己人手里呢，他们遭活埋了，他们遭自己所依靠的和所相信的人活埋了。这就是‘同志’的涵义呀！”（注30：成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中国往何处去》第二十八至三十页。）

清华大学学生孙宝琮在其油印散发的小报上发表了一篇杂文《神·鬼·人》，将国民党比作鬼，共产党比作神，大众比作人：“神居天阙，难以呼人吸”，“久而久之，竟染鬼习。”“人受命于天，而神主宰万物。”“人敬鬼、神而远之。这是人的悲剧，也是神的悲剧。”“愿神弃神权，重返人间，神弃神皮，重新作人。则庶民万幸，祖国万幸。”（注31：北京出版社《首都高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第二九八页。）很可能这是第一篇反对神化毛泽东的文字，尽管文中没有直呼其名。后来中共自己反对神化毛，那是在孙的杂文发表二十多年之后的事了。而为了这篇文章，中共将孙宝琮抓进牢里关了十五年。（注32：韧锋《回忆“反右”期间的北京高校》，见香港《九十年代》一九九〇年七月号。）

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谭天荣在大字报里点名批判了毛：“毛主席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不是唯物主义……是帝王思想的变相复活，是一种古代封建意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为的盗窃国家政权的一种新颖名词。……苏联的工人阶级的专政，也是欺骗人民的口号，完全是党巨人阶级独裁，人民一切无自由。”（注33：同注6，第三十页。）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应该对资本主义有个新的解释。他要求为被全世界共产党一致视为公敌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翻案。此外，他还攻击《人民日报》，把这家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说成是“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注34：同注31：第一八三页。）他还主张全民直接选举，对地主也给予选举权，反对用法律规定共产党在国家的领导地位。

广州中山大学，有人贴出大字报，要求全体同学为肃反期间因受不了斗争、追查而跳楼自杀的生物系女学刘雪明开追悼会。在追悼会上，二百多名同学在她的遗像前默哀三分钟；多人发言，要求追查凶手，要求已调职原校党委书记回来还账。

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的学生先在系里开了个“控诉会”，由三名受到不同迫害的同学上台控诉。之后，又移到学校办公楼召开大会。校党委闻讯，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诉”二字，但遭拒绝。

由于学生的激烈言词和行为，在当局看来已属于“闹事”，家长们不安了。当时并无任何蛛丝马迹表明共产党即将反击，这些学生将会遭殃，但过去几年令人心寒的运动使他们担忧一场镇压就会来临，于是纷纷给学校当局去信。据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力学家钱伟长说：“许多学生家长来信要我劝劝他们的子弟，不要参加闹事，我都劝过了，但是学生们十分坚决。这好像到了‘五四运动’的前夕。”据钱氏分析，学生们所以坚决要“放”，是为了出路问题。“知识份子冲破恶劣环境而求出路。学生闹事，也是因为没有出路。学校里的一切操在党员团员手上，非党团的学生们……自然演变成反党团的极端思想，寻求出路。就如蒋校长（指清华校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蒋南翔）上星期在报告中，居然公开地说‘今日的知识份子吃共产党的饭’。知识份子在共产党之下，有什么出路？”“知识份子是凭本领卖劳力吃饭的，怎么吃到共产党的饭了？”

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采用美英那一套还是苏联那一套，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论。一九五二年中共强令全国高等院校采取苏联的制度，理、工科分家，清华的理科全部并入北大，鸣放是这便成了一大议题。

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当初就反对照搬苏联那一套。当工程物理系的学生告诉他，要求理工合校的签名运动已征集到六百多人签名时，他签以“六百多人太少了，六千多人还差不多”。他向学生传其主张：北大理学院入清华，其他科系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去，将北京大学的牌子挂在那里，“人民大学这个教条主义的名字就干脆不要了”。

（五十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是专门培养干部的大学，与一般大学有所不同。）

对于学生闹事，中国人民大学的英语教授许孟雄另有一番解释：“共产党所希望的人民大学，是要一窝蜂一般。那些学生经过党的指导，马列主义的教育成功以后……能飞往各地去螫人。”“但这群蜂在蜂窝里看到不妥，变了质，不愿螫人，反要咬制造蜂窝的主人。那是共产党没有想到的。”“共产党要知道，失去真理与人性的教育是要失败的。”

北大校长马寅初的解释又略有不同：“以前几年学生都听党的指导和苏联专家的指导，学习马列主义一系列的文件和书籍。有的学生是模糊的，有的学生是认真研究的。那些认真研究的学生，将马克思的学说，以及唯物辩证法等等，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等等，研究出新的道理出来了，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学术已经过时，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错误，就开始不信了。”“这次毛主席高瞻远瞩，主张人民自由鸣放……。对马列学术研究有素，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认识清楚的学生，敢鸣敢放，批评党领导教育部门的错误与黑暗。其他平素模糊的学生，亦恍然憬悟。

当年敢鸣敢放的学生们的确对马列主义作过一番研究，只是结论为“不信”罢了。马寅初虽年高七旬，又贵为校长，对青年学生的状况了解如此透彻，实为难能。马氏由于德高望重，当局没有公开给他一顶“帽子”；但许孟雄却落了网。没有证据表明将许打成右派获得毛的赞许，但不管怎样，人们都可以说毛有负于许。

许孟雄为清华大学英语系第一届毕业生，执教数十年，是中国汉译英的泰斗。早在一九三八年，他就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一个对外宣传小组工作，将毛泽东的几十篇著作译成英文，向世界传播。四十年代后期，他任国民党政府驻马来亚和印度的外交官。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冲破重重困难返国。归国后，他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执教四年，因与党员干部难以相处而被迫转去中国人民大学。鸣放时，他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北京外国语学院鸣起来吧！》的文章，抨击“党党相护”、“党员欺侮非党员”，还批评了“外交部一位大员”在外语学院师生大会上放的谬论“政治好英文也会好”。这样，一个有功于中共、有功于毛的老学者就因为上述几句话而被当作敌人处置了。

不过，当时的知识份子只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却并不想使共产党陷入被动和过份难堪的境地。因此当学生情绪正十分激烈，到处在找领袖，希望教授出来领头说话，局势已严重到一触即发的时候，他们决定不再采取鼓动学生“鸣放”的态度了。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一度打算停课上街游行，党委书记武光控制不住局势，即向教授们求援，一位名教授为帮党委摆脱困境，起草了“呼吁书”，劝学生不要罢课，终于平复了学生的情绪。

第九章：弄“阳谋”反右揭幕

鸣放时，北京大学的傅鹰教授对前去采访的上海《文汇报》记者说过：“对一个负责的政府，说实话无论如何要比歌功颂德好。四十多年前读《圣经》，圣保罗说过一句名言：不要因为我说了实话，便把我当作仇人。”那时，他虽不知道毛泽东“诱敌深入而歼之”的计谋，却已隐隐或到了不安，因为执政八年来的共产党还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过。

上海的叶元龙教授在市委召开的会议上表示了类似的担心：“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鸦鸣的时候，就一枪开过去，因为一枪开去，乌鸦固然没法再鸣，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注1：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三《人民日报》。）

到了六月初，鸣放言论趋于激烈，中共似乎要有动作了。川剧作家范朴斋嗅出了弥漫全国的火药味，便想消弭、化解这场危机。他于六月五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今天全国鸣放，使大家发泄一下，把肚子里的闷气吐了，将会更主动地发挥出他们的热情和潜力，使国家事务得到更多的好处。否则郁塞更久，问题更大。”“既然郁闷很久，一旦倾吐，难免感情激动，说得尖锐一些，这也是情理中应有的事。”

外交部长陈毅在上海市长任内，与苏北古文家冒广生时有往还。冒氏赴京省亲访旧，陈毅闻知，前往探望。交谈间，冒氏对整风发表了若干看法，陈毅以为值得写下，并介绍给《人民日报》，于六月六日发表，大意也是欲化解鸣放者与被批评的中共之间的紧张气氛：

“既曰争鸣，又曰百家，那就人各异鸣，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不能只允许肯定，亦不能不允许否定。”“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行年八十五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希望党内外人站在一条战线上，把坏的风气移去，好的风声树起来。这才叫做整风，不是整人。”

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民盟的三位著名教曾昭伦、钱伟长、费孝通与秘书长胡愈之到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处，谈论高等学校的情形。“三位元教授一致认为局面严重，随时可以发生大游行，假使处理不妥当，学生若是和市民联合起来，也有可能发生类似匈牙利的事件。”（注2：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章伯钧在全国人大的发言，见《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十八号第九十五页。）章决定第二天召开会议，加约了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三教授。这便是“六月六日教授会议”的由来。这个会议并不避人，因为还邀请了史良（民盟中央委员）参加。史是坚决跟共产党、不批评中共的。（反右后，史被认是左派，照旧做她的挂名的司法部长。）会中，六教授均认为各学校形势严重，如果教师给学生领头，事情会闹大。这是他们不希望出现的。他们也明白，要是出事，中共可以动用三百万军队，但那样全国的人心就都散了。他们觉得民盟有责任帮助中共，要站出来说话，帮中共稳住局势。

但是教授也好，作家、古文家也好，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是杰出的，但是在政治上却都太迟钝了。因为早在他们说话之前，毛泽东已将五月十五日选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至党的高层，将反右部署安排妥当，只等扣发板机了。

毛部署抓右派，至迟是在五月十八日。那天晚上，主持《文艺学习》杂志编务的黄秋耘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家中聊天。邵正鼓励他“大胆地放”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来了电话。听了电话，邵“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沈”，放下话筒对黄说道：“唔，转了！”并嘱咐道：“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注3：黄秋耘《风雨年华》。）

周扬是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他必定是从毛处得到由鼓励鸣放转向抓右派的指示后才向其下属邵荃麟布置的。可知中共在五月十八日之后仍鼓励人民鸣放的甜言密语纯属阴谋，是诱捕无辜的圈套。譬如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直到二十四日还在公开号召鸣放：“希望党外人士把要说的话说完、说透。”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维汉知道毛有反右的部署后，仍然将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的资本家请去，让他们鸣放，后来这些人一个也没有逃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则几乎天天给算是非党报刊的《文汇报》下指示，促其为鸣放加温再加温，后来该报编辑部成员几乎全数被他收拾。

对这种做法，常人是无法理解的，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章乃器就不相信天下竟有如此恶毒的阴谋。他在反右已经开始之后仍然说：“共产党绝不会做半途而废的事情……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

然而事实正是表面一套，里面一套。五月二十五日，周扬甚至在邀请文艺工作者提意见的座谈会上说：“希望大家意见提得尖锐一点。你们太客气了，你们的批评只是一分，可是我体会到我们的缺点有十分。”其态度之诚恳，使任何善良的党外人士都料想不到共产党正在暗里布罗网。所以不谙阴谋伎俩的作家、《文艺报》副总编辑萧干直到六月一日还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认真地讨论实现“百花齐放”之道。他要共产党对作家放得下心，“大家彼此都放心一些，花，自然就会慢慢放开啦”。

有一种说法，谓毛泽东本欲接纳对共产党的批评，只是在鸣放超出了他的接受限度才转而决定反击。这与事实不符。这里不妨列一张时间表：

北京大学第一张鸣放大字报于五月十九日贴出，是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以后四天的事。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五月二十一日提出。

龙云的“反苏谬论”，五月二十二日。

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五月二十二日。

林希翎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五月二十三日。

葛佩琦的所谓“杀共产党人”（见本章稍后的叙述），五月三十日。

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五月三十一日。

储安平“党天下”，六月一日。

有些中共事后用以证明反右之必要的“罪恶活动”，全是在毛泽东五月十五日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通知党内高层准备反击右派后，在不知中共幕后部署的情况下，为中共反覆邀请而“放”出来的。

据粗略估计，凡因为“鸣放”而当上右派的人，一大半是在五月十五日之后被劝说、诱导而中计的。譬如前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陆铿，当年曾揭露过国民党的弊政，共产党为统战、收买人心，给了他一个云南省政协委员当。反右前夕，他远在南国，嗅不到北京待发的枪筒里的火药味。由于政协秘书长两次动员，他写了份建议，希望共产党考虑与美国化敌为友，大学用英文化替俄文，允许民间办报等等。可是他登了个鸣放的未班车，《云南日报》将他的建议刊出时，反右已经开始了。他这时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成了待宰的羔羊。他不仅成为“大右派”，而且为此坐了二十年牢。

本来，许多中共干部对于旨在揭共产党疮疤的“鸣放”并不热心，只是在知道不久将会展开“反击”之人后才变得诚恳起来，苦口婆心地劝人给共产党提意见。所以，要说耍阴谋诡计，这些干部都有一份，只是当时他们对这样做的“伟大意义”尚未有认识，不明白毛泽东蓄意通过这场打击迫使中国的知识份子整体就范，从此成为共产党政权下的顺民。即使做不到一劳永逸，也要使他的嘴长久地闭上。这些知识份子，特别是在中共建国前与中共合作赶走了国民党的各党派的人士，自以为有功于新政权，总想对国家事务有发言权。毛自己也明白，他执政以来的八年间所发动的那些政治运动，并没有完全消弭知识份子的二心，他们虽然出不敢巷议，但入却还要心非。这次鸣放中储安平的“小和尚、老和尚”、“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都说明了前几次运动并没有真正将他们打垮。毛决心不再如过去的运动那样小打小闹，而要来一次大清扫，以免国际国内有什么风吹草动时，出现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人民在知识份子鼓动下向共产党夺权的局面。就这一点来说，毛的确比党内那些只知紧跟中央、抓人凑数的干部们高瞻远瞩得多了。

六月初起，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已悄悄地开始变调。譬如六月六日发文说“帮助共产党整风，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有些人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反对马列主义”；六月七日的文章说“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容动摇，社会主义方向不容模糊”。但此时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场规模空前、比两年前的“肃反”远为酷烈的运动就要开始了。

六月八日，反右斗争正式揭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少数的右派份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者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郑重宣布：“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注4：《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二八四页。）

毛于这一天开始正式指挥反右斗争。不过在当天那篇社论里，他又表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

从“言者无罪”到“倾听善意批评”，这是一个质的转变。当时有一幅漫画将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知识份子模样的人，瞪大了眼，手握一只贴着“毒”字的瓶子，正在往桌上一只药瓶里滩，药瓶上击着一张标签：“给共产党口服良药”。从此，欲指某人为右派，只要说他不怀善意或者放毒就行了。

不过，这里要记上一笔的是，在出手打击之前，毛泽东仍然装出一副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样子，在中南海里演出了使人对其虚伪的品质有所了解的一幕短剧。

毛读到六月六日《人民日报》上冒广生的短文，便让周恩来约见冒老，并派车接冒氏父子到其中南海住处相见。

“老先生讲的好啊！”毛说，“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的，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

冒答：“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

毛郑重地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说来也巧，正当这时冒的儿子冒舒咽（口改言旁）在一旁却无意中看见了有密密麻麻的毛氏批改墨迹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文稿。（李维汉、胡乔木、吴冷西三人在座，他没弄清文稿是握在其中哪一人心裏。该文七月一日发表。）

送冒广生出门时，毛忽然停步问：“老先生有何临别赠言？”

冒略一思索，答：“我记得佛经上说过，一头雄狮也不免为身上几只虱子所苦。虱子虽小，害莫大焉，请务必提防！”

“讲得好哇！”毛表情严肃，右手搭在胸口说：“我一定牢记在心上。”（注5：冒舒口《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泽东》，香港《百姓》半月刊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六日第一二八期。）

冒氏引证佛典，本意在鼓励毛坚持整风初衷，将败坏党风的党内“虱子”清除掉。然而此时毛已决定放过“虱子”，正在“磨刀霍霍向猪羊”。他与冒广生告别那一幕，仅是演戏而已。需要指出的是，这与反右部署并无关系，他只是久仰冒氏大名，欲见他一面，而不得不敷衍、应付冒氏，遂有此一即兴而临时作的表演。不久后，历史上空前的灾难落到中国知识份子头上时，冒老先生已经作古，无从知道自己被毛耍弄了，而他那随他晋见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以记者身份访问延安时曾被毛宴请的儿子，剧作家冒舒口则没有逃过那场浩劫，成了百万右派大军的一员。

以后的史家也许会把六月六日这一天视作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的《文汇报》在副刊上登载了一篇三数寸见方的小文章，作者署名是姚文元。文章主要是抓住一件小事批评《文汇报》，大意是：几天前毛泽东主席接见共青团代表，并讲了话。《解放日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用特大的铅字放在第一条报导。《人民日报》报导此事的标题虽然用了小一些的字体，但也排在当中。“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因为这是表态文章，迹近溜须拍马，为了防止予人以口实，姚文元特别声明，关于自己的见解，他“不想说”。为其么不想说？“也不想说”。

坐镇中南海的毛泽东发现这篇无聊短文，如获至宝，立即回应。数天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文，夸奖姚“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是一篇好文章”（《人民日报》于六月十四日刊出该文）。从此，毛将

姚视作左派和文字狱的讼棍使用了近二十年。姚在文革中成为暴发户，究其渊源，还是靠这篇典型的文痞式的豆腐干文章。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于是全国各地都将工人搬出来，异口同声说“工人阶级说话了”。棍、伪君子、大坏蛋的代名词，成了亿万“工农兵”口诛笔伐和当众斗争的对象。

早几天“工人阶级”怎么不说话？因为共产党认为不需要让它说话。中国的工人从来就没有自己独立的言论阵地，一切都是由党替他们说。报纸、电台被明确规定为“党的喉舌”。工人是没有“喉舌”的。所以平素只有党在说话，“工人阶级”是不说话的。要斗人了，党让他们说话了，才在报刊、广播电台上说起话来。

在党的指挥下，各地工人动辄举行数千、上万人的集会，“愤怒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工人们“一下子就”和毛泽东站到一起去了，尽管几天以前他们还给这些右派的言论喝彩，而现在也闹不清什么叫反党和反社会主义”。（注6：刘宾雁《从我的一生看中共》，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一九九一年七月号。）

农民也说话了：“想取消党的领导就是要拆散农民的集体幸福生活。”几年前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英雄黄继光的母亲也被安排在六月十七日的《人民日报》上说话：“哪个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就要和他拚命！”

可是，风暴乍起，头脑简单或者心地善良的人们尚不明白，《人民日报》社论后面是一场灭顶之灾。《文汇报》社长徐铸成以为不久前毛泽东曾亲自请他当团长率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出国，革命不会革到休头上，于是在报社编委会上表示：“我们不要做《人民日报》的应声虫。”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良英绝未料到一场比过去的运动远为残酷的斗争已经开始。他认为这是失信于人民，于是公开表示《人民日报》的社论“使人感到昨天还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变了脸了，不道德，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太粗暴了”。（注7：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结果他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全院批判的右派，并被定为“极右份子”。

九三学社的顾执中教授也没想到现在是中共向大家算账的时候了。他还希望中共能听得进逆耳之言：“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的说了许许多多的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质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容易被误认为坏话。”他希望中共不要将好心说坏话的人拿去斗争，那样“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是不应该的……英明的党也决不会做的。”

顾老生先无论如何也料不到，半个月之后，英明的党会宣布他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人民日报》还发了辱骂“顾执中之流”的社论。（注8：顾执中发言和《人民日报》社论分别见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 and 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他不甘受辱，决定以死抗争。他一头向一个石柱撞去，幸因年老劲小，只撞成重伤，未死。

高教部副部曾昭伦和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等人以民盟科学规划小组名义提出的《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中有一条：“改变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态度”，恢复一九五二年被解散的全国各校的社会学系。六月八日《人民日报》杀气腾腾的社论竟没有使这批学者清醒，他们仍按原计划在六月九日召开了会议，决定筹备成立“中国社会学会”，并商定由著名学者、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担任他们相信中共会同意恢复的第一个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他们对政治气候的感觉之迟钝与其学问太不相称。吴文藻后来被中共定为右派份子，实在是因为秀才气太浓了。

当然，即使没有六月九日的会议，或者会中不确定由吴文藻主持未来的社会学系，他也跳不脱这一劫，因为他还有别的“罪行”：“诬蔑‘肃反运动是不道德的斗争’，‘今天政府权力之大，从古所未有，而能力之低也从古所未有。’他甚至还说‘共产党可能亡的’。”（注9：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六月十日那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女中央委员谭惕吾已经看出形势不对，对前去拜访的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林希翎说：“我看整风……是一个大策略，是诱敌深入的骗局。”可是身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的费孝通却不察形势之险恶，在六月十日的会议中还提醒当局“言者无罪”，要求当局“以理服人”。但到十七日，他就顶不住了，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持的会上作了检讨。新华社专门对他的检讨发了报导：“费孝通表示，他有决心和右派份子划清界线。他要跟着共产党走，不跟野心份子走。”他揭发“罗隆基最讨厌的是盟内的（中共）党员，在背后打听谁是党员”；因中共说章伯钧和罗隆基组成了“反党联盟”，他便攻击章、罗在“为垂死的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挣扎”。

徐铸成也被迫“揭发”罗隆基“想把上海《文汇报》从党的领导下拉出来，作为章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其他如民盟四川负责人潘大逵也出来揭罗隆基“组织小宗派是为了要造成山头，作为政治资本向共产党讨价还价”。连已被痛打的《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女士也表示要“从右向左转”，“和罗隆基划清界线”。她还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揭发罗：罗说一九五六年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干涉内政”，常说“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是最肉麻不过的事”，等等。

这些罗隆基的老朋友本欲以此获得中共的宽恕，但是他们错了，共产党人并不认为他们和罗之间有什么界线可划。毛泽东看准了他们的侥幸心理，先利用他们出面将罗搞臭，再一扫帚将他们同罗扫到一堆去。于是他们的检讨和揭发只是加速了自身的崩溃，却没有使们躲过“右派份子”这顶帽子。

这是令人痛心但不能回避的史实。百分之九十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在反右初起时都曾经跟着批判过首批被定为右派的人。风向突变时，他们懵了。历次运动中挨整的人下场有目共睹，谁都害怕自己被押上斗争台，为求自保只好去斗别人。他们以为这样做便可做“教鸡傲猴”里的那只猴，宰鸡时不妨去帮着戳一刀。谁知毛泽东嫌“杀一儆百”威力不足，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没能镇住知识份子，这回他决定扩大整肃物件，杀十儆百，甚至杀二十儆百，于是有一百万人注定进不了“猴”的队伍了。方针既定，他们怎么努力表现也是白搭，早晚会派上一顶右派帽子。譬如，十月十一日，北京的青年团中央大会堂举行批斗青年作家刘绍棠的会，另一位作家邓友梅上台作了一篇颇为有力的批判发言。当他正迈步下台，大厅里响起掌声时，北京市联秘书长突然大声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像所骗，他——他也被划为右派份子了！”就这样，邓友梅同刘绍棠一样，也成了傲猴的鸡。

要“批倒批臭”以知识份子为主体的右派，还得靠知识份子里的左派。后来在文化革命中差点当上毛泽东的接班人的张春桥，在一九五七年虽然只是上海市委的一名普通委员，但其眼光却不寻常。他看出反右运动是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便每隔两三天写一篇文章，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过目，化名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尽管都是些谩骂式的小文章，毫无理论可言，十几篇凑在一起也有点份量。不到一年，柯鼓吹“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被毛大为赏识，两个月后就把他收罗进政治局，成了“党的领导人”。柯随着也在上海论功行赏，把张收罗进上海市委常委，张也就成了上海的一名“领导同志”。以后毛泽东领导中共一路反右，张春桥也就一路往上爬，这都是后话了。

辱骂虽不能使人信服，却多少有点威慑作用。不仅《解放日报》一类的地方报，连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也从六月中旬开始连篇累牍地到登用文学语言污辱右派的文章：

《章乃器吃了咸肉骂火腿》：

《右派大学生成了落汤鸡》：

《学生中的害群之马》：

《灵魂深处长了浓疮的林希翎》：

《为资产阶级叫嚎的猫头鹰——穆木天》：（穆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章伯钧——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

《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揪出河南省副省长、民盟河南省主任委员王毅斋》：

《在前进路上的一堆垃圾——西安市西北大学教授刘不同、程元斟等“肮脏的一群”》：

《一群狂妄之徒碰得头破血流——内蒙古计计院总工程师高公润等》：
《斩断章伯钧伸进戏剧界的魔爪》：
《挖掉章罗联盟在江西的巢穴》：
《炸掉章罗联盟在四川的地堡》。

如此一来，偌大的中国，翻开任何一天的任何一份报纸、任何一份期刊杂志，打开收音机拧到任何一家电台，千篇一律全是上面这一套文学化了的辱骂。莫说这一套没有用，看了听了千百遍之后，几乎所有的工人、农民、中小學生都相信了共产党对右派的指控和给右派栽的赃。

高教部副部长曾昭伦等六位教授在六月六日的座谈会上表现的对中共的关心、爱护未得好报。他们的好心好意被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毛认定：“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注10：见毛泽东撰写的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于是“六月六日六教授”被缩写成“六六六”，于当时最有效的杀虫药同名。偌大的中国，从此没有人再尊重那些“反动派”。毛泽东所说的“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份子”，（注11：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轻而易举就做到了。右派们成了社会公敌，哪里有广播喇叭，哪里就在唱“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四类份子”变成了“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从此右派们就成了“不得乱说乱动”的人物。章伯钧所说的“共产党专政”真正实现了。

直到一九八一年，邓小平还在说，一九五七年中共之所以要反右，是因为“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注12：《邓小平文选》第二〇七页。）其实，那“杀气”是共产党自己造出来的。细查当时的“鸣放”记录，唯一被正式披露、牵涉到一个“杀”字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葛佩琦在学校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人民日报》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将葛的发言刊登出来，摘要如下：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允许的。”“共产党员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份子。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

“杀共产党人”这五个字，是“轮流做庄”之外中共一直用以说明反右之必要的另一重要根据。譬如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给北京的马列主义教师做报告，说：“右派份子……一面到处高呼要绝对自由，一面高呼杀共产党人。他们要有杀共产党人的绝对自由。这不是明明要来一个反革命复辟么？”（注13：陆定一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六日的讲话，见《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十八号第一四二页。）

事实如何？葛佩琦的发言是被人（一说是康生）篡改了的。《人民日报》登出那段话的第二天，他就给报社写信要求更正，因为他的原话是：“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争取群众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然而报社置之不理，于是他成为十恶不赦的右派代表，全国上下家喻户晓。由于当局有意识地宣传右派要“杀共产党”，制造紧张气氛，以便为镇压更多的右派提供口实，葛氏便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三十年来，人们都上了中共报刊的当，都以为葛氏是个共产党的死对头。其实他是个标准的革命党。他出身山东一个农民的家庭，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一九三五年参加中共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芦沟桥事变后随流亡同学去南京向国民党请愿而再度入狱，出狱后即赴河南组织抗日游击队。他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受命打入国民党军队。一九四六年国共内战前夕，他被中共派遣到杜聿明任司令、蒋经国任政治委员的东北保安司令部，以“少将督察”、“东北通讯处处长”的身份刺探情报，不断将情报送出，经由电台发往延安。后来与他单线联络的上级被捕，他一时找不到人证明那段历史，遂成了“党外人士”。中共抓了这么一个“共党份子”作为典型右派向全国示众，实在是不可思议。

葛氏既已成为全国最反动、最猖狂的右派，当局便于十二月将他逮捕入狱，还把他受共产党之命打入国民党军队的那段历史安上一个“国民党少将”、“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判以无期徒刑。真是“欲加之罪，无患无辞”。更为可笑的是，十八年后中共特赦国民党“战犯”，他竟也被作为其中一员而“再见青天”，同杜聿明等人一同释放。不过，一直到了二〇一二年，葛氏将申诉状直接送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家中之后，在胡亲自干预下，他才有幸被平了反，恢复党籍，“自一九三八年算起”。（注14：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被打成“右派”后，各人表现各异。老共产党员冯雪峰被党开除后仍忠于党，给也是共产党员的儿子写信道：“你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相信你一定会跟着党走，永远前进。”

女作家丁玲也是一种典型。她被开除出党后，到中国作家协会成员之一的刘白羽那里去痛哭：“白羽！离开党我很痛苦……”（注15：《人民文学》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四十三页，刘白羽的文章。）到了八十年代，她回忆自己当时的表现时写道：“一切辱骂、讽刺、一切冠冕堂皇言词下的造谣诬陷我能忍受吗？我能反抗吗？我能辩护吗？我只有匍伏流涕，锥心泣血，低头认‘罪’。”（注16：丁玲《远方来信》，《人民文学》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北京日报》编辑徐钟师就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了。因为同意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他被揪出来斗争。可是在斗争会的台上，人们突然发现：“此时昂首站在被审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芦头。老徐不但剃光了头发，还刮净了脸上平日的胡子拉茬。……穿上中式蜈蚣扣儿的盖布裤挂，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神色，溢于须眉之间。”（注17：从维熙《走向混沌》第五页。）由于“态度恶劣”，没过几天他就被送去“劳动教养”了。

另一个因“态度恶劣”而受到加倍惩罚的是军队中的版画家艾岩。艾本是海外华侨，抗战时归国投身八路军。一九四二年日军重兵扫荡晋东南。五月，在辽县（今左权县）的战斗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战死。在敌人的刺刀面前，艾岩不愿作俘虏，纵身跳了崖。日本人踢踢他的尸体，未觉察他仅是昏迷。数小时后，他终于醒来，爬回了部队。这样一位壮士，自然不会因为人家说他有罪就低头。领导认为他“实际没有多大事儿，就是态度特别恶劣”，将他定为右派，开除党籍、军籍，送去农场劳动了。（注18：徐光耀《跳崖壮士》，《人民文学》一九九一年第五期。）

杭州市青年团的一名年轻干部邵奇惠（一九九二年时的黑龙江省省长）被当作“右派集团的后台”揪出来批斗。他年轻、耿直，不懂得在大风前折腰，竟然在会场上跳起来回击批判者。这下正好，他立即以“反党份子”被逮捕，被剃成光头，成了杭州市监狱第“五五六号”囚犯。（注19：《人民文学》一九八三年第十一期，《在大时代的弯了上》。）

六月十九日，毛正式在《人民日报》发表他于二月间所作的讲话，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作了很大改动，补进了他二月时根本未曾讲过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至是很激烈的”一类的话，将“毛毛雨”换成了黑火药。文章还公布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六个“有利于……”，其实核心只有一条“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已）。

如果三月份以后层层传达的这篇讲话便是六月间发表的这个样子，许多人一定会保持缄默，不鸣不放。但现在对他们来说，闭嘴已经太晚了。他们的言论已被记录在案，共产党正按照“六条标准”将他们一一“对号入座”，而他们则在那无理可讲的制度下，“听候处理”。至此，“鸣放”正式结束。

无独有偶，这“六条标准”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次。司马光编完《资治通鉴》不久，宋神宗驾崩，八岁的太子继位，太皇太后听政。这位太后派人到洛阳问司马光何为当务之急。司马光答，头一件大事便是通告全国鸣放，帮助朝廷整风。原话是：“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凡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报言。”谓“尽情报言”，正是“大鸣大放”。朝廷接纳此意见，拟了诏书，然而诏书却有一条尾巴：“若阴有所怀，犯其非分……”共列出六条，“若如此，罚无赦。”译成今日的话，便是“若企图向朝廷的领导权挑战……则要从严处理”。司马光接了太后送来的诏书，读到那条尾巴，当即表示：“此非求谏，

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他遂上书请求删除那“六条标准”，解除禁区，任人鸣放。太后纳谏，于是朝廷收到了成千的意见书。

事隔近一千年，毛泽东执政而不是“听政”，自然不必像那位太后那样“听”司马光之流的知识份子的进谏。他那篇名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大作于七月一日正式发表，针对有人指责他言而无信，搞阴谋，巧妙地自辩为“阳谋”：“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从此，中文大词典里多了一个新辞汇——“阳谋”。

其实说新也不新，“阳谋”这套玩意早在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风中就已经耍过了。当年延安整风一结束，毛的副手康生就在一九四三年八月的一个训练班上得意洋洋地介绍经验：“号召大胆讲话，提倡出壁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问题不立刻反驳，也不加以压制，于是这就热闹了……”（注20：戴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他把那叫做“暴露阶段”，“暴露”之后便是抓人、斗人，同一九五七年的做法一模一样。只是由于当年在延安，人人都是共产党或共产党的拥护者，中了圈套也没人抗议说毛泽东搞阴谋，否则恐怕不是一九五七年而是一九四二年，毛就会发明“阳谋”这个词了。

“阳谋”的真意，当以翌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汉口会议上毛的解释为准：“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让那些王八蛋出台唱戏，在报纸上放屁，……然后……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

人总是怕被斗、被捉的，人们对“阳谋”一说只能腹诽，再也不敢公开斥责毛搞阴谋了。

可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怎么交待呢？“大学士”郭沫若出来打圆场了。六月底，他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与《光明日报》记者谈话，表示：“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他的逻辑是：“一个人的话，如果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还是无罪，那样还有什么国家法纪可言呢？”（注21：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虽然这番话不像是出自一个学富五车的历史学家之口，历史上从无一个人凭几句话动摇了国家的根本的先例，但毕竟还是在右派们的“言”上做了文章。

毛泽东本人就不这么文质彬彬了，他狡辩道：“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注22：同注10。）至于那“行动”是什么，他却半句也没有提。

八百年前的秦桧以“莫须有”三字貽笑天下，是因为有大将韩世忠敢于发问：“岳飞何罪？”但如今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人斗胆敢问毛泽东：“何为行动？”我们也就失去了聆听毛作答的机会。不然，以后中国人编词典时，或许会在“阳谋”之外再增加一条与“莫须有”相仿的条目。

直到这时，毛泽东才对原先不赞成鸣放的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道出他当初斥责陈“不让人讲话是专制主义”的原因：“毒草总是要出来的，不要怕，出来就锄嘛！”（注23：陈沂《永远怀念陈总》，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四日上海《文汇报》扩大版。）

一批又一批的右派“从阴暗的角落里挖出来”了，但是擒贼先擒王，当局真正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声讨、蓄意搞臭的主要是章伯钧、罗隆基这些“大家伙”。七月一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即《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民盟主席沈钧儒也发表公告称：“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按中共的一贯做法，这很可能是中共派人写了，再以沈的名义送去发表的。）

其实，按民盟中央常委千家驹的说法，“章、罗两人虽同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但……两人同床异梦，互相攻击，

民盟中央同志，众所周知……”。毛泽东“说他们两人结成‘联盟’来‘反党’……稍知民盟内幕的人无不认为滑天下之大稽！”（注24：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二三九页，千为民盟中央常委。）

为此，这里不妨将章、罗这两位民盟副主席的历史叙述一番。

罗隆基，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的清华学生领袖，一九二一至二八年在美、英留学，为政治学博士。他认同西方民主政治，攻击国民党政府“党员治国”，“非党不能做官，为做官便要入党”，又抨击国民党不容许公开批评其主义，不讲人权，终于得罪当局。一九三三年秋曾遭暗算，幸亏他机警地避开了特务的子弹，没有去阎王那里报到。以后，蒋介石禁止每日登载由罗撰写社论的《益世报》在全国发行，又将罗请去峨嵋山为他讲课，不停地大宴小宴招待。罗却软硬不吃，拒绝为国民党政府效力。他只是教书写文章，宣传他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直到后来与共产党合作。

章伯钧一九二二年赴德国途中，在船上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共红军总司令的朱德，遂成为朱德的秘书。不久，朱、章在德国相继成为共产党员。章的两个弟弟也加入了中共。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被蒋介石赶入地下的中共利用朱德任南昌市公安局长的身份，设计将亲蒋势力一网打尽，轻易地占领了南昌。

当时，章亦随朱德参与了这次建立中共第一支武装的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以后，章脱离中共，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二度改名后成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任主席。

一九四一年三月，无党无派的名人张澜（民国初年的四川省长）和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梁漱溟、沈钧儒、左舜生等人将其各自领导的党、会组织集合而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去掉“政团”二字），以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为宗旨，力求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

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派罗隆基的同乡又是清华同学、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彭学沛去做说客，告诉罗：“共产党只是利用你，不会信任你……只要你愿意，在国民党政府中当个部长，那是不在话下的。”对于章伯钧，蒋更是亲自开口，明白表示：“除了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之外，当什么部长都可以！”可是章、罗二人及民盟骨干以为共产党也主张民主、反对一党专政，因此毫不犹豫地与共产党合作。在国共内战爆发，中共奉国民之命撤销其在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的办事处时，公开宣布其财产由民盟“全权保管”，罗亦向报界作了类似声明。

由于同共产党合作，民盟于一九四七年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进攻上海，蒋介石命令将已被软禁的张澜、罗隆基带往台湾。但曾向周恩来表示过投靠之意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务头子杨虎及时反戈，将张、罗救到自己家中，迎接中共进了城。

章、罗的历史，中共了解得一清二楚，否则也不会让他们当国务院的部长。但在大局已定后，蒋介石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已无回天之力，章、罗们对中共再也帮不了什么忙，中共也不需要他们帮什么忙了。兔死狗烹，“章罗同盟”被描绘成凶恶残暴、阴险毒辣的恶魔，连小学生都学会了咒骂这两位“大坏蛋”的口号。

罗隆基和四十年代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名教授闻一多是清华同学，解放后闻的遗骨迁到北京下葬时，抬骨灰的便是罗隆基和闻一多的长子。如今要搞臭罗，中共像两年前将鲁迅夫人许广平抬出来斥骂胡风一样，将闻的夫人高真搬了出来，在报纸上骂罗“想把千百万中国人民几十年来流血牺牲的成果据为己有，你们实在太没良心了”。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浦熙修与罗相恋经年，欲结婚而未结，如今当局逼着她将罗给她的信全部交出，从中寻找可以用来搞臭罗的弹药。

罗隆基被搞得如此臭，以至人人都可以去侮辱他一番。在一次批判大会上，罗起立回答质问，坐下时却落了空，一屁股重重地摔在地上，眼镜也跌落在地，原来有人抽走了他的椅子。

更有甚者，当局又将章伯钧的儿子搬出来，让他宣布：“如果他（章伯钧）不放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彻底承认错误，我就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同时，又让储安平的儿子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公开信，声明与老子划清界线。其实，老子刚一被定为右派，这位儿子就已经被赶出军队了。

妻子们当然更得与右派丈夫划清界线了。剧作家吴祖光成为右派后，当局逼迫其妻，演员新风霞在戏剧家协会和电影工作者联谊会联合召开的揭露吴祖光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貌”的大会上骂自己的丈夫。《人民日报》发布消息，说新风霞表示“感谢党和同志的帮助，给了她力量能站起来揭发吴祖光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罪行”。（注25：一九五七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不明真情的大众自然以为吴祖光罪恶滔天，该打杀杀了。

“右派份子”们尽管明白自己成了毛泽东“阳谋”的牺牲品，但为免与这个掌握了自己的衣食住行的政权对抗，他们大多采取了检讨认罪以保饭碗的态度。他们的认罪书纷纷被刊登在报纸上。如费孝通、储安平、黄琪翔（黄曾批判中共学苏联的政治制度，见本书第六章）等人的检讨书被冠以“向人民伏罪”、“向人民投降”、“请求人民的宽恕”的标题，印在《人民日报》上，发到全国各地。

鸣放中，就批评毛泽东本人而言，陈铭枢的用词是最严厉的（见本书第七章）。如今为了能继续从共产党那里领饭票，他不得不在《人民日报》上公布《自我检讨》：“我一生的历史都是丑恶的……我是一个狂妄自大的野心家……”（注26：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吴祖光被指为文艺界“一个方面军的总指挥”，不得不将对他的批判、扣上他脑袋的罪名照单接收，痛斥自己“十足的反动思想”，承认自己是“阴险的、丑恶的、狡猾的”、“最丑最脏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典型”。不过，由于他“不交代具体事实”，左派贺敬之（时为作协理事）在批判他的大会上代表党宣布“他还没有决心向人民投降”，还没有“揭露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暗的内心世界”。（注27：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其实，投不投降并无区别，反正不久后他便被送到黑龙江北大荒的劳改营去了。

但是，那些学者名流们的脊梁并非全都是稻草做的。他们一方面被迫检讨，另一方面又在明讽暗喻，攻击中共。譬如罗隆基的“交代”于七月十六日登在《人民日报》上，他一方面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表示“羞愧无以自容”、“愿意以今天之我来同昨天之我斗争”，但他并不给自己乱栽赃。他是这样“认罪”的：关于肃反，我主张“不由原来弄错了的机关来宣布平反，却另外组一个委员会来进行平反……这就破坏了国家的政治体制，……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一点。”“我没有懂得反对下级党的领导就是反党，……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二点。”所以，明眼人都看得出，他并不认为自己有罪可认。

龙云也是如此，他的“书面检讨”是这样写的：“由于忝居高位，脱离实际，兼之血压过高，容易冲动，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当面也是这样讲，背后也是这样说。”关于他攻击苏联战后拆走了东北工厂一事，他为此检讨道：“那时苏联搬走机器一事，真是帮了人民的大忙，不留给蒋介石利用它来打我们。这种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无穷的潜在作用，我意不能识别。”他说的显然是反话。关于他早先发表的“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的意见，他检讨道：“我既无远大的目光，又无磅礴的气概，只能小手小脚，小家小管，紧把细持，量入为出。”这等于是反讽中共大手大脚，乱掷人民的血汗钱。

章乃器也不是软骨头。他在七月十五日全国人大的发言名曰“我的检讨”，实为自我辩护。他用“我本来说……”，“我并没有说……”，“我没有这样说”，“这不是我说的”，将对他的指控一一驳斥，并声明“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炼金’；‘曾参杀人’，重复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意即“某些人”是在诬陷、诽谤，企图以重复的谎言欺骗世人。

自然，“伏罪”、“投降”不济事，“请求宽恕”也枉然。罗、龙、章的曲笔隐喻，更不能唤醒毛泽东们的良知，反右运动愈演愈烈，共产党那部庞大的组织机器疯狂地运转，把上百万它昨天还信誓旦旦地认作朋友的知识份子吞没了。

第十章：除异己言者有罪

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标准，凡是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的，便该“划分”为“右派份子”。（注1：《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卷第六六九页。）将此标准搬到学术界，就变成了一把砍人的斧头。

鸣放期间，除了那些早已心灰意冷的人之外，凡在一九五二年被剥夺了教席的“资产阶级”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律学的教授们大多表达了希望恢复社会学系的意见。如今中共正式给予答复了：“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在根本上说来，是反科学的。……不过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而把一些谎话加上了科学的伪装。……普通的工人农民的常识也要比它有价值得多。”“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打开复辟的道路也就是为了资本主义打开复辟的道路。”（注2：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胡绳，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这样，凡主张恢复社会学系的，几乎全都成了右派。

譬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景汉说过：“社会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社会上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研究分析这些关系，提出解决的办法来，则有赖于精确深入的调查。”“中国社会学者一向是最重视实际调查和研究的。”这番话被定为欲以资产阶级社会学“篡夺整个马列主义阵地”，（注3：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所以他是个右派。由于他还留过美，便成了“美帝国主义一手豢养起来的”“奴才”。（注4：同注三。）

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沈志远在整风时批评“国家资料保密制度太严、太广、太死，以至经济学者无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有些外贸资料在外国杂志上发表了，而我国经济学者反而看不到。只对中国人保密，对外国人却不保密。”他被公开批判为“为反革命份子破坏国家机密敞开大门，有意破坏党的威信，反对党对经济科学工作的领导。”（注5：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批判右派份子沈志远、吴承禧在经济科学方面的反动言行》二十二至二十三页。）

沈还对大批旧中国的经济界人才被积压、浪费，未获新政府使用的情况提出呼吁：“开放聘用人才的自由市场”，让这些人有机会归队，重新发挥其经济专长。当局对他的回答是：那些投闲置散的“都是一些没有很好改造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人”，沈主张聘用他们是“为了招兵买马”，“为了恢复资产阶级经济学，从而为恢复资本主义制度铺平道路”。（注6：同注5，二十四至二十五页。）

沈志远是什么人？他为什么想要“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个“五四”运动时代的积极份子，一九二六年被中共派到苏联学习，一九三一年归国后即以全副精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的《新经济学大纲》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著，二十年间印刷十八版，曾帮助无数青年知识份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早在一九三九年，中共军政界要人罗瑞卿就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写文章，建议中共军队干部读沈氏所译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沈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后虽脱党，却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者。只因上述言论，他成了当然的反动派，立时被打倒。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振汉曾这样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自由比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民主自由要广，因为资产阶级国家还允许共产党存在，有出版言论自由，我们却不是这样。”（注7：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沈志远的遭遇就是个辅证。

北大经济系的三位教授陈振汉、徐毓旂、罗志如，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巫宝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副校长宁嘉风，邮电部副部长谷春帆等六位经济专家，在鸣放中联名起草了一份《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但文章正在学者中传阅时，反右已开始，结果未及发表就成了“经济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

这篇被说成对党“进行了凶恶的攻击和污蔑”的文章，大致内容是：“我们的财经政策和设施，不少是盲目地搬

用苏联成例，……碰碰试试，主观主义，盲目行事，并未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规律可资遵循。”“事实上我们目前的经济科学还是停滞在相当幼稚的阶段，除了教条的搬运苏联教科书的一些东西而外，就是一些现行制度的描述。”“多数经济学家只是替政府宣传解释政策。”“科学总是说明因果关系的，而现在只是些语录。规律应为二者之间的关系，而现在规律只是斯大林的语录。”“许多经典著作（指马克思著作——引者注）写作于百年以前，对于百年来的事物只能预见其大，不能洞烛几微。”

若说“凶恶的攻击”，大约是指作者认为“我们不能从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和四海皆准的规律”，因而主张是“敝屣就要摒弃”！（注8：同注7。）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共从来是不允许“争鸣”的。所以某些执政者一点名，六位专家就一起成了右派。其实就在一个多月前，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还对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说：“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灵活多样，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呢？”（注9：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刘少奇对杨献珍、候维煜的谈话。）他显然看出了根据马克思主义搞计划经济的毛病，因而应当容忍那六位学者对马列主义的“攻击”，应当允许更多的经济学家就此展开讨论。可是他没有那样做。他和别的中共领导人一样，听任这批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落了网。

那么学术研究还要不要呢？当然要，党还号召“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呢。

可是问题没这么简单。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宣布：“学术研究是一回事，假借学术研究的名义，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又是一回事。这中间有一条明显的界线，这条界线是绝对不能混淆的。”（注10：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至于谁个踩线，谁个反共，那裁判权就全归党了。

历史学界就是这样。除了翦伯赞、吴（口含）等党员学者之外，著名的历史学家大多成了右派。因为“史学界的右派份子……所进行的活动，实质上不是学术活动，而是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活动的一部份，不是学术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是为了……替资本主义复辟铺平道路。”（注11：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翦伯赞《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中共创始人、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写过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他本人在北洋军阀的绞刑架前结束了光辉的一生（据说那是中国第一次使用从国外引进的设备，宣告野蛮的砍头时代的终结）。作为其事业继承者的中共五十年代的领导人，竟然没有一个担当道义，出来制止任意摧残知识份子的野蛮行为，诚为可叹。

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韩德培于二次大战结束后自美国归来。在离开哈佛大学前，他对朋友说：“当年陈独秀先生首先提出打破北洋军阀专制主义的‘特人权治’，主张‘尊重民权、法治、平等精神’；李大钊也曾提出‘国之存也，存于法。……国而一日离于法，则丧厥权威’。”于是他得出结论：“我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建设法制强国希望在他们。”

国共内战期间，武汉大学进步学生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韩德培作为教授会的代表走进汉口警备司令部，引用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典为被捕学生辩护，胜了武大法律系毕业的特讯庭长。之后他暗地对获释的学生说：“到解放区去吧！”

可是，全国都成了解放区之后，统治党的对法治毫无兴趣的毛泽东，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再以“建设法制强国”为已任了。韩教授鼓吹法治，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扣上“利用法律武器和党对抗”的罪名，成了武汉大学四百八十多名右派份子中的一员。

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是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时与会的十二名代表之一，以后脱离政治，研究哲学，因此他在学校也是有职无权的角色。他在反右前对因受制于党委书记而萌生去意的韩德培说：“我在这里当校长，你怕什么呢？”李达为武大留住了一名人才，却未能予以保护，以至他在文革中被整死。弥留之际还后悔自己挽留了韩氏，说：“我不放他走……是我害了他。”其实韩教授即使离开了武大去北大（他已得到北京大学的聘书），也未必就能逃

过这一劫。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虽说自己是留学十年的知识份子，也因“反右不力”而被降职，调到兰州大学去，但他也在北大抓了数百名右派。即使江氏不抓韩德培，其后的陆平大概也不会放过他。一言以蔽之，当时主张法律治国的专家们躲过右派帽子的实在没有几个。

武汉大学法律系因为成了“右派窝”，也终于被撤销了。教授们被送到关押犯人的湖北沙洋劳改农场，教宪法的喂猪，教民法的剃头，教列法的烧法，教法理的放牛。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地下有知，一定会痛斥毛泽东“背叛本党宗旨”。

牵涉到另一批专家的是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

一九四五年春，抗战即将结束，国民党政府的社会部召集了一批国内对人口问题有研究的专家，在陪都重庆开了个为期两周的人口政策讨论会。会议的总结性结论是：中日战争结束，社会秩序恢复，政府得以从事经济建设时，中央政策应立即采取一个节制生育与减弱人口繁殖的政策，以避免造成国家建设的莫大障碍。（注12：李树青，《明报》月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第二至三页。）国民党政府自有其种种不是，但就这一件事而言，我们可以知道国府内自有明白治国之道的人。他们能尊重、采纳专家学者的意见，亦可称为有识之士。战后由于中共已有实力占据一方，正伺机南下，夺取全国政权，而蒋介石却以为可以用武力吃掉中共，引发三年内战，那个拟议中的人口政策未能推行。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于一九五四年底也召开了人口座谈会，再行谈论人口问题。北大校长马寅初及十年前重庆会议的参加者、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等参加了讨论。几位专家的意见都是必须从速控制人口。为此马寅初写了篇《新人口论》（主要观点是“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我国人口增殖太快”），吴景超写了篇《中国人口问题新论》，一九五六年刊登于《人民日报》。翌年吴氏又写了篇《展开人口问题的研究》。

其实，到了一九五七年，中国人口已达六亿五千万，约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问题已十分严重，早已不应停留在研究上，而已经到了必须立即行动、着手控制的时候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陆钦范忧心如焚，写了本《人口问题抛砖集》，自己掏钱印了一万份，送给全国人大，希望来自全国的代表认真将人口问题作为议题。他的文章并有政击中共，他只是为农村中由于人口过剩，人力比畜力还廉价，以至于“人代牲口拉犁，可悲地压低劳动生产率”的现状担忧。他怕因人口爆炸、生存空间不足而引致“比匈牙利事件更大的骚乱”，但共产党却说他“伪造‘人口问题紧张’的空气……企图掀起‘匈牙利事件’……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注13：一九五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给了他一顶右派帽子。

毛泽东虽然说过政府要有“计划生育部”，但从没有认真把这当作一回事。当时，占据他头脑中心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早晚要打起来，因此人多不吃亏的思想便左右了他。一九五八年谈到战争时，毛曾经这样说：“原子弹（战争）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九亿人口剩九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注14：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对这样一个居然希望用二十亿人的生命去换取所谓的“资本主义全部消灭”的人，人们如何能指望他控制人口的过速增长？

此外，毛泽东从农村来，靠小米加步枪取得天下，对西方近代的发展不了解，也鄙于去了解。他看不出当时世界已经显示科技发展将剧烈改变社会结构的迹象，思想仍然停留在斧头、镰刀的时代，又一贯鄙薄脑力劳动者，自然就为“人多好办事”的思想所左右。他不把控制人口当作一回事，这一点从一九四九年他批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时所写的文字可看出来：“中国人口广大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斥。”（注1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〇〇至一四〇一页。）

革命和执政是大不相同的。毛以革命家的气概说出上述豪言壮语，却无意以执政者的身份研究人口与生产的关系。他坚信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而竭力主张节制人口、渲染人口膨胀的危险，无疑是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怀疑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所以，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吴景超在反右初期未曾料到自己也会被共产党视作敌人，便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的全国人大会上发言，批判已被揪出的右派葛佩琦等人：“如果有人想推翻共产党，工农群众就会拿起铁锤、会起锄头来与他拚命。”他以为自己与共产党同一条心，但共产党却不认为他是自己人，很快就将斗争目标转到了他的身上。

吴景超是六月六日民盟六教授座谈会的参加者之一，与其他五人一起被划为右派，其罪名有“鼓吹马尔萨斯人口学说”，“企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提倡大学教授聘任制，不受政府委派”等。毛泽东点名骂他：“他们读马列主义比我们多，但读不进去，懂不了。如吴景超，一有机会就反马克思主义。”（注16：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的讲话。）

回想九个月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的国庆宴会上，周恩来特别邀请吴景超坐到首席桌，与政府高级官员一同进餐。现在，他突然被宣布为“大右派”，全国从南到北，无数广播喇叭一致声讨，如同从天堂堕入地狱，个中滋味，他人实无从体会。

一九五一年，吴景超受新政府之邀，到广西参加土地改革。他看到农民受苦的情形，深受感动，临时时把全部行李衣物都送给了当地农民，只身返回北京。这样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硕学鸿儒，不明不白地成了毛氏“阳谋”的牺牲品，虽未被送往农场，但降级、降薪，从此失去了教书的权利。那没完没了的检讨、批判，无休止地折磨、纠缠着他，直到他在文革中被抄家、斗争，郁郁去世。

另一位主张节制人口的主要鼓吹者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他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控制人口的问题时，毛泽东正在鼓动鸣放，因此当天便表赞同：“这一条，马寅老讲得很好。今天讲得好哇！我跟他同志！”（注17：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这样，反右初期的火并没有烧到他身上，他的《新人口论》还能于七月初发表。马寅初自己对中共反右一度也是积极支持的，但不久他就成了问题人物。不过中央统战部向周恩来请示是否应将他划为右派份子时，周保了他，说：“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于是他有惊无险地过了这一关。

但日子没有安稳几天，马氏就成了全国的批判对象，各种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竟达一百六十多篇。北大校园内在党委策划下，共贴出九千多张大字报对马老加以围剿，说马“借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妄图搞垮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复辟”。（注18：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康生在北大作报告时睨视着边上的马寅初，阴阳怪气地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马寅初是一个既具有西洋学者维护真理的精神，又秉赋了中国士大夫犯颜直谏传统的文人。当局的有组织围攻没有使他屈服。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他交给《新建设》杂志社一篇《重申我的请求》的文稿，在文中声明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他还贴了一张纸在北大的食堂里，声明自己将在那里当众发表演讲，表明自己的观点。三天后，他的稿子落到康生手中，康即宣布他“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北大党委书记陆平遵命，立即发动全校对马寅初实行大字报围攻，并匆匆解除了他的北大校长职务，同时将他定为“内控右派”。“内控”即“内部控制”。共产党内部将此人定为右派，但不公开宣布，除了极少几个校党委首脑，人人都被蒙在鼓里。

毛泽东将胡风所说的“与论一律”篡改为“不许反革命份子发表反革命意见”，真是威力无边。马寅初这样的“右派”再也找不到一家报刊、杂志发表他的一个字了。他只能痛苦地在家里说：“我如有一块阵地多好哇！”

马寅初长寿，在毛死后以九十多岁的高龄看到了这场争论的胜利，而吴景超却没有能等到这天。作为一个学者，挨批挨斗总还是个人小不幸，而其正确的人口主张得不到推行却是中华民族极大不幸。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吴氏与其社会学、人口学同行在重庆制订人口政策时，没有想到战后又来了个内战，推迟了政策的执行，更没有料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环境中，又因为执政者的无知和专横而推迟了二十多年。今天被公认的事实是：错批了一个马寅初，多出了三亿人口。这三亿人口成了中国的沉重负担，今后十代、八代的子孙都要为此付出代价。

荒唐的是，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一九八三年）中国大陆曾隆重办了个“学习毛泽东人口思想”的座谈会，郑重其事地表示要“坚持”“毛泽东人口思想”，理由是“计划生育是毛泽东同志人口思想的核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创举”。与会者一致称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口问题方面的贡献”，说毛“对中国要实行计划生育的态度是明确的、正确的”：“把毛泽东同志同马寅初对立起来”，“是不符历史事实的”。（注19：《人口研究》一九八四年一月号第五至七页。）

的确，毛泽东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过不少议论。譬如，“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十六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搞不好。”（注20：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谈话纪录。）但那都是空话，作为一个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主席，他没有提出一个办法，反倒在中国最孚众望的两个人口学专家呼吁节制人口时，将一个打成右派，一个打成“内控右派”，撤职冷藏。如果说毛氏在人口问题上真有什么“创举”的话，那倒可以算作一条。

在与论一律的中国大陆，我们能听到的只是一片“坚持”声。不过，那些喜欢一家独鸣的理论家们都没有本事掩盖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一九五八年毛泽东策动“大跃进”时曾说：“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实际人口到七亿五至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注21：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陶鲁笏发言时的插话。）“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什么办法。只要办法对头，再有十亿人也好办。”（注22：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十几年后，中国人口已经超过八亿了，他却又高喊“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沉浸在斗人整人的无穷乐趣中，“控制”一词早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中国的人口问题严重至此，罪魁祸首正是毛泽东。

按照当时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说法：“右派份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注23：一九五七年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所以除了大学之外，凡是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右派便一堆一堆地抓。出版界就是一个典型。

在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章伯钧以中共提出“互相监督、长期共存”为由，说：“互相监督要广开言论之路，这就要有园地，要有地方出版。”因此他提议由“知识份子组织出版社”，并“由国家货款来扶持”。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曾产修鉴于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垄断出版审批大权，主张撤销这个局，并说：“把这个局砍掉，中国不会亡”。五月间，不少作家和编辑提出了办“同人出版社”（由作家、编辑自行结合搞出版）的主张。其中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蓝钰还主张撤销出版局后，“成立出版协会，作为出版界群众性的组织，也就是让出版界自己管自己的事。”（注24：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他不赞成出版业“一切只有国家的”，主张国营和私营的出版社并存、竞争。

到了六月，中共大举抓右派，凡是赞同此一观点的无一逃脱。中共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国家宪法规定每个中国公民都有言论出版自由……但是对于反对社会主义、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自由，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右派份子要改变出版事业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倡大办‘同人出版社’，就是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他们是为着夺取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注25：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由于这个逻辑，中国出版界的编辑遭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大规模迫害。

贵州人民出版社钱革等七名编辑，因筹划办一个名为《文学青年》的杂志，与官办的期刊《山花》唱对台戏，全被打成右派，罪名是“积极准备出版反动刊物”。（注26：一九五七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

青海省文联、《青海日报》的一些人，提出将官方的《青海湖》杂志“自由结社化”的改组方案，并打算如改组不成，便自筹资金办《夜莺之友》。这二十余人被定为“妄想文艺界造反”，全都成了右派。（注27：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出版业学习苏联，出版、印刷、发行三家独立，但有些人主张恢复过去的做法，三位一体，联合经营。孰优孰劣，本非政治问题，但现在“在出版方面要不要学苏联”，成了“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当局宣布，“我们说首先要向苏联学习，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右派份子说，不要向苏联学习，因为苏联的‘机构和制度都是落后的’，苏联什么都没有，只有教条主义。”（注28：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所以，凡主张出版、印刷、发行联合营业的人便都是右派。

其实，这些文化人应当知道《新民报》是怎样在中共执政后从中国消失的，绝不当对独立办刊物抱有任何幻想，一听说中共答应给自由就昏了头。所以他们成为右派，说不该也真该。

一九二九年，四川人陈铭德创办了《新民报》。一九三二年，也是四川人的邓季惺女士大学毕业，加入《新民报》，为妇女版编辑。第二年，陈、邓结婚，双双通力办报，逐渐将该报办成全国有影响的大报。至一九四五年，已同时发行上海版、南京版、北平版、重庆版、成都版。一九四八年冬，政治上亲共的二人拒绝国民党政府迁该报去台湾或开辟台湾版的意见，匿往香港，不久到了中共治下的北京。中共待二人甚为友善，但对其报纸却毫不客气。北京版《新民报》被并入中共北京市委的报纸《北京日报》，上海版《新民报》成为《新民晚报》，其余各版均被党报接收。陈、邓二人丢了报纸却没有丢饭碗，陈被任命为北京市社会福利事业局副局长，邓被派了个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的位子。虽说两个位子都是闲差，与报纸风马牛不相及，但二人都不抗议，所以《新民报》是在和平的气氛中消失的。可惜陈、邓二人在鸣放期间了点牢骚，邓说自己有职无权，“局内的好多事情往往是报纸上发表了才知道……我好像成了不劳而食的剥削者”（注29：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转引自陈权《鸣放选萃》第二册第二一七页。）结果二人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当时陈六十、邓五十，要是鸣放时不吱声，再当上十年太平局长本来是不成问题的。

除了报刊杂志，不管何种专业，只要一帮专业人士凑在一起想做点发展本行的事，就是反党。这是一九五七年中共的逻辑。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讲师李畅、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演出队队长赵森林、总政治部歌舞团舞台设计师刘世彩谋划成立一个“舞台美术设计公司”，因而被指为“企图这样来篡夺舞台美术界的领导权，脱离党的领导”，成了“右派小集团”。而李畅在这罪名之外另有一罪：“李畅是大汉奸李鸿章的后代。”（注30：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工程技术界人士一向不为新闻重视，连姓名亦很少为世人提及。如安徽人盛德纯，二十年代起即从事公路工程，三十年代起任安徽水利局局长，四十年代主持修复长江大堤安徽段，一九五二年起任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编写成《安徽水利志》。又如浙江人励润生，早年毕业于北洋工学院，在美国留学、工作后，于一九四六年归来，在前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一九四九年，资源委员会迁台湾，他坚留上海，旋赴云南，为云南铜业公司及东川矿务局副总工程师，长年在矿山工作，著有《金属矿的通风研究》等。像盛、励这样勤勤恳恳地为国为民奔波了大半生的学者，不知有多少上了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名单。（注31：盛、励二人事迹见一九八八年版安徽《全椒县志》第六七〇页及浙江《象山县志》第六三二页。）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批农业专家，如柑橘专家、华南农学院教授林孔湘，西南农学院家蚕育种专家蒋同庆教授（中国第一部家蚕遗传专著《蚕体遗传学》的作者），甘薯专家、科学院薯类研究所副研究员盛家廉，以及专研究生大豆的徐豹等，都是右派。

北京大学新闻系女学生林昭被划右派后，不甘受辱，决定以死抗争。但由于发现及时，经抢救，未能如愿。（不过，她以后还是被枪毙了。）

林昭自杀获救后，曾质问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北大早期校长）当年曾慨然向北洋军阀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呢？”林昭的质问自有其道理，但校长却也有他的难处。当年蔡元培没有“阶级”负担，他只是向当局交涉，抢救青年学子，不必担心当局给自己按上什么罪名。现在情形不同了，右派学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不是用“迷途羔羊”掩饰一番，教训几句就混得过去的。当年的北洋军阀当局，不看僧面看佛面，对蔡元培那样的学者毕竟要退让三分，蔡的保释才能成功。不仅蔡这样做，四十年代国共内战时北大校长胡适也常为保释被捕的学生张罗，而且找过国民党要人李宗仁，请他运用影响力使学生获得自由。

同共产党相比，国民党对高级知识份子要尊重得多。一九三六年二月，国民党在北平对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领导人按名单抓人，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姚依林躲进冯友兰教授家中。军警查到冯家，客气地问：“有没有学生躲在屋子里？”冯答没有，军警未加搜查便离开了。姚逃过这场搜捕，终至贵为中共五人核心之一、政府副总理，恐怕多少与国民党尊重教授有点关系。

中共执政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别说大学教授，就是大学校长，也是动辄得咎。在得了天下的新政要们的眼中，他们从未有过蔡元培那样的地位。肃反时大学生们数以百计地被无理关押审查，他们无一去向政府（掌实权的党委书记们）交涉。即使鼓足勇气去与政府当局交涉，也无成功的可能。如今抓右派份子，连大学教授都纷纷落网，还会有谁去救学生？更何况大学校长自己还免不了中箭落马呢？

武汉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就是一个例子。马是湖北省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曾一度加入中共。他的“反党言行”主要是：“高等学校因为有了党委制，才产生了许多问题。在学校、工厂要取消党委制。”（注32：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被说成是章伯钧的农工民主党的“骨干份子”、“医药界统帅”，“从章伯钧手中接受圣旨兵符”，定为右派。

贵阳医学院院长张舒麟，因“好几次诬蔑肃反是‘惨无人道、丧尽天良’”，又企图“独霸”学院，“违抗省卫生厅的领导”，戴上了右派帽子。（注33：李宗恩、张舒麟二人“言行”，均见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河南农学院院长吴绍（马癸），因为批评河南党政领导“把群众路线当成灵丹妙药，认为知识份子的科学放狗屁”，也就被那些“党政领导”们定为右派份子了。

中南矿冶学院院长陈新民，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一九五四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当了两年教授。五六年成立中南矿冶学院，中共请他去当院长，应当说是重用这位专家的。但中共并不欢迎他过问政治，而他却偏偏要对政治发表意见。他给《新湖南报》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共办别是非的标准是“唯经典论”、“唯苏联论”、“唯成份论”、“唯鬼神论”，他被称为“要和共产党争权夺势”，成了右派在学院的“代理人”。（注34：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人民日报》。）

至于打成右派的大学副校长，那就多了。不可能一一列举，今仅在此列举数位：山东大学副校长陆侃如，东北工学院副院长张立吾，河南医学院副院长张静吾。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高觉敷，四川财经学院副院长曾庶凡，甘肃工业大学副校长王佑民等。

所以，不管是教授还是什么名牌大学的校长，中共抓起人来是绝不手软的。北洋军阀、国民党实难望其项背。不仅大学校长，教育部内的党外人士也成了清洗对象。

教育部一位司长级女干部陈霭民（前述陈新民之妹），早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时就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多年来一直支持共产党。成为右派后，她被送到东北边陲的北大荒劳改营去了。

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伦放弃在世界一流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机会，一九二六年回国，先后任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化学系系主任。他是我国实验化学的奠基人，是中国学术界公认的最杰出的人才之一。他于一夜之间成为右派，被撤了部长职务。只是由于其声望太高，中共未将他送去劳改。

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说了如下一段话：“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门有什么用？”（注3 5：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这当然是“右派言论”。再加上六月一日储安平作了那个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后，林汉达在会下对人说过“今天的发言储安平最好”，反右中那人将此话揭发出来，林就逃不脱戴右派帽子的厄运了。

林汉达原是燕京大学教授，又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他们的民主促进会在共产党的专政机器面前只是一个民主摆设，当林被中共宣布为反党敌人时，除了喊几声“坚决拥护”外，就只有闭嘴的份了。

另一位教育副部长柳（水是）也在那时被称为“右派”而罹了难。

所以林昭实在不应当质问校长。校长、部长，谁也无力搭救学生。他们能自保就已经不容易了。

第十二章：挖“右派”全国搜索

由于毛泽东在七月间号召“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劲”，（注1：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全国便在“挖”字上大做文章，将无数善良的人投入了冤狱。

譬如辽宁省铜铅锌矿务局工程师潘宝信，成了右派后被当局宣称是“深掘深挖”、从“地洞”里抓出来的，因为他“过去是个“先进工作者”，大鸣大放也没有发什么言，已被揭露，原来他是个阴毒的家伙。”（注2：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北方辽宁省从“地洞”里挖右派大有斩获，南方广东省也不落后。广东省委书记区梦觉在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上发文，号召采用广东农民冬天从地洞里挖田鸡（青蛙）的办法，把潜藏的右派挖出来。所谓“潜藏”的，就是不说话、未鸣放过的，党组织根据你的家庭出身、以往向党靠拢的程度，就可以判断你必定是右派，与有“反党言论”的同等处置。广东省右派数目超过全国各省平均数，（注3：一九九一年版《当代中国的广东》第一编第一四四页：“错划右派份子三万余人”，但实际应当不止。）大约多少拜这种“挖地洞”的新技术所赐。

新华通讯社在一九五七年的八月八日报道说：右派份子们正“一个一个地从各行各业中搜索出来”。这“搜索”二字真是形象而又准确。有一天，四川自贡市川剧团党组织接到了上海一家报纸退回的为四川诗人流沙河鸣不平的稿子，立即着手追查（文章用了笔名），结果“搜索”出了一位年仅十六岁的魏明伦。魏认为官方对诗人的批判无“坚实的内容，正当的道理”，“这种‘声讨’，也仅仅是‘声讨’而已！”当然魏就是个右派。但他才十六岁，未成年，于是党作了个英明的决定：不戴帽子，批判一番，下放农村。那个九岁登台演戏，十三岁开始在报纸、期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剧评的天才少年便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又一牺牲品。（注4：上海《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八期第五十九页。）

不过，将稿件退回作者的工作部门，供党委去“搜索”，这并不是报纸、期刊的编辑、记者们做的事，因为他们本人就是被“搜索”的对象。凡是采访了鸣放者，写了报道的，只要那鸣放者成了右派，记者也就逃不脱。即使是笼统地报道了某处的“鸣放”，而党认为那鸣放属于“放毒”，鸣放者自然逃不脱，记者或编辑也是右派无疑。

如《光明日报》记者殷毅奉派到东北沈阳采访，写了一篇报道东北工学院鸣放的通讯《第一朵迎春花》，刊于五月二十四日的《光明日报》。过了两个月，他报道过的那些鸣放者被定为“以民盟右派为核心的反党集团”，他也就因为将其赞扬为“迎春花”而成了右派。《文汇报》记者范琰采访四川诗人流沙河，写了一篇报道。不久，流沙河入网，范的报道被指为“歪曲事实，充满恶毒攻击”，也戴上了帽子。

当然，采访过右派鸣放者的记者不都是右派。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教授王泽汉在《人民日报》号召反击右派后，突然受到《黑龙江日报》记者的采访。记者将采访记录整理成文，未经王本人过目，第二天便见了报。根据记者写下的王的言论，王被定为哈工大第一号右派，而那位记者却平安无事。二十二年后，王教授找到当年那位记者，想要弄清真相。记者坦率相告，上面交给他采访的任务，目的本是为制造出一个右派来，以推动反右斗争。因为王是“九三学社”哈工大支部的负责人，又参加过国民党，故被选中。记者奉命行事，当然不会因为报道右派的言论而入罪了。

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在毛泽东骂他“死人办报”，“按兵不动”，“无动于衷”，“占着茅坑不拉屎”时，头脑十分冷静，警告其下属道：“不要锣鼓一响就出来。”结果该报社右派不算太多。为此，邓拓感到欣慰：“现在看来，当初按兵不动还是对的。”而鸣放期间被毛泽东夸奖“放得好”的上海《文汇报》，百人左右的编辑部有三十多人落了网。其中文化副刊的主编黄嘉音是中共执政前颇有影响的《西风》杂志的编辑，因学识渊博被《文汇报》社长徐铸成请去兼职。他当然成了右派，其右派言论有“咒骂‘人事档案是一堵墙’，主张‘开放人才自由市场’”，“认为‘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地位应该一致’”，等等。（注5：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文汇报》。）

黄嘉音绝不可能是反共份子。据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回忆：一九三七年前后，华是上海一家银行的小职员，内心彷徨苦闷，黄给了他一本斯诺的《西行漫记》，使他开始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一九三八年，华瞒着家人、同事离沪北上，去寻找共产党，登轮启程时，唯一的送行者就是黄和他的女友。（注6：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然而，黄嘉音这名共产党的追随者最后却死在共产党的冤狱中。

狱中传出的消息说，黄嘉音是被枪毙的，罪名是“蓄意杀人”。由于中共一贯将政治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任刑事犯欺凌，而刑事犯也乐于以虐待政治犯为乐，并以此向当局献媚，黄在狱中总是受流氓犯的气。有一次吃饭时，一个流氓又欺侮他，他忍无可忍，将饭碗朝那流氓扔去，虽未击中那人，但监狱当局却说他“蓄意杀人”，“依法”杀害了他。（注7：一名当时被劳改的右派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十几名记者，只有一两名侥幸未被扣上帽子。该报驻京记者刘光华，因为报道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民主墙”，被定为右派。在批斗他时，他表示不服，遂定为“极右”，于一九五八年初春节年三十的夜里被警车带走，送东北劳改。他几年后被送农村劳动，直到一九七七年方因病获准回家治病。这时，他的母亲、因为“破坏中苏友谊”而戴上右派帽子的民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早已死在狱中有好几年了。他的父亲、著名学者刘湛恩三十年代是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因鼓吹抗日，一九三八年四月被占领上海的日军特务机关控制的汉奸帮会组织收买杀手暗杀。要是刘湛恩也活到一九五七年，谁知道他会不会同夫人、儿子一样成为中共的阶下囚。

在那一两个月“帮助党整风”的热烈气氛中，一般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一言不发。连起先声明“不跳”的北京大学潘光旦还是忍不住跳了几下，说了些“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社会学可以培养党政人才”之类的话。他被戴上帽子，就此剥夺了讲课和做研究的权利。

朱光潜教授可说是个异数，因为前几年吃足了苦头，所以整风时坚决不开口，终于逃过这一劫。沈从文则早已离开北大，钻进古文典籍之中，别人把他忘了，他也乐得不问政事，总算没当上右派。

也有一些人，譬如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为聪明或滑头，从网眼里滑了出来，躲过一劫。据马思聪二十多年后回忆，整风时，文联开会鸣放，戏剧家吴祖光发表道致自己入网的言论之后，他接着提意见。他心知共产党斗了二十八年始执党政权，决不肯与人分享，便避重就轻，只讲了自己有职无权，但正好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搞

创作；又说文艺界人士不该过份集中于京沪两地等无关痛痒的话，因此安然过关。

也有人真正一言不发而当上右派的。整风时，一贯紧跟苏联老大哥，将南斯拉夫总统、南共领导人铁托骂为“帝国主义的走狗”的中共突然一反常态，令其机关报《人民日报》用两版的篇幅刊登了铁托的一份演讲文稿。由于南共的党纲被中共批判为修正主义，所以关心政治的人就仔细阅读这份难得见到的原文。有人在铁托文章中某些他认为重要的落用笔画上了杠杠道道，竟因此而闯了祸。尽管此人再三声明他并不赞成文章的观点，也不赞成南共的纲领，但申辩最终归于无效，被按上“赞美修正主义者，丑化我国社会主义”的罪名，戴上帽子送去劳改。

一位才二十岁的小学女教师，自己亦未鸣放，只是当着其他教职员的面，念了一段报上刊登的一位民主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的文章。后来，那位民主人士成了知名的“大右派”，她也就成了小右派。她被送往农场劳改几年之后，有幸返回学校，但仍无资格教书，只能扫地洗厕所，默默渡过二十年，等到平反时已是四十岁的人了。

一位即将大学毕业的文科学生，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艾青诗的研究》，尚未发表，艾青就被打成右派点名批判，于是这位赞美艾青诗歌的学生也就倒了霉。他被下放劳动整整二十年，直到艾青平反之后才获得平反。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刚入学的新生杨万才，买了一本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许杰教授的文集，写信去请教一个问题，许回了信。因为许是位名教授，此事一度在同学间传为美谈。但没过几天，许被“揪出来”了，而且是个“大右派”，从未与许教授见过一面的杨万才也就成为“右派份子的喽啰”，被扣上一顶右派帽子，流放到新疆伊犁劳改去了。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杨万才的父亲是一个黄包车夫出身的汽车司机，真正的无产阶级。他见自己才进大学之门的儿子被“充军”到新疆，绝望地糟蹋自己，慢性自杀死去。杨母也服毒自杀了。二十九年后，杨、许一人渡尽劫波，居然还都活着。杨又给那未曾见过面的老教授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劳动、折磨、牛马不如的待遇，几次险遭不测；挖地、放羊、采石、赶车……但我坚强地要活下去，心底深处，盼望有朝一日，能雪耻清冤……”（注8：上海《收获》文学双月刊一九九〇一月号，许杰《且说说我自己》。）

大革命时代投笔从戎的中帼英雄胡兰畦，一九二九年被蒋介石电令江西省长驱逐出境。她前往欧洲，在德国加入共产党，一度在柏林的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而遭逮捕，经宋庆龄、鲁迅向德国驻上海领事抗议而获释。随后她长期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是中共一大功臣。鸣放时她并未开口，仅仅去老朋友章伯钧家看望了他，而章是头号右派，所以她也就成了右派。（章伯钧的女儿则因为不满中共对章的处置而被定为“为反动父亲翻案”，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新中国”成立后自香港回国参军的诗人公刘，是解放军总治部文化部的专业人员。肃反时他被关押，在绝望中曾把腰带勒在自己脖子上企图自杀，幸被奉命看守他的作家黄宗江救下。一九五七年他并没有参加鸣放，可是一年前发表过两首《怀古》诗，其中咏南宋诗人陆游的诗中有“昏庸当道，戕尽了男儿志气”的句子，现在被拿出来批判，说他“用这一类恶毒字眼来发泄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仇恨”。他被一封电报从西北戈壁滩召回北京时，一顶右派帽子已经为他制好，他便被送到山西省一个水库工地同别的劳改犯人一起服苦役去了。

有时候，一个人嘴虽闭着，别人还是能揣摸出他的政治态度来，于是北京大学就抓出了一些“点头右派”、“摇头右派”。谁站在大字报栏前，读后来成了右派的人写的文章，点过头而被人注意到了，反右时揭发出来，就成了“点头右派”。谁看反击右派的大字报时摇了摇头，那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是为“摇头右派”。

北京地质学院学生臧孝安，平素话就不多，鸣放期间更是沉默。沉默就可能有问题，党支部强令他交出日记本，然后从日记中找出几句话，据此将他定为右派。尝到了这个甜头，党支部便下令所有有嫌疑的人交出日记，一一定为右派。

查日记是个每试皆灵的法子。有的人信教，在日记中写了对基督教的认识，查出来就是右派。

作家王蒙的那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虽已够得上“反党”，但由于毛泽东鼓励鸣放时表过态，说是没有政治错误，便不好凭此小说将王蒙定为右派。因王蒙被迫交出了日记，当局便另从日记里寻找罪证。王的日记中

有“英国有海德公园式的民主，中国连这个也没有”一类的话，当然也就够个右派的格了。

搜查信件也是个好办法。上海《文汇报》社长徐铸成的办公桌就被撬开，信件被收去“搜索”了一番。（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的《光明日报》甚至将搜查所得的罗隆基等人的信件冠以《罗隆基反共集团的一批密信》的题目发表，作为其“罪恶活动”的证据公诸天下。自然，这技术倒不算新，早在两年前就对“胡风份子们”用过了。

由政府派往苏联留学的人应当是受党信任的，可是留苏攻读数学的曾肯成听说《人民日报》点名批判许良英“是党的徒叛”后，给国内的朋友写信说他对许会成为右派想不通。结果信里的话被党知道了，将他召回国，连批判会都不必开，就给他扣上了一顶“右派”帽子。（注9：许良英一九九三年三月给本书作者的信。）

不管怎么说，上述这些人没有言也有行。譬如胡兰畦因为探望章伯钧而获罪，公刘因为一句诗而被押去劳改。有人因为私信中一句话、日记中一个感叹而戴上帽子，这多少还算有点谱，但有的人当上右派却是连半点谱也沾不上的。

一九五四年重庆大学地质系二十岁的毕业生黄治中，主动要求到柴达木去开发戈壁滩，被分配到青海石油管理局下属的地质研究所工作。鸣放、反右时，他正在北京石油学院进修。待他结业回到戈壁滩已是五八年二月，其时反右已经结束，可是石油管理局没有完成抓右派的“指标”，便把任务往下分摊。黄所在的地质研究所也分到待抓右派份子指标一个，所领导正为此犯愁，黄回来了，于是把他叫去说：“你被划为右派了！”黄申辩道：“我一张大字报没写，一句话没说呀！”没有用处，党委已经替他准备好了结论：典型不说话的右派，从骨子里反党。

黄治中的女朋友，北京石油学院毕业的龚德尊，因为不肯揭发黄行的“罪行”，自然也是“骨子里反党”，也成了右派。黄被押送青海劳改农场，龚则被开除，遣送回原籍。当初她毕业时，学院要留她任教，她却一再要求到大西北去作个建设者，最后终于如愿。如今竟带着未来得及用上的嫁妆离开荒凉的戈壁滩，回到四川农村当上一名“五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了。青海石油管理局的党委同志个个十分高兴，因为他们不仅完成，而且超额完成了上级规定的抓右派的指标。（注10：萧复兴《柴达木传说》。）

什么叫做“从骨子里反党”？那些党委书记们未予解释。但我们知道，同秦始皇的“偶语弃市”（窃窃私语者杀头爆尸于市场示众），到汉武帝的“腹诽”（肚子里诽谤当局）者斩，是一大进步；而共产党发明的“骨子里”的“反党”则比那“肚子里”的“诽谤”又更上了一层楼。公元前一一七年，因“肚子里”的罪而被汉武帝用朱笔勾掉了脑袋的，只不过是一个“农业部长”颜异而已；但公元一九五七年因“骨子里”的罪而蒙难的，就以成千上万论了。

有了“从骨子里反党”的右派，有了“阴毒的家伙”，各级党的干部们的官就好当了。他们要做的只是先将本部门职工总数乘以百分之五，得出数字，再将自己管辖的人员按不可靠程度排队，在旧政府里做过一点事的首当其冲，其次是以往运动中整过一通的或海外归来的，最后是平时不那么听话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等等）；排完队，将前若干名划出来，任务就顺利完成了。当然也有不乘百分之五而乘百分之六、七、八、九、十的，那成绩就更辉煌了。如广州市工商界于一九五六年交出企业、资产的原资本家有一万人左右，一千二百多名成为右派，超过百分之十。（注11：见香港自联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鸣放回忆》中《广州工商界万人争鸣记》。）

著名作曲家、上海民乐团团长陈歌辛（《蔷薇蔷薇处处开》等大量歌曲的作者），一九五〇年经中共人士乔冠华（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夏衍（后来的文化部副部长）的鼓励，携全家自香港回国。韩战期间，中共动员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他变卖了金银首饰，独自捐了一架飞机，并把长子陈钢（后来以小提琴协奏曲《梁山泊与祝英台》而闻名）送上韩战前线去“保家卫国”。这样一位爱国艺术家，没说过一句反党或对党不敬的话，只因为是从香港回去的，党委排队把他排在前头，就被扣上右派帽子，押送到安徽劳改去了。他不久饿死在那里，尸骨无存。

小城市、县城、乡镇里没有多少知识份子，能找到个把就不容易了，党组织当然把他们排在名单里。河南省商城县黄柏山林场有个河南大学毕业的张培从，还是个地主家庭出身，于是县里指定他和另一名也是地主家庭出身的会计到县城去参加“鸣放”。领导对张培从说：“你可是俺县里的‘大知识’，高材生。你得带头帮助党整风，否则就是对党不。”张不明其中有诈，亦不知世上有“阳谋”一说，遂写了一张“县长不重视专家的意见”的大字报。仅此一张，这就够了。当局立即宣布：“经数月苦战，隐藏得很深的右派份子张培从终于被挖出来了！”张立即成了“右派劳改队”里的一员。一九五八年，他与另外十九名右派份子被送去修水库。因为是大跃进，没有图纸便施工，工程建到一半时，坝崩库垮，张幸得逃生，而另外十九名右派同伴与几万名农民却一齐被大水吞噬了。（注12：《中国作家》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一六六页。）

当“大知识”（念过大学的人）凑不够数的时候，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们只好到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中小学教员中寻找可以凑数的斗争对象。例如辽宁省锦西县一百五十三名右派中，百分之七十是教员；山东省庆云县一百一十四名右派中，百分之七十二是教员；吉林省延吉县一百六十九名右派中，教师和医生占了百分之九十二。（注13：一九八九年版《锦西市志》第二十九页；一九八三年版《庆云县志》第四〇八及四三四页；一九八九年版《龙井县志》第三七〇页〔吉林延吉县今已改名为龙井县〕。）

江苏邳县有个姓程的小学教员，本是前国民党将领傅作义部下一名军官。一九四九年年初，傅的军队接受中共的条件，让中共和平进北京，军队被改编、遣散，程拿了中共发的路费回到邳县，教教书，种几亩田。他本欲在乡里安居乐业，谁知天外飞来反右横祸，当地党组织为了完成“指标”，将他的名字写上凑了个数。他从此就成了“专政对象”。到了文革中，“地、富、反、坏、右”都在劫难逃，他受不了折磨，自杀了。

作家古华反右时是湘西山里的一个中学生，据他回忆：“五七年反右，学校贴了许多大字报，凡是教书教得好的老师，不论教哪一科，毫无例外成了右派。”（注14：北京《当代》文学双月刊，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二一四页。）

这里有几个例子可以为古华的话作佐证：

北京青年中学教师陶西平，曾经是一流的“北京男四中”的学生会主席。他一九五五年成为教师，五六年被评为“北京市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可是五七年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

四川荣昌县大地主家出身的知识青年林万涛，一九五〇年当东北人民政府到四川招聘青年建设边疆时，报名到了中国最北端的黑河县。他在黑河中学任高中数学教员，自一九五三年起，年年被评为模范教员。他成为右派，对前途绝望，终于在一九六四年二月的一天夜里越过冰封的黑龙江，投奔了“苏修”（苏联修正主义）。（注15：北京《当代》文学双月刊，一九八九年第五期。）

广州第十四中学老师叶非英，一直以教育为业，早在一九三二年就在福建泉州主持过平民中学，曾两次带领数十名学生到中国北方徒步旅行，考察社会。以后他到广州办新民中学。中共执政后，新民中学改为第十四中学，他担任数学教师。他没有家，没有孩子，连星期天都到学生家去为学生补课，因为工作优秀，被中共选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代表。但是反右时中共就不要他了。他被定为“右派”、“无政府主义反革命份子”，送到劳改农场。一九六二年初，他的老朋友、名作家巴金到广州，“才知道非英已经死亡。他死在劳役中。”（注16：巴金《随想录》第五集第一六四页。）

除了教员，乡镇中的医生也算是文化人，他们未必有什么“右派言论”，可是共产党已决定把一定比例的人按敌人处置，指标分配下来是非完成不可的。圈圈从文化高的人画起，医生当然就是右派，正应了“天塌下来先砸个儿高的”这句老话。

江苏青浦县，当时是全国血吸虫流行最严重的几个县之一，一位祖传了十七世的中医陈祖贤参加了当地的血吸虫病抢救队。当他正在忙于为一个个肚子鼓胀的病人医治时，上面突然通知他，他已被定为“右派份子”了。

浙江省四明山区有个留过美、在上海教过书的老知识份子，是全县唯一懂得英文的人。他当时潦倒无业，靠给人写碑帖和婚丧对联为生。一天，他为乡政府写对联，因为喝了点酒，将毛泽东说的“东风压倒西风”写成了“西风压倒东风”。他本来就是乡里唯一的文化人，这样当然也就成了乡里的“大右派”。

因为有指标，总得有人去凑足数，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事，甘肃有个县，派两个人将二十名右派押送到劳改农场去。途中有个右派逃跑了，押送的干部往县里打长途电话报告。县委领导指示：“二十个，跑了一个，不够上级给我们规定的右派指标了。就让他（另一名非干部押送者）去顶那个空缺吧。”凭这一句话，那个押送右派的人成为右派，进了劳改农场，任他怎么呼冤，也跑不脱了。（注17：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中篇小说选刊》一九九二年第五期。）

还有一种情形，与“指标”无关，而是因为别人当了右派，你也得陪着一块儿上榜。譬如知识青年李兴华，十九岁加入中，共参加解放军，建国后是天安门警卫部队的一名军官，因有文学才能，被调到《文艺学习》杂志编辑部。一九五六年秋，该杂志组织读者讨论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他是主要约稿人。王蒙成为右派之后，李自然要作检讨。但直到一九五七年底该杂志编辑部被解散时，右派名单中仍没有他。后来上级发现同一大机关中，其他部门犯有与他相似的‘错误’的人已被定为右派，要是将他放过，对别人就“不公平”。于是“平衡”一番，补上他的名字，也将他送去劳动改造了。

还有因为亲属是右派，本人受牵连的情形。兰州大学物理系批判学生何之明时，批判者手里舞着载有批判他哥何之光（湖南省青年团宣传部长）的文章的《新湖南报》说：“你哥哥都是右派，你还能不是吗？”他的厄运自此开始了，先被送下乡劳动，以后又判刑十五年，直到二十年后才回到社会上。（注18：何之明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河南省滑县的一个会计黄继亮，到北京看望弟弟后，回到单位对人说：“我弟弟是右派。他一向热心工作，他怎么会是右派？”这就够了，“为右派鸣冤”。他成了右派，被押送“劳动教养”三年。三年后送他回原籍江西吉安县城种田，不久闹起文革，吉安县“挖出”一个一万多人的“国民党组织”，黄也算一个，党支部书记将他抓到人民公社，捆绑手脚悬在屋梁上，下边用扁担拷打，直至绳子断掉，他摔下死去才罢手。（注19：黄继亮的弟弟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中国有所谓“株连九族”的传统，“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语）之后又如何？不妨以人民大学的林希翎一案为例。林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位自朝鲜战场归来的志愿军老大姐（人民大学是培养干部的学校，学生中有不少从工矿企业、政府机关和军队中调派来的干部），早先由系里的党组织指派她关心、帮助林希翎，准备发展林加入青年团。林成了右派份子，她便被说成是林的“裸姆”，也成了右派。她的未夫和弟自然同她属于一群，也是右派。他的丈夫仍是军人，在部队中当然有一群朋友，那一群十几个为中共打过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干部，就因为林希翎的“裸姆”的丈夫的朋友，统统成了右派份子。仅在北京一地，受林案牵连而戴上帽子的便有一百七十人之多。（注20：《林希翎自选集》第四十七页。）

鸣放时听了林希翎的演讲，读了她的文章的青年，有不少给她去信，表示赞同。反右初起，林天真地以为大家都是光明磊落的君子，谁也不想反党，党组织若读了那些信就会相信大家。于是她信件全部上交，请党审查。谁知这一来，党组织获得了名单，那些青年全部落网，无一幸免。《中国青年报》记者詹寰一九五六年九月致林希翎的信，也被当局作为“詹寰的反动思想”的证据而登在《人民日报》上：“看看吧，在我们周围，不是还充斥着唯唯诺诺，人云亦云，见风使舵，谄上压下之辈吗……这种现象迟早会被消灭的，我们也有责任促使它消灭死亡。”后人也许嗅不出其中的“反动”气味，但《人民日报》却就是凭此将詹寰定成了“反对党的‘勇士’”。（注21：一九五七年八月六日《人民日报》。）

祸从天降，古已有之，只不过于今为烈罢了。一九五六年，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曾发表过一篇通讯《不应开设的商店》，批评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为干部设一家不挂招牌的商店，低价供应稀缺商品的做法。虽然文章写于整风之前，与鸣放无关，但黑龙江省与哈尔滨市的父母官员们将这一年前的老账翻了出来。牵涉到

那篇文章的记者多为中共党员，与那些当权派并无不同的政治信仰。但问题是，记者认为当官的不愿与百姓同甘共苦，利用职权搞特殊化，有违社会主义原则，而当权者却认为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过是农民意识，他们有功于党，党对他们多一点照顾，既谈不上享受，也谈不上脱离群众；记者未经党的许可，擅自将党内的事向百姓公开，不仅仅是绝对平均主义在作祟，真实意图还在于破坏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

胳膊拧不过大腿，“无冕皇帝”输了那场官司。同当年延安整风时王实味因为抨击“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作了自己人的阶下囚一样，这群记者被定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不同的是，这一篇文章牵涉到《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以及《中国青年报》三家报社的三十多名记者，他们竟一个不漏地被一网打尽。如果做个文字游戏，将那篇仅上千字的报道均分一下，则每人只能摊到不足三十个字。就为了那三十个字，他们从受人尊敬的记者变成了新中国的贱民。

既然从一篇文章就可以抓出三十多个右派，各级党干部还愁完不成上级交给他们的“指标”吗？

第十三章：超“指标”贱民百万

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总书记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公布了毛泽东在七月间作的指示：“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注1：见《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即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同各省、市党委书记谈话的一些要点”。）这就为“反右运动”定下了基调。一百万右派被斗得死去活来，无数人家破人亡，缘由皆出于此。

由于中共官方正式公布的右派人数是“五十五万多”，（注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八三九页。）实有必要在此论证，为何这是个被缩小了的数字。

也许是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也许是图方便省事，中共一向爱搞数字计划，按照它的术语，叫做“指标”。肃反时因为向各省市下达计划捕人的指标，造成了无数的冤狱，许多人在整风中对此作了尖锐的批评。现在，“攻击肃反运动”的人全成了右派，当局对于按“指标”办事的做法非但不改，而且变本加厉地推行起来。

肃反时往各地下达的是捕人的总数，而反右中为了强调打击的是“一小撮人”，便换了新花招：给各部门下达该抓的右派占总人数中的百分比，再由那个部门、地区将自己的人头数乘以那个百分比，从而得到自己该抓的右派数目，作为官定的“指标”。各级党组织都按“指标”办事，上级考核下级亦按“指标”完成与否为基准。这样，中共中央就省了很多事，不必“不患寡而患不均”。

完不成指标，便是没完成党的任务，那是不行的。刚好百分之五，那是勉强完成，还是“不积极”，“反右不力”。例如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抓了百分之六点五，却还是“反右不力”，下了台。直到陆平去主事，抓到百分之十才住手。

所以各级党组织的干部们为了向党献忠心，求取立新功，往往超额完成任务。譬如中国人民大学六千多学生，第一批就抓了四百多名右派，超出北京的父母官（市长）彭真定的百分之五的指标一大截。人民大学的著名“右派”林希翎第一次漏了网，只因她提出“反右运动扩大化了”的意见，被认为是“继续放毒”、“坚持反动立场”、“攻击反右运动”，入了第二批名单。当时，校长吴玉章并不赞成将林划为右派。吴本为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虽然三十年代就到了延安，被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尊为革命元勋，但他在人民大学亦属有职无权，学校完全控制在党委手中，因此他对林希翎也爱莫能助，无从搭救。他对林的右派帽子故意“视而不见”。学校开学典礼，别人为他准备的报告稿中点了十几名右派的名。他在念稿子时跳过林的名字不念，算是公开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各地的干部都愿多抓几个，谁也不愿用一个“百分之五”框住自己。例如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这样说过：“复旦大学六百多个教师中……右派只占百分之八点五。”（注3：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柯庆施在中共上

海市委一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要是再加上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补充的右派,必定超出了百分之十。吉林省的各高等院校,一九五七年七月初讲师以上的教员已有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五被定为右派。(注4:数字源自吉林省委关于高校反右斗争的报告,中共中央七月七日转发。见丛进着《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六十页。)至反右结束时应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

北京地质学院五千多学生,百分之九是右派;一千余名教师、教授,右派占了百分之十二。(注5:该校右派学生吴宏达平反后访问母校时得到的数字。吴告诉了本书作者。)

甘肃兰州大学右派总数不详,仅知物理系二年级(一九五六年入学)一百五十名学生中,近四分之一是右派;其中一个班三十人,八名是右派。

鸣放期间兰大赴京请愿代表团的十二名成员,除了一名因“揭发”他人而“将功赎罪”未定为右派外,全戴上了帽子。这些人都是各系学生中的优秀份子,如物理系学生苗庆久是该系青年团的总支(部)副书记,深受同学信赖才当代表的,结果被送下乡劳动改造,以后又因“反革命”罪入狱,坐了二十年牢。

不仅学生代表入网,连同情学生、受兰大党委委托陪同代表团一起赴京的副校长陈时伟教授也被“揪出来”了。陈不久被送去劳改,饿死在武威黄羊河农场。(注6:兰州大学的情况源于物理系右派学生何之明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其余各大学的右派人数均在数百名上下。譬如武汉大学抓了四百八十多名,其中中文系三年级有个班,因学生中的“右派头子”吴开斌在该班的缘故,三十三人中有二十九人成了右派。(注7: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上海交通大学抓了三百多名。福建师范大学有三千多学生,一下子抓出四百多名右派,而在最初的批斗风暴中,有十多人不堪凌辱,以死抗争,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后人也许会奇怪,哪里会有那么多学生出来攻击共产党?或者会纳闷,即使以言定罪,也必要先有了“言论”才行。果真有那么多学生出来攻击共产党?或者会纳闷,即使以言定罪,也必要先有了“言论”才行。果真有那么多学生参加了“右派大合唱”吗?为说明这一点,不妨举个例子:清华大学有个学生,父亲是国务院某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所以算是出身于清白家庭,与共产党无冤无仇。他本人积极拥护党,还是个学生干部。反右时他听党的话,积极写大家报批判右派学生。不幸他的大字报里有“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你的看法是对的,但是……”这样的话,就证明他与被批判的右派学生有相同的思想,结果他也遭了劫。(注8:源于当事者的同学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清华大学还有个学生张德寰,因为给过几位有困难的同学几件旧衣服及几十斤粮票,而那些同学因“右派言论”成为右派,他也就被牵连,戴上帽子,被判处三年徒刑。(注9:《新观察》一九八八年第十八期,《一位工程师的命运》。)

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讲师黄继忠是一个班的班主任,曾带领二十八名学生到清华大学介绍北大的鸣放(但由于清华党委事先组织了学生在会场上起哄、嘘叫,会开了个头就散了。)北京市市长彭真下令:“黄继忠是北京高校第一个带学生出校门的,应该严惩。”于是黄成为“极右份子”,他班上二十四名学生三分之二成了右派。鸣放时,该班一位学生时荣章曾打电话到中共中央,要求向毛泽东汇报北大的运动。获准后,以他为首的十个同学,外加黄继忠老师,于五月二十七(八?)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虽未能见到毛本人,却向称为毛的“办公室主任”的人物鸣放了一通。过了十天,毛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反右,这十一名荣幸进入中南海重地的小人物一个也没逃脱。黄继忠和时荣章一对师生成为了河北清河劳改农场的难友。(注10:源于当事者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就被毛泽东抛出来,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祭品。历尽磨难之后,他竟然活了下来。文革后他对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整死一事发表了一通感慨,说“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不行啊!”说完眼泪夺眶而出。(注11:《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二卷第三十五页。)这个看

法固然很对，但他对于把几百名北大学生送去劳改一事，似乎并没有足够的反省。

当时物理系的学生似乎格外活跃，右派也格外多。北大全校的右派学生，物理系几占三分之一。由于一九五二年中共学习苏联，理、工科分校，清华的文科、理科并到北大，当时又还没有与清华、北大鼎足而立的中国科技大学（该校于一九五八年成立），因此北大集中了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理科学生。落网之后，很多右派学生被押往农场改造，从此葬送了青春。

与北大隔街相望的清华也是一样，工程物理系的第一届学生由各系挑选优秀者而来，预定一九五八年毕业，为中国刚起步的核工程、核科学技术事业输送第一批人才。可是，该届学生近一半成了右派，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各系。由于该系专业涉及国防，右派个人固然落入了悲惨世界，国家蒙受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当时，毛泽东说“全国大专学校一千五百多所”（注12：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各省市书记会上的一次讲话。）可能包括了中专，真正的大学、学院大约四、五百所。每所大学的右派人数均在三四百以上。所以高教系统的右派大约十五至二十万。全国一百七十个大、中、小城市，中、小学教员右派约为五万。新闻、文艺界的右派比例高，一般在百分之十五以上。粗略估计，全国应有五万新闻、文艺界人士落网。工程技术界、银行、金融界亦应有五至十万。如中型城市鞍山是一座工业城，知识份子较多，右派数字为二千零七十。（注13：见《鞍山市志》。）“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注14：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估计亦有五万以上戴了“帽子”。商业服务行业知识份子虽然不多，但有大批“旧社会”过来的留用人员，右派总数亦应有五万。除此之外，全国党政军干部的右派总数估计为五万，不会更少。这样相加，右派在四十至五十万之间，中共公布的数字“五十五万多”似乎不差。何以会有“一百零二万”（见刘宾雁为本书撰写的序言）这个数字呢？因为全国二千零二十三个县尚未考虑进去。

各县右派人数差异较大，端视其所在省的省委书记抓右派的积极性而定。如河南南阳县，八十万人口，右派数达一千一百六十四名。又湖北，七十万人的襄阳县，八百五十二名；（注15：一九九〇年版《南阳县志》第三十九页及一九八九年版《襄阳县志》第二十二页。）七十七万人的随县，七百四十一名。（注16：见《随县志》。）安徽省比例更高，二十八万人的全椒县，四百四十五名；（注17：一九八八年版《全椒县志》第二十一页。）十七万人的休宁县，三百三十九名。（注18：一九九〇年版《休宁县志》。）江西省比例相对较低，二十四万人的万载县仅五十人，三十六万人的高安县仅一百一十名。（注19：参见八十年代出版之各县县志。）不过江西文化落后，知识份子少也是原因之一。

黑龙江省嘉荫县是个隔黑龙江与苏联相望的偏远小县，全县仅六千余人，没有一辆汽车，可见知识份子屈指可数，但右派仍有十五人。按人口比例计，比安徽还高。可见反右运动无远弗届，“天高皇帝远”一说不成立。全国两千余县，仅内蒙古巴林右旗（人口六点七万）是个例外，蒙古族的中共旗委第一书记哈斯巴根坚持不改整风初衷，违法乱纪的干部处分了四十七名，右派却没抓一个。其邻居巴林左旗则积极反右，抓了二十五名右派，三十五名“中右份子”。（注20：一九九〇年版《巴林右旗志》、《巴林左旗志》。）

今随机抽样，取二十二个省市中的一百个县，统计结果如下：总人口三千三百一十万人，右派总数为一万九千四百一十一名。（注21：一百个县为：黑龙江省集贤、五常、绥棱、海伦、肇东、肇源、阿城、青冈、绥化、望奎、嘉荫；河南省南阳、安阳市郊区、淮滨、西峡、陕县；湖北省襄阳、随县、松滋、汉阳、宜都；四川省什邡、崇庆、仁寿、井研、夹江、彭县、新津、南川、丰都、蒲江县鹤山镇；安徽省宿松、全椒、祁门、休宁；山东省益都、临淄、陵县、崂山、庆云；湖南古丈、凤凰、保靖；江西省高安、万载、丰城、万年、广丰、崇义、乐平；广西省阳朔、扶绥、横县、大新、上林、宾阳；江苏省高邮、如东、武进、溧水、常熟、江宁、昆山；上海市郊区青浦、奉贤、崇明、松江、川沙；浙江省萧山、仙居、象山、淳安、常山、嵊县、临海；山西省河津、永济、沁水、五台、河曲；陕西省渭南、户县、安康；辽宁省海城、锦西、长海、台安；广东省和平；宁夏省盐池；吉林省集安；云南省弥勒、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镇雄；贵州省惠水、黎平、兴义；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内蒙古托克托县、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当时全国总人口六亿五千万，两千个县的农村人口约为五亿。粗略推算下来，全国县以下农村的右派总数约为三十万。这样，加上城市的右派，全国右派总数当在七十至八十万之间。

这是下限，决不会更少。

另一方面，前述各县的统计数字虽然是在八十年代中共比较实事求是的时期披露的，其中并不包括当作右派斗争、处理，但实际没有正式列入右派名册的人。这样，即使官方无意作假，其统计数字也要比实际右派人数为少。

譬如，安徽省蚌埠市的《蚌埠报》，文艺组的编辑记者全成了右派，自然包括组长张锲。但是，拉粪车、扛麻包，劳动改造了十五年之后，军管会的军代表突然发现张锲的档案里并无上级核准他为右派的批覆件，自然不能算右派，或者只能算“不算右派”的右派了。（注2 2：《新华文摘》一九八一年第八期第一三四页。）

又如，有所学校，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是五个，但该校党支部书记年方二十余岁，老实规矩，抓出四名后再也找不出第五个，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只好将自己的名字报上去作为第五名右派。上级官僚不问缘由，照例批准，将他开除党籍，送往农场劳改，妻子离婚，儿子亦随之改姓。在农场改造了二十年之后，右派们均获改正回了城，唯独他一个无人过问。原来上级右派籍册里并无他的大名，自然不在平反之列。（注2 3：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团结报》。）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师李树槐的档案中，也发现当初上级并未批准定他为右派。他被告知：“你不是右派，我怎么给你改正？”但他在二十年右派生涯中遭的罪，就再也无人过问了。

北京幼儿师范学校女学生胡慧芝的父亲因“历史反革命”罪入狱。她给父亲写的信和日记中同情父亲的话被一位学生干部偷看了，报告上去，就够定为右派了。由于她才十七岁，不能戴右派帽子，便给了她一个“反右期间有错误言论，不宜当教师”的结论，发配到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支援边疆”。二十年后，右派平反了，她父亲也平反回京了，但她却无反可平，因为她不是右派。她到《新观察》编辑部去请求记者为她申诉时，痛苦地说：“我真希望自己是右派！”

除此之外，有些重要的科学家不宜公开定为右派，而称为“内控右派”，如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葛庭燧、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英等等。“内控右派”和“不戴帽的右派份子”也是不计在右派名单内的。总数虽无法统计，但全国估计总不下数万。所以粗略说来，右派总数大约接近一百万。

这个数字可以由当时毛泽东的一番话得到辅证：“现在产业工人有一千二百万人，党、政、军、教育和经济工作人员（厂长，合作社社长不在内）等共一千四百万人，合计二千六百万人。这一千四百万人不是直接生产的，真正直接参加生产的是一千二百万工人。”（注2 4：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谈话记录》。）

按当时中共的说法，那一千四百万是全国所谓“参加运动”的人数（工人、农民不参加运动）。如四川省新津县，“全县应参加整风人数二〇〇八人，实际参加人数一八六四人。定案划为右派份子一三一人”，右派数为参加运动的人数的百分之七。四川仁寿县，“全县参加整风运动职工六千二百六十四人……在职工中错划右派份子四百六十二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七点三。”山东庆云县，五百三十七名中小学教师参加运动，右派出了八十二名，占百分之十五以上。（注2 5：以上数字分见一九九〇年版《仁寿县志》第三六六页，一九八九年版《新津县志》第三十一页及一九八三年版《庆云县志》。）

一千四百万人，百分之五是七十万，百分之七便是一百万。笔者探用“百万右派”这个数字的根据便在这里。无论如何，五十五万是不可能的。县以下农村都有三十万，城市怎可能只有二十五万？运动对象知识份子绝大多数在城市，只是城市右派人数一直不公开，难得计算其总数罢了。但“百万”要比“五十五万”更接近实际数字，这是不容置疑的。

还有的人“因‘右派’言论戴上其他帽子，受到处理”。这些人也没有被官方统计进去。如广西上林县，一九五七年七月至九月将一〇七〇名教师集中到县城“参加运动”，除右派外，还抓了一百五十八名“反革命份子”和

“坏份子”。（注26：一九八九年版《上林县志》第三八三页。）

“右派”怎么同“坏份子”扯到了一堆？那是因为可以在完成抓右派的指标之后再多抓一些人。譬如有人本来就有辫子可抓，如“男女作风问题”，但双方自愿，并不算犯法，但如今又有“右派言论”，党决定严加处置，却并不宣布此人是右派，只说是“坏份子”，予以逮捕。尽管此人在狱中、劳改营中仍得为其“右派言论”认罪，却不在右派名单之中。

有的大学生，有“右派言论”，刚好借图书馆的书丢失，逾期未还，当局便宣布他是偷书的“坏份子”，抓走了。这学生也不是右派，但实际也是反右的牺牲品。

北京有个十年前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姚祖彝，几年来无业在家，自然没有哪个部门的党组织会去给他一顶右派帽子。可是人不能住在天上，只要你在有人烟的地方，就有街道“居民委员会”考察你的思想。他被“居委会”报告说是“思想反动”，结果也被抓起来劳动教养了。

在劳改农场，姚遇见了燕京同学、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讲师黄继忠。黄是右派，可姚不是，然而农场对他们的处置没有区别。服了十年劳役之后，姚看不到出头之日，便同北京俄语学院的右派学生王同竹一起逃跑，欲偷渡去香港。不幸事败被捕，二人及另外两名“同犯”一并被枪毙于南京。这是“右派”之外的受害者的又一例。

不在右派名单内的还有一批“中右”。如江苏省宜兴县，右派是二百零八名，而“中右份子”则有一百六十九名。（注27：一九九〇年版《宜兴县志》。）黑龙江省肇东县“共划右派一百九十三人，中右份子三百三十六人。”（注28：一九八五年版《肇东县志》第二十三页。）中右数目比右派还多一百多名。

“中右”也是一种正式的帽子，虽不统计在“右派”之列（中共公布的“五十五万多”右派中只包括“极右份子”，不包括“中右份子”），也是要受处理的。这自然也是伟大领袖的指示。毛说：“右派反对我们，中右也反对我们。”（注29：同注14。）所以，中右份子也要被开除公职，或降职降薪，当团员除名，或回乡种田等，只是不送劳改营而已。例如位于齐齐哈尔的解放军第十一军医学校一位教员被定为“中右份子”后，预备党员的资格被取消，转业离开军队，下放到了边远的小县城北安。他的妻子倒还留在第十一军医学校教书，但两人却因此过了长达十四年的两地生活。（注30：《无情未必真豪杰》，《人物》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此外，还有仅有“右派言论”、不戴帽子者，算是“右倾”或干脆就叫“右派言论”。甚至还有叫做“疑似右派”的。这些都是要写进档案的。个人档案中有了这条记录，调动工作时就谁也不敢要了。

从各县县志公布的数字来看，各地“中右份子”的总数大约为右派数字的四分之三。（注31：前述一百个县中，有十七个县公布了“中右”的数字，总数为一八六四名；这十七个县的右派数为二五五一名。）所以全国农村大约有二十万“中右份子”。这个比例与大城市相近。如北京大学，“右派”与“极右派”约七百左右，另外“中右”、“右倾”的处理对象为八百左右。（注32：高望之《北京大学与民主运动》。该文于一九八八年五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二十世纪中国民主运动史”会议上宣读。）所以，全国“中右”亦有五十万，不会更少。

应当说明，戴上右派帽子的只限于知识份子及够得上称为“干部”的人，工人、农民是不定右派的。这是中共的“阶级政策”。当地方执掌大权的人想要将工人、农民中不顺眼的“份子”定为右派时，必须做点手脚才行。如河南省洛阳市五金交电公司有一位姓蔡的职工，鸣放期间出差外地，见到别处鸣放挺热闹，便写信回去鼓励同事向公司领导提意见。因此，公司党委定他为右派。谁知上报到中共洛阳市委，未准，因为该职工本人成份为工人。于是公司党委玩了个花招，将其成份改成了“学生”，再度上报。学生是可以按知识份子处理的，这下他便被正式扣上“右派份子”的帽子，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去了。（注33：源于该蔡姓职工的儿子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中共规定农民也不抓右派。可是湖南临湘县有个未进过大学校门、自学成才的养蜂专家李忠谱。成了专家就不能再算农民了，因此他不配享有农民的“豁免权”。他成为右派，入狱，在狱中身体被摧残，出狱后不得不卧床两

年才恢复健康。（注34：《人物》一九八二年第六期，《农民养蜂“博士”李忠谱》。）

当时，像这样想方设法把工人、农民变成知识份子扣上右派帽子的例子不很多，较普遍的是定为“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如辽宁海城县，除了五百八十名右派外，“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竟多达二百四十八名。（注35：一九八七年《海城县志》第二〇七页。）四川省什邡县是个仅二十几万人的小县，大约因为知识份子不多，抓了一百二十一名右派后，县委书记觉得不过瘾，便在不够称为“干部”的工人、农民、城镇居民中大抓其“反社会主义份子”，总共抓了九百七十八名，是右派数目的八倍！（注36：一九八八年版《什邡县志》第五及第七十八页。）

成了“反社会主义份子”的工人一般不去坐牢，但惩罚是要给的。四川重庆附近狮子滩水电站工程局有位姓口的老工人，是全局有名的劳动模范。本来，劳模只要劳动带头就够了，可是如今党要改进作风，要请工人们给领导提意见，所以劳模也要带头。在领导们的再三动员下，他终于提了点意见：各级干部都是由东北丰满水电站调来的，对四川本地人重视不够。一条足矣，他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败类”——“反社会主义份子”。劳模除名，工资由最高的八级降到最低的一级，而且被发配到荒僻的贵州去了。

古人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虽说字字是真理，但古人不懂今人的事，如今患的不是辞，而是帽子。要是什么帽子都扣不上，事情就不那么好办。天津市一个工厂的工人在厂里大字报上大事小事一齐乱鸣时，写了一张大字报，呼吁大家谈正事，不要就谁偷东西、谁搞女人之类的闲事乱扯。结果党委说他“向党放暗箭”，因为他那张大字报一出，许多反革命就缩回去了，没暴露出来。“放暗箭”算什么“份子”呢？什么也不算。斗争会是要拉上台的，可是斗来斗去，帽子却不好安。工人不能定右派，说他是“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也不妥，只好胡乱给了他一个“劳动教养缓刑两年”的处分。（注37：《报告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二期，冯骥才《我不愿承认是牺牲品》。）

粗略估算一下，在“右派”和“中右份子”之外，全国按“反社会主义份子”、“坏份子”及其它名目处理，加上没有名目、不算“份子”也同样处理的人，估计不会少于三、四十万。

所以，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开始、持续近一年的那场“反右派斗争”中，大约一百万，至少七、八十万“右派份子”，五十万“中右份子”，三、四十万“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被制造出来，成了共产党的新的敌人。这一百五十至二百万人是所谓戴了“帽子”、有“份子”头衔的，中共后来给他们平反、“改正”，还有据可查，譬如广东省于一九七九年秋“改正”了四万多名。（注38：香港《争鸣》一九八七年六月号第四十四页载：“据广东省改正右派办公室透露，至一九七九年秋，全省共改正四万八千多件右派案件，和当年反右斗争结束时内部公布打出六万五千多名右派的数字相差一万七千多人。”但一九九一年版《当代中国的广东》第一四四页说该省仅抓了三万多右派。）至于如前述姚祖彝那样的不属“份子”的份子，被送去劳改营也好，留在城里在街道上扫马路也好，那就无从统计了。

第十四章：反温情六亲不认（上）

如此大规模地抓人斗争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中共似乎轻而易举就做到了。它究竟是怎么“成功”的呢？

当然是靠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反右中，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曾代表中共中央指示全党：“在反右派斗争中，必须像对待党外右派份子一样，一视同仁地对待党内的右派份子。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份子的斗争中，表现了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加以克服。”（注1：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这样，各级干部中稍有理性、对如此大批地抓人斗人心存疑问的人就不得不保持沉默了。心肠再好的干部也不能

不考虑到对右派表现“温情主义”的后果，他们毕竟不能为了几个右派危及自己的仕途。因此，他们所能做的充其量只是少抓几名而已。如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收到下面报上来的右派名单，找了个藉口将其中正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一批人从名单中剔除，保了这些人。又如中央农村工作部主持部务的副部长王观澜，仅为了应付差事抓了一名右派，决不再多抓一个。（注2：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也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一批人。当时，胡耀邦是共青团中央的第一书记。抓右派抓得热火朝天时，他率领代表团在国外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他一回国，便从新疆的乌鲁木齐给北京打电话，问团中央机关打了多少右派，当听到回答说“一百多”时，他立即告诉对方：“你给我刹住，不要再打了。有问题等我回北京再说。”

当胡耀邦得知《中国青年报》有十七人成了右派时，不禁痛呼：“损失惨重啊！”（注3：《闽西文丛》第三十八期第三页。）他试图保护许多人，连刘宾雁这个“大右派”也想保。按刘的说法，胡只成功地保住了两个人，其余的只能眼看着他们沦为“人民的敌人”。事后，也仍把团中央机关的右派们集中到一起谈了一次话，鼓励他们对未来保持信心。一九五八年，刘宾雁与其他右派下放到山西劳改，团中央对他们说：“准备劳动三、五年。”说话算数，三、五年后胡耀邦的确把他们大多弄回了北京。正由于如此，刘宾雁曾对人表示：胡在反右时“没有污点”。但胡自己却不这么看。一九七七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曾坦白承认，他当时在团中央将一些有才能的干部打成了右派，为此感到很抱歉。

由于中共是以“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为组织原则的，既然毛泽东决计要实施“阳谋”，张德生、王观澜、胡耀邦这些人就无力挽狂澜于既倒，改变不了整个局面。要是坚持反对抓右派，他们自己就会落网。这样的例子颇不少，教育某司司长李常青便是一个。

李常青本出身于吉林省延吉一个大地主家庭，弟兄五人都参加了中共。李一九三一年入党，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时，他是中共北平地下市委书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由于与彭真等人有隙，被疑有问题，调离北平，赴敌根据地“学习”（受审）。他到达晋察冀边区的前一天，另一姓名与他相近、也是从敌占区去的干部，按北方局的指令被秘密枪决。后人理解，那人是错杀，李只是侥幸未死。直到一九四八年，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决定，他的“问题”已被查清，才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委兼哈尔滨市市委书记。但几年后又扣上“高岗集团份子”的帽子，罢了官，反右前不久让他到教育部当一名司长。

反右时，李任该司“反右领导小组”组长。该司有一青年干部是基督徒，在日记中写了一些自己的宗教观，其日记被查出后，即将被定为右派。李认为宗教不能和政治混为一谈，故定他为右派毫无道理。这样，他就成了“包庇右派”的右派份子，开除党籍，发配到内蒙古大学教书去了。几年后，这个一生坎坷的老共产党人终于被一辆卡车撞死于轮下，比他那也是右派、后来卧轨自杀的儿子范政还早几年离开人世。（注4：李常青的材料由刘宾雁提供。）

清华大学袁永熙的命运也差不多。十年前（一九四七），袁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陈璉（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党员）结婚不足一月，双双被捕，押至南京。当时犯了“共案”，照例枪毙，但蒋为收买人心，破例放生。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蒋政权崩溃前夕，陈布雷自杀。在这之前，陈曾劝袁勿弄政治，但袁不为所动。几个月后，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被中共党组织认为向国民党自首而遭开除党籍的处分，不久又获准重新入党。中共建国后他一直担任清华党委书记。一九五六年，上述被捕自首的问题又被提出，作为一个“历史上有错误”的人，他失去书记职，改任党委常委、清华大学校长助理。

反右初期，袁永熙不赞成在教授、学生中大抓右派，理由是“整风就是要改造领导，不是要整群众”。但他在党委内是少数派，而清华的校长蒋南翔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不是有职无权的花瓶，这样袁也就被揪了出来。

袁永熙的右派罪名不少，其中由《人民日报》公布的一条是“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在工会主办的自由论坛上，

党右派份子高呼‘反对共产党的特权’等等诬蔑性的口号时，他竟跟着群众一起鼓掌”；（注5：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一条叫“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诬蔑中央的方针”，根据是他曾对左右亲近的人说过：“毛主席受到很大的压力，国内告急，电报雪片飞来，都要求收。”（由此可见，各级干部在收到毛泽东五月十五日写的名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弄清毛的“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之前，是不欢迎“鸣放”的。这足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几乎个个都能完成或超额完成抓右派的指标。）

当年袁与陈璉同在中共执政后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手下做地下工作，凭藉在国民党方面的关系，为中共获取过许多重要军事情报。（注6：关于袁永熙，见香港《九十年代》一九八六年第五期和《人物》一九八五年第六期《陈璉在黎明前》。）刘仁为中共中央委员，不知何故此时未出来为袁辩诬。由于文化革命期间刘死于中共冤狱，这件事大约永远无人能说明白了。

低级干部中，因为“包庇右派”、“同情右派”，而自己戴上帽子的就更多了。

四川医学院学生会主席宋乃湘兼任该院学生会校刊的编辑工作，手头有十余份对中共提了不少尖锐意见的同学来稿，鸣放期间因稿挤未来得及刊发，反右时若拿出来则个个逃不了右派帽子。他毅然将那批稿件烧毁，保护了那十几个同学，但他自己则被扣上右派帽子一顶，送去劳改了。

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一位一九五三年冒死在法国殖民者军队的枪口下泅水从越南回到祖国的学生被定为右派，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李淦林表示异议，结果也陪绑做了右派份子。

上海同济大学一位学生在肃反中被斗争，停学一年后复学，鸣放中写了一份大字报，要求公布被斗、被判入狱、劳改及自杀者的名单，因而成为右派。他的同学严公政认为党已经亏待过他一次，不应再对他采取粗暴态度，结果也被扣上一顶帽子，送到黑龙江劳改去了。

东北有个机关刊物，编辑部九名成员有五名被定为右派，主编作为“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在会议上说：“这几位同志的错误，但都不是右派，我了解他们。”他刚说完，主持会议的首长便拍桌子道：“就你这句话，决定了你的命运。你退场吧！”该主编被撤了职，虽未当右派，却于不久一九五八年的“拔白旗”运动成了一面“白旗”。（注7：引自《人民文学》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某单位党委开会，投票决定某干部是否右派。一位党委成员因病在家，平素认为那干部不错，便让别人代他投了个反对票。结果党委里他是唯一反对那干部戴右派帽子的。这样，他也成了右派，但幸获宽大，被定为“不戴帽的右派份子”。不幸他妻子仍然认为这同戴帽右派并无区别，同他离了婚。

所以，在那种局面下，凡是自己不想当右派的，就非得死心塌地地跟着中共中央抓右派不可。每次运动都是如此，不想自己挨斗就得跟着党斗人。譬如《文艺学习》的主编韦君宜曾竭力替下属黄秋耘辩护，甚至到上级那里痛哭流涕：“要是黄秋耘要划为右派，恐怕我也该划，我们的思想本来就差不多嘛！”但她毕竟不愿被划成右派，所以还是把几个明明不该划的下级划成了右派份子。

反右不积极是不行的。山东省省长赵健民就因为“对右派态度不明朗”而被批判，撤了职。（注8：一九八九年版《当代中国的山东》第一七三页。）

当时有的干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却又不忍见人无端被斗，只得采取躲避现实的态度。

譬如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眼见反右运动愈演愈烈，他这个书记也无法控制，连省委直属机关也抓出了一大批右派，《新湖南报》的全部业务骨干几乎一网打尽，他“坐立不安，进退失据……思之再三，只有退避”。这样，他不得不违心的以“多日失眠，精神不佳”为由，向中央请求休养。获准后，他于十月间离开了湖南，躲到青岛读《资治通鉴》去了。（注9：《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四卷第二九三页。）

像这样的控制不住局面的干部，各省都有一些。广东省乳源县一位县报编辑，作为右派被送到农场劳动教养，二十年后又遇到当年的乳源县委第一书记。那位书记对他说：“你们（被错打为右派）的问题我知道，可是当时我也顶不住。后来到五九年我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了。”（注10：该编辑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连中共干部中的有识之士都不能挺身而出，对抗这个疯狂的政治迫害运动，右派自然也就愈抓愈多，无人能控制了。

还有一种情况，一些本来赞同“右派观点”的中共干部，在毛泽东一声反击令下，便在自己主持工作的地区，部门大抓右派。譬如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武光，在五月十八日的教授座谈会上说：“党群（党员与群众）之间不仅有一座墙，而且这座墙是一座‘万里长城’，甚至比万里长城还厚。”要是说这话的是教授或学生，那决计逃不脱右派帽子，但武光身为党委书记，没人去抓他，他倒是按着中央的指令在教授和大学生中抓了一大批右派。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鼓励鸣放时曾说：“全国政权虽是人民的政权，但政权的行使只落在少数共产党员手里，很容易脱离群众产生官僚主义，变成特殊阶级，从而脱离人民，最后被人民唾弃。”这番话与“大右派”葛佩琦在人民大学的鸣放发言可以说是大同小异，而且陶还说：“纵使有人讲了几句反动话，写了几条反动标语，这算什么？”按照反右时的标准，上述言论便足够使他当右派了，但是他却主持全省的反右斗争。他在八月间的省人大会上理直气壮地说：“不反对右派，我们还算什么共产党呢？”

当然，这不过是他在反右风暴中为求自保而不得不做的违心的行动。所以，当一九六二年初毛泽东的左倾滥调在党内明显失去市场时，已贵为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本性又露了出来。“不要动不动就划人家右派份子。”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讲谁是右派、反党，那他是混不下去的呀！坐火车住旅馆都有困难，连儿子都有问题。大家都是来革命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注11：一九六二年三月，陶铸《对繁荣创作的意见》。）

正由于他心存此理，在文革初期升为仅次于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后，他拚命保护大大小小的干部，以至被扣上“最大的保皇派”的帽子，自己惨被整死。所以，虽然他有过一段左倾的历史，人们还是记着他的好处。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就不同了。此人心狠手毒，在延安整风中就整死了许多人。

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大学做学生时加入中共的山西人赵梅生，一九二九年任北平市委负责人兼北大党支部书记。一九三三年曾率汾阳军校官兵三千余人徒步到张家口，加入抗日同盟军。延安整风中，北平地下党组织被诬为内奸，一批人被处死，包括这位忠心耿耿的知识份子，后来由于民愤太大，毛泽东不得不将康生降职，让他以一个政治局委员之尊之任山东省委书记。

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陈毅的儿子一九八六年的文章记述：“解放后，康生一直‘不得志’，常住院，据说神经也不太正常。父亲素来为人宽厚，在‘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时候，父亲常去看望他。那时康生对父亲真是感激涕零。”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觉得要必要将他解冻，决定将这位昔日的打手放出来，康生闻知自己将在中共八大捞到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位子，才结束“养病”的生涯。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康生一旦喘过气来，又回复成一只咬人的狗。例如，在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共发动的山东日照暴动失败后和党失去了联系的牟宜之，借助其姨父、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帮助，赴日留学。三年后归国，靠着丁的关系，担任《山东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他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赴延安。因为他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中共劝他暂留在国民党那里做官，以配合八路军在山东的行动。抗战期间，他曾利用各种关系，先后策动近七千名伪军反正、来归。反右时他在城建部工作，罪状是没有的。康生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注12：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这样，他就被送到黑龙江劳改去了。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曾彦修在延安的革命队伍中长大。在一个整风座谈会上，他引用诗人杜甫的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说中共出山进城后，做了官，就脱离人民，搞特权，变“浊”了。康生见到载有曾彦修发言的内部简报，批道：“单凭引用这两句诗，曾彦修就该划成右派。”这样曾也就逃不脱厄运了。

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委委员，但凭藉康的权势，为所欲为。党校内的干部和学员（学员也是各地撰来准备提拔重用的干部），凡是议论过曹或对康生流露过不敬的，一律被扣上帽子，开除党籍，进了劳改场。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是个和康生不相上下的党阀、党霸。他口一张就有人要倒霉。安徽省话剧团创作了一个话剧，到上海参加汇演，评比委员会一致叫好，可是柯硬说不行，一定要剧团检讨，否则不让回家。剧本作者那沙也就因此成为右派。另一个话剧《布谷鸟又叫了》，深受广大城乡观众喜爱，柯却下令禁演。姚文元闻风而动，撰文说该剧是大毒草，作者随之被扣上了右派帽子。

上海《文艺月报》副主编王若望是个老共产党员，但当年在延安与柯庆施有过不愉快的纠葛。柯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化名徐汇在《人民日报》上攻击王“反党反宪法”，柯则在大会上说“王若望那么猖狂，藉党员的名义散布反党言论”，王就戴上了右派帽子。（注13：香港《九十年代》一九八六年第八期王若望的文章。）

毛泽东在四月发动鸣放运动时是这么说的：“我看每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注14：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可是凡提出类似主张的人却全都成了右派。又如他四月三十日召集各党派负责人谈话，鼓励他们鸣放时曾说：“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但几个月后他却转了一百八十度，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章伯钧、罗隆基等……他们要取消学校党委制，要同共产党轮流坐庄。”（注15：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这样，凡是在五月间鸣放中建议取消学校党委制的人统统成了右派。譬如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认为：“学校可以不要党委领导，而由校务委员会领导，这样省事得多。”（注16：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结果钱端升成了“大右派”。

主张教授治校、取消党委的人是右派，反对教授治校的人未必就是左派。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主任孟昭英对“教授治校”持反对意见。但他曾骂过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又认为中共“非常不民主”，把毛泽东当成“神仙”，“农村干部强迫命令的作风到了极点，比过去土豪劣绅都不如”，他也就成了“一贯反苏反共”的右派。（注17：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北京日报》。）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加入中共，参加过万里长征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和诗人冯雪峰，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当上右派后，获得的鉴定是“三十年来一贯反党”。毛泽东点他的名道：“他在那里放火……他放的火，他的目的是要烧共产党。”（注18：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对冯雪峰恨之入骨似乎毫无道理。他们两人曾经是好朋友。一九三四年一月，冯到江西红军根据地，毛去他住处聊天，他告诉毛，鲁迅认为毛的诗中有“山大王”的气概，毛听了开怀大笑。从那时起，直到长征到陕北，二人过往甚密。毛还曾对人称赞冯：“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就会打游击！”（注19：张乐初《雪峰纪事》第六十六至六十八页。）一九三六年冯被派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找到了毛的两个儿子，并设法安排他们经法国送到了苏联。以后冯被国民党逮捕，毛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辗转请国民党人胡秋原出面保外就医，终于使冯逃离险境。

可是，在反右时，毛泽东翻了脸，彻彻底底地六亲不认，冯雪峰便被打翻在地了。

在用枪杆子打出天下的毛泽东眼中，文化人本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冯雪峰的遭遇只是一个普通的例子。他是少数经历了红军万里长征的高级知识份子之一。他写了一部五十余万字的关于长征的小说，但党组织告诉他，一个右派份子不适宜写这种伟大的革命题材，于是他愤而将文稿一把火烧掉，直到在文革中郁郁死去，再也没有动笔。

一九三六年，丁玲自国民党的监狱出来，到达延安，毛泽东曾有一首词相赠，其中就有“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注20：见《新观察》一九八〇年第七期。）的赞词。据说在延安时丁玲与毛私交甚好，她曾是极个别不必相约、通报便可闯到毛的住处拜访的人之一。丁玲当了右派，熬了二十多年后平反，有人问她：“反右派的时候，他（指毛——引者）也不站出来讲句公道话？”丁玲答道：“我们经过这么多的运动，觉得不落井下石的人，就是好人。”

丁玲不怨恨毛泽东之无义，这是她的宽容。但说毛没有落井下石，那就大大错了。早在一九五七年一月，毛著手鼓动鸣放之时，就先对丁玲的处置预作了安排。他在全国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发指示，要把丁玲“在社会上搞臭”。将丁玲打成“大右派”之后，毛又几次点了丁玲的名：“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徐开个别的人，譬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了。譬如冯雪峰……他就下不得台了。那是少数人，就是右派。”“只要不是冯雪峰、丁玲这种人，也不要怕下不得台，怎么下不得台呢？”“进了共产党，他要反共，共产党反共！丁玲、冯雪峰不是共产党反共？”“共产党里头出了个高岗……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注21：同注18。）

“右派”、“反共”、“高岗”，正是由于毛扔了这几块大得足以压死人的石头，丁玲与其丈夫一起到北大荒农场劳改去了。

一九五六年中共提倡“百家争鸣”时，曾复查、甄别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为其平了反。现在丁、陈当了右派，不仅当初受牵连的十九个人全是右派，连主持复查工作、为其平反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等人也受连累成了右派。

可能丁玲始终无缘读到毛泽东上述讲话的材料，以至到死还认为毛是“好人”。

毛泽东虽然杀得性起，将原先许诺的“顶多十五万到二十万”（注22：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右派一下子翻了几倍，但并没有杀昏了头。出于“统战”的需要，他也“保护”了一些人。他在上述讲话中提出：“对一部份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如荣毅仁等。”

荣毅仁当然不傻，赶紧在报上表态：“感谢党在我危险关头向我大喝一声，使我能猛醒回头”，“如果不是这一次党大喝一声，我就有可能成为右派份子的俘虏。”然后再将章乃器（中国民主建国会委员、时任粮食部长，本章稍后评述章氏的遭遇）狠批一通，这样他就安然无事了。

毛说的“荣毅仁等”的“等”字里还包括九三学社的社长许德珩。许曾在社内批发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的谈话纪录，其中有毛赞成取消大学党委制的话。如今毛对自己说的话不认账了，许便犯了“篡改”毛的指示的“重大错误”。不过，在报上批了一阵“许德珩的重大错误”和“右倾”之后，毛很快就放过了他。他后来还能长期担任人大副委员长的角色，即使在文革中也能替毛式“社会主义民主”充当花瓶，足见毛之聪明多智。

毛泽东还曾因为私人原因保过一些人。

有一天，毛看到教他英文的女教师泪痕满面，问是怎么回事。那教师告诉他，她丈夫是北京大学的讲师，恐怕快要成为右派了。毛说，不要紧，只要让秘书给北大党委打个电话，保险平安无事。果然，电话一打，那位讲师就化险为夷过了关。

七十六岁的章士钊早年做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一九二〇年毛向他募捐时曾拿出两万银元供毛作活动经费。毛始终不忘此事，因此当章眼看就要戴右派帽子，给毛写信求援时，毛立即指示说章对中共的批评言词虽过激，用意还是好的，保他免了灾。

毛还出面保了天津《大公报》社长王芸生，但该报总编辑袁毓明则没那么幸运。袁毓明是党员，被宣布为“无耻

反党”后，成了右派份子。王芸生虽然幸运，但也不是没付出代价，他必须写检讨才能过关，在检讨中必须攻击被定为右派的老朋友。王问心有愧，长期闷闷不乐，从此患上糖尿病。（注 2 3：《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七辑第八十二页。）他或许还不如让中共把他也打成右派，反正地位像他这样高是一律不送去劳改营的。

周恩来对某些落难的人伸手拉了一把，但做得也极有限。（一九五七年）七月中旬，一九四九年放弃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机会毅然回归的作家肃干已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但当时还有资格参加一个会议。会上周恩来安慰他道：“你不是右派，要认真检查，积极参加战斗。”萧顿时如死囚听到释令一般激动。但过了不久，他还是成了右派。

《旅行家》杂志主编彭子冈，被批判为“特别强调反映社会的阴暗面”，“毁谤祖国”，“常常在原稿上删减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字句或段落”，“向读者灌输反党毒素”，成了右派。（注 2 4：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彭在国民党时代是《大公报》的名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国民党曾抓过她夫妇二人，只因不能肯定其共产党员身份，很快就放了他们。如今夫妇双双被共产党自己判为右派，生性倔强的彭拒绝认罪，拒不出席批判她的会议，又要求辞职回家做家庭妇女。可是成了共产党的敌人，便没有做家庭妇女的自由。她被宣布为“对抗运动”，是“极右份子”，须送往边疆劳改营。但周恩来审查劳改名单时将她的名字删除，她才幸运地就近去了河北农村。

女作家冰心的丈夫吴文藻成为右派后，周恩来所能做的，只是派车将冰心接到家中，安慰一番而已。

需要保的人太多，周恩来也许顾不过来了。反右前夕，他曾同刘少奇一同去观赏著名的豫剧演员陈素真的演出，演罢又同刘一起上台与陈合影，陈立中间，他与刘分立左右。不久，剧团党委将陈定为右派，《人民日报》特别批她：“豫剧大王”陈素真原来是右派角色”。大字标题，刘、周不可能看不到。也许是因为鞭长莫及，想救她也救不了，也许是因为她有“共产党不得人心”一类的谬论，不能去救。总之，他们不会再去看了。

有些人未成为右派，那是中共蓄意保护，并非因为他们不“右”。如国内最有声望的几位科学家曾昭伦（化学）钱伟长（力学）、华罗庚（数学）、童第周（生物）以及千家驹（经济学）共同起草了《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该“意见”被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但中共又不打算将这五位学部委员都定为右派，决定放千、华、童三人过关，招呼他们与曾、钱划清界线，于是千、华、童三人赶紧在报上写文章声讨右派，表示向党靠拢而成了左派。

自然，要当左派得付出代价，那就是良心的折磨。千、华、童三人明明是同曾、钱平等讨论的，却说自己是被利用了。华罗庚至在全国人大的讲台上指“右派份子们”“假借了我们的名义提出了这篇荒谬文件，作为他们向党进攻的政治资本”。（注 2 5：《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十八号第十一页。）这样当众撒谎，其内心所受的折磨恐难为外人道明。

右派队伍如此庞大，同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在反右时胡作非为有很大关系。那些干部品德恶劣、素质极差，在上级面前是奴才，在下级面前是主子。譬如有的大学的党委书记就指着在鸣放时对他提过意见的教授的鼻子说：“你攻击我，目的在于反党！”随即将那位教授定成了右派。

但仔细说来，要是没有中央撑腰，不久前还在信誓旦旦的表示欢迎批评，保证不打击报复的各级干部也还不至于打击无辜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划分右派份子的标准”，下达全国，其中有一条是“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注 2 6：《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卷第六六九页。）这样，所有的中共官员及向其靠拢的“积极分子”都成了在中共卵翼下碰不得，说不得的特权份子，人民则彻底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党的官员们想要置谁于死地，只要说他“攻击党的领导，破坏党的威信，损害党的权威，污蔑党的干部”就可以了。

曾获得中国、德国、美国医学博士学位的老科学家刘绍光，四十年代任中央药物研物所所长。一九四八年，他谢

绝美国医学界的邀请，对人表示“我决定等待共产党，等待中国的新生，把智慧献给新中国”。但解放后云南当局竟把他当作旧政府人员，将其博士文凭、荣誉证书和手稿收去作为“罪证”，几次拉他到野外去“枪毙”。枪声响起后，他才发现自己仍活着。如此折磨持续了两年，直到中国科学院成立，通知他赴京报到，才告一段落。一九五六年，他将数十年的研究成果交给中医研究院的负责人，请他“转呈毛主席、党中央”，谁知直到反右前夕他才知道他的手稿被那位负责人送进了火堆。愤激之余，他大骂那位负责人“吃人饭不干人事”，“不懂科学”。这样，那负责人反过来给他按上“谩骂党的干部，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把他打成了右派。

从此，刘绍光成为一名被“管制”的坏人，被迫迁居到一间原来堆放杂物的小窝棚里栖身，既不通风，又无水管暖气，屋门正对着公厕。他需要“劳动改造”，职务正是打扫厕所。这位年过花甲的老学者就这样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年的屈辱生活。（注27：香港《镜报》一九八六年第十期第三十三至三十六页。）

右派帽子扣到当事者头上，重如千钧，直可把人压入十八层地狱，但对手握一叠帽子随意派发的当权派来说，就不那么有份量了。河北束鹿县一位姓裴的客串演员有个七岁的女儿艳玲，演武戏《哪吒闹天宫》出了名，剧团领导为了挽留人才（或者说挽留摇钱树），将他叫去说：“你的言行足够给你戴上右派帽子。但是这帽子是活的，可戴可不戴。”然后摊牌说，如果留下不走，做基本演员，不仅没事而且待遇从优；如果不从，则戴帽下乡劳改。裴氏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自然舍下乡劳改而取“待遇从优”，他的女儿也就没有被葬送。熬了几年后，父女终于出头，获得了去京演戏的机会。不仅北京的普通戏迷得饱眼福，连毛泽东也亲自观赏了裴艳玲的《闹天宫》、《宝莲灯》。

十几年后，毛死前不久，在病中突然又想看裴女的《宝莲灯》。当局赶紧给她拍摄了一部不得公映的“内部资料片”，使毛如了愿。

若不是那个小小束鹿县剧团的当权派爱才或爱钱，那位裴姓演员早就戴上右派帽子下了乡，从此沉沦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裴女也许便就此被埋没终身了，而毛泽东也将失去那最后的文化享受。以此来看，那小小剧团的当权派实在是积了大德。

由党委书记一句“你攻击我，目的在于反党”而被扣上帽子的右派，数目相当大。譬如安徽省书记曾希圣将中央的“恶意地攻击”、“污蔑”简化为“反对”二字，规定凡是“反对党委书记”的便是右派，而百姓是否“反对”了书记，则由书记大人判定。

其他各省虽然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实际也是按此标准办的。所以就全国而言，虽难以断定确切的比例，估计大约有一半或更多的右派是由于被认为“反对党委书记”，或者“反对”更小的党官（如支部书记）而落网的。这五十万右派实为共产党大大小小的干部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的牺牲品。譬如作家刘宾雁就曾给本书作者讲了两个故事：其一是一位中学校长看上了本校体育教员的妻子，将那教员定为右派送去劳改，进而将其年轻貌美的妻子弄到了手；其二是一位中学教员，因偶而撞见校党支部书记与一个女人的奸情，被扣上帽子送去劳改，他当然也就不可能对党支部构成威胁了。反正上级只查各部门是否按人头数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标，并不问那些人有哪些罪行，凡右派一定有罪就是了。

那些干部如此胡作非为，与毛发动反右的本意并不相干。但创了这个政治制度，将人民的生死大权交给他的党的干部，任他们为所欲为的是毛泽东，而且规定了抓人的“指标”命令下边完成的是中共中央，所以这笔账首先要算在毛身上。

第十四章：反温情六亲不认(下)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关于判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公布后，谁也不再提共产党整顿作风的事了。尽管中共统战部李维汉说过不要求各党派整自己的风，各党派还是安静下来，各自回窝，整自己的风去了。

由于各党派里本有一批公开和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以他们为骨干，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各党派内选定了一批右派名单，痛批一顿之后，统统赶出其领导机构。人们开始整日将“热爱党”挂在嘴边。当“热爱党”比“热爱共产党”显得更亲切，却绝不会引起“热爱哪个党”的误会时，我们就知道，那些“民主党派”已经死去了。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于七月十二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痛斥民主建国会首领、国务院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为“右派野心份子”，细数他“恶劣的品质，凶狠的行为”之后，一本正经宣布：“我们今天对章乃器展开斗争，就是整个反对右派的斗争中间的重要一环。”如果不看文章的署名，人们真会以为这是一个共产党首长的政治报告。为了痛打落水狗，民主建国会出版了两本专集，往章氏身上泼尽了污水。

章乃器在历史上是帮过中共大忙的。抗战初期，章就任国民党政府的安徽省财政厅厅长前，周恩来嘱他与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搞好关系。章想方设法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银元，（注28：《安徽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第四页，转引自徐承伦《抗日战争初期章乃器在安徽》，载《安徽史学》一九八六年第四期。亦见章乃器遗稿《七十自述》。）并为中共培训了一批财经干部，为此毛泽东曾向他致谢，称他做了好事。战后国共内战，国民党政府经济濒临破产局面，有人蒋介石建议起用章为财政部长，蒋叹气道：“我是要用章乃器，可他不为我所用。”（注29：《人物》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一九四八年底，章氏抛开在香港已具规模的产业，接受毛的邀请秘密到了东北解放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他建议在“中国”之前加一“新”字。毛对他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从此这首歌传遍了全国。

这样一个人是绝不可能反共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使毛泽东将他定为敌人的呢？

综观章乃器的反动言论，主要是“攻击社会主义”：“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们从资本主义还可以汲取精华，去其糟粕，可以找出有利于生产与管理的经验和知识，服务于社会主义；但是官僚主义是百无一用的糟粕。官僚主义一旦加之于社会主义事业，它的效率就会低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其原因即在于此。”（注30：《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十三号第七十七页。）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将章乃器召去，说马上要开国务会议，要撤他和章伯钧、罗隆基的职。章伯钧和罗隆基不得出席申辩，但允许章乃器出席。章乃器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权利。”这正合周恩来的意，便回答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注31：章乃器遗稿《七十自述》。）就这样，章乃器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屈辱生活。在中共的强大攻击下，他的妻子和儿女均作了向党靠拢的撰择，与他划清界线，从此断绝了来往。唯剩幼子章立凡不愿离开，与也相依为命。一九六六年文革初起，共产党子弟组织起红卫兵，大闹“红色恐怖”。年已七十的章乃器与许多人一同挨打，不少人丧生，他却因每日练功而体格健壮，活了下来。可是不久儿子章立凡因“为父亲翻案”而被抓进牢房，他就成了形影相吊的孤老。从那时到去世，他再也没有见过一个亲人的面。

一九四五年七月，黄炎培曾访问延安。当时，毛泽东问他有何感想，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矣’。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总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劳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当时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注32：转引自湖南人民出版社《延安文艺业书》报告文学卷第五一六页。）

事隔十二年，满腹经纶的黄老先生自不会忘记毛泽东那番漂亮的言词，他完全可以着文问毛：你不是说要走一条民主的新路吗？你不是说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吗？为何人民才监督了一个月，你就翻脸不认人了呢？你熟读

《红楼梦》，难道不记得“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客，眼见他楼塌了”的醒世明言吗？但是，黄老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条件发表文章批评毛泽东食言。连他那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当教授的儿子黄万里都成了右派，他还能有什么力量制止毛的所作所为呢？

这些所谓“民主人士”，非但不挺身而出，斥责中共背信弃义、践踏民主，反而纷纷抢着向中共献忠心，表示要当“左派”，做“红色老人”，巴结唯恐不及，遑论对中共实行监督。

党外人士中公开对反右的做法流露出不满的，似乎只有张治中。这位解放战争末期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一方的首席代表，自谈判破裂留在北平与共产党合作以来，基本上是赋闲在家。他对反右的做法实在不满，终于打破沉默，对受到中共保护、未定为右派的“民主人士”沈钧儒（民盟主席）等人委婉地说：“反右应着重摆事实，讲道理，情绪激昂一点还可以，但拍桌子、破口大骂是不是好？以势压人怎服？”（注3 3：《人物》一九九一年第二期第三十二页，张治中生前秘书余湛邦的文章。）当然，张治中只能说到这里为止，批评中共的胆量他是没有的。七年前中共“镇反”，将在他投共后追随他，到北平投奔中共的堂弟张韶舞抓到浙江平阳公审，当场就地枪决。张闻讯，只是在家中痛哭一场，不敢对中共道一个字。尽管他知道张韶舞的罪名只是抗战期间任平阳县县长时，为政府征兵征粮比较卖力而已。

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虽然支持中共反右，但对那么多人成为右派感到不解。听说教育部副部长柳（水是）、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等人都成右派后，他说：“这些人过去都是老朋友，做过许多工作，为什么现在都变成了‘右派’？”（注3 4：见当时的中共统战部副部长金城的文章《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虽然被中共确认为左派，但谁人能说出他内心的愤怒或悲哀？

每个人都有一些人性的弱点。在那种正派人动辄得咎的情形下，能够坚持正义、不同流合污，的确很困难。二十多年后，名作家巴金这样回忆当年的事：冯雪峰是个“耿直、真诚、善良的人，我始终尊敬他”；“我想不通他怎么会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作了联合发言……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注3 5：巴金《随想录》第一集第一三〇至一三一页。）

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不像巴金那样做点违心的事是不可能的。为此，中国最优秀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不得不奉命在批判“京剧界的败类、右派份子李万春”的大会上发言。

“看着李万春长大的”老一辈艺术家荀慧生被迫在报上表态，说李“昧尽天良，颠倒是非，狂妄地向党进攻”，是个“为虎作伥的败类”。（注3 6：《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十八期第二十八页。）

后起之秀，女演员杜近芳亦曾奉命登台批判戏剧家吴祖光。二十多年以后，杜近芳已是五十岁的人了，她在纪念惨死于文革的戏剧界老前辈田汉的会上见到吴，站起来深深地朝他鞠了两个躬：“吴先生，我对不起您。在一九五七年，我在大会上批判过您。我向您道歉！”

即使在反右前，眼见了“肃反”等运动的恐怖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知识份子的懦弱，巴金便预言：“今天谁被揭露，谁受到批判，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仗义执言，替他辩护。”（注3 7：同注3 5，第一三一页。）

巴金的预言基本上成了事实。百万右派几乎每一个都发现平素的朋友、同事毫不怜悯的加入斗争自己的行列。对此无法忘怀的青年作家从维熙三十年后回忆道：“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艺》上着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注3 8：从维熙《走向混沌》第三十五页。）从并不记仇，他明白“反右的锣鼓敲响，知识份子人人自危，谁都怕陷入右派泥沼”，也就全理解了。

祸到临头仍然敢说真话的人还是有的。《戏剧报》编辑张郁就公开站出来说，中共拿吴祖光开刀是“对中国善良的知识份子的不信任”，是戏剧家协会“为了要在戏剧界抓一个右派份子报成绩”。很自然，他为此付出代价，成

了“反党急先锋”。（注39：《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十七期第十五页。）

上海同济大学研究生、中共党员吴中在眼见那么多人成为右派后，挺身而出，说：“被指为右派份子的背后，没有政权，没有法律，没有国家机器作为后盾，他们所有的只有道理和真理。而党却有一系列的政权机构为它撑腰……有枪杆子握在手里的。今后谁还敢再开口？”“党本来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忽然来了这么一手，不由人不联想到‘叶公好龙’这个故事……”（注40：香港自联出版社《鸣放回忆》第一二一页。）为了这几句话，吴也进入了右派行列。

在高压下为右派的观点辩护是需要勇气的。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农工民主党举行大会，会议虽然仍由章伯钧主持，主题却是批判章氏的“政治设计院”。在一片讨伐声中，唯一一九二〇年在北大任讲师时与李达一起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张申府（当时为北京图书馆研究员）明白表示说：“章伯钧所说的‘政治设计院’问题，并不一定是错了。”他因此也成了右派。

张申府成为右派听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一九二〇年底，他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执教，首先介绍了天津学生刘清扬（女）入党，随后张又与刘一起介绍周恩来入了党；以后到了德国，又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共。张回国后，正值国共合作，廖仲恺请他推举国外留学生回国工作，他开列了一个十五人的名单，第一个便是周恩来。这样，周便回国当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注41：人民出版社《怀念周恩来》，张申府《留法前后我同周恩来同志的一些接触和交往》。）逐渐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一九五七年时，要是周坚持不赞成给张扣上右派帽子，张应当能够幸免。也许是张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涉及中共一党专政的制度，太致命了，连周恩来也觉得无法保得住他。毛泽东的态度也许是周不愿出面保自己的入党介绍人的另一原因。一九一〇年代末期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张申府曾是他的“顶头上司”（毛氏自述），给过他气受（毛抄写潦草，张令重抄之类）。毛讨厌这些大知识份子，认为他们“最无知识”，派给他们“右派”帽子时当然不会怀恻隐之心。看透了毛泽东肚肠的周恩来，一贯以不与毛冲突为首务，自然也任由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而不吭声了。

小人物中也有敢于站出来为“大右派”辩护的。

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生党治国，是一九五四年陕西省高校考生第一名，一位极有才华的青年。学校批判钱伟长、黄万里两位教授时，他走上讲台去为他们辩护，说他们不是右派。这样，他成为“极右份子”，被送去劳改了。（注42：陈祖芬《理论狂人》，见《人民文学》一九八六年第七期。）

化学工业部一位普通科员阎义采在章伯钧已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鼠之后，写了一篇《两党制适合中国国情》的文章，说：“我认为民盟章伯钧先生提出在政治上向美国学习，在中国实行‘两党制’的主张，对人民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只有‘两党制’才能真正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注43：一九五七年八月三日《人民日报》。）当然，阎因此而成了“反党份子”，尽管他也是个共产党员，自一九四五年起就参加了革命。

自然，绝大多数人没那么勇敢，他们不愿成为牺牲品，就只好“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了。

被迫的或者主动的与右派划清界线的人，只比右派多享受了几天“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而已。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又号召“拔白旗”，一批人被“拔”。如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传鹰。一九五七年时，传未落网，但五八年却成了北大头号的“大白旗”，终于未能逃脱被整的命运。

到了下一年（一九五九年），毛又指挥全国“反右倾”，又有很多人落了难。譬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反右时的左派邹鲁风，曾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批判许孟雄教授，说许“不学无术”，对马列主义“一窍不通”，并正言告诫许：“你的狂妄的叫嚣，正是‘蜉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邹在别的批判右派的文章中曾说：右派“都是些高级知识份子，他们的阴谋也是‘高级’的。说它‘高级’，是因为他们不仅要篡夺高等学校的领导权，而且要

篡夺我们国家的领导权，企图发动匈牙利事件，使千百万人人头落地。”（注4 4：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这是反右中左派们所能想得出的最严重的罪名。像邹这样坚强的左派怎么会在两年后就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挨斗自杀，实在是个谜。

如果既未在一九五八年被“拔”，又未在一九五九年被“反”，也须夹紧尾巴做人。随后三年，在“大跃进”带来的饥荒中，知识份子同全国人民一起挨饿。广东的“大右派”罗翼群的“反党言论”——“农民在饿死的边缘”——不幸成了事实。几亿农民到了饿死边缘，两千万以上农民成了饿殍。可是饥馑刚过，毛泽东就大声疾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九六三、六四年开始批这批那，又有人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孙定国则是其中之一。

一九五七年冬，九三学社和《光明日报》联合举办千人批判大会，将储安平拉去当众批判。会中作主要发言者，是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特别邀请去的孙定国。孙能文能武，抗战时先后做过山西新军的旅长和八路军的军区副司令。一九五七年他是当校的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因为懂马克思主义，又有口才，在批判储氏、逼使他低头认罪一役中立过功。但是六年后孙自己也被批判，赶出了党校。一九六四年底，他被弄回党校，接受再批判，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让他在几千只眼睛面前站起，挖苦他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冒牌的哲学家”，又骂他是“大流氓、大坏蛋、大骗子”，“你是死不要脸！”当天夜里，他留下了一张遗书，跳进了校内湖中的冰窟窿。他在遗书中写道：“我今天才体会到邹鲁风的心情……”（注4 5：林青山着《康生外传》第二二二页。）

如果说一九六四年的打击面还不够宽的话，到了六六年文革，五七年的左、中、右就差不多一锅端了。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一九五七年八月，首都戏剧、电影界接连举行过四次批判吴祖光的大会，每次都由田汉主持。由于吴曾对“今天的政府机构和过去封建统治的机构有什么不同”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发表过疑问，田汉便着文批判吴“包藏祸心”，“一贯对我们的制度有反感”；他还将吴受邀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标上《当“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的题目，在报上发表，用以作为吴“反党”的铁证。吴是人人喊打的落水狗，剧作家曹禺甚至发表文章，说“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注4 6：《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十五期第十五页。）名作家老舍也打了一杆子，这大约是因为不打一杆子自己要惹祸，打一杆子也伤不到哪里去罢。后来吴到北大荒劳改，吴妻将他收藏的齐白石的画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说等吴归来时“物归原主”，可见他在会上、报上发表的斥骂吴的话并非由衷之言。

九年后，文革乍起，吴祖光幸运的活了下来，而老舍、田汉却相继死于非命。老舍是遭毒打后投湖自尽，受罪只是一时，田汉就惨了。试看文学教授秦似《悲田汉》诗“光天竟指鹿为马，暗室难堪尿作茶”二句之自注：“田汉有糖尿病，在狱中备受折磨，甚至尿胀亦不得解，遂不得已而解在脸盆内。监守者竟逼他喝下肚里去。”受此侮辱，何如一死了之。

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王昆仑早在一九三二年就成了秘密的中共党员，于是中共让他出头大肆批判其民革同事龙云、黄绍宏、陈铭枢等右派。但到了文革，他又被诬为“特务”、“反革命”，坐了八年牢。由于毒刑拷打，到释放时已成了半瘫的废人。

京剧艺术家周信芳参加了几十次反右斗争会，几乎每次都声色俱厉地斥责右派份子。他真心地热爱共产党，并于一九五九年要求加入中共。几年后他也成为斗争对象，被捆绑双手游街示众，终于折磨而死。其妻也被惨无人道的拷打致死。

上海《新闻日报》社长金仲华，也是紧跟中共刻薄咒骂“右派份子”的一员小卒。九年后，他也被中共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份子”的帽子，被斗争、抄家之后，终于自杀，骨灰也被当局抛弃而不可寻。作家巴金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这样记述了他的死况：“金仲华孤寂地吊死在书房里，住在楼下的八旬母亲只听见凳子倒下的响声。”（注4 7：巴金《随想录》第五集第三十二页。）

京剧女演员言慧珠在批判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陈仁炳的鬼把戏》的文章中说，她“感到社会主义社会比旧的社会制度好一千倍、一万倍！”又说“我要大声告诉右派份子，我们坚决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注48：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人民日报》。）九年后，这位被公认为中国最优秀的旦角演员的艺术家也像金仲华一样悬梁自尽，告别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中国史学界有两位权威人士，一是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一是离开清华教席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反右开始后不久，翦伯赞作为党员，紧跟中央，公开怀疑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三位右派部长在私底下有过串连，在鸣放中分工合作。“章乃器的说法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复辟；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就是政治上改制，要倒退到资本主义的民主；而罗隆基则要和共产党算旧账。”翦氏这样分析，只是凭“据说”而已，可是这一来，他们便成了一个阴谋集团——正与中共指称的“章罗反党联盟”合拍。吴晗则于六月中主持北京民盟的反右大会，决议要求对章伯钧、储安平、罗隆基等人“按组织纪律严肃处理”。中共让吴晗主持北京民盟的反右大会是要了花招的。吴晗的公开身份是民盟成员，但他已在三个月前秘密加入了中共，成了中共在民盟的代理人。（吴一九四九年一月曾给毛泽东去信，要求加入共产党，毛答复同意，但说时机尚值得研究。到五七年三月，这“时机”到了，吴被吸收加入中共，但身份不公开。）（注49：《党史研究》一九八〇年第四期第六十至六十二页。）由此可知，这所谓“民主党派”不过是中共操纵的民主玩具罢了。中共执政前，作为清华的一名教授，吴口常与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以及费孝通、钱伟长等民盟同志聚会，商谈如何与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相配合，反对国民党政府。而今潘、费、钱均被中共党作敌人处置，吴晗竟不明白自己早晚也会成为毛泽东的阶下囚，他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初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猛烈抨击右派，该发言以《我愤恨！我控诉！》的醒目标题在报上发表。

九年后，轮到翦、吴两位下油锅了。毛泽东说：“翦伯赞、吴晗是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注50：一九六六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毛第一次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时，在城楼上对北大附中的女红卫兵小将彭小蒙说：“娃娃，对翦伯赞，你们批判了吗？”

“他这种人，书读了不少，可是越读越反动。像他这样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人民还是有用的，可以扫扫垃圾，搞搞卫生嘛……”（注51：见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〇年三月号《写血书给毛泽东》，文章署名“佚名”。文中彭小蒙回忆道：“事隔二十年，毛主席的话我可能记得不很准确，但基本内容决不会错。”）

翦氏在历尽侮辱后，于一九六八年秋与妻子一起服药自尽。据说他死后，人们从他的左右衣袋里找出两张纸条，写有“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的字样。是真还是假，并不重要；倒是毛泽东果真“万岁”活到今天的话，翦伯赞恐怕还是“反共份子”一个，决无翻身之望。

吴晗的遭遇比翦氏更悲惨。他被捕入狱后，妻子也被关进劳改队的一间小浴室，直至全身瘫痪没救了，方许可其年幼的子女接回家，第二天便含冤而逝。七个月后，也即翦氏夫妇自尽的一年之后，吴晗的孩子被通知：“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他临死前提出过想要见你们，可我们不知你们的地址。”那十五岁的女孩受不了打击，精神分裂，历尽几年磨难之后，也选择了死。

还有什么比这些令人痛心的事实更能描绘毛泽东时代中国知识份子的处境和遭遇呢？

反右过了三十年，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的漫画家华君武痛定思痛，自述道：“批判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我都画了一些漫画‘配合’，曾经画过胡风、浦熙修、丁玲、萧干等，……当时自己洋洋自得，出版社也把这些漫画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现在回头看看，真可以说是‘不堪回首’。……想想人家已经遭受了不白之冤，我还添油加醋地去讽刺人家，实在很不应该。”（注52：《人物》一九八七年第二期第三十一页。）

一九八四年，反右时的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给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衍写信，对自己在文革中写文章批判周扬、夏衍，“伤及长者”表示“怅恨不已”，同时又表示当年主持省内文教、电影界的反右，“整了人，伤了朋友，嗣后历次运动，伤人更多，实为平生一大憾事。”

宋振庭悔恨自己伤了哪些人已不可考，但有一个被他伤了的人可能是他永远忘不了的。宋是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该省省会长春市委的宣传部部长范政是其直接下属。范因父亲李常青（即本章前面所述的教育部某司司长）及四位叔叔均是一生献给中共革命的老党员，少年时代便入了中共。他自幼聪颖过人，十四岁起便开始写剧本，写过一部在知识青年中颇有影响的小说《夏红秋》。反右中他被指为鼓动文艺界自由化，再加上一些别的罪名，成为右派。范后来被调到长春第一汽车厂任热处理车间主任。文革初期，右派份子个个是斗争对象，范被工人批斗、侮辱，愤然卧轨，碎尸三段。罪人自杀，无人收尸。他妻子不得不去收了那“自绝于党”的丈夫的尸体。

为安抚宋振庭不安的心灵，夏衍将文革中自己被关在牢里吟就的一首打油诗寄了给他：

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注 5 3：《散文世界》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夏衍是中共的一名高级干部，他对毛泽东一个接一个的搞运动，一批接一批的整人的手腕算是看透了。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这是抗战时流行在中共解放区的一首歌里的歌词。当中共各级干部们在一九五七年将其管辖下的知识份子圈成右派、送去劳改营的时候，也就埋下了九年后他们自己的名字被划上叉叉，押上斗争台的种子。

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胡锡奎反右时是个积极份子，他毫不手软地抓了好几百名右派学生。他在反右的高潮中咒骂那些右派教授们，说“其目的地是……使共产党的领导权化整为零，全部消灭。……把高等学校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地。”他以为他这样做是忠于党的行为。因为要忠于党，因为脑子里有“阶级斗争学说”，自然不会怜悯那些上了名单的无辜学生和教授，他大大超额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标。到了文革中，他自己被抓入监狱，并于三年后死在狱中。他的骨灰被丢弃而不可寻。今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里，他的骨灰盒中盛放的只是刻有“胡锡奎”三个字的一枚私章而已。胡遭此下场，不是由于知识份子的报复，尽管被他抓的几百名右派中有很多人的遭遇比他悲惨得多。当然，那更不是由于上天报应，而只能说是他们“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必然，只是他们自己认识不到而已。

第十五章：狠处理殃及妻孥

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作了个政治报告，提出：“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必需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白，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地出来加入干涉。”

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这段话，所有的人都表示满意，但是所有的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宪法明文规定中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如果中共认为某人反对它，那么此人是否违反了法律？刘少奇宣布保障公民权，前提是“他没有违反法律”。所以，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刘的话就等于白说。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女中央常委谭惕吾在鸣放会上发言，批评共产党带头违反宪法，指出上海对房产商的“改造”（实为没收）违法。她说：“共产党今天是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呢？还是自己捣自己的乱？”“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不应在法律、法令之外，再发内部指示。”“指示代替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注 1：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人民日报》）

就事论事，谭惕吾说得很对，但是仍然没有抓住上述那个要害问题。即使是这样，她也当上了右派。

逻辑是清楚明白的：要是中共认为某人反对它（言论上反对或者骨子里反对），这人就是“反党份子”，你说你不反对也不行。反党即违法，它就要“依法”予以制裁。它从来是依法行事的。

所以，凡是说中共不依法行事，对中共按其随时变更的“政策”处理事务的做法表示了不同意见的人，都被认为是“反党”，都当上了“右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就是一个例子。

在地方政法部门工作的法庭庭长、法官们，凡是主张依法办案，抵制当地党委干预的，差不多都在这时被当作右派打了下去，罪名一般是“反对党的领导，闹独立王国”。而且不论党内党外，“一视同仁”，全抓。譬如北京市司法部门抓了八十三名右派，占司法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九以上，其中包括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级法院院长，司法局正、副局长，律师协会副主任等。（注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市司法界右派份子是怎样进行反党破坏活动的》第一页。）别处如福建省司法厅厅长何公敢是右派，辽宁省司法厅正、副厅长也都是右派。检察部门亦类似，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彭瑞林是右派。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王范也够格当右派了，但他长期做保卫工作，一九四九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进入北京时，车队第一辆开路的就是他，所以只是大会“重点批判”一通，定为“右倾”，撤职了事，未扣右派帽子。后来他在文革中饮弹自杀，那是另一回事了。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法官费璐璐（女），出身豪门，早在四十年代国共内战期间就捐过巨额财产给中共。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她又捐了八万多元，以后陆续将其工厂、商店全捐给了国家。这样一位爱国者竟在一九五七年成了“反党份子”，戴上右派帽子到农村劳动改造去了。改造了六年，她大难不死回到北京，但不久便是文革，又再次被关了四年多。（注3：见《人物》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安徽大学法律系一九五〇年毕业的黄行，出任安徽青阳县人民法庭庭长之后，因为见到不少只是对中共在农村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不满，或对合作化运动发了几句牢骚的人被捕入狱，便指出这些人只是思想错误，并未触犯法律，不应判刑监押。结果他自己就罹了难。他被宣布成为右派之后，连见妻子一面的要求也不获准，就被押到山区一个铁矿“劳动改造”去了。

中共党内有许多正派勤恳的好干部，他们不求名利或不善人事，虽然资历很深，但没有进入权力机构，而集中于各级党的监察部门。由于他们的职业便是检查、制止各级干部的违法行为，在各级要员看来，属于“找岔子”，“说泄气话”的角色，平时嫌他们碍事却又撵不走，现在反右运动提供了一个处置他们的绝佳机会，因此各监察机构里的右派便多得要用箩筐装了。有的省，监察厅的机关干部竟有百分之二、三十被打成右派。

中共中央监察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王翰，早年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九一八”事变后曾与同学赴南京请愿，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为革命出生入死几十年后，他于一九五四年出任中共中央监察部要职。由于他主张使用知识份子，反对老搞运动等等，又“因对一个下面干部的划右派问题坚持不要划，结果在那个不许有异议的政治环境下，他自己就被划成了右派”。随后他被送到水利部的三门峡工程局当工人，被监督劳动。整整十六年（包括一九六六、六七年“天天挨打”的那段日子），他挺过来了，但身体已完全垮掉。厂里怕他死在那里，才答应由他的妻子接回北京。但作为无户口的“黑人”，他竟找不到一间肯收留他的医院。作家韦君宜为他作的传这样写道：“受尽千辛万苦，直至八十年代，平反了，来不及了，死去了。”（注4：《人民文学》一九八三年二月，韦君宜的文章。）寥寥数字，却是一曲深沉的、绵绵不绝的挽歌。

作为反右的一大成果，监察机构上下一并撤销了，从此再也没有人能够约束那些党委书记们，以后的无法无天的行为也就通行无阻了。只要党委书记们认为你在言论上、思想上，甚至“骨子里”反党，你就犯了法，就不受公民权保障。一九五八年正式对右派进行“处理”时，就是按这种逻辑行事的。

这“处理”，大致分几类。今以广西横县为例子以说明：

全县右派二百九十七人，逮捕入狱五名，送劳动教养二百一十五名，撤职三十三名，开除遣送回籍十名，开除公职留用二十名，在原单位监督劳改五名，降职降薪七名，逃跑失踪两名。（注5：《横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十五

至十六页。)

近三百名右派，除了两名失踪的（很可能跑到山里自杀了）以外，全部受到了惩罚性处置。逮捕、判刑是一类，从几年到十几年，到枪毙，都有。按官方的说法叫做“法办”。

应当说明，右派虽然“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并不等于就是“反革命”。这就是为何右派绝大多数并不坐牢的原因。然而，“反党”和“反革命”实在也只差半步，谁也说不清两者之间的界线。所以，你只是一名右派还是“右派加现行反革命”，送去劳教还是坐牢，就全看你命大不大，看管你的那个党委书记喜欢在你的生死簿上打哪个钩了。

辽宁省本溪钢铁公司有个副工长倪亦方，一九五二年以全优的成绩从燕京大学毕业。一九五四年他曾经与苏联专家在工作中发生争执，被领导认为是“顶撞”专家，免职记大过。一九五七年他又旧病复发，对领导的作风意见，于是成为“双料份子”——右派加现行反革命，进了监狱。（注6：《了望》周刊一九八六年第二十一期第二十九页。）

清华大学有位来自新加坡的侨生，戴上了右派帽子、被开除学籍后，在国内孑然一身，便申请出国回家。可是当局“研究”了一年之后，竟把他投入铁窗，背铐、脚镣、单人禁闭、捆绑吊打及苦役，没完没了地折磨了他整整二十年。（注7：见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一九九〇年七月号，韧锋《回忆“反右”期间的北京高校》。）

青海省有个撒拉族青年韩秋夫，因一篇文章被省文化局局长看中，调去《青海湖》文学月刊当编辑。他成了右派后，被抓到牢中蹲了二十三年。

一九五四年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的陈以强，反右前写了一篇讽刺某领导干部的短篇小说，虽未发表，却被定为右派。他对自己戴帽一事想不通，结果问题又转变为“现行反革命份子”，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注8：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中刘宾雁的文章。）

也许一九五七年的法官认为“十五”比较吉利，很多右派被判了十五年徒刑。除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学生林希翎外，再以几位清华大学的学生为例：张贴大字报要求中共“还政于民”的马维琦，十五年；在校园设立“自由论坛”的赵树范，十五年；另一位刘世广“谋划”成立政党，也是十五年；写《神·鬼·人》的孙宝琮也是十五年。（注9：同注7。）

十五年是相当长了，但同死刑相比又算从轻发落了。北京大学学生黄中奇，当上右派后被斗争。他而跳楼自杀，可惜没死，结果还是要带着伤继续挨斗。他愤怒得扬言要拿刀杀人。这下正中当局的意，尽管他只是说说而已，还是以“右派杀人犯”的罪名枪毙了他。二十多年后为他平反时，骨头早不知哪里去了。（注10：同注7。）

另一名北大学生，西方语言系一年级的顾文选才十八岁，当了右派后无处伸冤，竟天真地跑回杭州家里找妈妈。结果他被抓回北京，判处五年徒刑。刑满释放后，他留在劳改农场“就业”，永不能回到社会。在绝望中，他设法逃到了苏联。

哪知苏联更不把他当人，克格勃像畜生似的将他装进麻袋，弄到莫斯科审问，然后又送回远东，引渡回国。虽然他最后是在刑场的枪口下死去的，却总算在祖国得到了一块安息之地。（注11：北京大学一位右派讲师与本书作者的谈话。他是顾文选的老师，且与顾在同一农场劳改。）

右派们既成贱民，也就动辄得咎。有相当多的人在以后数年中“转变”为“现行反革命份子”（简称“现反”）而被捕入狱，甚至被枪决。在所谓“五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中，因为被认为有反对现政权的行为，右派受到的处置最为严厉。如四川重庆大学十八岁的学生李天德，被扣上帽子后同其他几名右派学生一起劳改。其中一位云南省籍的学生建议大家一起去他的土地肥沃、气候温暖的家乡混口饭吃，不料尚未动身就被说成是“妄图偷越国境”，伙人成了“反革命集团”。李被判处五年徒刑，刑满释放后又以“反革

命罪”再度判刑。但他一颗赤子之心仍未泯灭。获自由后，他于一九七五年春，怀揣万言书《献国策》，跑到北京国务院接待室，要求面见四川老乡邓小平。结果，他当晚就进了公安局的审讯室。之后，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改以“反革命罪”入狱二十年。

反右高潮中，《人民日报》发文《新华社连日围剿戴煌》（八月六日），公布了老共产党员、新华社记者戴煌的“右派言论”：“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除杀人放火外，无恶不作”，这一切“应该由中央负责”；如中央再不改变，他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员组织“共产党革命委员会”。

当时，共产党只是将戴煌开除，倒没有抓他去坐牢。可是他不知好歹，不体会这是党对他的“宽大”，反于一九六二年写了一份万言书，为自己辩护，要求平反。正好毛泽东向全党下达不得给右派平反的指令，当局立即宣布他那封信是“进一步向党进攻的炮弹”，将他逮捕，押送西北的劳改营去了。他这一去，整整十七年后才回家。

判刑的一般不在牢中白吃饭，多数被送到劳改营去，叫“劳改犯人”。另一类是“劳动教养”，俗称“劳教份子”。右派大多数是“劳教”。“劳教份子”和“劳改犯”关在一处“改造”，只是待遇略有差别，每月有二、三十元生活费，自己须交伙食费。实质二者均被视为犯人，只是劳改有刑期，劳教未经审判，没有刑期而已。

什么样的人劳教？《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上说的是：“不务正业”、“违反治安管理”、“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不服从工作分配……不断的无理取闹”、等等。此外就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份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份子”了。（注12：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人民日报》。）

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于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发布社论说：“右派份子攻击我们实行劳动教养违反宪法，这是最露骨的一种恶意攻击。”所以，现在轮到右派份子尝尝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教养”的滋味了。

如青年作家张贤亮成了右派后，在十八年间被“劳动教养”两次，“劳动管制”一次，外加一次“群众专政”，一次坐牢。他在“劳教”时的一位难友原是自己单位的领导，并不是右派。由于他真诚地相信中共“在劳动教育培养”的说法，在将本单位的右派都送去“劳教”后，他觉得自己也应当接受教育、改造，于是主动申请去劳动教养。结果，他与张贤亮等真右派为伍，不久就在繁重的劳动和饥饿的折磨下死了。（注13：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现代作家》一九八五年九月号第五十一页。）

各地将右派送去“劳教”的时间不一，大致上是一九五八年的头几个月。如四川省重庆市就往长寿县湖渔场送去了三百九十二名右派，这支队伍的主要成份是教授、学者、工程师。同时送去的还有一百九十二名“历史反革命”，“他们被禁锢在渔场的许多岛上，与世隔绝。他们被社会所遗弃。”（注14：元工《蓝幽幽的湖啊！》，《现代入家》一九八五年九月号第五十一页。）

还有一种惩罚，既不是“劳改”，也不是“劳教”，而叫“下放劳动”，身份是“下放干部”而不是罪人，但实际境遇与罪人毫无二致。如上海《文汇报》记者江显良，因主张共产党与各党派“互相竞赛”而被定为“极右份子”。本来，“极右”者都坐了牢或去了劳改营，但他却被宽大，仅“下放”上海郊区农村劳动。不过、别的“下放干部”有星期天，他没有；别人八点钟上班，他得七点就去作准备工作；别人下班了，他得留下收拾；别人下雨天不用干活，他还得下地去“改造”。这样年复一年地改造到一九六四年，盼不到出头之日，他终于跳楼自杀，死时仅三十出头。（注15：上海《文汇报》一位记者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另一种处理方法是“遣送回籍”。中国以农立国，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个农村或某个县为其“原籍”，哪怕你从未去过那里。由于罪人太多或由于此人罪行不大，一般的处理方法便往往是“遣送回籍”。

如四川医学院的学生李树楠，因给院刊写了一篇文章，建议不仅要向苏联，也可向英、美学习，不要将学英语看成落后而戴上“极右份子”帽子。之后批斗会无休无止，却又无处申诉。他请一位同情他的学院广播站管理员（高年级学生）给他对着话筒向全校师生讲话的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于是两人一并被送去劳动教养，在荒野的大

凉山劳改，配给的口粮不及常人的一半，长年在饥饿的折磨下挣扎。后来，由于“坚持反动立场”，他又被押送回云南老家，在街道当了二十年搬运工人。（注16：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天津某设计院一位刘姓建筑设计师，成了右派后，妻子同他离了婚。他被遣送原籍山东省东明县劳动改造，在黄河故道的荒地上种瓜。同在劳改营里服苦役相比，多少算是一种宽大。可是他穷得没钱买被褥，只得在土炕上撒一层细沙，就算是铺，又当了盖。他年复一年地在地里劳作，瓜种得出了名，当地瓜农均称他“瓜匠”。过了二十年，天津原设计院决定为他平反而找到他时，他已得了癌症，不久于人世了。（注17：北京《当代》文学双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瓜匠”的墓志铭》。）

凡事都有例外，也有人去了农村而没有吃太大的苦。安徽蒙城县有个南京去的育种专家丁震亚，在领导“征求意见”，鼓励他鸣放时，对省委书记下令全省推广旱粮田改种水稻一事发表意见道：“最好先试验，后推广，一个县不宜一下子搞几十万亩。”这一来，他成了“反对省委第一书记”的右派份子，送到一个农村“接受监督劳动”。那村的农民不懂阶级斗争，既不愿监督他，又不愿让他劳动，只是给这位五十五岁的专家土地和助手，请他培育良种。他则庆幸有了一块得以继续其育种研究的新天地。

幸运者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譬如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有一对年轻夫妇仇士华、蔡连珍，双双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双双成为右派，被逐出了实验室。此时，在考古学界利用碳同位素（碳十四）测定古生物年代的技术刚开始使用了几年，中国在这方面还是空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找到物理所所长钱三强，指名要求将这两位“闭着不用”的右派份子调给考古所研制用碳十四断代的仪器。从一九五九年起，仇、蔡两个右派份子在夏所长的保护下，用了七年的时间，终于制成了第一台碳十四断代仪。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是个考古学者，他闻讯赶去，高兴地对仇、蔡二位说：“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注18：一九八五年九月八日至十二日《光明日报》。）

自然，绝大多数右派份子没有这样幸运，他们无论从政治地位上还是经济生活上说，都成了社会的贱民。

除了前节所说“劳改”、“劳教”、判刑的之外，那些未失去人身自由，还被允许留在正常社会中的，日子也不好过。如文学教授董每戡及其妻一并上了广州中山大学的右派榜，工资顿失，无以糊口，只好一起回到妻子老家长沙市去，依赖亲友接济为生。作为一个学者，蛰居整整二十年，没有收入维持生计，除了未受劳改皮肉之苦外，精神痛苦并不弱一分。

有少数右派，反右后被宽大，获准被“原单位留用”。这些虽然也在正常社会中，却也是社会中的一群贱民。

一位一九五七年时任天津某工业设计院主任工程师的右派曾这样告诉作家冯骥才：

“我们总共五百个知识份子，一下子打了八十八个‘右派’，占百分之十七。”“到了五七年上边又下个命令，说所有‘右派’都不准做技术工作，一律做体力劳动……每天早上工人师傅没起床，我们‘老右’就得拿桶把洗脸水放在他们门口。”

什么是新中国的贱民？这就是，尽管共产党认为不把他们送到劳改营去就已经是很宽大了。

不仅右派份子们本身成了社会的贱民，连他们的家属也低人三等，成了准贱民。如兰州大学的陈时伟、左宗杞夫妇，二人均为留美归来的化学博士。陈为兰大副校长，左为化学系主任。夫妇双双成为右派后，孩子也陷入了绝境。女儿一九五八年高中毕业，成绩为全市第一名，可是就因为父母是“阶级敌人”而进不了任何一所大学。陈本人饿死在劳改营里固然极惨，那女儿受不了打击而终至精神失常，也成了那段黑暗岁月的牺牲品。

广州的话剧演员章曼莘成右派后，她的儿子陶令昌就学的上海戏剧学院要把他赶走，不说开除，却说要他到西北去“支援边疆”。陶不服从，只好离校。一个才念了两年大学的青年就这样失学又失业了。

已经学成的也要受右派父母的牵连。丁玲的儿子留学苏联，学的是潜艇专业。但右派的儿子无资格从事国防工业，他便被分配去搞民用船舶了。

作为右派的妻子，最痛苦的也许不是丈夫成为“反党份子”这件事本身，而是党的干部要她与丈夫划清界线离婚的压力。

作家王若望被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点名，成为“大右派”后，他的妻子李明也被处理。她的上海电机工业局党委书记的职务及市委候补委员的头衔被撤销不说，代表党的人还找她谈话：“要么你与他划清界线，要么你要王若望。”她回答：“我怎么能不要王若望呢？”于是她被警告道：“后果你自己考虑吧！”（注19：王若望与本书作者的谈话。）她没能“考虑”下去，疯了。被精神病引发的一系列疾病折磨了七年后，她丢下丈夫和一堆孩子，死了。

北京的回民居住区牛街一户人家有姐妹俩，其祖父由沙特阿拉伯迁来。姐姐黄桂琴的丈夫梁增祥是邮电部的一位工程师，本来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被定为右派后坚持认为自己给党提的意见是事实，无须认错，于是被逮捕入狱。黄桂琴所在的北京公共汽车公司接着便动员她与梁离婚，说是离了婚便可入党，还可被提拔当副股长。黄坚拒离婚，结果由干部降为工人，被派去刷油漆了。他们的年方两岁的女儿直到十七年后才见到被准许回到北京的父亲。

妹妹黄凤琴与丈夫刘俊卿均是共产党员。刘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为右派后被收押，预定半个月后送新疆劳改。黄凤琴所在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党小组长轮番找她谈话，要她在半个月内作出选择：“要党还是要丈夫？”她带着一个才几个月的女儿，被逼得走头无路，只好选择党，同丈夫离了婚。（注20：黄家姐妹的孩子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除了政治压力外，由于一般右派都失去了工资，仅领得勉强维持一个人吃饭的“生活费”，不少妻子为了摆脱经济困境而选择了离婚。还有一些人，因为子女受歧视，为了子女的前途计而被迫与丈夫离婚。更有一些人，若不与右派丈夫离婚，自己也将面临被“下放”的威胁，为求自保或为免孩子受苦，只得忍痛选择离婚。

有的妻子迫于压力与右派丈夫离了婚，却还苦苦等着，希望有朝一日还能破镜重圆。

一九五〇年，清华大学营建系副教授高庄曾奉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稿制作成浮雕，经他改动定型制成的国徽浮雕比原设计更臻完善，普受好评。可是到了五五年他就因“破坏中苏友好”、“反苏、反人民”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宜兴去搞紫砂壶工艺美术设计。五七年成了右派后，妻子便同他离了婚。他被送往劳改农场，数年后解除劳改，留场就业，仍不得返回社会。直到一九七五年他获准回宜兴时，他发现十八年来妻子竟一直在等着他，两人由是复婚。

对右派的妻子来说，与丈夫“划清阶级界线”、一刀两断固然是一条出路，但对其丈夫多少是一种落井下石的行为。实际上不少妻子既拒绝接受丈夫成为社会的“敌人”这一现实，又无力抵御社会的压力，结果只得以自杀作为解脱，家破人亡。数不清的人间悲剧就这样在反右的凯歌声中撒在了中国大地上。

当然，我们的民族还有更多的坚强不屈、不向暴政低头的妇女，在这里是很应当为她们记上一笔的。

有一天，《人民日报》登出了一则报道，说有位女性与其右派丈夫离婚，因此光劳入党云云。当天，文化部一位副部长把剧作家吴祖光的妻子、名演员新风霞叫去，让她读那段文字，并对她说：“你应当向她学习。”说是离了婚便可以入党，否则便要承担后果。新风霞拒绝后，女演员与部长之间有个简短的对话：

部长：“我们要把他送到很远的地方。”

新：“我可以等他回来。”

“噢！你能等多久？”

“王宝钏等薛平贵等了十八年，我能等二十八年。”

“……你给我出去！”（注2 1：见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一年六月号吴祖光的文章。）

新风霞不取“党票”而取了“后果”，于是成为“内控右派”。所以“内控”，是因为若她成为右派份子，便不能登台演戏，剧团的演出便卖不出票，要垮台。由此新风霞开始了两面人的生涯：在台上，她受不明底细的观众的鼓掌、喝采；下得台来则倒痰盂，扫厕所，当清洁工，算是劳改。

黄梅戏名角严凤英的命运与新风霞差不多。她在鸣放时说过要“头顶状纸告到中央”一类的话，当局决定将她定为右派。材料报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那里，曾不予批准，说：“这算什么反党呢？中央不是党吗？”正在此时，周恩来来到安徽，指名要看严的戏，于是严被保了下来。不过她的丈夫却因写了一篇文章而被划为右派，被发配到农场劳改去了。

像新风霞一样，严凤英也拒绝与自己的丈夫离婚。由于有周恩来、曾希圣的保护，她依旧可以演戏、拍电影，在舞台上饰演一个“女驸马”，将古代一个奇女子扮男装入深宫、打动公主救丈夫出冤狱的故事传遍全国。当然，她在戏里做的并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再现。她无计将在农场劳改的丈夫营救出来，她只能凄苦地带着孩子、侍候婆婆，度过辛酸的日子。那时，她仍然对中共一片热忱，努力要求加入中共，并终于在一九六〇年如愿。但是到了一九六八年，她不堪文革中的凌辱，终于自杀。一代名优弃世而去，年仅三十七岁。

拒绝与右派丈夫离婚需要坚强，嫁给右派更需要勇气。

北京画家王复羊被定为右派后，被强制劳改，每月十八元工资，仅够糊口。女友崔振国（亦为画家）决心与之结婚，但领导警告她，如与王结婚，便将她发配大西北。崔不为所动，与王结婚，之后与王一同被“流放”到青海去了。

新华通讯社记者戴煌一九六二年被捕时，妻子早已因他是右派而与他离了婚，连两个孩子也没要。就在戴要被押送西北劳改营、眼看两个孩子要成为孤儿”的前一天，一位工厂女工毅然同他结婚，以便取得合法抚养孩子的权利，此后便含辛茹苦地照那两个孩子，直到十七年后戴获平反回到北京。（注2 2：戈扬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嫁给右派所需要的勇气，后人已经很难想像了。安徽省坠子剧团名演员陈元萍曾在华东地区戏曲汇演中获一等奖，可是与已成右派的男友结婚后，就被剧团除名，成了在街头卖大碗茶的。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像他们夫妇那种身份的被打死不知多少。为了活命，二人逃到大别山里，隐姓埋名，流浪行乞，直到一九七九年听说右派全部“改正”才回到人间。可是，一年后，她那学经济的右派丈夫又因批评其顶头上司被斥为“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党”，他看不到希望，终于在给中共中央留下一份万言遗书后自杀，结束了痛苦。（注2 3：见《了望》周刊一九八六年第三十四及三十六期。）

当女性自己也成为右派时，就需要更大的勇气才能活下来了。

一九四九年，宁夏六盘山区第一位考上大学的女性夏莲芳从重庆高等师范毕业，与她的新婚丈夫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家乡。她没守在固原县城父母身边，到山里当了一名女教师。寒暑八年后，这对年轻人已决心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山里的孩子，可是她被宣布为“右派份子”，赶离学校；丈夫则变成“反革命”，被抓进了牢房。没过几个月，丈夫死在狱中，她便成了“反革命的右派寡妇”。

然而，这位女教师心里的火并未因此而熄灭。不能当教师就当“业余”的。她走家串户，动员老乡们把孩子送到她家里，在她自家的窑洞里读书写字、唱歌跳舞。她当了二十一年的业务“业余教师”。一九七七年，她的“右派”案和前夫的“反革命”案都平反了，县长的车子开进山村，登门慰问“夏老师”时，她只提了一个要求：“允许我当一个山村教师吧。”

中国的知识女性，也许对真理有着格外深的执著。北京大学女学生林昭可以说是个典型。她出身于一个革命的家庭。她的母亲早在大革命时代就追随胞兄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屠杀共产党人，林昭的那位时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的舅舅也从容就义。林在母亲的教诲下长大，对新中国充满了激情。她二十岁时就在《常州民报》当记者，写了不少新闻、诗歌、散文。一九四五年，她以江苏省最高分考取北大新闻系。鸣放时，她为费孝通的《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叫好，又声明支持已被批判的流沙河的诗文，并在北大的“自由论坛”朗诵自己的诗《我是剑，我是火焰！》这样，她便成了“右派份子”。

本书前面曾经提到林昭自杀一事，她自杀前曾写下一份绝命书，抨击历次政治运动中用别人的血“染红面貌的人”，诅咒“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让我的影子永远跟着他们……让他们身上永远染着我的血”。她自杀获救后，被送去“劳动教养”，以后又因病遣送回上海家中。由于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导致了更大的灾难，她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兰州大学下放在甘肃武山县和天水县劳动的十几名右派学生，合作编印了一份刊物《星火》。刊物中《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指出：农村正在大量饿死人，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直接后果。共产党已经腐朽，需要一次革命，希望党内的同志起来……。该刊还印了林昭的一首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这批年轻人同时又写了意见书，拟寄给各省市的共产党领导人，希望靠他们来修改中共的错误政策。但是，文章尚未寄出，《星火》第二期尚在编辑中，他们就于一九六〇年九月全部被捕了。（注24：因涉此案入狱的兰大学生何之明的回忆。原件应存于甘肃武山县法院。）

几年后，林昭的妹妹去探监，她用一床白被作裙子，拖曳在地，手臂上套着一块黑布，上面用白线绣了一个“冤”字。她的头发留得极长，齐根扎了一条白手帕，宛如千古名剧《窦娥冤》中的那位女性。

由于不服“无产阶级”对她的专政，她被认为是“抗拒”，于是原先的“二十年有期徒刑”被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差不多同时，同案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张春元及曾支持他们的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在武山县被诬以“密谋暴动越狱”而枪决。）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是官方法定的“劳动人民的节日”。在这一天，当局派人到林昭家中，冷冷地宣布：“林昭已被处决。付五分钱子弹费！”林的妹妹默默地为已不在人世的姐姐付了那颗子弹的费用，母亲则昏厥了过去。以后，林的父亲愤而自杀，母亲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忧愤而死。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就这样消失了。

综观林昭短暂的一生，她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她只是在接到死刑判决书后，剖开自己的血管，留下了一份血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这是一位纤弱而又坚强的江南女子留在人间的血诗，我们不妨抄录几句在这里：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抹吧，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阳谋》第十六章：入“另册”殉难者众

反右高潮中，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注1：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真死也罢，装死也罢，对这些命如蝼蚁的小人物，毛泽东是不存怜悯之心的。许多入了“另册”的右派，在看到同这个政权无理可讲之后，就只有以死抗争了。

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上海市当局在郊区某处集中全市各机关、学校送来的右派份子，然后一批批地押送到外省的劳改农场去。但是不少人没有活着离开那里，他们在被押走之前选择了死。

多少人自杀了？自杀者太多，多得无法统计。死者多，死法也多。有女学生在宿舍用头撞暖气管而死的，有服实验室的氰化钾而死的，还有吞食火柴头自杀的。

清华大学旁的铁路常有自杀者卧在那里。跳教学楼的不稀罕，爬上高耸的烟囱纵身往下跳的也有。

北京颐和园后山有一棵歪子老槐树，早上时常有一、两人被发现吊在那里。浅浅的昆明湖，时常有人往里跳，有的人身子插在浅浅的湖底淤泥中，双脚还露在水面上。

风景如画的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成了右派的殉难地。

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鸣放期间正在苏联开会，自然没有反党言论。但他人还在外国，学校就造出了一个“余（瑞璜，物理学家）、丁、徐（理治，数学家）反党集团”，把他定成了右派。丁返国后回到北京大学拟继续编写教材的工作，可是东北人大却电话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对国内来势凶猛的运动毫无思想准备，即投身北大校园内的未名湖，死了。

云南昆明的资本家、政协委员汤汝光本以为自己听党的话，积极批判右派，党就会信任他。不料消息传出，他也可能被定为右派，于是痛不欲生，跳了河。

丁则良和汤汝光尚未被斗就先一了百了，没有受罪。有的人则是在被斗得生不如死的情况下，不得不寻短见的。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女学生江凤英，是核校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么？》二十二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为全校要“斗臭斗垮斗倒”的头号目标。她被连续斗了三天，昏倒在台上，喷几口冷水弄醒再斗，直倒下后喷水也不灵为止。她被抬回宿舍后，当晚就跳了楼，成为反右的又一名祭品。（注2：林学政《阳谋》，引自《从大陆看大陆》一书。林是福建师大右派学生。）

云南大学中文系有四名同学，因为向系党总支部的领导提了意见，一并被定为右派份子。因不堪批判斗争的侮辱，其中一位共产党员跳湖自尽了。

既能演、又能导的“天才表演艺术家”（中国早期电影艺术大师黄佐临语）石挥，不久前导演的电影《鸡毛信》在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得过奖，反右时刚完成一部根据真事改编的电影《雾海夜航》。由于片中有一干部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算是“诬蔑党的干部”；他平时说的笑话（指管理制片厂的电影局的人为“警察局派来的警察”、“咱们拍镜头都要经过警察局（批准）”也扯来作为罪证。连续被批判、斗争两天之后，他登上自上海至宁波的轮船，在真正的雾海夜航中跳进吴淞口外的扬子江，年仅四十二岁。

去了台湾的文化名人胡适只有一个孩子胡恩杜留在大陆，他也是无数不甘受辱的自杀者中的一员。胡是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人民日报》在发文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胡恩杜两人“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时，特别注明胡是“胡适的儿子”。（注3：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胡适是仅次于蒋介石的“大坏蛋”，这样一来，胡恩杜也就没有活路了。尽管他早在共产党刚进城执政时，就已经公开宣布同“反动”的父亲划清了界线。

广东某县一位年轻的小学校长，在全学区右派指标缺一个时，被补入名单凑了数。他被准许留校，撤职当教员，但不能教政治、历史、语文，只能教不涉意识形态的数学及做杂工。工资没有，每月仅得十五元生活费。他养不活妻子、小孩，还要忍受批斗及辱骂，终于寻了短见。死后，县广播站对全县宣布：“右派、特务、反革命份子 x x 畏罪自杀，死于汽车轮下……”（注4：香港《争鸣》月刊一九八七年六月号第四十八页。）

死者听不到斗争会的口号声，但这不等于斗争会就可以免了。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女技术员黄倩，是上海过去的地头蛇黄金荣的堂侄孙女，哥哥又在台湾，只因写了一份大字报，希望领导“对目前的知识青年的取舍、培养、使用和鉴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应着重从他们具体的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去观察、鉴别和评价……”被定为右派。一连几天几晚的斗争，斗争之余又打扫厕所，这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受不了，上吊自杀了。但第二天，设计院礼堂却挂出了横幅：“批判黄倩右派谬论大会”。在党委安排下，大会对死者批判道：“用死来软化群众博取同情；用死来威胁党；用死来否定党的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用死来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注5：见香港自联出版社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印行《鸣放回忆》一书，小铤《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鸣放记》。）

“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自杀成功，痛苦也就消失。最可怜的还是“自杀未遂”，继续在人间煎熬的。北京地质学院一个学生，被斗争后爬上了该校的大烟囱。他已打算一蹶了之，可是禁不住校方在下边好言相劝，竟被说服，又爬了下来，他一着地，当局的好话便立刻不算数。他被逮捕入狱，从地质学院消失，再也无人知其下落了。

年轻的《北京日报》女记者张沪，因为自己、丈夫、父亲、弟弟都成了右派，过够了在苦痛中劳改的日子，一下吞服近百片安眠药，打算一了百了，但不幸被过早发现送进医院而获救。出院时，她与丈夫从维熙去向医院院长道谢。也是女人的院长当着她的面说：“当时我们不知道张沪是个右派份子，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不会费那么大力气去进行抢救！”说完便逐客，好像在告诉张沪：“你本该死的。”张沪这位十二年前才十六岁时就在上海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右派的父亲、弟弟也都是老党员）的人被党弃如敝屣，过不了多久就因为“自绝于人民”被严加惩处。她与原为报社编辑兼作家的丈夫从维熙一同被勒令签字画押，一同上警车，一同成了囚犯。

张沪是个小人物，对中共没有价值，自杀不遂还得坐牢。广东省工商联副主任陈祖沛（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受的待待遇便客气得多。他因被指为“章乃器的广东代理人”、“陈祖沛右派集团”的头子，在七斗八斗之后愤而跳楼，幸亏只跛了一条腿，人还活着。由于他是中共建国初期自香港挟资归国的，中共着眼于仍在香港、海外的大资本家，便未再对他穷追狠打，保留了他的“政协委员”的资格，更没送他去坐牢。

自杀并不见得是因为懦弱。有人因为见到与自己背景相同的人被划为右派后受尽凌辱，为免自己受辱而预先寻了死。有人因为亲人被斗争，不愿与之“划清界线”而宁可玉碎。有一位中学生因为说“苏联并不是真正帮助中国，他们把中国的鸡蛋、苹果，好吃的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而被检举，当局便责令其父“揭发”。父亲不愿伤害儿子，卧了铁轨。

也有母亲因为孩子成为右派而自杀的。鸣放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秘书吉世林奉谢之命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林希翎，说谢欲在家中见她。后来接见时吉也在场陪同。林被指定为“大右派”后，吉也受累落网。老婆离婚带走孩子，他被遣送老家农村监督劳动。老母亲见此，愤而上吊自杀。吉从此孑然一身，开始了漫长的贱民生涯。

还有父亲因为儿子成右派而活不下去的。此人名蒋维乔，又名因是子，是一位气功师，著有《因是子静坐法》。毛泽东年轻时曾“自信人生二百年”，那是信了这位名气功师的“废朝食，可以二百岁的理论。一九五七年时，因是子已八十多岁。一天，他的儿子回到家中，告诉他成了“右派”，他当即说“我不想活”了。转身上练功的小楼。待他儿子醒悟上楼，他已安静的死去了。

对于因是子的死，谢觉哉说过一段话。他于一九六〇年给中共另一元老徐特立写信道：“因是子曾来说法，归真返寂已三年。……一九五七年来北戴河疗养院讲法（即气功疗养）……八十一、二岁，估计他还可以活若干年。顷听黄任老（黄炎培）说蒋老死已二三年了。大概来此说法回去就死了。气功疗养也不过如此。”（注6：见《怀念谢觉哉同志》第一七五页。）

谢觉哉以为因是子未能长寿，是因为他的气功疗养法不灵，却没想过他是自杀。但他确实死得蹊跷，那是因为家

中出了右派，子女们不敢张声而已。若非儿子成了罪人，他是绝不可能这样死去的。

对常人来说，跳楼是最简单的解脱之道。如上海《文汇报》管理部副主任梅焕藻就是这样解决的。但这并不等于跳楼者一定就是右派。《中国青年报》编辑戚学毅，自己并不是右派份子，但他不愿如别人一样，违心的去批判自己的同行刘宾雁。他不愿“带着锈损了的灵魂而活下去”，就在批判刘宾雁的大会现场跳楼自杀。他当然不是死于中共的迫害，但他的死却比右派份子的死，更深刻地揭示了那场大规模迫害的恐怖。那场古今罕见的政治迫害，不仅摧残了近百万被打成“敌人”的右派份子，而且制造了数以千万计的“锈损了的灵魂”。无数人为了保护自己，明知被斗者是好人也要去打一棍子。这对民族的戕害，实在要比致数万人于死地的迫害更为深重。

一九五八年春节年三十那天，北京西郊几所大学的右派学生、助教、讲师接到通知，自带铺盖到某处报到。报到后摘掉校徽，上车，开到派出所，一个一个按指印。认为自己没犯罪，拒绝按的则由几个警察架住，扣上手铐，强行按上指印，而后押上大客车。车厢首尾各有一个端着手枪的警察监视，每个人必须低头，不得朝窗外看，直到车子开进市内的半步桥监狱。许多学生流着眼泪吃完了年夜饭。

十天后，这些右派们与刑事犯一起，在半夜里被解押到火车站，转运到北京以东一百余公里的茶淀车站。下车时，四周房顶上架着机枪，另有一支马队监视着犯人的举动。

这就是著名的清河劳改农场的所在地。以其中的三分场为例，五百人左右的犯人，大多数是“劳教”的右派，少数是刑事犯。右派也有个别是“劳改”。“劳改”的没有工资，“劳教”的则按体力强弱发给二十四至三十二元的工资，再交回十元饭钱——严格按照“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行事。

住处是个“口”字型的建筑，中间是空地。四个角上各有一个岗楼，架着机枪。

干活时，地里四个角都有岗哨，不可越出界限。午间休息在地头吃饭，每人两个玉米面窝窝头、两根萝卜条。从伙房运到地里，玉米窝头已经冻得很硬，咬都咬不动。每人每月定粮四十五斤，一周可以吃到一顿大米饭，两周可以吃到一顿饺子。

到了一九六〇年前后，由于“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经济崩溃，全国陷入了饥荒。劳改农场自然是首先削减粮食供应的地方。每个犯人，包括只是“劳教”而不是犯人的右派在内，从一九五九年底开始，定量由四十五斤降到了二十一斤。可是劳动量并没因此而减轻。人们逐渐虚弱，连铁锹也握不动，收工回来连爬上炕的力气都没有了。当人都浮肿的时候，便开始死去。一个分场竟至有一个小分队的任务便是埋人。

本来，劳动已经免了，但春天来了，年轻的都被集中送到某处去春耕。三分场半数以上的犯人集中去春耕，其中少数是刑事犯，大多数是学生，从北京西郊来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工业学院、钢铁学院、航空学院等校的右派份子。由于食物不足，劳动繁重，那三百人左右的春耕队伍全都倒下了，没有一个活到夏天。

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的两位右派学生张心涛、刘雪峰，本来一个壮实得像张飞，一个长得又高又大，身体特别好。两人被送到春耕队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是清华电机系的杨小平，当时身体虚弱得不行，没被选中，结果反而活下来了。

由于未经审判，或者说由于不是犯人，无须审判，劳动教养的右派们不知道自己要被教养多久。捱过了一九六〇年的饥馑，一般倒也不再会有饿死之虞。大家只盼着能挺到解除教养、回到北京去的那一天，谁料六一年年底，当局向右派们宣布：教养是四年，六二年春天到期，但是北京要办成“水晶城”、“玻璃城”，不能收容坏人，所以右派解除教养后全部留场“就业”。这样右派们就注定终身不能回到正常人的社会中去了。

到了一九六九年，中苏东北边境闹磨擦，中共怕苏军从渤海湾进攻，直取北京，而清河农场正是从渤海湾到北京

城的必经之地。劳改犯人以及已经解除劳教但仍不准回北京的就业右派们，都是潜在的危险份子——尽管其中不乏因“反苏”而戴上右派帽子的，一律不得留下。这样右派们便被遣送回原籍农村，清河农场作为右派劳改场所的历史终于在六九年底前后结束，历时计十二年。（注7：在清河农场呆了十二年的北京大学一名右派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在中国的东北角，有一大片未曾开垦的处女地。自从一百多年前俄国人掠走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那块丰腴的土地之后，这块处女地就成了中国东北的边陲，俗称“北大荒”。五十年代初，新政府陆续在那里开辟了农场，转业的人民解放军一批一批的到达那里，年轻的国家建设者也一批批到达；同时，囚犯和历次运动中被整肃的好人也一批批地到了这里。有部电影描绘了那些垦荒者的创业生涯，许多人至今还记得那些英雄好汉们坐在雪橇里，在雪原上唱的诙谐的歌：“北大荒来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没有大姑娘……”一九五五年周恩来总理批准在北大荒中苏边界上的兴凯湖旁建了一座农场，专收北京送去的“劳教”、“劳改”犯。到了五八年，那里便成了北京右派的集中处。

一九五八年春天，北京火车站忙了好一阵子。在“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的凯歌声中，一批一批右派份子被押上了开往北大荒劳改营的火车。

右派份子到了农场，全部衣服包括内衣裤都用油漆写上“劳改”二字。这样，除非赤条条的跑或永远画伏夜出，绝无可能找到藏身之地。由于政府的“宽大”，他们不是犯人，没有刑期；但这样一来出头之日就是个未知数，也可能遥遥无期。劳改营的某些规则适用于右派与一般犯人。譬如：擅自越出警戒线（包括劳动时的许可活动范围）者，武装人员有权开枪；家属可以定期探望，通信要经当局拆阅；口粮以相当于一个小学生的标准配给。他们的待遇比当年被俘的国民党官兵不知差几许，理由是俘虏缴了枪就不再危险，而思想反动的右派份子在还没有改造时等于还没有缴械，因此仍算危险份子，不可优待。

什么样的人送北大荒？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只要“罪行”够得上“劳改”或“劳教”。

剧作家吴祖光以及“吴祖光反党小集团”的成员都去了北大荒。吴三十年后写过一篇记述《人民画报》副主编胡考的文章，说“从此以后好多年都不知道胡考的去向”。其实，胡也在北大荒劳改，只是北大荒地方太广，彼此不知音讯而已。

《人民画报》的另一个副主编丁聪也被送到北大荒去了。一九四六年国共内战前夕，周恩来撤离上海之前，曾将丁聪等人找去，要他们保护自己，免被国民党当局加害。丁聪等便于一九四七年到了香港，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共胜利才回北京。如今中共要抓人，谁也没处躲。后来周恩来把他们从北大荒放回来，已是一九六一年的事了。

一九四二年，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员王莹及其丈夫谢和赓在周恩来指示安排下赴美国留学。王是个杰出的演员，还是个作家。一九四三年春，她曾应美国政府邀请在白宫演出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抗战歌曲。一九五二年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大批人受迫害。大概由于共产党身份被暴灵，王莹夫妇于五四年被诬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罪名下狱，后经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等人的声援，被驱逐出境，于年底回国。一年多后他们参加工作不久，即遇上整风反右，谢和赓落了网。中共将这样的爱国人士扫进右派堆中还嫌不足，一九五八年又将谢押上了去北大荒劳改营的火车。这一回，再没有人为他们呼吁、鸣冤了。

到了文革中，谢和赓坐了八年监狱，出来时神经已失常。王莹则更惨，一九六七年被抓入牢房后就再没有活着出来，七四年死去时，死亡书上没有名字，仅有一个代号“六七四二”。

这里应当为一些勇敢、坚强的女子记上一笔。她们在丈夫无辜获罪后决心与丈夫共命运，主动随同来到北大荒。她们的丈夫是罪人，当然不配享有夫妇独处一室的优待，入夜，几十名劳改犯在一大统铺上逐条躺下，两端靠墙处则各睡着一位女性，紧贴着各自的丈夫。这些女姓就在这种窘迫的环境中开始了其北大荒的生活。

右派们在北大荒，真正受到了那种“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锻炼，由于饿、累、病而拖垮、死去的不知多少。越南华侨中有个老革命家张式，由于开办越华文化公司，专向华侨出售进步书刊，被法国殖民者驱逐到香港，回归祖国后担任民盟中央常委。他作为一名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劳改，不明不白的死在那里，成为许多殉难者中的一员。

上海出版界的老人、作家巴金的朋友卢芷芬也是送往北大荒并死在那里的右派。巴金说“卢芷芬甚至给送到北大荒去劳改，竟然死在那里，据说他临终前想‘喝上一碗大米稀粥而不可得’”，（注8：巴金《随想录》第五卷第一一三页。）看来是饿死的。

死在北大荒的民族精华的名字无法一一追踪，但这里还可以再提一位。一九五一年，名歌唱家张权自美归来，周恩来曾出席她的第一场演唱会，鼓励她永远为新中国歌唱。现在她成了右派份子，被赶下舞台，赶出了北京。因为是女的，她未被送去北大荒。她的丈夫，中央歌剧院的合唱指挥莫桂新却未能受此宽大，作为右派大军的一员，他被送到兴凯湖农场，不久就死在那里，再也没有回来。

北大荒的多数死者同莫桂新一样，是饿死的。但也有人采用了自杀手段对当局大规模迫害知识份子表示抗议。北京协和医院（中国医科大学前身）学生林澄，作为右派份子被发送到兴凯湖农场劳改。因劳改农场的干部也找他治病，他有行动自由，住单间，还能吃上为干部设的小灶。但是他用一把手术刀割开自己的腿部动脉，死在兴凯湖边。

也有因逃跑而被打死的。北京俄语学院的一个右派学生，一九五八年大年三十在派出所被要求按指印时曾抗议：“我没犯法，为其么要按指印？”结果当场被扣上手铐，几个警察强行制服他，按了指印。由于他“态度恶劣”，须予严惩，在别的同学由北京半步桥监狱押往清河农场时，他却单独被送到了兴凯湖农场。在那里，这个性子刚烈的青年决定逃跑。可是，当他在冰封的江面上往苏联方向奔跑时，背部中弹，再也没有爬起来。（注9：同注7，一九六一年，兴凯湖有一批右派调到清河农场，将此事告诉了北京大学这名右派。时隔三十年，他忘了那名死者的名字。）

各人命运、造化不同，在北大荒也有人未受大难。北大荒本有一批为开发边疆而献身的爱国者，有幸投到他们门下的右派们便没有遭太大的罪。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匆匆提前结束在美国的学业、回国参加抗战的土木工程博士李温平，战时终在西南大后方建设公路桥梁。当时为了打开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的出口，决定与盟军合作开辟一条中缅公路。作为中方的主任工程师，李在那个工程中立了大功，于一九四六年荣获美国自由勋章。这位不为人知的抗日英雄，一九五七年时是建筑科学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室的副总工程师，鸣放中没有什么言论，但他是农工民主党北京市的联络人，章伯钧请工程界人士吃饭，名单是由他提出的。《人民日报》发文《在章伯钧直接指挥下，李温平在工程界捣乱》，以后他便顶着右派帽子到了北大荒劳改营。来到北大荒后，他以其专业知识帮助农场大幅提高了水利工程的效率。该农场领导人立即将他提拔为自己的助手（虽然他无权正式任命一个右派），并向上级打报告，要求将这位劳改犯的工资由犯人的最高月薪三十元提高到与自己相同的一百三十元。在这位不知名的干部爱护下，李博士终于在北大荒寻到了一块报效祖国的用武之地。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终于能在二十多年后赴美领受了那枚久违了数十年的自由勋章。

一九六一年前后，由于发动“大跃进”而引致全国性的饥馑，二千万农民饿死，毛泽东的左调才有所收敛，于是中共其他的一些领导人才得以着手做一些拯人民于水火的好事。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长张执一向周恩来请示说：“北大荒有不少右派上了年纪，可不可以让他们回来？”周问有哪些人，张答：“譬如聂绀弩——”

聂绀弩（诗人、文学家，中国作协党组成员）的妻姐是周恩来、邓颖超年轻时在天津发起的“觉悟社”的成员，与邓情同手足，因此邓一直称聂之妻周颖为“阿妹”，周恩来也就称聂为“妹夫”。有此关系，周恩来自然要搭救聂。但他又欲不露痕迹，便答道：“聂绀弩？这人吊儿郎当的！让他们回来吧！”（注10：《报告文学》一九八六年第十一期。）

周一句似乎漫不经心的话，解放了一批中国文化界的名人，使这些民族精英（包括吴祖光等）走出了劳改营。不过，总的来说，中国的知识份子受到的摧残实在太大了。

从北大荒向西走，是中国的森林宝库大兴安岭。北京曾一批送去过十二名右派知识份子，多年后活着回京的只有一位（王孚庆，中国新闻社编辑）。（注1 1：香港《百姓》半月刊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六日总第九十六期中《陆铿新闻信》。）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两千名左右犯人全是知识份子，绝大部份是右派。一九六〇年前后，两千人中死了一千六！（注1 2：画家高尔泰在兰州成为右派后被送到夹边沟，因被公安部队调去画宣传画，待遇比其他吃不饱却还要干重活的难友好，因而得似幸存，活着走出夹边沟。此处引述的数字由他提供。在甘肃、青海几处劳改营先后呆过十几年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何之明告诉本书作者：他的同学、右派李克嘉死在夹边沟。一九八〇年前后，甘肃的右派全被平反、获释，交流信息后，大家一致认为夹边沟死人最多。对于一千六百这个数字，他认为应当是可靠的。）

从酒泉往南不远便是“古来白骨无人收”的青海，“从广东押往青海劳教场的右派能生还者仅有二成”。（注1 3：香港《争鸣》月刊一九八七年六月号第四十六页。）

广东省境内的主要右派劳改地三水农场，离广州不到百里，死亡率约为百分之二十。（注1 4：同注1 3，文内说：“该场劳教份子医生曾恩涛博士（已故）告诉我，估计知识份子劳教人员的死亡率占总数百分之二十左右。他曾解剖尸体证实，死者肝部没有任何营养储存。）

广东一个矿体分散，无法用大型机械开采的老矿，在井下挖掘的不是挂白牌的刑事犯，就是挂黑牌的右派。原始设备加低贱的劳力，结果便是用人血换矿。几年过去，二十一名右派中，除跳崖自杀者外，因坑道塌方被压死四名，因病死去二名，因伤致残者四名。（注1 5：同注1 4，第六十三页。）

反党份子们绝大多数是饥饿加劳累而死的。只要管理劳改农场的干部们通点人性，其中大多数可以免于死。譬如新疆塔里木某处，南边是戈壁滩，东边是罗布泊。一九六一年四月，劳改犯的工作是挑土筑坝，可是“每餐只有二克玉米面掺骆驼刺（戈壁滩上的一种野生植物）做成的淀粉馍。过了不久，一些‘反党份子’就进了坟墓。”不久，一位好心的、知道将犯人视作人的陈处长“派人送来十七匹骆驼的黄豆粉，从此，每天早午两餐加匀豆浆，这才减少了死亡。”（注1 6：这是一位某省冶金设计院送到新疆塔里木去的劳改犯的回忆，引自秦兆阳《两封信引起的故事》。见北京《当代》文学双月刊一九八六年三月号。）

要是每个劳改农场都有那么一位陈处长，许多人是会活下来的。新疆这个劳改农场当时的死亡总数是个谜，但有一个官方数字可用以参考。一九六〇年，甘肃省宁县的子午岭“省办劳改农场犯人死六百余人”。（注1 7：一九八八年版《宁县县志》第十六页。）

由于甘肃省官方说这六百多人死于克山病，未提及饥饿、劳累，我们且看另一处的数字。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外语学院右派学生王升陞由一辆囚车送至安徽一处劳改农场“劳动教养”。据他回忆：六〇年初，“我们劳改队四百多人，差不多都饿死了，最后活着的只剩下二十几人。”（注1 8：《中国之春》一九九二年十月号第二十一页。）

死在安徽的右派名单如今恐怕已无法统计。除前述作曲家陈歌辛之外，剧作家汪照也在备受折磨后死在那里。至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可能全都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灰中了。

湮没在历史中的还有一批十几岁的青年。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学生因对官方制定的升学政策不满而罢课，游行示威，并冲击了县委、县政府。为给反右制造气氛，当局马上宣布那是“反革命暴乱事件”，逮捕了十几名学生，枪毙了三名。（注1 9：一九八九年版《汉阳县志》第二十页。）等到二十八年后中共中央批准为案子平反时，已经没有什么人记得那些殉难者的名字了。

第十七章：再“补课”劫祸不止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煞。”六百年前，朱元璋在农民起义军中初露头角时写的两句诗，可以用来说明反右风暴尘埃落定之后的局面。共产党一鸣，百鸟齐喑，百花齐被吓煞，一九五七年夏初那热闹的鸣和放在知识份子心头只剩下了痛和苦。

“百家争鸣”呢？没人提了。好像大家都忘了共产党是主张实行“双百方针”的。正如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所说：“反右派以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形式上没有被废除，但实际上停止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百家争鸣实察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注1：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

因为右派又叫“资产阶级右派”，所以凡右派一律不得鸣、不许放。不仅政治上不许鸣放，学术上也不准。著名的力学家钱伟长撰写的《应用数学》一书，本已排好了版，现出版社不仅不肯再印，反而要向他索取拆版费。他费了数年心血写成的一篇关于弹性力学变分原理的学术论文，也因为他的新身份而被《力学学报》退了稿。

当年秋天，巴金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第三期即将付印时，收到了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所在部门的党来信，说那作者“有问题”，不同意发表其作品。主持编务的靳以立即遵命，抽掉了那篇文章，此类做法在中国就此成了惯例。

毛泽东此时必定早已忘了他年轻时在学校面对“言志”的作文试题所写的《咏蛙》诗：“独坐池城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到此时此刻，偌大的中国，的确没有一个虫儿敢作声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北京正是乍暖还寒时节，万名在反右斗争中过了关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个“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会后，八十多岁的民盟主席沈钧儒和七十岁的郭沫若率领一支队伍沿着长安街向西走，队伍里有一个高大的木架，上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的条文。在他们的背后，八十岁的黄炎培、李济深等人则另率一支老兵队伍向东走，由年纪较轻的人高举一个巨大的红布造成的心，上面写着“把心交给党”五个大字。

把心交给党，交给哪个党？这支游行队伍不是属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吗？

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什么误会也不会发生。除了共产党之外，所有的党派已经名存实亡，没有人会把心交给他们，虽然这个党派的新首领已经表示要“争取三年内使成员中左派和中左份子达到百分之八十”。

民盟一九四四年通过的《纲领草案》有如下的条款：“国家应保障人民身体、行动、居住、迁徙、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之基本自由。”（纲领“政治”部份第二条）“国家应实行宪政，厉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纲领“政治”部份第三条）（注2：转引自日本《民主中国》月刊一九九一年八月号第三十四至三十五页。）如今共产党将民盟的纲领视如厕所手纸，将民盟各级负责人大多打成了右派，如宁夏银川地区四十五个民盟支部负责人中有三十三个成了右派，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抗议。（注3：一九九〇年版《当代中国的宁夏》第一一九页。）应当说，这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如今不会忘记自己的党纲，可是为什么却一个个都成了不敢作声的虫儿？无他，人要吃饭，饭票在共产党手里。一年前毛泽东说的“不举手就不给饭吃”，可不只是说说而已。右派们的悲惨下场明摆在那里，谁还敢不把心交给党？

这些新首领其实是替共产党看管“民主党派”。譬如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民盟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新选杨明轩为副主席，以后沈钧儒去世，他接任了主席。其实杨早在一九二六年就入了共产党，比他在民盟的历史长二十年。他于六七年文革初期死时是民盟的中央主席，在共产党内却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但是八〇年中共替他举行骨灰安葬仪式时，覆盖在他的骨灰盒上的却是共产党的党旗。由此可见，要是民盟也有自己的旗帜，那也不过是一堆烂

布。它的主席既然是中共派去的，其存在也就可有可无了。

又如历史学家吴晗，一九五七年春天入党，但其共产党员的新身份却未暴露。反右后，他以老民盟的资格成了民盟北京市的负责人。有他当管家，民盟北京支部自然不会做逾越越矩的事了。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整死他，那是共产党内的事，与民盟毫无关系。

有那么些秘密的中共党员替共产党照看各小党派，按说毛泽东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不，他仍不放心，他决心扫清所有可能怀异心的人。于是又有了“反右补课”一说。这又是毛泽东的指示。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间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说的是“整风没有整好的，要补课”。而当时整风已死，唯余反右，因此所谓“补课”，只是中共各级当权派审查、计算其所辖的部门是否完成了该抓的右派指标数，少一个也要补上。各级党委为免“反右不力”，自己遭清算，便纷纷抓无辜凑数，把一九五七年没有说什么话，却又多少流露了几分不满，当时没有划成右派的人，作为漏网份子补进新的右派名单中。

没有可靠的数据告诉我们有多少人被补进右派行列，但估计不会在十万名之下。

如河南省南阳县，本已抓了八百九十二名右派，一九五八年七月开始“又在工商、文教、卫生界开展向党‘交心’运动，再划‘右派’二百七十二人。”（注4：一九九〇版《南阳县志》第三十九页。）

又如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三年级共一百八十名学生，一九五七年仅抓了三名右派，可是五八年四月间“补课”却又补了十八名，而且是经由上海市委正式批准，毫不含糊的。这二十一名右派占该班学生人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七，大大超过“指标”。这批右派中有十二名获得宽大，留校改造，每日将自己的“改造日记”贴在墙报上供人监督批判。其余的，半数被抓去劳改，半数被押送新疆去了。（注5：当事者之一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又如哈尔滨一家工厂的青年技术员李嘉亮，一九五七年鸣放时在党内会议上说过“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样的话。当时没整到他头上，可是一九五八年八月的一天，公安人员突然向他出示逮捕证，将他抓进了监狱。他的罪名是“极右份子”，根据却仅是上述那句话。六年前，李的母亲获准出国定居，正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李嘉亮表示自己是共产党员，打算留在国内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未与母亲同行。他千里迢迢由江南来到北国，不料竟成为二榜右派，被判十五年徒刑。他远在美国纽约的母亲闻讯，几乎哭瞎了眼睛。她将自己在异国给人烧饭所得的微薄工资省下来，每月往中国东北关押她儿子的监狱汇款，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度过了整整十五年。（注6：贾宏图《他从美国回来了》。）

天津二十三岁的青年王宏烈平素爱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文学小品，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被查出他发表的作品中有“右派言论”，当时未受处理。要“补课”了，党委书记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宣布他“拒绝组织挽救，甘心堕落为右派”，罪名中竟有一条“与（党）支部书记开玩笑”。

三十年代日本在东北成立“满洲国”，颁布了“国歌”。此伪“国歌”颁布的第二天，哈尔滨多处出现用其谱填了新词的传单：“九·一八事变起满洲，我满洲变成殖民地，日本强盗率同走狗，造成傀儡国……”这新歌词，渐在抗日民众中传开，其作者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个学建筑的学生、共产党员任震英。自一九三七年起，他即离开东北，到甘肃兰州以建筑师职业为掩护，从事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一九五七年中共整风、鸣放时，他是兰州市规划局长、总工程师。反右时没整到他，可是一九五八年夏天，他从苏联等国访问一回来，就被宣布是“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开除出党。有幸的是，他未被送去劳改，因而得以在逆境中呕心沥血，将黄河北岸的白塔山改造成一个俏丽的山上公园。不过，文革中，他历尽折磨。包括被绑在兰州大街的电线杆上凌辱示众，根子就是一九五八年“补”到他头上的右派帽子。

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鞍山钢铁公司下属高炉公司（炼铁厂）有三位工程师，一九五七年中共整风之时奉党委之命召集三十来位工程技术人员开座谈会，给党提意见。由于不提意见便是对整风不关心，对党不够热爱，被叫去开会的人只得凑出几件琐事提了提，算是参加了鸣放。不料，会议记录交上去后，党委认为是反党言论，主持会议

的老工程师和担任记录的归国华侨工程师也就蒙上“记录和整理反党言论”的大罪而成为右派。那第三位工程师，公司的总工长满开强在会上一言未发，当时只被告诫要“吸取教训”，免于处分，算是宽大。一九五八年，鞍钢高炉公司大队人马调到北京，为首都钢铁公司安装第一座炼钢炉。最初，这位总工长连续二十二天泡在建设工地上，连绵袄都没有脱过，直到身上长了虱子才想到回家去换衣服。他正要离开工地时，党支部书记把他叫到工棚里，取出一张纸，摆在他面前说：“你被划为右派了，签字吧！”惊愕、迷惘之后，满终于愤愤地抗辩道：我在鞍山做过结论，不划右派，为什么调到北京后还要被划为右派呢？”党支书冷冷地答道：“告诉你，你是漏网的。在鞍山不够划右派，在北京不一定不够！”随即说：“现在通知你，从今天起，免去你的工程师职称，撤销总工长的职务，工资降两级，到下面去当工人，好好接受劳动改造！”从此，满开强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屈辱生活。

地质师顾树松，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春风不度”的玉门油田，但在他自己的要求下到了更为艰苦的柴达木。在戈壁滩上踏勘时，他曾一度迷路，仅靠用自己的小便解渴，走回营地。这样的热血青年亦是补课中的右派，罪名是“要技术领导不要党的领导”。（注7：冯君莉《柴达木情思》，见北京《当代》文学双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新观察》主编戈扬女士躲过了反右的第一波，但一年多之后终于被网住了，连一直想保她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爱莫能助。

抗战期间，戈扬在重庆直接受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领导为中共工作。当沈醉手下的国民党特工人员对她盯梢，企图加害之时，邓及时安排，使她安然潜出了重庆。沈醉丢失猎物，不明所以，直到近四十年后才知道自己输给了周氏一着棋。

但是这一次，周恩来身为政总理，她和邓颖超竟未能保护住戈扬。这颇像胡风的情形，他们在国民党欲加害于胡的时候能够用计保住他，到了共产党欲整肃加害的时候，反倒束手无策了。

著名翻译家傅雷也是在补课时落网的。

傅雷当上二榜右派，实在是因为他太迂。一九五七年六月底，反右已经搞得热火朝天，虔诚的傅雷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长文，支持这场斗争。

他在文章中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共产党领导的正确”，也总结了“七年的成绩远远超过了缺点”。这都不会惹祸。但是，他在文章结尾处还表示：“为了爱党、爱政府、爱社会主义事业，爱我们自己的前途，而诚诚恳恳、切切实实的帮助党整风。”傅雷罹祸，实源于此。

这个书生可能是唯一的在举国讨伐右派的时候仍然念念不忘“帮助党整风”的人。我们完全相信傅氏“爱党、爱政府”，可是找不出证据说明那个党和政府也爱他。至少可以说，从一九五八年将他打成右派直到六六年将他夫妇逼得双双悬梁自尽。这几年间，由毛泽东控制的党是不爱他的，尽管共产党内始终有别人暗暗地爱护着他。

反右这场风暴摧折了无数大树，更摧残了数不清的幼苗。但是，也有一些小树在被巨石压倒后，凭着一股韧性，又从石缝中顽强地钻出来，在中华大地上继续高唱他们的生命之歌。

广州的青年中学教师龙潜庵成为右派后失了业，寄居亲戚家中，靠改名换姓向报社投稿每月得二十元稿酬维持生计。他开始了三年的宋元断代词典的编写工作研究却没有中断。以后他进了街道小工厂，工余仍潜心研究，持之不懈。整整三十年心血，凝成一部百万字的《宋元语言词典》，使中国有了第一部断代词典。

清朝乾隆年间有三部文学巨著问世：《红楼梦》、《儒林外史》和《歧路灯》。其中《歧路灯》始终没有付梓，一直靠抄本流传。右派份子峦星在穷愁潦倒之中，历尽艰辛，收集各种抄本，加以校勘，终于校注出完整的小说，并在八十年代出版献给读者。

江苏作家、新闻记者海汝恺当右派后的二十多年，始终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他找到堆放杂物、破门被钉死的斗室，每日劳动之余从那破裂的地方钻进去，躲在那里研究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作品，日积月累，写出四百多万字的文稿，等到文化革命后，陆续出版见天日。

文字改革出版社编辑吴越成右派后，先是囚禁，后是劳改。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他编了一部二十余万字的《汉语拼音自修课本》，一部一千余页的《汉语世界语大词典》，一部四十万字的关于浙江方言的专著。文革中，他又在枪口下被押到了渤海湾边的一个劳改农场。在难友们和基层干部保护下成功的瞒过农场当局，他写成了一部八十万字的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该书于文革之后出版，第一次印刷二十八万册，不到一个月即销售一空。

青年知识份子陈以强由右派转变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十五年后，不愿白白度过狱中的岁月，他要为人民留下一点东西。当时能够得到的唯一的书只是字典，由于“四角号码”难学、难用，他决定改造字典，重编检字法。后此，白天和其他犯人一样去劳动，夜里等其他犯人都睡下了，他再悄悄地工作，对上万个汉字逐一反覆推敲……

十五年后，陈以强出了牢门，又被平了反。他的生命之烛虽已将燃尽，他那本检字比迄今所有的汉语字典都快捷的字典已出现在全国各书店的书架上。（注9：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上海著名的杂志编辑尚丁，流放青海牧羊四年。放羊之余，他以藏族历史题材创作了一部诗剧《达赖喇嘛传奇》，还编写了海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志。

中国科学院薯类研究所杂粮研究室主任盛家廉当上右派下放农村后，数十年如一日地专注于甘薯新品种选育工作，终于在一九八二年培育出“徐薯十八号”，一下子在全国推广种植二千八百万亩，一年增产折合粮食二十亿斤。他本人也获得了一九八二年国家发明一等奖。（注10：《人物》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甘薯专家盛家廉》。）

上海水产院一位学生赵乃刚，因为反对在学生中抓右派而自己成了右派。他二十年中吃苦无数，包括在文革中戴高帽游街示众，但他仍不放弃其研究。中国特有的中华蛭绒蟹，由于长江到处筑坝建闸，回游通道断绝，产量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他辛苦十余载，试验上千次，终于使人工半咸水育苗成功，挽救了濒于绝灭的这种蛭绒蟹。他本人亦获得一九八四年国家发明一等奖。（注11：《人物》一九八六年第二期，《追求之歌—记国家一等发明奖获得者赵乃刚》。）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金湘，在音院少年班时，才华便被院长马思聪赏识，特保送入音院。可是他成为右派后，马院长就保护不了他。他被分配到新疆阿克苏地区文工团，整整十三年搬布景、打灯光、扫厕所，就是不能作曲。但他没有在逆境中消沉，终于在一九七三年创作了一部歌剧，并于七九年回到北京，担任北京交响乐团指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教研室主任。他的歌剧《原野》还越过大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连续上演十一场，使中国歌剧第一次登上西方的歌剧殿堂。（注12：一九九二年一月十日美洲《新闻自由导报》。）

一九七八年，一流学府中国科技大学将三名优秀的学者越级提拔为正教授，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教授。这三人都是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成绩斐然的科学家，其中项志遴和曾肯成当年是右派，方励之则是被批判后开除出党的准右派。

这样的例子虽然还可以举出不少，但就百万在反右运动中横遭迫害的右派份子而言，却极为个别。绝大多数应当在其专业领域里做出成就的右派份子，终身事业被葬送在劳改营里了。

即使一千年后，人们也要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黑暗的一章。我们不说“最黑暗”，那是因为这三个字属于毛泽东在九年后制造的另一场灾难——文化革命，这已成了公论。

文化革命那场遍及全国的政治迫害，宗旨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特别是右首当其冲，“叛徒、

特务、走资派”倒在其次。在文革中受罪最多，吃苦最久，坐牢杀头最多的一类人就是右派份子。

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傅小石（名国画家傅抱石之子）曾被许多人公认为是个“天才”。成为右派后，他先在农场劳改了三年，文革中又成为“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审”之后，入狱判刑十年。

青年医生王贤才，因为成了右派份子，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曾将他所译的世界著名的医学专著《希氏内科学》(Cecil's Textbook of Medicine)的译稿扔进火堆。他劳动数年后仍未被“改造”好，文革中作为“现行反革命”五花大绑的押到内蒙古体育场万人大会上“公审”，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其判决书上写着：“吹捧美帝国主义科学文明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只是有幸遇到了一位通情达理、正直的劳改队政委，又得助于一位同时坐牢的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终于在狱中再将此书的最新版译成，计中文三百四十万字。（注13：《人物》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五至八页。）

《新湖南报》编辑钟叔河在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中就是一名斗争对象，反右中更是被大张旗鼓的批判。一本《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小册子竟厚达一百多页。其主要右派言论有：“社会主义……并不是共产党发明的。……除了马列主义以外，社会主义学说还有别的流展，实行它们的理论，这样才可以显出优劣……”（注14：《人物》一九八六年二月号第七十七至七十八页。）由于这些言论，他不仅成为右派，而且被处理为“现行管制份子”。文革中，他又“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为“现行反革命”，判了十年徒刑。

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不管怎么说，这些人活了过来。可是很多人活到了一九六六年，就再也活不下去了。

兰州大学地理系学生褚松村一九五七年戴着右派帽子到农村去劳动了几年，被认为改造得还可以，获宽大，允其回学校继续读书。可是文化革命一来，老账又翻了出来，他终于绝望跳了楼。

“内控右派”也是牛鬼蛇神，与右派没有什么差别，也逃不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英，在被批斗、抄家、扫地出门进“牛棚”后，选择了死。他的妻子得到他的死讯，决心与他同去，但又不愿扔下女儿在人间受罪，只得先狠心毒死爱女，然后再只身奔赴黄泉。萧光英是一九五六年举家从美国归国的，十年间，报效祖国不成，反成了毛式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后来，他的表弟、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邓昌黎回国访问，要求看看萧光英一家的坟，结果不仅没有坟，连尸骨何在也无人知晓。一家人就这样消失了。

自杀的多，被杀的也不少。一九五七年时的《新湖南报》总编辑刘凤祥就是其中之一

刘凤祥是一九四九年中共接管政权后参加党的青年知识份子，一九五〇年任浏阳县县长时还不到三十岁。成为右派后，他被送到一家工厂“劳动教养”，被机器轧去整条右臂。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将其反右时最卖力的手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打倒后，刘凤祥与一批右派朋友印发传单，鼓动右派们起来翻案。这便成了当局将他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十五年徒刑的“罪行”之一。一九七〇年春，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大举清除“现行反革命”，毛泽东的老家湖南省省会长沙召开了两次“公审大会”，每次审完都将近百名犯人拉去枪决，其中半数以上是政治犯，其中就包括刘凤祥和他的右派朋友、原湖南省公安厅干部雷特超。（注16：《中国之春》第一〇〇期至一〇二期，杨小凯《狱中回忆》。）

差不多就在同时，北京也杀了一批“现行反革命”，所不同的只是那几十个人在被枪决之前的一个多月里，天天拖着脚镣和手铐，分组被带到市内各处的万人大会上斗争、示众。连那些同将被杀戮的知识份子毫无关系的地方，譬如“中越友好人民公社”，也把们“借去”斗一通，就像一批就要扔掉的东西最后再使用一次似的。那批人除了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张郎郎被周恩来以“留个活口”的名义保下未杀之外（因为张的父亲张仃是文化界名人，著名画家），全都死在了“无产阶级”的枪口下。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的右派、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沈元就是其中之一。右派份子反党，当然有罪，可是一个文化人怎么就犯下死罪了呢？原来他因为被斗得受不了，买了盒黑鞋油，涂在脸上扮成了黑人，进了马里大使馆。谁知马里使馆转手就把他交给了中共，他也就“罪该万死”了。（注17：张朗朗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清华大学右派学生党治国也是文革中被判作死刑的“现行反革命”，原因是他在陕西铜川煤矿劳改时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辅导工人业余学习《共产党宣言》。在被斗争、毒打了一阵之后，铜川市法院将他判处死刑，上报陕西省待覆处决。恰好那时省法院按指标行事，说已作好计划只枪毙四名，而各地当时报审的死刑犯共七名，党治国排第五，竟因此而逃了一命。（被处决的前四名均于十年后被当局承认是冤杀而平反。）党十多年后出狱，回到母校领到了一张久违了近三十年的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的毕业证书。（注18：陈祖芬《理论狂人》，《人民文学》一九八六年七月号。）

清华大学建筑系还有一位右派学生冯国将，是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侨生。他被送到清河劳改农场先后在延庆县劳改犯工厂和京郊良乡机械厂服刑。别人刑满后可以遣送回原籍，而他在印尼是第三代华侨，原籍何处都不知道，只能留在厂里就业。文革一开始，又要将他送往新疆去开荒。他终于又逃亡，成功逃到北朝鲜后，却又被那个“社会主义小兄弟”引渡回国。先是判处十年，后又改成死刑。只因后来考虑到他是印尼华侨，枪毙了对海外有影响，那死刑才未执行，让他最终活到了平反的一天。（注19：当事人与本书作者的通讯。）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卫生学校右派学生刘士源也是一个拣了一条命的死刑犯。他在劳改农场组织“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被说成是“反革命集团”，他也就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根据“首恶必办”的原则，他被判处死刑，作了死囚的牢房。只是混乱之中未被拖去执行，拣了一条命。

如此幸运右派毕竟不多，原教育部副部长柳（水）就没有度过那场劫难。柳本是个著述甚丰的学者，他成为右派后同其他地位较高的右派一样，被宽大，免于劳改。但文化革命来了，再也没有一个牛鬼蛇神可以获得宽大。他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被补，随之而来的便是严刑拷打。二十一日夜，这位六十五岁的老学者被打得大腿折断，脑浆迸裂而死。事后，人们从他的棉被里发现一小页纸，那是从当时犯人必读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中撕下的文前空白页，上面是这位学者留在人间的最后几行字：“政治迫害，毒打取供。我非叛徒，为我伸冤。”

另一个“大右派”、原《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曾被下放到长城脚下放羊。后来文革兴起，已回到北京城里的储安平成为红卫兵打骂、侮辱的对象。他曾投水自杀获救。一天，一群人又来敲门，要批斗他。他从后院翻墙而出，逃到当年放羊时的右派伙伴李汝苍老先生的家前，在门里塞进一纸条：“汝苍：我走了！安平。”从此没有人再看见过他。不久老右派李汝苍也被斗死，储安平的下落便永远成了一个谜。

储是江苏宜兴人，《宜兴县志》的著者不愿说他死了，只说他于“一九六六年深秋一个晚上，出走失踪，生死不明。”（注20：一九九〇年版《宜兴县志》第八四五页。）当时，总理周恩来曾派人调查寻找他的下落，但无结果。储安平肯定不会出家做了和尚，因为那时所有的和尚、道士都被勒令还了俗，全国已没有一所寺院可以栖身了。

他会隐姓埋名跑到国外生存下来吗？不可能，但当时确实有人成功的跑到了国外。

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徐洪慈，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以他为首，十四名同学合作写了份大字报。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人民日报》特发文《上海医学院三千同学声讨叛徒徐洪慈》，说他“妄想……搞垮党”。随后，他被送往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劳动教养”。因为不堪一天十几小时的劳役和动辄而来的扣饭，他和一位本是空军飞行员的右派合谋逃亡，求一生路。但很快被捉，判处六年徒刑，送云南省丽江劳改队服刑。一九六五年刑满，名曰“释放”，实则“留场就业”，仍然回不了家。文革一来，他又成为“反革命份子”，又判了二十年徒刑。监狱当局布置人贴了一百多张大字报，将他骂作“阴谋家”、“败类”、“毒蛇”、“叛徒”、要求“严惩”；他不甘心等着被拉去枪毙，成功越狱，历尽千辛万苦，从云南横穿中国，逃到了外蒙古。在获得政治庇护，又服了二年因偷越国境而判的刑之后，他终于成了一个自由的人——那里不是中国，没有“留场就业”一说。当他作为反右及文革的幸存者和那个时代的罪恶活见证，于一九八四年偕同蒙古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中国时，已时五十开外的人了。（注21：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人民日报》和《探索杂志》）

尾声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时，百万右派中，尚活在人间的那些人已经做了十九年贱民。其中相当多还在他们“就业”的劳改农场里等待生命之灯枯竭、熄灭。已经回到社会的那部份也还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直到两年后中共才决定给“错划为右派份子的案件”予以改正，并于一九八一年六月通过决议，公开承认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的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份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注1：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共虽然承认反右是“严重的扩大化了”，但“扩大”到何等程度，它却不愿直说。实际情况是：江苏省一万九千多右派全是“扩大化”化成的；河北省两万五千多右派，只有六名被认为是真正的右派，不予改正；山东省三万四千多右派，除八十名仍被认为是右派外，全是冤案。（注2：以上数字分别见《当代中国的江苏（下）》第八一〇页，《当代中国的河北（上）》第八十六页，及一九八九年版《山东四十年纪事》第一三六页。如本书第十三章中所述，这些官方数字应低于实际的右派人数。）除江苏省外，各省都有一些县、市留下一人或数人（如江西景德镇市七人、河南南阳市二人），说是真右派，不予改正。全国算来，总数大约只有几百。

全国知名的右派中，被宣布不能平反的只有五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和彭文应。人们对其中所谓“国家级”的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不能被平反颇能理解，因为要是“章罗联盟”的章、罗和批评中共搞“党天下”的储安平都不是右派，反右的理论就根本站不住了。可是许多人纳闷：“怎么彭文应（上海政协常委、法学家）也不能改正呢？”

原因是他“态度恶劣”。当上右派后，彭文应拒不认罪，结果职务被撤销，没有了工资。六个孩子加上老人，一家人顿失生计。妻女急得旧病复发死去，次子自杀身亡。“组织上”来人告诉他，只要写个检讨认错，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他坚决不写。子女们跪着哭求他：“家里没有饭吃了，你就承认了吧……”然而他就是不写，直到一九六二年去世，成了真正的“死不认错”。这就是为什么他直到现在还是“右派份子”的原因。（注3：袁永松、王均伟编著《左倾二十年（一九五七—一九七六）》第一〇四页。）

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林希翎不被改正的原因也是不认错。该校党委《对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是这样说的：“林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制度。”“叫嚷要‘清洗党内一大批混蛋’。”“大反斯大林，制造混乱。”“林希翎的这些言行，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些年来又一直不认错，仍然坚持其原来的立场和观点。”“用一九五七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份子的标准’衡量，林希翎定为右派份子不属错划，不予改正。”（注4：引自《林希翎自选集》第八十四至八十七页。）

就算那几百人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该打该杀，那也只占总数的千分之一。可是由于这千分之一的存在，中共便理直气壮地声明，它在一九五七年发动将百万中华民族的宝贵人才整得家破人亡的“反右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注5：同注1。）可见中共并不如它自己声明的那样，敢于“实事求是”地面对毛泽东时代它所犯的错误。

毛泽东的继承人为了维护自己执政的“法统”，至今不愿清算毛的罪恶。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浦熙修被毛点名为《文汇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的”，之后才成为右派，毛是这一冤案的始作俑者。可是由于浦在受尽凌辱之后死于文革期间，一九八一年三月中共为浦平反、开追悼会时便说浦是“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不断折磨、迫害之下”，“含冤逝世”，好像把罪责推到毛的“接班人”和妻子身上，“伟大领袖”就可以照旧伟大似的。

毛泽东取得中共最高统治权之后，对在他之前的数任中共领袖无一不泼尽污水，不怕那会玷污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可是现今的中共领导人却无此胆量，给其前任按其原貌描上几笔。

一九八九年五月，青年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前闹“动乱”时，从毛的老家湖南来了几个年轻人，朝天安门上毛的肖像上拨了一点污迹，结果自然是坐牢。其罪行不是“损坏公物”，而是“现行反革命”，罚无赦。

不过，中共对付“现反”的法子已经比十年前文明了许多，那几个青年没有一个拉去杀头。要是在毛泽东时代，杀十次头也够了。毛泽东时代，“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现在的中国，即使“谁要说党不好”，也不会“马上叫他见阎王。”；因“骨子里反党”而坐牢的事也不再听说了，社会总算前进了一大步。

在毛泽东指挥下过了二十多年的斗人生涯后，接班的中共领导人发愿不再搞运动整人了。中国人民愿意相信一点，但是人民注意到，中共一方面宣布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却又顽固的声称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拒不认真检讨其执政中的严重过失。他们以为用“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一诡辩，就可以使人民信服，真是把几亿人都当成了阿斗。

可是，历史的账即使不算也不会烂掉。毛泽东中国人民欠下的账，并不会因为当局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而可以钩销。

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中，既然光反右派挨整的人数已超过秦始皇所坑的“儒”的一千倍，要是再加上“大跃进”的人祸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们便可以相信，北京城里那个黄圈圈南面的“毛主席纪念堂”，总有一天会坚持不下去的。

据学者研究统计，自一七〇〇至一九〇〇年的二百年间，中国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人数共一千四百万。（注6：《大自然探索》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转引自《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八年第四期第五十九页。）即使考虑到史料记载的遗漏，也决不超过两千万。而在毛泽东治下，仅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就饿死了二、三千万人。（注7：《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的中国》第二册，《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着，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二七二至二七三页。）当时任毛的副手的刘少奇在那场人为制造的灾难发生后说：“要知道秦始皇、随炀帝是修长城修运河垮台的。实际上我们比他们死的人还多。”（注8：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北京“彻底摧毁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联络委员会”出版的《彻底摧毁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第六次大会发言）》第十八页，见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红卫兵报汇编》。）这正是一句实话。要是再加上文化革命中被打死的以及被迫自杀的上百万人，我们可以肯定，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超过我们可以数得出的任何一位历史上的帝王。为国泰民安计，我们世代都要提防毛泽东那样的人物攫取统治国家的权力，不管他头上是否戴着“人民救星”的桂冠，不管他设计的社会蓝图是多么美妙。

一九一八年毛泽东二十五岁时，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期。那时的北大由蔡元培主持，先后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时代的旗手”，正是中国知识界新思潮的发源地。然而“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在毛身上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果说有什么痕迹的话，那就是在他脑子里终身未消的对知识份子的敌意。自然，他有他的理想，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不过是在一个帝王般的领袖统治下百姓间的平等而已。他以为将地主、资本家消灭，亿万百姓“步调一致”的追随领袖，按领袖制订的建国宏图施工，这就是新中国了。他沉缅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现代迷信，看不到现代科学技术正逐渐改变社会，并将决定社会发展的取向。他又得力于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严密的社会组织——共产党，将他的意志传递到每一个社会细胞。于是，一个又一个灾难就被制造出来了。

有人认为，毛泽东花了过多时间去研究《资治通鉴》，马列主义读得不够，满脑子封建，才闹出那些荒唐事。其实不然。毛研究历史，熟记在心的，往往是帝王们的谋略与权术，如“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类。对于真正的治国之道，毛只是择其爱，弃其所鄙，并无深入研究，更算不上是专家。

譬如，北宋一百六十余年，社会稳定，国家机器运转正常（外敌侵扰另当别论），主要归功于被毛氏讥为“稍逊

风骚”的宋太祖赵匡胤。赵虽一介武夫，但决不愚蠢。他一重法制，以为“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二讲“干部知识化”，改革科举，扩大招生，录用优秀知识份子，一概不问“你是什么出身？”；三是实行“言者无罪”，皇帝龙袍底下从来不藏右派帽子。

可是毛泽东读历史用的却是另一种眼光。秦朝二世而亡，他不认为是暴政所致，却认为是秦始皇杀知识份子杀得太少了。“秦始皇坑儒（只坑了）四百人吃了亏，张良、陈平没有整倒，汉高祖用了，是‘镇反不彻底’。”（注9：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在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报告时的解释。）他认为要是秦始皇坑儒再彻底一些，将张良、陈平等一并杀掉，秦朝的天下就不会落到刘邦手里。

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四分之一世纪，制造了那么多灾难，误尽苍生二十多年，原因就是他从历史中看到的只是“阶级斗争”、“镇反肃反”、“反攻倒算”，浓缩起来，就只剩了一个“杀”字。只是除了“坑”之外，另有名曰“劳动改造”的苦役和流徙可供撰择，并不一定非要像用五分钱的子弹费处决林昭那样从肉体上消灭他不喜欢的知识份子。这一切都可以在《社会主义好》的凯歌声中进行，比斯大林的法子不知高明到哪里去了。

自然，知识份子在新中国受到的空前灾难，不应完全归咎于毛氏一人。自相残杀本是中共的传统。譬如，一九三三年，中共在湖北的根据的里搞肃反，杀了三万七千多自己的同志。（注10：一九九一年版《当代中国的湖北》第一三一页。）这与毛泽东无关。

一九八三年，前中宣部长陆定一在回忆廖承志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三十年代红军）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和四方面军里的知识份子党员几乎被（自己人）杀光了。”（括号内的字为引者所加。当时共产党在鄂豫皖建立的地方政权和红军第四方面军均由中共元老张国焘控制。）（注11：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读了这样的文章，使人深信，在一九三五至三八年毛泽东和张焘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中，要是张氏获胜的话，知识份子在新中国的遭遇决不会更妙。陆氏提及的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是东方专制传统和苏式共产党的“铁的纪律”相结合的产物。而反右和文革不过是一根藤上先后长出的两个瓜而已。

现在，“文革”已经作为中国历史和人类文明史上一件无双的浩劫和丑剧，同毛泽东的名字锁在一起了。但是目前中共的执政者以当年指挥反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为首，只是将“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的歌词第二句改成“反动份子想反也反不了”，仍然坚持认为他们反右反得对，只不过反得过火了而已。也许，还这段历史以真实的使命，注定将属于下一代或下一代的中共领导人——假定他们继续执政而且有勇气去做的话。即使他们不愿那么做，中国人民或迟或早，总会有自己起来清算反右的那一天。正如全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所说的：“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注12：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现在苏联已经变了，中国一定也会变。到那时，我们或我们的后代将在北大校园里的未名湖畔竖起一块小小的石碑，将为了民主的中华而殉难的林昭的血诗刻在那里。人们不会因为岁月的磨蚀而忘记她和她的同志，正如那诗里说的：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全书完）

* 再版后记 *

《阳谋》首版刊行后，有人纳闷，反右时丁某才十二岁，七亲八友没一个右派，怎么会想起写《阳谋》的呢？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五七年，我读的那个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成了“右派份子”。以后好长一段时间里，我每日清早都看见那个文弱的女子握着一把长长的竹筴帚在另一所中学门口扫地。一九六二年我进北京清华大学，第一课就是“反右斗争”的教育，因为我们系的第一届学生差不多一半是右派。系里怕我们走老大哥的路，再三向我们宣传他们“堕落”的教训。我对“右派”的兴趣就是从这儿来的。

当了三年大学生后，就再也没书读了。一九六五年九月下乡到京郊延庆县农村去搞“四清”，上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课”。第二年六月回校时，文化革命已经闹得热火朝天。毛泽东躲在南方，等着抓刘少奇的辫子。刘少奇耍不出花招，只好把一九五七年镇压右派的老办法拿来对付一九六六年的学生。正当“反动学生”、“反革命”、“右派”们被斗得呜呼哀哉之际，毛泽东突然回到了北京。这位当年反右的总导演摇身一变，扮起保护学生的角色来。他指责刘少奇搞“白色恐怖”，“镇压学生运动的没有好下场”。刘少奇不敢反驳说“我是照你五七年反右的法子做的”，周恩来又躲在一边不帮忙，刘只好认错下台。

被刘少奇“镇压”过一阵的我辈小人物，要是早出世九年，必是毛泽东的“阳谋”的牺牲品，清河、兴凯湖、夹边沟的劳改犯、饿死鬼。可是如今竟光荣步入人民大会堂，见到了满面红光的毛主席。大家受宠若惊，把一九五七年大哥大姐的教训全忘光了。“七亿人都是批评家”，谁有错都可以批判，不用担心右派帽子。我忘乎所以，竟在一九六七年伙同朋友写了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康生的大字报。多亏“敬爱的江青同志”乃时向我们发出严厉警告，使我猛醒，明白这个革命是他们的，没我们的份。于是我做起“逍遥派”来。

既不能读书，又不能革命，闭中无事，只好退而求其次，收集点资料，准备日后把这个奇特的革命记述下来。不曾想到，在收集文革资料的同时，我不由自主的对反右那段历史也产生了兴趣。到了一九八七年，中共开除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三个人在一九五七年早就被开除过的。当时自忖手头的资料尚不足写文革，却已够为反右写点东西，遂当起业余作者，写成了此书。

香港《九十年代》月刊提携新人，先行连载，后又印行了本书的第一版。可惜该版极不成熟，遂决定重写。不少人为这本书的新版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有些本人头顶“右派”帽子坐过十几年牢，有些是右派的子女，有些本人不是右派，却是那事件的历史见证。所以这次修订后的新版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作品了。今趁再版印行之机，向他们表示谢意。

人都有梦，身在异国梦更多。我的梦是：这本目前只能在中国大陆个别小书摊偷偷卖的书，有朝一日能够在全中国自由发售。

丁抒 一九九三年六月·美国